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以色列总理拉宾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引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的艾伦比将军率部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巴勒斯坦地区，战后国际联盟便委托英国统治那一地区，简称“委任统治”。其实，委任统治跟殖民统治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叫着好听一些而已。

但巴勒斯坦地区很难统治，它汇集了世界上最复杂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矛盾，跟巴尔干一样也是个大“火药桶”。英国人很快就头痛了，最让他们头痛的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英国人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东西，吃不着羊肉反而惹了一身骚。自从英国1917年发表了《贝尔福宣言》以来，到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犹太移民逐年增多，他们买田置地、集体垦殖自成一统，与土著的阿拉伯居民的摩擦与冲突日益增多，当地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真所谓：

一纸宣言洒向大地都是怨  
阿犹冲突巴勒斯坦起狼烟

巴勒斯坦地区的紧张局势暂且按下不表，却说1922年3月1日这天，耶路撒冷市一家犹太人门前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原来是这家女主人生了个胖男孩，割礼前起了个名字叫做伊扎克·拉宾，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喜祝贺。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长大能成器，以后能当上将军总理什么的，在犹太人中间叫伊扎克的孩子多得是。

但这个伊扎克似乎跟别的伊扎克有些不同，因为前来道贺的人中有不少贵宾，来了些“伊休夫”大人物。所谓伊休夫，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团”的希伯来语简称，后来的以色列国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看来，这家人与伊休夫头头们不是一般关系。有这层关系，这孩子长大后还能没人照应？

果不其然，小拉宾上学后伊休夫领袖本-古里安便开始“照应”他了，总拿他寻开心。一天，他当众笑着问小拉宾：“喂，我说伊扎克，你知道你怎么会生在耶路撒冷吗？”小拉宾眨巴着眼睛，摇摇头说不知道。本-古里安一听乐了，“不知道吧，告诉你。是我把你爸爸招进了犹太军团，这才使他来到了巴勒斯坦，也才使你生在圣城耶路撒冷。”说罢他放声大笑起来，其他围观的人也跟着哄笑起来。拉宾委屈地瘪着嘴跑回家，揪住父亲的袖子，缠着他问是不是这么回事。老拉宾笑而不答，既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此事遂成了一桩悬案。

对本-古里安的话可以不信，但对梅厄夫人的话就非信不可了，她也是伊休夫的高级领导人。她是不跟人乱开玩笑的，对什么事都特别认真。拉宾长大从军后，一次闲聊中提到自己母亲曾当过索莱尔·博尼赫建筑公司的出纳。旁边的梅厄夫人一听不答应了，放下咖啡杯子一本正经地纠正说：“谁说你妈是出纳来着？我才是那家公司的出纳，你妈是坐在我对面的会计！”吓得拉宾一吐舌头。

在以色列高层领导人中，熟识拉宾父母的人当然不止本-古里安和梅厄夫人两人，建国前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家简直就是一个政治沙龙，是工党上层人士经常光顾的场所。人们很喜欢那里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可以海阔天空地大谈政治的环境，当然还有女主人的喷香咖啡和精制小点心。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很喜爱这对热情好客的夫妻，他们虽然来自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家庭，有着大相径庭的经历，但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请看：

## 前 言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国内的和平集会上遇刺身亡。这一噩耗震惊了整个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沉痛哀悼，甚至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都派出代表参加他的葬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他是“中东和平的积极推进者，以色列人民的杰出领导人”。

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国家领导人，拉宾长期以来在以色列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建国前，他作为犹太武装精锐部队“帕尔马契”的指挥官，执行过各种艰巨的任务；建国时，他作为以军“哈雷尔旅”旅长，在独立战争中有过突出的表现：60年代，他作为以军总参谋长，与达扬将军出色地指挥了“六天战争”；70年代，他作为驻美大使，为建立以美特殊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4年他第一次出任总理后，通过与埃及的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开辟了两国和解的道路；80年代，他在出任国防部长期间，力主从黎巴嫩撤军。1992年他第二次出任总理后，通过与巴解组织的和谈，推动了整个中东和平进程。

可以说，他是个在以色列国每个重要发展阶段都有突出表现的军人和政治家，一个长期在中东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明星人物。他是在国际传媒中频频亮相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他不是个完人，早年他是个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鹰派。但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敢于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格局中一次次刮起和平旋风，从一个著名的战争英雄转变为大无畏的和平斗士，最后为了中东和平大业英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是以色列史和阿以冲突历程的缩影，“勇敢的士兵、无畏的政治家与杰出的和平缔造者”，是世人对他非凡一生的客观评价。

我从90年代初开始研究拉宾其人，试图通过他的事迹加深对中东事物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得到了拉宾总理的热心帮助，他通过助手哈伯尔先生授权我引用他的著作，并向我寄送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和资料。在以色列前大使亚可夫先生转赠了我的研究成果后，他于1994年5月25日亲笔来信表示感谢和勉励。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在1993年年底访问以色列时因故未能见到他，我永远失去了这一机会。

应我的请求，拉宾总理的遗孀莉赫·拉宾夫人为本书作了序，我对此深表谢意。从她那些一往情深的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今中东和平局面的来之不易。珍惜它吧！

以色列前大使亚可夫先生、公使衔参赞康露丝女士、文化官普罗泊先生和新闻官芮马克先生向我提供了多方帮助，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以色列现任大使南月明女士、文化官卡斯比先生和新闻官沙鸥娜女士，非常关心此书并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资料，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使馆文化官助理石春暖女士，她长期以来一直向我提供各种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此书也凝结着她的心血。

此书是在中国以色列专家徐向群、宫少朋和殷罡等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而且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最新资料。内蒙古草原部落创作室主任贺雄飞先生对本书的结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云南大学的左文华、肖宪、西北大学的阎瑞松、四川师大的许晓光教授和我的助手陈开明提供了特别协助，我对他们的感激是难以表述的。

承蒙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热情约稿，我得以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权作我对已故拉宾总理的深切怀念。责任编辑胡务先生对本书作了精心修订，一并感谢。

杨曼苏

1997年元旦于昆明

## 序

究竟是什么使得伊扎克显得那么不寻常——他是那样地广受人们尊敬，那样地备受人们信赖……他的去世引起那么多人的悲痛，人们是那么怀念他和需要他？

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我 16 岁时上苍安排我与他相遇谈起，当时我就感到他是个超群绝伦的人。

我陪伴他度过了一生——与他同享成功的欢悦，与他分担挫折的忧伤，与他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与他同甘共苦患难终生。我们深感幸运的是，我们同舟共济地经历了我国短暂历史的各个阶段。作为具有重大使命感的人，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英勇抗争誓死不屈，不断奋斗以求生存。

独立战争后伊扎克在一次采访中说：“为使今后我们不再出现艰难地保卫祖国的状况，我愿为此奉献出全部精力和生命。”从那时起他全力投入到军队建设中，为把以色列国防军建成一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装备最优良的军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确保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权方面，他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懈怠。劳累了一天他总要扪心自问：我今天作得够了吗？有没有疏漏之处？他的座右铭上镌刻着这样的词句：“为取得安全与和平，我愿贡献出整个生命。”多么真切动人的言语！

对他来说，最有效的防御措施是走向和平的谈判桌。

应当感谢历史一再向他提供机遇。总理一职赋予他选择优先处理问题的权力，使他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兑现了大部分诺言——教育经费增加了一倍，外国投资扩大了三倍，改革了卫生保健事业，减少了一半失业人口，接纳了数十万犹太移民，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公路网，大大改善了供电能力，实现了整个通讯系统的现代化，筹建了使以色列工业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温室”，等等。

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垂顾表现在向他提供了引导这个国家走向和平时代的机遇上，以证明他不仅是战争英雄而且也是和平斗士。当然，这一切远远不够。

在以色列的公墓中，自建国以来埋葬了一万八千名志愿为国捐躯的青年。在经历了痛失亲人的惨剧之后，在了解并立志摆脱种族灭绝厄运之后，他们被称为“烛光的一代”。他们乐于大声谈论和平，公开宣称自己有权获得安全的未来。我们必须像伊扎克那样关心爱护这一代人，因为他们身上寄托着数代人的梦想。

我们能让这些人的鲜血白流吗？我们不能让发生在伊扎克身上的惨剧重演，我们也不能背叛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基辛格在伊扎克的葬礼上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走上了一条孤独的路。但是，如果他所作的一切很有意义的话，那就不能说他是个孤独的人。”

作为一个可能是巨大的挑战，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是发现、培育并支持那些愿意完成伊扎克未竟之业的男女青年。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成为寻求和平的勇士。

Mrs. Lea Rabin

1997 年 5 月 4 日于特拉维夫

以色列总理拉宾

## 第一章 投笔从戎

拉宾的父母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经历大不一样。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来，而且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呢？这本身就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

### 殊途同归耶市结合 拉宾学农立志报国

1917年的一天，一个膀大腰圆的蓝眼睛小伙子，在美国芝加哥市政府的前厅里转来转去，一脸焦急神情。原来，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巴勒斯坦，英军招兵小组正借这个地方对报名参加犹太军团的人进行体检。体检合格的人兴高采烈，没过关的人垂头丧气，这个小伙子就属于后者。他身体五大三粗的没问题，但没想到查出脚有毛病。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脚底板太平了点儿，俗称平足，不能长途行军。招兵官二话没说就勾掉了他的名字。他很沮丧，不甘心就这么轻易被淘汰，正琢磨着怎么蒙混过关呢！

他就是拉宾的父亲。

老拉宾原本不姓拉宾，原名叫纳赫米亚·鲁比佐夫，出身于俄国乌克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他早年丧父，从14岁时起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家里穷得常揭不开锅。这种贫困家境，再加上俄国社会对犹太人深刻歧视和迫害，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反抗意识。长大后，他成为领头闹罢工的革命斗争积极分子，因而也成了沙俄当局的服中钉肉中刺。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运动，但当局险恶地把民众斗争矛头引向厂犹太人，不久全俄各地便发生了血腥的反犹暴乱，大批无辜的犹太人死于非命。见机会一到，密探和宪兵立刻倾巢出动满城搜捕他。他东躲西藏地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些鹰犬的追捕，孤身一人逃往海外，最后流落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市。

在芝加哥他当过沿街卖报的小贩，后来学了手艺成了一名裁缝，很快融于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中。老拉宾对美国的感激和热爱，给小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拉宾的记忆中，只要有他父亲总要大谈在美国的经历，话匣子一打开，他的眼睛里总要放射出激动和无比留恋的光芒。但他不是那种三个饱一个倒的庸人，生活稳定后又去念夜大充实自己，后来成了一名犹太裁缝工会的积极分子。到美国后他的政治兴趣仍然很浓，很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参加了一个左翼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而且还渴望亲手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人的家园。一战末期这种机会来了。当时，英国为争夺中东着手组建一个犹太军团，其中一个招兵组来到了芝加哥，当地的犹太人纷纷报名参军。鲁比佐夫闻讯扔下剪刀匆匆赶去，没想到让一双平脚板给砸了锅。

但他发现招兵的人并非个个都铁面无私，坐在窗子旁那位就不那么挑剔。而且他验兵的方法很独特，只用眼睛上下打量你，看上的人就可以当兵，因此他面前的队排得特别长。鲁比佐夫决定闯闯他这一关。他灵机一动，挤上前去又领了份招兵表，偷偷把自己的姓改成“拉宾”，然后大模大样地向那位招兵官走去。这位招兵官身材不高，宽额角下有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光犀利得能把人刺穿。他扫了那张招兵表一眼，什么也不问地抬起头盯了“拉宾”半晌，然后大笔一挥让他过了关！从此，鲁比佐夫就变成了拉宾，而且以后再没改过来。后来老拉宾才知道那个招兵官名叫大卫·本·古里安，其

实他不是个军官，是从先入伍的士兵中抽出来帮忙的。由此看来，本·古里安对小拉宾那番话不是玩笑，至于他当时是否看出老拉宾的猫腻，就不清楚了。

就这样，老拉宾更名改姓混进了英军第38营，这个营又叫“美国营”，因为里面大部分官兵都是美国犹太人。本·古里安与他老搭档本·茨维也在该营当兵，他们很快便与性格开朗的老拉宾成了莫逆之交。更有意思的是，大概是老拉宾为人忠厚的缘故，许多犹复运动的头面人物都对他有好感，在开赴巴勒斯坦途中他还结识了一位名叫雅博钦斯基的军官。雅博钦斯基是犹复运动中“修正派”的领袖，该派主张修正主流派的温和立场，以强硬手段来推行复国大业。他对憨厚的老拉宾一见如故，不仅对他宣传了一气修正派的观点，还耐心地教他学了不少希伯来语。

部队越逼近巴勒斯坦，老拉宾越激动，他急于到那里大显身手。但可惜犹太军团成立得太晚了，这支部队基本上没打什么仗，他们1921年开抵巴勒斯坦时一战已接近尾声。万幸的是耶路撒冷发生了反犹骚乱，老拉宾的部队奉命前去平息，这才给他提供了点儿用武之地。俗话说福人自有天相，别看他在耶路撒冷没放几枪，但俘获的“战利品”却比谁都多，他带回的不是一群满脸胡子的阿拉伯俘虏，而是一位楚楚动人的犹太姑娘！开到耶路撒冷那天，他刚从卡车上跳下来，就看到一群阿拉伯男人正把一位犹太姑娘往屋子里拖，那姑娘尖叫着拼命挣扎。他一看不好，抬起枪来冲天放了两响，那伙人闻声呼啸一声逃得无影无踪。他忙三步并作两步抢到跟前，从地上扶起那位泣不成声的姑娘，见她的外衣和汗衫全撕烂了，忙脱下自己的军衣披到她身上。那姑娘颤抖着伏在他胸前抽泣着，他顺势把她揽到自己怀里，轻声细语地安抚她。就这样，老拉宾在耶路撒冷街头结识了犹太姑娘科亨·罗莎，接着以参军那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征服了她，当年就与她结为百年之好。

那么，罗莎是从哪儿来的呢？

话说1919年夏季的一天，在俄国黑海港口敖德萨的码头上，一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围成一圈跳“霍拉舞”，吸引了不少过路人围观。原来，他们是一伙犹太人，准备到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集体定居点“基布兹”，启程前他们打算乐一乐。欢乐中，他们中的一个机灵鬼一眼就看出围观人群中有一位犹太姑娘，于是很快就把她拉进了这个旋转的圈子里。她就是拉宾的母亲罗莎。

罗莎的经历与老拉宾大不相同。她出身于俄罗斯戈梅尔市一个富有家庭，从小不愁吃穿，家中有十兄妹，父亲是个极虔诚的犹太教徒。小罗莎不仅自幼聪慧过人，而且个性极强，认准了的事一干到底。但她父亲也是个认死理的人，于是父女俩平时就免不了叮当两句。上高中时她与父亲彻底闹翻，随后离开了家庭。当时她父亲认为犹太子女该上犹太学校，孩子在那里既能学知识又会遵守教规，这才能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她则坚持去一所政府办的中学就读，理由是在那里能学到现代科学知识，这才有助于提高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父女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恼怒中父亲脱口骂了声“滚！”没想到小罗莎起身雇了辆马车绝尘而去。起初父亲以为她耍小性子没放到心上，到晚上还不见她回来才慌了手脚，忙派人出去四处寻找，可哪里找得到？过了几天她带话说自己住在外公家，叫家里人不要接她，她从此不回家了。

她外公十分疼爱这个聪明而又倔犟的外孙女，高中毕业后把她带到圣彼



得堡经商。他是个经营木材的老手，手把手地教她如何谈生意，罗莎很快就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木材商。接着她转向利润更丰厚的行业，到十月革命时她已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军需品厂老板了。但随后她开始倒运，革命政权容不得她这样的资本家，不久便将她扫地出门。没想到此举在该厂引起了工人罢工，当局忙收回成命请她回来担任厂长，但她看出自己在俄国已无前途，不会有她的甜面包吃，遂决意离开这个国家。但到哪儿去谋生她没拿定主意，想先去北欧或美国看看。她中学时受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崩得派”的影响较深，对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民族家园没有什么兴趣。但她毕竟是个年轻人，在敖德萨轻而易举地让这伙年轻人俘虏了，她无法抗拒这群朝气蓬勃的新伙伴们的吸引力。于是奇迹发生了，她决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这艘希望之船毅然地向巴勒斯坦驶去。

到巴勒斯坦后，罗莎与她的伙伴们在加利利海畔的卡乌塔兹·钦乃里特安营扎寨，接下来便是一场凭意志和身体与大自然搏击的创业战。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特殊产物。头几批犹太移民都是个体户，既没资金也没经验大多失败了，移民们死的死跑的跑影响很坏。后来人们决定集体合作，便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基布兹，里面不讲贡献大小一律平均分配。这种“公”字色彩很浓的集体农庄，或许在其它国家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但在自然条件恶劣且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巴勒斯坦站住了脚，后来成了犹太移民点的主要形式。罗莎她们的基布兹条件很恶劣，劳累、饥饿和疟疾轮番进攻这伙年轻人，第一个败下阵来的就是罗莎本人。她从小根本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也不习惯基布兹的那种斯巴达式的生活，那里是吃食堂睡大铺。数月后她悄然离开基布兹去耶路撒冷投奔她的叔叔，随后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护士工作。1921年耶路撒冷发生了阿拉伯起义，她被那可怕场面吓坏了。在危难之际，一位高大的犹太军人用厚实的胸膛保护了她，她的心弦触电般地抖动起来，扑倒在他的怀中。

一战结束后英国人解散了犹太军团，老拉宾没再回美国重操旧业，设法在海法市邮电局找了一份差事，罗莎也到一家木材厂当会计。分娩前她回到耶路撒冷叔叔家，生下大儿子拉宾。1923年，老拉宾把全家迁到了特拉维夫市。

生活一走上正轨，拉宾夫妇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犹太大国的政治活动中，这时罗莎逐渐显示出她的政治意识和组织才能。她在这方面比老拉宾强多了，她被推选为特拉维夫市市政委员时，老拉宾只不过是一名金属工会的积极分子。到后来他们连自己的家都贡献出来，每天，来自各阶层的工党积极分子总要在哪里讨论或争论到夜深人静。罗莎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很浓，她虽然始终未加入工党，仍被人们称为“红色罗莎”。

此况下，父母亲用在拉宾和小他三岁的妹妹拉切尔身上的精力就没多少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兄妹二人从小就学会了干各种家务事。在客人们激昂慷慨地发表高见之际，收拾桌子、添茶水和上点心之类的事全落到他俩身上，他们就像两条小鱼似地在大人身旁钻来钻去。就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在小拉宾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刚上完幼儿园，妈妈就把小拉宾送进一所离家很远的工人子弟学校寄读。在当时，人们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犹太工总办的学校是个惯例，他们不能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到晚上妈妈还不来接自己回家，小拉宾害怕得一咧嘴哭了起来，这马上引起了其他孩子的齐声大哭。见劝不住，老师们无

可奈何地耸耸肩，摊开双手：哭吧，反正这出戏每年都得上演一次！

头几天妈妈没来看他。或许是因为她抽不出时间来，或许是她认为根本没必要来，孩子是未来犹太国的财产，他们必须从小接受最严格的集体主义教育。事实确实如此。在这所靠近沙漠的学校里，学生不论大小都必须自己作饭、洗衣服、种菜和干各种杂活，自私和偷懒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最使孩子们提心吊胆的是校庆那天。从一大早他们便汗流满面地来回奔忙，整个校园犹如一个嗡嗡作响的大蜂窝，只有当戴着白手套的校长确信每个角落都一尘不染时，身着校服的孩子们才能松口气。

小拉宾并不害怕这种半军营式的生活，他害怕的是母亲会突然撒手离去。多年的操劳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痊愈已无可能，大家都希望她能活得更长一些。每当放假回家，他和妹妹总是想方设法使母亲更快活一些，方法是撒娇、讲故事和送上自己烤的点心。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含着泪把和妹妹搂在怀里。她从不溺爱孩子，对拉宾和拉切尔兄妹很严厉，上顿不吃的东西下顿照样端上来，一直到吃完为止。但孩子们最敬重的是自己，她既满足又伤感。孩子们身后是怔怔地望着她的老拉宾，他根本不听妻子的劝阻，到处借钱为她治病，他要履行自己当初的山盟海誓。对母亲病情的牵挂，使拉宾变得沉默和内向，他在同龄孩子中显得有些早熟。这逐渐形成了他的性格，初次见到他的人总觉得他有些腼腆。

初中毕业后，拉宾报考了北加利利地区的卡多里农业学校。当时犹太移民的拓殖活动蓬勃发展，各地急需农业技术人员，于是报考这所著名的农校便成了大热门。可惜拉宾的中考成绩不太理想，虽然分数达到了录取线，但学校通知他还得复试一次才能决定取舍。这份通知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整个暑假他通宵达旦地复习功课，隔壁一位工程师也花了不少时间辅导他的数学。这些心血没有白费，在复试中他以高分被学校录取。1937年秋，他成为卡多里农校的一名新生。

卡多里农校的气氛与工人子弟学校大不相同。诚然，学生们仍要参加各种劳动和公益活动，但学校的管理方式相当民主，人们没有被强制感。为表示对学生的人格尊重，教师从不到考场来监考，他们以讨论的方式向学生灌输知识和责任感。在该校，考场作弊和违反纪律的现象是罕见的，学生完全是自主管理，班委会和校学生会拥有严格管理的大权。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有人把拉宾从课堂上叫了出来，说他妈病重了。一进家门，他见到了泪流满面的父亲，刹那间他一切都明白了，接着拔腿向医院狂奔而去。但太晚了。母亲虽然使力睁开眼睛望着他，但已说不出话来，他扑到母亲身上嚎陶大哭起来。当晚母亲就咽了气。

7天悼念活动结束后他回到了农校，同学们觉得他好像变成了个陌生人：他的话更少了，甚至显得有些孤僻，常一个人闷在教室里苦读。母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觉得自己该更成熟一些，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对民族有用的人。一年级结束时，他成为班上20个同学中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但他的书念得不顺当，因为阿犹冲突愈演愈烈。

### 少年从军终生无悔 初次行动夜间破袭

二战前，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

步。这一局面，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在中东地区制造纷争并借机控制中东政策的必然结果。1936年阿拉伯人举行了反对英国当局偏袒犹太人的总罢工，随后发生了阿犹之间的流血冲突，紧张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才有所缓解。

在骚乱过程中卡多里农校几次遭到袭击，师生们也被卷入到冲突的涡流中。由于年纪太小，拉宾和低年级学生们最初只充当各犹太定居点之间的传令兵，后来才教他们使用武器。军事教官是个英俊而勇猛的青年，有一种天然的领袖气质，名叫伊加尔·阿隆。他是卡多里农校的首届毕业生，由于勇敢善战，在当地威信很高，犹太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加利利之王”的外号。拉宾很喜欢这位性情随和的大哥哥，而阿隆也很喜欢这个听话的小弟弟，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动乱中学校关门停学，拉宾被分配到当地一个基布兹里去锻炼。白天他在地里干活，晚上担任警卫工作。后来他被委任当局招收为一名犹太编外警察，当地叫“加菲尔”，以合法身份保卫犹太定居点的安全。干了6个月加菲尔之后，他接到学校10月份复课的通知，在返校前一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复课后他一时很难集中精力学习。对基布兹的生活和加菲尔经历的回忆常使他分神，欧洲犹太人的遭遇和二战的进展也时时牵动着他的心，他坐立不安。后来他对自己发了火，这半瓶子的醋算什么？他命令自己安心学习，这才逐渐走上正轨。毕业时他以最佳成绩成为受奖生，英国高级专员亲手向他颁发了奖章，还给了他一笔7.5个巴勒斯坦镑的奖金买农具。可惜的是，他没把这笔钱花到农业上，而是花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上了。后来他当了以色列总理后，老拿这事跟英国客人开玩笑，说自己还欠着英国政府7.5巴勒斯坦镑的债！

比这笔奖金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给了他一个奖学金名额，让他去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水利工程，这能使他成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工程师，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同学和老师们纷纷向他祝贺，但他自己却陷入了沉思，晚上一个人在操场上徘徊到半夜。该去吗？机会确实难得。但建国大业谁来干呢？他眼前浮现出从美国来到巴勒斯坦的父亲，又浮现出为了建国大业累垮了的母亲，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而奋斗的呢？他觉得自己此时不应该离开巴勒斯坦，于是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毕业后拉宾参加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时犹太青年劳工运动在海法市附近一个基布兹里举办了一个训练班，要求学员们在训练期间自己动手创建一个新的基布兹。这个活动很合他的胃口，专业知识和组织才能全都用上了，主人翁的感觉使他很愉快。要不是当地“哈加纳”的指挥官来找他谈话，他很可能会在亲手建起的基布兹里当一辈子农民。

哈加纳是伊休夫的秘密武装力量，成立初期主要任务是自保和联防，后来经过英国情报军官奥尔德·温盖特上尉的调教，开始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民兵武装。1936—1939年巴勒斯坦发生了阿、犹冲突，英国人怕阿拉伯人破坏他们的输油管道，便让哈加纳帮他们巡查守卫。在这一过程中，派去的教官温盖特教给犹太人不少实用的突袭战术，后来知名的达扬和阿隆等人受益不浅。当时伊休夫与英国委任当局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当委任当局需要犹太人协助时，它就会默许哈加纳的活动，双方的关系就会好一些；当英国人觉得争取阿拉伯人更重要时，他们就会压制犹太武装的发展，双方的

关系就会紧张起来。伊休夫当时还不能跟委任当局搞僵，好歹得维持着与它的关系。但伊休夫始终坚持一点，那就是谁也不能限制它接纳犹太移民，谁要是阻止它这样做，它就跟谁坚决斗争。

二战爆发后，德军在巴尔干和北非地区连连得手，并大有向巴勒斯坦扩展之势。此况下伊休夫决定从哈加纳中抽出一批精兵强将，组建一支准备跟德国人打硬仗的常备部队。这支 1941 年 5 月 15 日建立的部队就是著名的“帕尔马契”，它是希伯来语“突击连”一词的缩写，初创时有 1080 人分为九个连。帕尔马契首任司令是伊扎克·萨德，他是个从克里米亚来的犹太移民，身材高大心胸开阔人缘很好。他乐于提拔和重用年轻人，在他提拔的人中，起码有三位后来当上了以军总参谋长

当这位哈加纳指挥官问拉宾是否愿意参加帕尔马契时，拉宾毫不犹豫地点了头，其实他当时连帕尔马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殊不知这一点头，便定下了他的终身去向。他很想从这位指挥官嘴里打听些帕尔马契的情况，但一无所获，后者只是告诉他“人们”认为他适合参加这支部队。接下来的事情就更离奇了。从那次谈话之后，足有几星期没人再来找他，好像那一次是找错了人似的。正当他焦躁不安时，有人通知他去哈加纳指挥部。到了地方一进门，有位比他年长些的人向他伸出手来。拉宾认出了他，他是当时已小有名气的摩西·达扬，他也当过编外警察“加菲尔”，现担任帕尔马契的一位连长。达扬的问话低沉而简洁。他问拉宾会用什么武器，拉宾回答说只会用左轮、步枪和手榴弹。又问了一些情况后，达扬以拍板的口吻对他说：“你适合干这个工作”。然后与他握手道别。但接下来又是几个星期没动静。直到 1941 年 5 月底，人们才又把他找了去。

当时的形势很严峻。有消息说，卖国的法国维希政府已同意轴心国军队开进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这样一来盟国战略要地巴勒斯坦受到了威胁。于是英军决定先行开进黎巴嫩和叙利亚，并请求犹太武装配合这次行动。6 月初一的黄昏时分，拉宾与 20 个左右同样兴奋紧张的年轻人被召集到靠近黎巴嫩的哈尼塔基布兹，随后又被领进了基布兹的阅览室。他们在那里见到了哈加纳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其中有伊扎克·萨德、雅柯夫·多里等人，达扬也在场。多里首先讲了话。他简要地介绍了当前形势，说明哈加纳已决定参加这次行动，要求大家勇敢地参加这次战斗。拉宾对此兴奋不已，他庆幸自己头一次就能参加这么重要的战斗行动。但他高兴得太早了。头几天让他们干的事情不过是徒手沿着边界巡逻而已。直到 6 月 8 日，上级才交给他们一项多少有点风险的任务。具体的工作，是潜入到黎巴嫩境内割断敌军的电话线，指定拉宾任组长。小伙子们马上着手准备行动，他们那副认真和紧张的样子引起了院子里老兵们的兴趣，老兵们决定给这些新兵一些有益的“鼓励”。于是，他们使着眼色围了过来。

“喂，小伙子们，知道对面是些什么人吗？告诉你们，是塞内加尔人，他们是从不抓活的俘虏的！”一位留着一副土耳其小胡子的老兵诡秘地说。

“喂，听着，伙计，千万别大靠近那些奥地利人。知道吗，他们总是先开枪后问口令！”

看到有的新兵脸都吓白了，老兵们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夜深了，一路急行军的拉宾小组到达了黎巴嫩境内的指定地点。在惨淡的月光下，一根根电线杆幽灵般地排列在原野上，电话线在夜风的抚弄下悲切地呜咽着。组里拉宾的年纪最小，但今天的事他得挑大梁，任务是爬上电

线杆割断电话线。

他觉得嘴里干得厉害，心怦怦地跳到了嗓子眼儿，他不知道附近有几支枪在瞄准他。现在他们是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很可能成为人家的靶子。更要命的是得光着脚往上爬，因为爬电线杆的铁齿蹬子下午才送来，根本没时间练习使用。不能迟疑了，是死是活就这么一回。他抱住电线杆子，一咬寸，噌噌几下爬了上去。到了杆头，他掏出钳子，“咔吧”一声剪断了电线。说时迟那时快，他只觉得身子一歪，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咕咚”一声摔到了地上。他咧着嘴，揉着摔疼了的屁股爬起来，也不敢叫唤，仔细一看才明白了原因。原来是电线杆栽得很浅，主要是靠电线拉扯着才“立”在那里，电线一断电线杆当然要倒了。没别的办法，他一咬牙又爬上了第二根杆子，接着又是“咕咚”一声栽了下来。那一夜，他到底一共“咕咚”了多少次也数不清了，好在任务总算完成了，而且没遭到敌人的枪击。因此，尽管屁股都摔肿了，返程时一瘸一拐的，他仍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不再害怕了。

与拉宾相比，达扬那晚上可惨了。在与维希军队交火时，一颗子弹击碎了他的望远镜，他永远失去了左眼。从此达扬戴上了黑眼罩，在人群中极其显眼，那个黑眼罩后来成了他的象征。伤亡倒不算什么，令人气愤的是英国人后来根本不提哈加纳也参与了行动，好像那天是犹太人自己跑去凑热闹似的。

从那一夜起，拉宾就成为帕尔马契部队的一名成员。

但帕尔马契在二战期间始终没派上用场，因为隆美尔的部队始终没打过来。局势一缓和，英国委任当局便在1943年要求解散帕尔马契并交还武器，此时这支部队已发展到3000多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标志着英国当局与伊休夫短暂婚姻的解体，此后英方无意再与犹太人合作。这事在伊休夫领导人中引起了意见分歧。想当初，他们本来是准备拿帕尔马契跟德军拼命的，现在眼看德国人来不了了，仍保持一支全脱产的常备军还有什么用呢？因此大多数领导人主张解散帕尔马契。这一来可以跟英国当局搞好关系，二来也能节省很多开支。但这一主张遭到那些来自基布兹的领导人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二战结束后帕尔马契会派上大用场，现在绝不能解散。双方的意见顶了牛。最后伊扎克·萨德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把全脱产的帕尔马契改成半脱产的部队，把人马分散到各基布兹中去，一半时间习武一半时间劳动。人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帕尔马契部队随即“消失”了，成员主要集中在金诺萨和拜特奥兰两个大基布兹中。

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大批官兵离队的问题。帕尔马契官兵都是从哈加纳部队中精选出来的，现在让他们整天跟老百姓干农活憋坏了许多人。在伊休夫允许人们参加英军上前线的情况下，许多人穿上体面的英军服装去了欧洲战场。这种离队现象在二战末期尤为严重，因为许多人得知亲友死于纳粹灭绝营后红了眼睛，要想拦住他们是不可能的。但拉宾始终没走。这倒不是他贪生怕死，而是他本能地预感到战后巴勒斯坦地区将发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激烈冲突，到那时帕尔马契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犹太武装，必须保住它的架子不能散掉。况且，在二战结束前的这个期间里也不是没事干，上级交给他不少任务。

争强好胜偷藏哑弹  
初露锋芒营救移民

1943年，21岁的拉宾被任命为帕尔马契一名排长。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因为此时整个帕尔马契只剩下1000多人了，能作战的只有3个连共9个排，拉宾排是其中火力最强的一个排。

一天，上级命令拉宾带领战士给哈加纳首长做军事表演。他信心十足地按时把队伍带到演练场，随后认真地进行了操练。观看的首长对他的排的训练水平很满意，他自己也很兴奋。在收拾东西准备返回时，他发现路边扔着一发没打响的迫击炮弹。他决定偷偷地把这发哑弹带回去。因为他的排里只有迫击炮没有炮弹，那名炮手老在他耳边念叨此事，这发哑弹说不定修修还能用。他左右看看没人注意，便捡起炮弹装进了自己的背包。他把队伍带到海法市后，让战士们徒步走着回去，自己上了公共汽车。这倒不是他要搞特殊，而是怕连累众人。他想得很简单：即使被英军查了出来，那么也只有他一个人坐牢，其他战士不会跟着倒霉。

还好，那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他和那发哑弹都安全地回了“家”，他颇为自己的勇敢和机灵劲儿自豪了几天。没想到，一个星期后连长怒气冲冲地找到了他，横眉立目地问他：“丢了一发炮弹，是不是你偷的？”他顿时傻了眼，承认是自己干的。他想解释一下，但连长根本不听，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并通知他几天后去军事法庭受审。这飞来的横祸差点使他瘫倒，他一连几天都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中，不知道为这事会受多重的处分。到了那天，他自己去了设在海法的哈加纳指挥部，到临时组成的军事法庭上受审。进去后他发现，屋子里只有两位军事法官，一位是帕尔马契司令萨德，另一位是哈加纳高级军官约瑟夫·阿维达尔。

阿维达尔的脾气很大，一通拍着桌子的高声痛斥，几乎使拉宾背过气去。相比之下，萨德的训斥还算温和。拉宾老老实实说明了事情经过，诚恳地承认了错误，并把那发哑弹交了出来。看他那副大汗淋漓的狼狈样，两位法官对视了一眼，叫他在外面等候判决。在过道上，拉宾抱着头蹲在墙根，耳边一直轰鸣着两个字：完了！这几分钟对他来说漫长得没了边。最后法官们又把他叫了进去，对他的判决是至少在一年内不得晋升。他听罢大大松了口气，发现衬衣都让汗给湿透了。他不怕提升慢，只怕人家把他从帕尔马契中赶出去，现在总算是没事了。

那发让他大倒其霉的哑弹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但拉宾却将其牢记在心。当他1947年升为帕尔马契的作战部长时才搞清楚，原来那发打不响的炮弹是当时帕尔马契剩下的最后一发炮弹，怪不得人们像寻宝似地追查它的下落，看到底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把它偷走了。

1945年帕尔马契以营的建制扩大了规模。说是营，其实不过是加强连，每营才二百来人。拉宾那个偷哑弹的“污点”已被淡忘了，被提升为第一营的训导主任，换句话说就是该营的二把手。在二战即将结束的6月份，伊休夫把主要精力放在接纳欧洲犹太移民的工作上，因为接来的移民越多，以后能分到的地盘就越大。在这个问题上，伊休夫与英国当局的矛盾极其尖锐，双方已经接近不客气动武的边缘。委任当局用武力阻止犹太移民涌向巴勒斯坦，并把大批被截获的“非法”移民关进集中营；伊休夫则通过明的、暗的渠道拼命输入移民，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移民工作的正常进行。同年10月拉宾接到上级通知，命令他和营长执行代号为“连接战役”的行动，把关在海法市以南的阿色里特集中营里的大约200名犹太移民解救

出来。

这个行动有一定难度。第一，此次行动不能以死打硬拼的方式进行，因为移民中有不少老弱病残，在激烈的交火中他们会有大量的伤亡；第二，集中营主要守备力量是阿拉伯编外警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在救人前得设法制服他们；第三，伊休夫仍不想为此与英国当局完全闹僵，再三交待尽量避免向英军开枪。为此，拉宾从营里挑选出 200 名最优秀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另外又派了一些战士伪装成“教师”混入集中营作内应。在行动之前，他与营长又把整个方案仔细审核了一遍，直到找不出大破绽为止。

一个漆黑的深夜，拉宾带领突击队悄悄逼近了集中营。整个营区被探照灯照得亮如白昼，但又静得出奇，只听见青蛙和秋虫此起彼伏的欢唱声。拉宾一挥手，几名队员冲上去剪断了电网，人们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栅栏。在第二道栅栏处，他们遇到几位等候的“教师”，后者告诉拉宾，他们已偷偷敲断了阿拉伯卫兵的步枪撞针，……正说着，阿拉伯卫兵听到了动静，纷纷爬起来拉枪栓扣扳机，但只听到“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子弹却打不响。这时一部分突击队员飞身扑了上去，用枪口逼住了阿拉伯人。拉宾率领另一批人急速冲到英军营房前。还好，只听见屋里传出一片鼾声，英国人睡得正香呢！

这时移民们已在“教师”们的指挥下行动起来，他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镇静无声无息地向大门口走去。营长过来命令拉宾负责殿后，叫他半小时后再撤出集中营。当时的情景荒诞得如同一个梦游者眼前的幻境：在雪亮的灯光照耀下，黑压压的人群悄然无声地向大门口移动着，酷似原野中一队结伴而行的鬼魂，秋虫在为他们鸣奏着进行曲。营里静得怕人，拉宾听得见自己的喘息和心跳。蓦然，从拐角处钻出一名犹太编外警察，只见他背着手、踱着方步与拉宾擦肩而过，但却什么也没看见！

两点差一刻，拉宾率领后卫部队撤离集中营，他们抄近路一路小跑冲到接运移民的卡车前。到这时拉宾才发现事情坏了，因为还有一半移民正在半道儿上磨蹭呢！时不待人，营长立即决定由他自己把上了车的移民运走，剩下的人由拉宾设法带到海法附近的拜特奥兰基布兹。两人正低声商量，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在深夜这枪声响得使人心惊肉跳，接着又是一枪，随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原来，第一枪是一位驾车路过的英国军士开的，一名突击队员当即回击了一枪。不想回击那枪打得太准，直接命中了心脏，那位可怜的军士趴到方向盘上，死了。

拉宾忙带人返回接应落在后面的移民。他心里直埋怨自己太粗心，竟忽视了他们是些刚逃离苦海的可怜人。这群移民，更确切地说应称为难民，多为老弱病残，拖儿带女不说，每个人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包袱。其实里面净是些连纳粹匪徒都看不上的破烂儿，但这些劫后余生者却把它们视为传家宝，说死也不肯扔掉。这些人已走不动了，拉宾命令战士们接过他们的包袱搀扶着他们往前走。到了拜特奥兰山脚，这些人再也无力举步了。拉宾下令战士们扛起孩子拖着大人往上爬，他自己也举起了一个孩子跨到脖子上。这孩子只有几岁大，却被纳粹的死亡恐怖折磨得像只会叫的小猫，任人摆布不哭不闹。孩子温暖的小屁股摩蹭着他的脖子，弄得他痒酥酥的，那一瞬间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自己肩负着犹太民族重任之感。正想着，他忽然觉得一股热流顺着脖子流到了脊背上，不好，回过神来的孩子痛快地撒起尿来！

直拖到天大亮，拉宾才把这批人弄到了山顶。他先把移民们藏到一片树林里，然后派两名战士到前面打探消息。情况很糟，被激怒的英军已追上来并包围了山顶的拜特奥兰基布兹，但好在包围圈还有两个没合严的口子。拉宾忙指挥众人从缺口进入了基布兹，把移民们疏散开并藏好了武器。这时英军的援军到了，并开始撞击基布兹的大门，情况万分危急！正值此际，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海法市赶到了山顶，与英军抗争。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情绪激昂。到了下午，整个山顶挤满了不断赶到的犹太人，移民们趁机消失在人海中。英军始终没敢开第一枪，最后悻悻地撤退了，“连接战役”取得了胜利。

一营的官兵们喜气洋洋，士气高昂，纷纷要求下达新的战斗任务。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被一系列这类活动激怒的英国委任当局，决定给伊休夫和哈加纳一次沉重的打击。时间定在犹太人的安息日那一天。

### 血气方刚驾车摔伤 黑色周末横遭拘禁

不久上级交给一营一项新任务，命令他们袭击委任当局的“机动警察部队”。这支部队自恃火力猛机动性强，常对犹太武装进行心狠手毒的打击，许多破获哈加纳军火库及抓持枪犹太人的事都是它干的。帕尔马契司令部决定打掉它的嚣张气焰。为尽快摸清敌情作好准备，拉宾搞到一辆摩托车代步，到哪儿都骑得飞快。一天，正当他高速驶经工厂区时，一辆大卡车突然从奈希尔水泥厂里钻出来向左拐，刹时间卡车就到了他的面前，只听“砰”地一声巨响，他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来时，眼面前晃动着一张熟人的脸。那人看清拉宾真的醒了过来，便戏谑地笑了，“喂，我说伙计，你可真会找麻烦。我费了半天劲才在沟里找到了你的左脚腕子！”拉宾闻言失色，挣扎着起来要看左脚，但那条腿已用石膏固定了，根本动不了。那人见拉宾急了，便安慰说，“别害怕，没那么严重，你只是撞坏了左膝盖骨。”营长和战友们都来看望他，但这宽慰不了他那懊丧的心情。三个星期后人们把他从医院送回了家，以后他只能关注行动的进展和诅咒自己的命运。在养伤期间，他并未意识到一场灾难正向自己袭来。

1946年6月29日的深夜，拉宾突然被街上传来的汽车马达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惊醒，随后便是粗暴的敲门声。拉宾的父亲开了门，一位被犹太人蔑称为“白头翁”的英军伞兵上尉闯了进来。他疾步走到拉宾床前喝问：“他是拉宾吗？”老拉宾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刹时间，一大群荷枪实弹的伞兵如临大敌似地冲进屋子，用枪指着拉宾；同时，足有一个排的伞兵包围了这栋房子。在一阵乱七八糟的搜查后，拉宾被英军粗暴地拖下床，不由分说地架上门外一辆大卡车。他父亲和一位临时在家里过夜的客人，也被同车押走。汽车没开多远，一转弯拐进附近一所暂时充当拘留所的学校。随后被捕的人不断地送来，拉宾在那里遇到了被抓来的摩西·夏里特，他是伊休夫公开机构“犹太代办处”政治部的负责人。很明显，这不只是一次针对帕尔马契个别暴露成员的逮捕行动，而是针对整个伊休夫大规模空前的镇压行动！后来人们才弄清楚，那天夜里约有10万英军和2000名警察参加了这次全巴勒斯坦地区的大搜捕行动，他们冲进几十个基布兹和犹太代办处搜查，逮捕了包括



绝大多数领导人在内的约 3000 名犹太人。只有两个领导人未遭逮捕，一个是恰巧在国外的本 - 古里安，另一个是不便抓捕的梅厄夫人。这一天在以色列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六”。

拉宾等人最初被关在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之间的拉特隆，两天后被转移到加沙地区的拉特鲁恩集中营。拉宾觉得很对不住他父亲，老人在被带走时没来得及带上假牙，在集中营里足有两个多星期不能好好吃东西。那位客人则更倒霉，无辜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才被释放。遭到沉重打击的伊休夫很快就缓过劲来。国际犹太人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严厉谴责英国这一敌对行动，并告诉英国人它的负责官员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有事可以到那里与他们会谈。这一着使得委任当局相当被动，因为犹太代办处是国联认可的机构。与此同时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也组织起来，接通了与外面的联系。犹太代办处指派哈依姆·舍巴医生来照看囚犯，他仔细地检查了拉宾的伤腿并设法让他住进了集中营医院。但当他进而劝英国人释放拉宾时，英军情报部负责人恶狠狠地说：“别说他只是伤了个膝盖，就是两条腿全断了，也得呆在这里！”看来英国人很清楚拉宾是干什么的，他每次到 X 光室透视检查时，窗子外面都设立了双岗加以防范。

拉宾腿上的石膏到 7 月底才被拆掉。他看到整个左腿已变得畸形和僵硬，十分伤心，继而悲观地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兵打仗了。他一方面拼命锻炼恢复腿的功能，另一方面找了些专业书复习准备重新务农。但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因为他风闻帕尔马契准备以武力解救他们。他对此焦急万分。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单是他那条不听指挥的腿就会给战友们带来可怕的伤亡。万幸的是，那则传闻没变为现实，而英国当局在 11 月份突然释放了他们。

出狱后他还是不能正常走动，郁闷中他又萌发了去伯克利深造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阿隆，阿隆断然反对：“这绝不行！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我们自己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此时你怎么能离队呢？”拉宾明白他是对的，遂打消了读书的念头。不久，他被任命为帕尔马契第二营营长，年仅 24 岁。为了对付英军的突击检查，他身上常带着两个假身份证，其中一个名叫罗森伯格，另一个名叫罗森堡。

到 1947 年初伊休夫加快了建国的步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犹冲突愈演愈烈，英国人绝望了，最后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处理。甭管这事会有个什么结果，阿、犹双方都明白，一场印、巴分治式的大决战势不可免。此况下，身为“犹太建国协会”主席的本 - 古里安接管了犹太代办处，出任防务委员一职，以加强军事领导。上任后，他立即召集了哈加纳营级以上的军官开会，在会上他第一次明确地要求大家要为即将到来的恶战做好准备，因为犹太民族已经到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

## 第二章 独立战争

在老殖民帝国当中，英国是遗留祸根、挑起纷争的老手。犹如它在印巴分治过程中留下克什米尔问题一样，它在巴勒斯坦地区也留下了阿、犹纷争问题，到它拍屁股走人时两族纷争已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该地区的犹太人在大国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以武力强行在巴勒斯坦地区建起了自己的国家。

按照流行的说法，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也就是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与埃及、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发生了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为了保卫巴勒斯坦家园，阿方称之为“巴勒斯坦战争”；以方认为自己是为捍卫国家独立而战，故取名为“独立战争”；学者们则把它定为“第一次中东战争”，以便为阿以之间数次大规模战争排个顺序。

### 决战前夕方知力绌 争夺耶城勇挑重担

1947年4月的一天，伊加尔·阿隆兴冲冲地从哈加纳的防务会议上回来。他告诉拉宾，本·古里安特地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犹太武装能否挡得住阿拉伯武装的进攻。他回答说有这种基础，但还需要大大补充人员和装备才行。

拉宾烦躁地掐熄了烟头，望着窗外一声不吭，他并不认为这事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这至多表示本·古里安现在关心军队建设了，可他早两年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时不关心这个问题？

那天，本·古里安在防务会上列举了哈加纳的武器数量。它们为：10073支步枪，1900支半自动步枪，186挺重机枪，444挺轻机枪，672门两英寸口径迫击炮，96门三英寸口径迫击炮……正规战中必需的飞机、大炮、坦克和装甲车可以说是没有，只有两辆从英军那里偷来的轻型装甲车。从人员规模来看，当时组建的所谓“野战军”约有1.2万人，实际上是哈加纳的扩编，其中真能打仗的不过是帕尔马契那几千人。就算加上不听本·古里安指挥的激进犹太武装“伊尔贡”和“斯特恩邦”，全部能打仗的部队也不过万把人。现在，要用这么一支用步枪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去对付即将杀来的数以万计的阿拉伯正规军，这不是开玩笑吗？

拉宾认为本·古里安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他对本·古里安的看法很矛盾。

他和帕尔马契其他同事非常敬重本·古里安，这位绰号“狮子”的实干家对建国大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水平和能力确实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拉宾尤其惊叹他有一种近乎神奇的远见卓识。本·古里安常在会上提出一些人们意外或反感的见解，但不管其他人如何反对他毫不让步，而且常用雄辩而尖刻的语言与他人争论，使反对者感到很大的压力。然而不久事实就证明他是正确的，从而使反对者又一次丢人现眼。他的作风有些专断，在紧要关头他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常用“阳萎”和“意志上的阉人”之类的话讥讽对方。但说来也怪，尽管许多人对他很有意见，还是忠心耿耿地跟着他干。由于他能干敢于并且经常正确，自然而然成为伊休夫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但拉宾在两个问题上对他很反感，一是他对于武装力量建设问题的态

度，二是他对帕尔马契的做法。

照拉宾的看法，1936—1946年这十年是建设军队的大好时机，但伊休夫领导一心扑在接纳和安置移民等工作上，错过了这一宝贵时机。他不由得回想起当初伊休夫号召人们参加英军的情景，想起这事他就觉得窝囊：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却去管英国人的事，搞得哈加纳和帕尔马契差点儿散了架子。他坚信，如果当时伊休夫能把主要精力花在招兵买马上，现在就用不着扳着手指头数有几条枪了。他很奇怪，为什么历来精明过人的本古里安，在这个问题上没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呢？

至于本·古里安对待帕尔马契的态度，拉宾是极为愤慨的。按理说，帕尔马契是哈加纳的精华，它的出色表现给伊休夫长了威风，本·古里安理应极力爱护它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对这支英雄部队是尽力排斥和压制的。他从一开始就对帕尔马契不感兴趣，因为这支部队的官兵多来自与他政见相左的“巴勒斯坦统一工人党”，他对此存有戒心。在帕尔马契因战功累累影响扩大之后，本·古里安就想方设法对它进行“外科手术”了。具体的作法是重用从英军回来的犹太军官，用他们来排挤帕尔马契的指挥官，最终造成了帕尔马契的规模难以扩大的恶果。建国前哈加纳部队总共约有3万人，其中，能打硬仗的帕尔马契部队仅有3000人。拉宾认为，本·古里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短视和狭隘，导致了建国初被动挨打的局面。

1947年10月，在联大就巴勒斯坦分治问题表决前夕，25岁的拉宾被提升为帕尔马契的副司令兼作战部长。11月29日联大通过了分治决议，拉宾在特拉维夫参加了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看着欢呼雀跃的人群、他心中掠过阵阵阴影。他知道，犹太人这次外交胜利只会进一步刺激阿拉伯人，后者将会以全面进攻来粉碎犹太人建国的美梦。他也知道，这个分治决议完全是美苏等大国一手促成的，否则犹太人根本谈不上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阿拉伯代表在联合国说，犹太人无权对巴勒斯坦提出任何要求。他们指出，大卫和所罗门在公元前三千年建立的古以色列国只存在了72年，此后连个犹太国的影子都没有，现在犹太人凭什么说巴勒斯坦是自己的故土？从道理上来说，阿拉伯人是明显的受害者。犹太代表则强调：我们虽然被迫流浪了三千年，但我们始终心系巴勒斯坦，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回到故土的表现。现在分治决议业已通过，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双方都明白下一步是开打。目前犹太人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实施分治协议，但这支军队在哪里？

应当说，拉宾的焦虑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太偏激了，有些情况他不了解。本·古里安不是个书呆子，他当然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但建国前的情况很复杂，他不能由着性子乱来，当时巴勒斯坦的事情是英国人说了算。英国在巴勒斯坦驻有大批军警不说，而且严禁当地平民百姓拥有武器，逮着轻则关押重则处死。哈加纳的很多武器是靠妇女的裙子掩护和转移的，海上有英国军舰巡逻，大宗武器根本运不进来。当时英、犹关系已经全面恶化，英国军警重点盘查的是犹太人，达扬就吃过这种苦头。1939年10月，他和手下40多人连人带枪让英军抓获，在审讯中许多人遭到拷打，后来在大牢里关了一年多。此况下，本·古里安只能谨慎地发展武装力量，武器弹药还得东挪西藏地防备英军查获，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点豆成兵。另外伊休夫当时也没钱买武器。国际犹太组织给的钱是建立定居点的，建国前就跟它们要钱买武器也不成道，更重要的是，伊休夫必须尽力维持与英国委任当局的关系，许多事情还需要它的协助才行。

现在的问题是打不过也得打。许多著作，包括达扬的自传，都把独立战争说成是 1948 年 5 月 15 日打响的，说这个国家成立几小时后 5 个阿拉伯国家正规军就对它发动了全面进攻。拉宾认为这完全是杜撰，无非是想衬托出以色列建国之艰难。实际上那天根本就没有正式宣战和敌军大规模入侵的事，战争早在那天之前的 6 个月就开始了。

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大通过了分治决议，30 日清晨各地阿、犹混居的村镇便爆发了流血冲突，双方的“非正式战争”开始了。随即，阿拉伯武装人员开始围困耶路撒冷市的犹太人。当时全巴勒斯坦地区约有 60 万犹太人，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就有 10 万人，丢掉耶路撒冷这座宗教圣城，对犹太人心理上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主要集中在新城，住在老城犹太区里的有大约 2500 人，阿拉伯武装想首先拿下老城犹太区，进而占领新城和整个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武装是考克吉率领的“阿拉伯解放军”，名曰“军队”实际上是个民兵组织，名义上的头领是伊拉克人塔哈·哈希米，后发现他是个大草包考克吉才顶了上去。考克吉原是奥斯曼帝国驻叙利亚的军官，组强能力差但打仗很勇敢，在阿拉伯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

拉宾认为这个仗很难打。第一，联大决议规定了耶路撒冷的国际飞地特性，伊休夫领导急于立国接受了这一决议，这就束缚了自己手脚。反之，由于阿拉伯人不接受这个决议，可以自由行动先下手；第二，耶路撒冷市内还驻有英军，他们要拖到 1948 年 5 月 14 日才撤走。这些英军明显地亲阿仇犹，构成了以军行动的严重障碍；第三，犹太人主要集中在西部沿海平原和北部加利利地区，中部耶路撒冷的犹太区犹如阿拉伯人大海中的孤岛，在地理上阿拉伯人具有围点打援的战术优势。

更糟糕的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天也离不开外援，10 万人的食物、武器、弹药和人员等补给全靠外面运进去，就连他们的饮用水也要靠特拉维夫以东 20 公里处的机井供应。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公路有 70 多公里长，大部分路段从阿拉伯人居住区通过。阿、犹双方都很清楚，只要这条补给的“生命线”一被切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坚守不了几天。从 1947 年 11 月底起，这条交通线就被阿拉伯武装切断了，重新打通公路的任务是个极其难啃的“硬胡桃”。哈加纳总司令部把这一任务交给拉宾去完成。

### 护车队打通补给线 遭伏击奋力突围

这个胡桃确实难啃。除个别地段外，这条公路基本上在阿拉伯居民区里穿行，到耶路撒冷前要穿过阿雅隆山谷。这条路能卡住脖子的“瓶颈”有两处：一处是位于阿雅隆山谷中部的拉特隆高地，另一处是拉特隆以东的山谷出口。公路到了拉特隆高地便开始曲折爬坡，车速骤然减慢。正因为有这样的地形特点，早在中世纪时十字军就在拉特隆设立了据点——一座石头高墙的修道院，委任统治期间英国人又在那里建起了台戈特警察据点。这两个据点视野开阔，可互相火力支援，易守难攻。第二个瓶颈又叫作“山谷大门”，公路到了那里突然变狭，车辆只能紧擦着山壁行驶，根本无法开快。这两个地段帮了阿拉伯人的大忙。他们根本用不着沿途设防堵截，只要守住这两个瓶颈，犹太人的车队就到不了耶路撒冷。对于一个狙击手来说，射击开不快的卡车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拉宾接手这个任务后首先得解决保护司机的问题，因为司机要是忙着躲子弹，即使人不死车也容易翻到山沟里。他找来一些可以防弹的钢板焊到驾驶室两侧，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保护随车战士的问题没解决，他们仍暴露在敌人交叉火力射击之下，一点防护设施都没有。时间一长，官兵伤亡数字直线上升，士气大受影响。有的战士公开抱怨说：“司机和乘客都有了装甲保护，可我们什么都没有，难道伊休夫就拿不出一点儿钱来保护我们？”到后来他们彻底绝望了，深信自己注定要死，只是时间迟早而已。于是他们开始玩一种冷酷的算命游戏，凑在一起用纸牌算谁是下一个去死的人，这样一来士气更加低落了。目睹此况拉宾焦急万分。他一方面尽量找钢板焊制土造“装甲汽车”，保护押车官兵。另一方面尽可能亲自参加战斗，以身作则提高士气。但好景不长，他的土造装甲汽车运行不久，考克吉也研制出土造穿甲弹来，官兵们伤亡又增加了。随着阿方伏击水平越来越高，拉宾护送补给车队的行动几乎完全停顿。耶路撒冷里的犹太人频频告急！

此况下，哈加纳司令部抽调其他部队协同拉宾部队在4月5日发动“纳契松行动”，强行打通这条补给线。在强大的攻势下，阿拉伯武装后撤到阿雅隆山谷两侧的山顶上，公路可以通车了。哈加纳司令部趁机用近300辆卡车向耶路撒冷抢运了6天的补给品，使那里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哈加纳的增援部队一撤走，退缩在据点里的阿拉伯人又杀了出来，公路又被切断。

1948年4月15日，26岁的拉宾被提升为帕尔马契新建的“哈雷尔旅”的上校旅长，手下有2000名官兵。在同一批参加哈加纳的人员中，他是提升得最快的，七年就由个小兵当到了旅长。但他不是靠“走后门”提上来的。他的那些“叔叔阿姨”没帮什么忙，本-古里安对帕尔马契存有戒心，自然不会专门点名提拔拉宾。其他人不能插手帕尔马契的事，因为它是个独立单位。再说，在天天都有流血牺牲的情况下搞这种歪门邪道也不行，指挥官没真本事和战功是难以服众的。

哈雷尔旅在70公里长的交通线上护送车队本来就很吃力，再要求它去攻占拉特隆等据点就更勉强了，而且它也没有攻坚战必需的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4月18日阿拉伯武装向耶路撒冷犹太人据点发动猛攻，那里的哈加纳部队陷入险境，斯科普斯山顶哈达萨医院中的77名犹太医生、护士被杀害。本-古里安闻讯极为震怒，下令伊扎克·萨德率部增援拉宾旅，在4月19日再搞一次大规模的补给行动。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拉宾预感到这次阿拉伯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此建议把行动日期改在20日以打乱敌军的部署。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本-古里安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英国人准备提前从耶路撒冷撤走，因此又作出让拉宾旅随车队到耶路撒冷抢占地盘的决定。拉宾认为英人根本不可能提前撤走，因而反对这一计划，但他的意见遭到上峰粗暴的拒绝。司令部通知他，本-古里安和萨德将与他同去耶路撒冷，出发时间是20日凌晨。

天刚蒙蒙亮车队就出发了，350辆卡车扬起的尘烟在公路上形成一条20公里长的滚滚巨龙。打头的是一辆土造装甲汽车，里面是双目圆睁随时准备射击的警卫战士。跟在这辆护卫车之后的是一辆轻型装甲车，本-古里安和萨德坐在里头。再往后是长长的车队，拉宾在车队尾部殿后。奇怪的是，半路上阿拉伯人一枪都没放，经历过多次血战的拉宾却感到更加紧张，阿拉伯人会设伏的预感始终在折磨着他。他觉得沿途对方连冷枪都不放颇为反常，该不会出什么大事吧？接近拉特隆时人们紧张起来，护送的战士们纷纷打开枪

机，紧张地注视着两边的动静。还好，什么事也没发生，最前面的几辆车平安地过去了。人们松了一口气，交换着庆幸的眼色。

猛然，“哒哒哒哒……”一梭子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手榴弹像冰雹般地向车队砸了下来。在“安拉至大”的震天呐喊中，数以百计的阿拉伯战士跃出掩体向山下冲来，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打响了！前面几辆汽车中弹起火，道路一下子堵住了，护卫的战士们拼命反击着，情况乱成一团。早有准备的拉宾，赶紧命令后面的一个土造装甲连冲上去增援，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接近公路。但这次阿拉伯人计划得很周密，从高地的警察局和修道院里射出的炮火非常凶猛，考克吉的战士冒死猛冲，被击中的车辆更多了，整个车队终于陷入瘫痪。拉宾咬紧牙稳住神，把最后一点儿本钱——从英军那里偷来的两辆装甲车——拿了出来，它们密集的火力迫使敌军攻势减弱。这时从耶路撒冷杀来的援军也赶到了，两军合力才把阿拉伯人赶回了据点。

车队又前行了。亲眼目睹这场激战的本-古里安额头的青筋暴跳着，一句话也说不出。20辆被击毁的卡车抛弃在路边，车队带上20多名伤亡的战士，直奔耶路撒冷。

拉宾判断得很准，英国人根本没有提前撤走的意思。这样一来，哈加纳不得不面对两个对手：阿拉伯武装和英国驻军。要抢占地盘要得到英国人的默许，否则就会直接与英军发生冲突，而英国人毫无偏袒犹太人的意思。但本-古里安不管这些，一味命令萨德和拉宾立即对城北和城南的阿拉伯武装发起进攻。这场代号为“杰布西行动”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以军一抢地盘英军就加以制止，25日英军把他们赶回了原地，哈加纳敌不过英国人的坦克大炮。

耶路撒冷的争夺战陷入了僵局，它的补给线又被切断，哈加纳司令部深感焦虑，叫拉宾到特拉维夫来商讨下一步行动。坐汽车经过拉特隆很危险，于是人们给拉宾找了一架破烂不堪的小飞机，让他碰碰运气。在人们担心的注视下，那架飞机蹦跳着从十字军山谷匆忙清理出的跑道上起飞了，开飞机的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头儿。老爷子自有独特的办法，从启动发动机那一刻起便大声祈祷，让上帝帮他克服困难。还好，上帝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让那架破飞机安全降落到特拉维夫机场上。

总参谋长雅柯夫·多里疾病缠身不能主事，总参工作实际上由作战部长伊加尔·雅丁负责。雅丁在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再次要求拉宾努力打通补给线。于是又经过一个星期的恶战，耶路撒冷至拉特隆之间的敌人总算是肃清了，但拉特隆的敌军据点仍未拿下来，阿拉伯人的抵抗异常顽强。拉宾部队伤亡惨重，一些连队已成了空架子，上级派了一个排的“青年支队”补充兵力，可那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大孩子。激战中，每当拉宾看到这些孩子惨白的脸色时，他真想闭上眼睛不看他们，他只能在心中诅咒那些忽视军队建设的人。

5月14日，在耶路撒冷市郊马拉赫·哈哈米沙基布兹的仓库里，一架摆在桌子上的旧收音机传出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的庄严声音。躺在地板上的战士们闻声爬了起来，兴奋的议论汇成了一股欢庆的声浪。不料，这声音吵醒了一位累瘫了的战士，他费力地睁开睡意十足的眼睛吼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瞎吵什么？快把那玩艺儿关了！我困得要命，他那些好听话我明天也听得见！”有人上来关掉了收音机，仓库中出现出令人难堪的寂静。当时拉宾也在场，他抽着烟缄默不语，他不忍心责备这位最勇猛的战士，他

知道这个战士跟自己一样窝着一肚子火。

### 抢占地盘耶市鏖战 另辟蹊径绕道而行

5月14日早晨，英国人刚撤离耶路撒冷市，以军就一枪未放地抢占了市中心地区，随后又攻占了城外北部和西部地区，但东部的橄榄山至锡安山一带仍在阿拉伯人手中。到15日情况变了。原先跟以军周旋的是由考克吉率领的阿拉伯民兵组织，从这天起换成了约旦正规军——阿拉伯军团。这支部队是由英军将领格拉布将军创建的，官兵多为骁勇善战的贝都因人，经严格训练后战斗力很强。结果15日阿军发动反攻，夺回了城北阵地。17日形势发生逆转，大批阿拉伯军团部队从北线攻入市区抵达老城，包围了那里1700名犹太人，随后又向新城犹太人发起进攻。这时拉宾接到掩护一支补给车队进入耶路撒冷的命令。

这次他想搞得彻底一些，制定了夺占拉特隆及附近雅鲁村的作战方案。但这一次阿方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拉特隆的大部分阵地，原因是考克吉部队正向阿拉伯军团交接拉特隆据点。公路打通了，拉宾赶紧通知特拉维夫发车。但他等了一整夜，鬼都没见到一个，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末了，从远处孤零零开来了一辆车，到跟前一看是自己的装甲侦察车！哭笑不得的战士们讽刺当夜任务是“护送孤儿”。拉宾火了，大嗓门问特拉维夫是怎么回事。运输队指挥官抱歉地说，组织工作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当天的发车。拉宾确信他是撒谎，是为不相信他能打通公路找的借口。

17日凌晨他正忙着部署当天的护送任务，耶路撒冷旅旅长大卫·沙梯尔来找他。原来沙梯尔请求他借两连人帮助进攻老城。拉宾素来看不起沙梯尔，生怕他把自己两个连的弟兄给赔进去，因此提出派手下两名军官与他共同制定作战计划。沙梯尔勉强同意了。

不多时，派去的作战参谋依梯尔·阿米塔打来电话，焦急地说：“伊扎克，你快过来看看，他制定的计划简直是个灾难！”拉宾忙赶到沙梯尔的指挥部，一看沙梯尔的作战计划便愣住了。原来沙梯尔准备从雅法门攻进老城，而那道城门正是阿军重兵把守的一道城门。沙梯尔解释说，他准备用借来的两个连进攻锡安山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而由他的部队来攻打雅法门。说着说着他被自己的计划陶醉了，他保证很快就会有一面以色列国旗飘扬在老城的大卫塔上，而那位升旗手将是他本人！随后沙梯尔又要求拉宾再多派些兵来助战。拉宾压住反感冷冷地说：“别拿着脑袋楞往墙上撞！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把整个哈雷尔旅都交给你指挥，但他们必须按照另一个计划作战！”

这下子沙梯尔脸上挂不住了，他愠怒地问拉宾有何高见。拉宾说他准备先围住老城，待里面的阿军弹尽粮绝后再发起进攻。沙梯尔轻蔑地一撇嘴，噌地一下从桌上跳下来，鄙夷他说：“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招儿呢，不就是个围城的俗套子吗？那还不得闹腾一两个月？照我的计划，保证老城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拉宾火冒三丈地骂道：“你那个该死的计划只有一个十足的白痴才想得出来！它注定要失败！你还有脸提它呢。”

见势不妙，手下人忙劝住了他们的争吵。最后，拉宾念及老城犹太人的困境勉强同意了沙梯尔的作战计划，随后赶回了自己的指挥部。那天，他设

法使 30 辆卡车开到了耶路撒冷。

18 日沙梯尔旅的战斗打响后，依梯尔向拉宾通报：“只有哈雷尔旅部队的进攻奏效，锡安山已经拿下来了，但对老城的进攻毫无进展。”进一步了解详情后拉宾才知道，沙梯尔的突击队连雅法门的边儿都没挨着，它的指挥官在发起冲锋前就负了重伤，这样一来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拉宾的两个连身上，有 45 名战士被阿拉伯军团围困在锡安山上。见事情弄成这样，拉宾气得说不出话来。下午他匆匆赶到沙梯尔指挥部商量解决办法。

沙梯尔似乎没看出拉宾已憋着一肚子火，又提议让锡安山上拉宾的 45 名战士突出重围杀进雅法门。拉宾冷笑一声，恶狠狠地问道：“那么请问你的部队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借给你的那 80 名帕尔马契士兵就是城里的犹太人望眼欲穿的援军？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让山上那些精疲力尽的战士充当攻城的主力！”这次沙梯尔很有涵养，他保证了山上的人一冲下来他就派兵增援他们。这时，老城犹太人又送来了紧急求援的信件，这才转移了拉宾一腔怒火。

最后还是按着沙梯尔的计划行事，命令锡安山上的战士突围下山。有 30 人冲出了重围，其余 15 名战士只有在山头与敌决一死战了。拉宾旅的乌兹·纳尔斯基副营长率部突进了老城。这时沙梯尔的“增援部队”也来了，原来是清一色的老头和大孩子。没办法，这种“兵”也得用，拉宾旅的战士们连推带拉地把他们弄进了城。这就是老城犹太人盼望已久的“援军”！

很明显，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以军在耶路撒冷的失利已成定局：哈加纳派不出大军来增援这一战区，交通线又控制在阿军手中，拉宾等部队面对的是战斗力很强的阿拉伯军团。27 日夜间，拉宾组织的 3 次突入老城的战斗均告失败。随后总指挥部下达了让帕尔马契部队从老城中撤出的命令。28 日凌晨，拉宾登上了锡安山。在约旦军队对新城不间断的炮击中，他看到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屈辱场面：在零散的枪声中，一个打着白旗的老城犹太代表团向着趾高气扬的约旦士兵走去，其中还有犹太教士拉比。28 日夜，老城犹太区中的 150 名武装人员和 700 多名居民向约旦军队缴械投降。

在耶路撒冷战役期间，拉宾一再组织力量进攻拉特隆据点，但这颗钉子始终拔不下来。阿拉伯人顶多暂时撤出公路两旁的阵地，但却死守着围墙坚固的山顶警察据点和修道院。当 6 月 8 日又一次进攻失败后，本-古里安的失望达到了顶点，他下达了 6 月 9 日晚一定要拿下拉特隆的死命令。但这一次人们不听他的了，伊加尔·阿隆和拉宾等人一致决定将进攻时间推迟到次日，原因一是部队极为疲惫需要休整一下，二是他们发现了一条可绕过拉特隆据点的便道。

那条便道实际上是拉宾白等的那天夜里发现的。最后来的那辆装甲侦察车，就是从那条便道上开过来的。再往后，拉宾旅的军官、几辆吉普车乃至一支 150 人的新兵部队都安全地通过了那条便道，拉特隆据点上的机枪打不到他们。这条便道位于拉特隆以南，人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缅甸路”，大概是用亚热带雨林来形容它的隐蔽性。现在需要实地好好勘察一下，看看那条便道能否开辟成通大卡车的公路。但延误军令的事总得跟本-古里安解释一下，于是阿隆和名义上指挥这个战区的美国人大卫·马可斯上校（绰号“石头米奇”）派拉宾前去说明情况。

不料，本-古里安听罢拉宾的解释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给我说清楚，今晚到底能不能去进攻拉特隆？”



“当然可以，但成功的希望几乎为零。”

“那你们为什么不昨天晚上说清你们根本就不打算进攻拉特隆？”

“我不大清楚这件事情，我只是‘石头’和阿隆派来传话的。”拉宾迎着他的怒目耐心地解释着，“我认为打拉特隆的目的是要保证补给线的畅通，如果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达到，我们为什么非要血洒拉特隆呢？”

这一反问使本-古里安失去了理智，他挥舞着拳头大叫：“为什么阿隆不告诉我他不想进攻拉特隆？我要枪毙他！”

听说要枪毙阿隆，拉宾吓坏了。他嗫嚅地问道：“本-古里安，您说什么？您要枪毙阿隆？”本-古里安断然地一挥手，“是的，你没听错！”随后他又连续不断地吼叫了两个小时之久，拉宾满头大汗地立正聆听着，间或低声细语地解释一两句。末了，本-古里安总算作了让步，他厌烦地挥挥手，“去吧！你们真让我没办法。好，我批准你们的计划”。

听到有“你们”两字，拉宾才放了心，知道阿隆暂时不会被行刑队带走了。他精疲力尽地回到指挥部，告诉阿隆和马可斯他总算完成了“任务”。多年后退下来的本-古里安写了本自传体的《重建以色列》，拉宾仔细地阅读了此书独立战争那一部分，却发现作者绝口不提要枪毙阿隆的事。很明显，在追溯往事时本-古里安显然觉得那天话说得过头了。但当时他的暴怒也不是没有原由的，那时哈加纳的许多将领不大恭敬他这位“总司令”，而他则执意要改变这些将领的散漫作风，心里正窝着火。

当夜拉宾便组织人马通宵达旦地拓宽缅甸路，到9日晚终于把它扩宽成一条长约10公里、可以行驶大卡车的毛路。

6月11日阿以第一次停火协议生效，但这纯粹是阿以双方准备再战之前的休整。在停火期间拉宾又组织力量开辟了另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毛路，基本上解决了对该市新城犹太人的补给问题。在停火期间，以色列的军火采购人员从美国搞来了轻型轰炸机，从法国购回坦克和大炮，从捷克买到了飞机。随着大批军火和志愿人员到来以军实力大大增强，它已不是当初被人打得到处跑的“游击队”，鸟枪换炮正规军扩充到9万人。最使拉宾感慨的是，军火主要是由捷克在苏联默许下提供的，它从1948年4月20日起卖给以色列大批武器，其中包括10架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拉宾后来认为，不论以色列有什么帐要跟苏联等东欧国家算，在建国功劳簿上有一条要用大号字写清楚，那就是：“如果没有捷克按照苏联旨意提供的武器，我们是否能够打赢这场独立战争是值得怀疑的。”

但停火前出了件不幸事，美国人“石头米奇”上校被自己人打死了。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勇敢、健壮又和气，自愿来以色列帮助组建国防军。他出身参谋，没多少实战经验，但组织训练能力很强。他一直努力改变帕尔马契军官身上的游击习气，系统地教他们书本上的战略战术，对这批人后来成才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披着条毯子出去散步，回来时哨兵问他口令。他不大懂希伯来语，便用英语回答了一句，接着作了个使人起疑的跨越动作。由于当时阿拉伯人常来夜袭，紧张的哨兵当即向他开了一枪，没想到这发子弹打得太准了，不偏不歪地击中了他的心脏。以军高级指挥官们对此很伤心。拉宾认为，美国人马可斯和英国人温盖特，是两个为以军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后来，是达扬亲自把他的棺材运回美国，安葬于他的母校墓地中。

7月9日双方又打起来，但这次持续时间不久，仅10天，原因是各自为

战的阿拉伯联军敌不过统一的以色列国防军。只是耶路撒冷老城和拉特隆据点仍未能拿下来，格拉布将军训练的阿拉伯军团战斗力很强，士气不比犹太人低。为了便于指挥，以军总参把全国分为北方、耶路撒冷、沙隆（沿海平原）和南方四大军区。伊加尔·阿隆为南方军区司令，他同时也是继萨德之后的帕尔马契司令。帕尔马契此时仍然是独立的，阿隆便把它的主力 and 司令部一起带到了南方，副司令兼作战部长拉宾也在其中。

尽管战事繁忙，千头万绪，但拉宾的勤务兵发现旅长大人的胡子刮得更勤了，而且经常乐滋滋的，原来他要与未婚妻在战火中喜结良缘。

### 遇莉赫拉宾陷爱河 有情人战期结伉俪

要论谈情说爱的本事，拉宾那两刷子比起他父亲差远了，在速战速决方面他只算个新兵。扳着手指头算，他的恋爱罗曼史足足持续了4年之久，真算得上是个晚婚模范了。他与她，莉赫·斯彻罗斯伯格，是1944年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公共场合相遇的。他在这方面很粗，后来连那天是几号都记不清了，只知道说那是个“战时罗曼蒂克”。是缘份，还是被爱神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说不清，只记得当时两人没谈几句，接着便是默默无言的深情对视。这个“公共场合”具体地说是个冷饮店，拉宾正在里面吃冰淇淋时莉赫走了进来，他的目光一下就被吸引过去。莉赫当时是名16岁的高中生，来自德国的知识分子移民家庭，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感到有人在死盯着自己，扭头看见了傻乎乎的拉宾，他的目光是那样专注无邪，她的心颤抖了。她受不了这种相视不语的煎熬，主动走到他面前伸出了手，“你好！我叫莉赫·斯彻罗斯伯格。”莉赫的黑色大眼睛里，突然涌现出激动的泪花，拉宾笨手笨脚地掏出一块满是汗味的手绢递给她，她没擦泪水却收下了这块手绢。第二天一大早她来找他，把那块洗得干干净净、洒了香水的手绢还给他，他发现上面绣上了一颗心。莉赫的眼圈微微有些发青，含情脉脉地望着他，一语不发。拉宾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他记不清了，只感到血往上涌心跳得厉害，一把搂住了她，两人的心跳到了一起。

但莉赫恼火的是拉宾不愿意确定双方关系，而且往后变得若即若离了，粘粘糊糊地有时还找不着他。其实她误解了拉宾。干柴遇到烈火岂有不燃之理，莉赫是个亭亭玉立的美人，一表人材的拉宾心里狂热地爱她，只是怕耽误了她。因为他当时是帕尔马契一名低级军官，每战必须身先士卒冲在前面，军官的伤亡率极高，有一次他们连队的40%的军官战死。拉宾认为自己早晚也有这一天，生怕自己给善良莉赫带来终身的幸福，想用躲着她的方法冷却此事。

事情弄明白之后，莉赫决心不受他的摆布，主动对拉宾发起了强攻。后来她干脆也加入了帕尔马契，并“设法”编到了他那个营，把自己交给他直接“指挥”。这样一来拉宾的脆弱防线被彻底冲垮了，他常到她驻扎的基布兹去看望她，弄到摩托车后两人的交往更频繁了。她坐在后座上，紧紧地搂住他的腰，他感到她那清香的气息和火辣辣的目光，摩托车飞驰起来。万幸的是，撞上大卡车那天他没带上莉赫，要不可就惨了。在养伤期间，莉赫寸步不离地照顾他，俩人曾筹划过建立小家庭，但随后的被捕又把这事推迟了。就这样，一次次的变动和战斗使他们的婚期一再推迟。到了第二次停火期间，

他们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给漫长的战时罗曼史划上句号。

1948年8月23日他们在特拉维夫举行了婚礼，亲朋好友和部队官兵把他们的洞房挤得水泄不通，拉宾和莉赫（改名叫莉赫·拉宾）只有听凭那些鬼点子无穷的战友们的肆意摆布。在那个喜庆的婚礼上只出现一件使拉宾不快的事：主持仪式的犹太拉比迟迟不到。有人记得拉宾当时说了句气话：“怎么搞的，要知道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他摆什么架子！”

蜜月还未结束拉宾就经受了一次感情冲击。9月14日，本-古里安召集了10多位帕尔马契高级军官会谈。他首先高度评价了帕尔马契在建立和保卫以色列国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同时他也强调了帕尔马契的宝贵经验和勇猛作风已被新建的“以色列国防军”所继承。“但是，”他话锋一转进入了正题。他强调，在国家已有了统一的军队和总参的情况下，再保留一支独立的帕尔马契部队和它的司令部是不合适的，因此应当撤销帕尔马契司令部，把它的三个旅交给地方军区和总参直接指挥。

这次会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拉宾在会上一言不发。本-古里安说是跟大家“商量”，实际上是来下命令的，拉宾对此决定感到矛盾和痛苦。从道理上说，本-古里安这样做没错。帕尔马契本来就隶属哈加纳总司令部统辖，再加上它的部队分散在全国各地作战，的确没有必要保持一个独立的司令部。但从感情上说，他对这一决定很反感。他在这支部队中从一个士兵升到旅长，他对帕尔马契感情极深，容不得任何人诋毁它。他本能地感到，这是企图清除帕尔马契在军队中重大影响的第一个步骤。

为驱赶心中不快，拉宾会后全神投入制定再次打击埃军的计划。这次是以色列人想打而埃及人不想打了，因为埃及人满足于占据加沙和内格夫地区的战果，而且他们知道和以色列人打起来凶多吉少。阿隆负责指挥这次代号为“约阿夫行动”的战役，目标是把内格夫的埃军分割为三部分，分别加以包围歼灭。由于埃及人想避免冲突，开战的借口就需要以色列人自己来找了。借口倒不难找，第二次停火协议规定以军车队可穿越埃军防区向内格夫犹太据点运送给养，但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人也没有这样干过。现在好了，可以派几辆空车去试试，只要埃及人一开枪，开战的借口就到手了。

10月15日晚以军制造事端的车队出发了。人们紧张地聚集在指挥部的帐篷里，探听着车队行进的情况。车队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开着，车灯大开，还不时地按几声喇叭通知埃及人。但埃及人没有反应。人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暗中祈祷枪声的响起。上帝保佑，在车队都快穿过埃军防区之前，终于有一名提着裤子出来撒尿的埃及士兵发现了隆隆开来的车队，他揉了揉眼睛，乱叫着向天空鸣了两枪。行，这就足矣！以军飞机立即起飞向埃军投下重磅炸弹，步兵随即发起了攻击。

经过7天的激战以军打通了特拉维夫——内格夫地区的通道，并夺取了内格夫重镇比尔谢巴。埃军面临的局势很不利：它在特拉维夫以南的阿什克隆——阿士杜德滨海地区的一旅多军队面临着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另一旅赶来增援的埃军被以军引诱到精心设伏的“法鲁加口袋”之中。出于无奈，埃军司令部忙把处于险境的阿什克隆——阿士杜德地区守军撤到受联合国保护的加沙地带。但“法鲁加口袋”中的埃军却无法动弹，直被围到1949年2月埃、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为止。

“约阿夫行动”战役结束后，阿以战争实际上已变成以埃两国的战争。阿拉伯国家已精疲力尽，但以色列的后劲正足，它不愿意放过这一乘胜扩大

战果、抢占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的机会。于是，以军又在 1948 年 12 月 22 日发动了“霍雷夫行动”战役，旨在把内格夫和加沙的埃军全赶出去。战斗主要集中在从比尔谢巴至埃及边界的西南战线上。埃军的抵抗不强，以军开战后第 5 天就挺进到巴勒斯坦——埃及交界处。但拉宾不想就此止步，他打算乘胜拿下埃及西奈地区的交通枢纽阿布奥格拉，并进而攻克沿海重镇阿里什。为此他驱车去特拉维夫请示代总参谋长伊加尔·雅丁。为获批准，他玩了个小聪明，隐瞒了自己要夺取阿里什的意图。雅丁批准了他攻占阿布奥格拉的计划。吉普车沿着公路向南方前线急驶，心情激动的拉宾迎着风沙注视着匆忙调动的以军车辆，心里乐滋滋地像又偷到一发“哑弹”，他甚至想到了在阿里什举行一个盛大的入城式。

### 欲拔头筹擅自挺进 屡遭空袭被迫撤军

12 月 27 日傍晚，拉宾指挥全旅发动了猛攻。在急速行进中，当乘坐吉普车和卡车的官兵们看到“埃及——巴勒斯坦”边界的英文标牌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部队在距阿布奥格拉 7 英里处遭到埃军的顽强抵抗，一枚火箭击中了打头阵的装甲车，那辆车像支火把似地烧了一整夜。黎明时拉宾部队才发现，阿布奥格拉的埃军已连夜逃遁，人们没费什么事便占领了它。

随后拉宾挥军向北面的阿里什推进。但他疏忽了一点，那就是天上的以军飞行员没有接到地面上有以军部队的通知，他们奉命攻击地面上任何活动的目标。这时的以军装备已鸟枪换炮，不仅有了装甲车和大炮，而且有了一个小小的空军。飞行员大多是来自欧美的犹太志愿人员，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油子，以色列人管这些只打仗不定居的志愿兵叫“马哈尔”。这些人都有些陈纳德的飞虎队员的脾气，平时不讲究穿戴，技术好胆子大，谁也不看在眼里。

半路上拉宾部队就被他们炸了一次，高喊的和摇旗子全没用，马哈尔们炸坏了几辆吉普车后满意地哼哼着飞走了。部队逼近阿里什以东的机场时又被炸了一次，但这次是埃及飞机，好在炸弹扔得不准，没伤着几个人。正当人们从沙地上爬起来拍尘土时，马哈尔们又一次光临了。这次士兵们变得怒不可遏，他们随手抓起各种武器向自己的飞机猛扫。拉宾赶忙喝令制止，但哪里拦得住？他恼怒地拦住一辆向空中喷吐火舌的吉普车，对一个打得最起劲的士兵吼道：“你疯啦？没看见是自己的飞机吗？你们打埃及飞机有这么卖力吗？”那位战士打完了那梭子子弹后才回答：“我当然看清了是我们的飞机，但你知道，我们的飞机要比埃及飞机危险 100 倍！”

被密集的火力打得晕头转向的马哈尔们看出了问题，没扔炸弹，一扭屁股飞了回去。随后拉宾接到总参访问的电文：“我们的飞行员报告你部正向阿里什推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立即停止前进！”不得已，拉宾只得坦白了自己的意图，要求总参再给他一夜时间拿下另一个机场。但遭到总参断然拒绝。拉宾转而求阿隆去说情，阿隆忙飞到特拉维夫要求解除这个禁令，但他午夜发回的电文打破了拉宾的幻想——“不得前进，从阿里什地区撤出！”拉宾当时不知道，阿隆曾追到本-古里安休假处劝他同意占领阿里什，说拿下它就等于把加沙地带和腊法拿到手了。这种好事本-古里安当然动心，但他得考虑全局，不能因小失大。当时英国政府接近跟以色列翻脸，已向它提出最

后通牒，要它立即从埃及领土上撤出，否则就要动武。他不能不考虑这一事态的严重后果。

无奈，拉宾只有率部暂时撤到内格夫地区休整。1949年1月6日，内格夫刮起了遮天蔽日的沙暴。沙暴刚刚过去，正在帐篷里刮脸的拉宾突然听到一阵凄厉的飞机马达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冲着头顶砸了下来。他忙扔下刮胡刀往外跑，抬头一看，只见空中有四架冒着浓烟的飞机急速地向地面坠落，接着便是几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残骸烧成了火球。再看空中，有四个身份不明的人吊在降落伞上晃晃悠悠地往下落。他忙抓起手枪，跳进一辆吉普车向那些从天而降的人驶去。到跟前一看惊呆了，原来是几位英国飞行员，其中两人已经伤重而死！

原来，刚才天上发生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格斗，以色列的马哈尔们把4架英军飞机当作埃及战机加以攻击，而且一口气把4架全打了下来！有位以色列飞行员也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打下了其中一架飞机，他就是后来升到空军司令和总参作战部长的魏茨曼，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的侄子。拉宾忙跳下车向一位英国飞行员奔去，那位英国军官脸色煞白，狂怒中夹杂着惊骇，嘴唇抖动着却说不出话来。这些该死的犹太佬的野蛮行径快把他气疯了。他们的飞机是来侦察情况的，枪炮里没装弹药，但以色列人却像没看见皇家标记似地左一遍右一遍地攻击他们，直到把他们全打下来为止。

拉宾忙把活着的飞行员接上车，向附近一个基布兹驶去。在那里，他嘱咐基布兹社员们以最高礼遇照料英国人，同时对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件深表歉意。直到那时两位英国飞行员才恢复了说话能力，把一肚子的怒火向拉宾倾泻过来，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几位战功累累的皇家飞行员，竟被一伙儿不知道如何行军礼的乡巴佬打了下来。拉宾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控诉，十分内疚地向他们保证这完全是一次偶然事件。

“霍雷夫行动”战役实际上是以军打的最后一仗，以军猛攻腊法却没打下来。当时，以、英关系已经紧张到要开战的地步。埃及和约旦等国原先皆为英国殖民地或附属国，英国有义务而且有条约“保护”它们，见以色列还不想罢手英国急眼了。到第5架英军飞机又被马哈尔击落时，英国拉开阵势准备开战，美国急忙加以劝阻，本-古里安赶紧下令停火。此时埃及有四分之一的部队被困在“法鲁加口袋”中，美国对双方进行有利于己的“调停”，埃及在1949年1月7日提出了休战及谈判的要求。双方决定在希腊的罗得岛上进行停战谈判。

在谈了两天之后，以军总参作战部长雅丁要求南方战线派一名熟悉情况的代表来参加谈判，阿隆把这个好差事给了拉宾。拉宾兴冲冲地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莉莉不免一番叮嘱，叫他谨慎行事，别毛手毛脚地在外面出洋相。拉宾给了她一个吻，叫她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

### 第三章 出任总长

1949年初，埃以两国在希腊的罗得岛玫瑰大酒店举行停战谈判，以军总参作战部长雅丁叫南方军区派个人来参加谈判，南方军区司令阿隆把这个好差事给了拉宾。拉宾忙回家收拾行装准备出发。

#### 乡巴佬罗得岛献丑 受排挤时度日如年

临出发前拉宾才发现自己需要一套像样服装，因为出入外交场合不能穿着旧军装上阵。于是，手下人给他找来一套看得过去的旧礼服。可别小看了这套旧礼服，它是当时窘困的以色列政府从一家旧货店里买的美国二手货，是专供与外国谈判的特使穿戴的。在拉宾之前许多政府要人都穿过它。遗憾的是衣服袖子快磨通了，往里伸胳膊时须十分小心才行。

罗得岛上是一派和平景象，刚到时听惯了枪炮声的拉宾还有些不习惯。等睡足觉后他发现自己好像缺点儿什么，很快他弄明白自己缺的是油水，老觉得肚子里面空荡荡的。于是他把酒店的服务员找来，问他希腊语的“多”字怎么说，那个小伙子困惑地教他说“恩考瑞”，他坐在床边把这个词足足背了十多分钟。晚餐时他眨眼间便吞下一盘牛排，接着把侍者叫来指着空盘子说“恩考瑞”，这样他又得到一盘肥牛排。那晚上他至少重复了三次“恩考瑞”，最后才在几位侍者惊讶的目光下满意地离开了餐厅。躺到床上，他不由自主地又说了一声“恩考瑞”，接着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讨厌的问题，那就是在外交场合得打上领带。这可把他难住了，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打过领带，那玩艺儿是怎么套到脖子上的他根本不清楚。他心里直埋怨人类真无聊，非得往脖子上套一条没什么用的带子，真是无事找事做。但雅丁叮嘱他一定得打上领带，无奈，拉宾只好请代表团的司机教他打。但那位司机绝望地发现，这个笨学生无论怎么教也学不会这门手艺。没法子，最后司机只有教他一个笨方法：用时把领带从打结处扯松，从脑袋套进脖子后拉紧就行了；不用时程序正好相反，扯松后从头顶上褪下来。这种方法拉宾一学就会，他觉得自己并不笨。

一天，他到下榻的旅店理发室去修面，见埃及代表团团长赛义夫先生也在座，两人礼貌地点头致意。塞义夫在英国受过良好的教育，脾气挺好，说话和声细气的，拉宾对他印象不错。拉宾光顾着这么漫无边际地想了，竟忘了了解下领带来，站在他身后的理发师不耐烦了。理发师活这么大的岁数了，还没见过一个顾客要他解领带的，况且这位顾客还是个年轻人。于是不客气地叫拉宾解下领带。情急中，拉宾便按照司机教他的方法当众表演了一番。当他像褪马围脖那样取下领带时，满屋子的人全看呆了。拉宾在镜子中看到塞义夫先生吃惊地睁大眼睛，张开了嘴，那副表情好像是说：“噢，万能的安拉！我是在与一伙多么没有教养的野蛮人打交道！”

确实，塞义夫先生的对手们很难打交道。以色列人手中有“法鲁加口袋”这张王牌，因此要在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后才肯停火，在谈判中曾出现过埃及人全体退席抗议的场面。但以色列人并不着急，他们知道形势对自己有利，谈判陷入僵局时雅丁便带领大伙骑自行车环岛旅行。这是拉宾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事外交谈判，他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谈判就是交换，只有自己手上有对

方需要的东西才能成交。最后，埃及接受了除加沙以外埃及——巴勒斯坦国际边界为埃、以两国停火线，双方于1949年2月24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拉宾没能出席签字仪式，因为以军准备进行抢占地盘的“法克特行动”，熟悉南线情况的他被总参调回去参与这次行动。法克特行动由内格夫旅和戈兰尼旅承担，它们3月6日从比尔谢巴出发，分东西由两路沿内格夫荒漠南下，最后在红海附近的埃拉特汇合。实际上这两个旅进行了一次急行军竞赛，沿途的阿军没敢阻拦，最后内格夫旅以先到终点一两个小时获胜。同年7月20日以、叙也签订了停战协定，持续了15个月的独立战争终于结束，以色列史翻到了新的一页。

在和平到来之际，拉宾考虑了自己今后的去向。他有三种选择：一、解甲归田，做一名农业技师；二、再次争取奖学金，去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学水利工程；三、继续留在军中，为建设一支强大军队贡献自己的青春。他稍作考虑后便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认为自己当个职业军人是有前途的，除了达扬、阿隆和雅丁等人外他并不认为其他人比自己强多少。但他万万没想到，或者说估计不足，他的“帕尔马契干将”的背景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好几次差点儿被人从军队中清洗出去。

### 集会事件旧怨难释 达扬惜才处境改观

战后以色列大量裁军，大批官兵复员回乡。这拉宾能够理解，国家初立财政困难，的确养不起十多万大军。但他不能理解有人借此整人，处心积虑地排挤帕尔马契成员，以各种借口把他们从军队清除出去。这样干的主谋是本-古里安。他认为帕尔马契是由一批思想较左的基布兹社员控制的，他生怕这些人把以军变成以色列的“红军”，从而改变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特性。本-古里安有革命意识，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中他选择的是后者。他要建立一支纪律严明且不干预政治的军队，帕尔马契好谈论政治的传统不符合这一要求。继1948年9、10月间他取消了独立的帕尔马契司令部后，1949年5、6月间他指定帕尔马契作为首批复员部队，下令解散了它下属的三个旅。在这种赤裸裸的打击排斥下，帕尔马契4名司令官中的2名和12名旅级干部的6名相继离开部队，他们以集体辞职的方式表示了对这种不公正做法的抗议。这正中本-古里安下怀，他迅速提拔那些从英军回来的犹太军官填补他们的空缺，这也是本-古里安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最使拉宾痛心的是，在卖力地执行本-古里安这一旨意的人当中，竟有原帕尔马契旅长、现任以军总参谋长的雅柯夫·多里。拉宾在自己的哈雷尔旅被解散后给多里写了一封信，向这位以前的老同事发发牢骚。多里的回信来的极快，好像他正等着拉宾表示不满似的。多里在信中断然否认有个反帕尔马契的运动，接着他凶相毕露地对拉宾说：“不管怎么说，你是不能再当旅长了，我们已把你定为第一批送往国外学习的人员。”

对这一打击拉宾并不感到太意外，近来像他这种级别的帕尔马契军官被打发走的已经很多了，能以“出国学习”或“驻外武官”的形式被礼送出境已算是很客气的。好在多里在信中没讲明哪天请他走人，他还可以在恋恋不舍的部队里多待几天。南方军区司令阿隆得知此事很不愉快，他知道这种砍

他左膀右膊的事是冲着自己来的。恰好他要出仿法国，便以指定拉宾代理司令的方式把拉宾暂时留了下来。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他不能老呆在法国不回来，拉宾对此郁郁寡欢。在这危难时刻，总参训练部长钱依姆·拉斯科夫出面拉了他一把。

拉斯科夫身躯高大，一副标准的士兵长相，嘴里老叼着个烟斗。他是本-古里安重用的那批从英军回来的军官，早先也是个反帕尔马契的急先锋。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他觉得收拾这批英勇善战的“乡巴佬”很无聊，整天窝里斗算什么本事？见拉宾那副被整得抬不起头的样子，他动了侧隐之心，主动邀请拉宾负责教导他主办的营长训练班。更使拉宾难以置信的是，他还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叫剩下的帕尔马契军官都来参加训练班。我保证所有想留军队中的人都可以进这个训练班，当教官或当学员都可以。”最初，拉宾对他的话还有些将信将疑，但事实证明拉斯科夫的确是个心胸坦荡的君子。

拉宾原准备等阿隆回国后再走，但本-古里安使他连这点奢望都变得不可能。趁着阿隆在国外出差之际，本-古里安下令提升原作战部长雅丁为总参谋长，并任命达扬为南方军区司令。这样一来，阿隆回国后除了递交辞呈外别无选择。本-古里安这一招蓄谋已久。阿隆战功卓著威信很高，又是帕尔马契的首领，此时不剥夺他的兵权更待何时。阿隆被挤出军队后，帕尔马契人马最集中的南方军区官兵心情十分沉重，因此当满面春风的达扬前来就任时，司令部里的气氛冷漠得怕人。拉宾不打算隐瞒自己对阿隆的深厚情感，他连仪式都没有举行便把指挥权移交给了达扬。达扬显然感受到了这种不大友善的气氛，但他终究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的资历和战功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他毫不怯阵，宣布不愿在他手下干的人都可以走，他绝不挽留。随后他决定杀鸡给猴看，用解雇的口吻对拉宾说：“谢谢你的交接，但我不需要你！”当晚，拉宾默默无言地离开了南方军区投奔拉斯科夫，与他同时离开的还有一大批高级军官。

为感谢拉斯科夫的一番好意，拉宾在营长训练班里干得十分卖力，表现得极为出色。他的组织才能引起了高层人士重视，包括许多反帕尔马契干将在内的高级将领意识到让拉宾干这种工作太屈才，一些人向身兼国防部长的本-古里安总理说了拉宾的好话。但本-古里安不表态，没有“照应”他的意思。拉宾很清楚，他把本-古里安得罪伤了，后者对他产生了坏印像。

事情出在所谓的“集会事件”上，当时拉宾还在南方军区中任职。那时大批帕尔马契官兵被赶走，人们很有些抵触情绪，高级指挥官们决定举行一次集会为战友送行。事情一传到上面立刻引起本-古里安的警觉，他生怕这事弄不好会演化为哗变，于是忙叫总参谋长多里下了一道命令，严禁现役军人参加这次集会。这惹恼了拉宾等人，他们认为这也太过份了，岂有不准人们与离开部队的战友说声再见的道理。拉宾决心参加这次集会，即使遭到处分也在所不惜。

集会定于晚间举行，但那天一大早他就被多里叫到特拉维夫汇报工作。多里那天很友好，话也多，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上午。末了他告诉拉宾，本-古里安也想跟他谈谈，了解一些南方边界地区以、埃军队交火的情况。于是拉宾忙赶到本-古里安家。本-古里安对他非常热情，听完了交火事件的详细汇报后，又问及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拉宾不得不又重新汇报了一遍。与多里一样，本-古里安那天的谈兴甚浓，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后末，他把话题转到了对高级将领的评价上。他对他们的评价极为准确却刻薄得惊人。谈到他相



当倚重的雅丁时，他的评语是“雅丁是位好军官，但不大遵守纪律，而且缺乏实战经验”。谈到阿隆时，他指出“阿隆是一位优秀的战地指挥官，但卷入政治的程度太深了”。他对爱将达扬的评语也很特别，“达扬是一个无比勇猛和信心十足的士兵，但他是个十分孤独的人。”拉宾不得不钦佩本-古里安鉴别部属的非凡才能，但这种无边际的漫谈也太费时间了，他想早点回去参加集会，于是决定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提问来结束谈话。

“本-古里安，我能直率地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谈的呢？”本-古里安以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他。拉宾的嘴唇嚅动了一下，血涌了上来，然后不顾一切地说：“为什么总参谋长要在您知情或奉您指示的情况下，禁止我们参加帕尔马契的集会呢？这不是使我们很为难吗？因为我们必须同战友道别和遵守军令之间作一个困难的选择！”

拉宾期待着他的宽容答复，那样他就好去参加集会了。但本-古里安什么也没说，脸上鼓励的神情消失了，客厅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后来，本-古里安眨动了几下眼皮恢复了常态，诚恳地说：“伊扎克，你愿意与我共进晚餐吗？”拉宾突然感到一股厌恶，这很明显是要拖住他。他有礼貌地谢绝了这一邀请，借口有事匆匆离去。他明白，这是本-古里安对他的特殊照应，要换个人本-古里安根本犯不着费那么多口舌。但拉宾对帕尔马契的感情太深，不懂得见风使舵，他还太年轻。

回家后，他忙换上便服带着莉赫向集会地点奔去。集会已进行一会儿了，他们感受到人们投来的不满目光。那晚的集会上，许多人对本-古里安整治帕尔马契和不许军官参加这个集会表示了强烈不满。但拉宾没在会上讲话，其他现役军官也没有发言。但没讲话也减轻不了他的“罪责”，几天后军事法庭就传讯了他，军法官就是总参谋长多里。在询问了一些集会情况后，多里像训一个新兵似地给了拉宾一顿申斥，教训他要懂得遵守纪律和军令的重要性。随后，宣布给他一个记入档案的警告处分。

但实际上清除帕尔马契影响的运动已接近尾声。要清除的人已清除得差不多了，再搞下去就要搞到30岁左右最能打仗的军官头上，这将严重损害以军的战斗力，总不能连着孩子跟洗澡水一块泼出去吧！因此，一年后总参决定开办旅长训练班时，拉宾又被推为最合适的人选协助拉斯科夫进行筹办工作。但总参谋长雅丁看中了拉宾，指名调他到总参任作战部长。拉宾心有余悸不太想去，拉斯科夫也舍不得他离开。但军令难违，他1950年底28岁时第一次出任总参作战部长。

以军总参统管部队的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的大权，称它为“总司令部”或“统帅部”都可以。总参谋长是最高军职，叫总司令也行，它是将军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总参谋长在防务决策上受文职的国防部长的领导，但实际上他的意见很重要，他经常出席内阁会议向阁员们反映军方看法。作战部是总参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主管作战、防务和后备役三方面工作。总参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作战部长一般是总参谋长的首要人选。这次任命是经本-古里安批准的，拉宾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他怎么会允许我从一个训练部长副手一下子跳到作战部长的位子上呢？”其实他不清楚，本-古里安很了解他的价值，是这位年轻旅长坚决执行了他进攻北京的“伊尔贡”部队的命令，而且他也没随大流与帕尔马契的高级军官一起闹事。年轻人嘛，涉世经验少，总有些意气用事。再说，对自己的老首长有感情，也不是什么坏事。

拉宾上任不久就遇上了一次表现机会。当时，中东国家的大批犹太移民向以色列涌来，经济困难使新移民只能暂时栖身于等候安置的帐篷营里，这些帐篷营被称为“转运营”。与欧洲来的移民不同，这些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生产技能，但都幻想着能在一夜之间过上轻松富足的日子，稍不如意便会怨气冲天地闹将起来。在人手和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把帮助新移民的工作交给了军队，雅丁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拉宾。下达给他的任务是：一、改善转运营里的移民们的生活条件；二、向移民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拉宾认为后一项任务不难完成，部队有的是大学生和医生。困难的是培养移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这正是作为新移民应当具有的品质。

正当情况迅速好转之际，老天爷又来凑热闹。1950年底1951年初之交的冬季，罕见的暴雨和大风雪掀翻了转运营里数以百计的帐篷，洪水也冲进了营地……拉宾发出了紧急命令，数十个转运营附近的驻军长官率领战士迅速冲去抢救。官兵们在暴风雨（雪）中重新树起了帐篷，脱下自己的军衣披到移民身上……这一切，使得移民们感到了依靠力量的强大，人们的奋斗意识复苏了。在以军战史上，这场没有枪炮声的战斗被称为“转运营之战”，本-古里安深情地称颂救助的官兵为“民族使者”。

拉宾的出色表现使头头们很满意，遂把他派到英国坎特伯雷皇家参谋学院进修一年。他带着莉赫和两岁半的幼女达丽亚同行。对于有着丰富实战经验并且当了两年作战部长的拉宾来说，这所学院的某些课程使他感到很乏味。比如，初期教官要求学员们编制一个运送步兵师的时间表。这多少有点离谱儿，因为当时以军还没有师的编制，多以旅的规模展开行动。后期的学习内容还有点意思，英国人向学员们传授了一些根据各方情况判断局势的经验。转眼间，一年的进修就要结束了，拉宾不得不考虑自己回国后的安排。

在他进修期间，总参谋长换成了莫德恰·马克莱夫，作战部长一职已由达扬顶替。马克莱夫与达扬的关系很快就搞僵了，他写信给拉宾，希望他回国后取代达扬的职务。但马克莱夫这一愿望很快落空，因为本-古里安提升达扬为总参谋长，一脚把他踢开了。拉宾对此感到忐忑不安，他回想起达扬过去对自己的态度，心里直发毛。他忙写信求马克莱夫让自己在英国再呆一年，以便转到伦敦经济学院就读。但马克莱夫回信沮丧地说，此事他已不能作主了，进修延期之事得听达扬的安排。不久，达扬出访途中路过伦敦，拉宾决定当面与他商量此事。

达扬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派头。他听完拉宾的要求后晃着二郎腿问道：“原总参谋长早先给你的指示是什么？”

“进修完后回以色列。”拉宾小心翼翼地回答，手里捏着把汗。

“那你就回去好了，呆在这里有什么意思？”达扬回答得很干脆。但这次似乎没有恶意，脸上也有了笑容。

回国后达扬并没整他，反而让他担任了总参训练部长，这使他大为感动。随后他投身到筹建以军指挥参谋学院的工作中，英国学的那些东西正好可编到教材中，他干得风风火火的。对于拉宾的工作，正全力对以军进行第二次整编的达扬很满意，到美国考察时也把他带去见见世面。直至此时，小时候老拉宾灌输给他的美国“概念”才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在如何训练军队指挥官方面，拉宾与达扬的看法完全一致，那就是学员必须一专多能，要把他们培养为多面手。比如，步兵指挥官必须学习伞兵技能，而坦克兵则须掌握突击队员的十八般武艺。

随着共事时间的增长，拉宾最初对达扬的疑虑消失了，他不是个难以相处的人。话说回来，拉宾是个只敬佩强者的人，而达扬确实是个各方面都很强的人，两人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了。1956年4月，即拉宾二儿子尤瓦尔出生后不久，达扬任命34岁的拉宾为北方军区司令，拉宾深感激动和振奋。他对北方军区很熟，他的军事生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但现在那里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重新熟悉认真对待。然而他未料到，他在北方军区没呆多久，命运便又把他召回了总参，这使他距总参谋长的宝座近在咫尺。

### 总长点将拉宾生疑 选择靠山两派纷争

1956年秋季一天，拉宾和其他大军区司令被召到总参开会。达扬告诉他们，以色列准备进攻埃及，英、法将协同这次军事行动。整个作战计划是在判定叙利亚和约旦不会参战的前提下制定的。因此，达扬要求拉宾等三个军区司令，将部分军队交由南方军区司令指挥，他们自己要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出于这种安排，拉宾未能参加苏伊士运河战争，他对此一直感到很遗憾。

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北部边界地区的局势不算太紧张；但这次战争后，北部边界非军事区内的以、叙摩擦加剧了。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耕种非军事区里的土地；叙利亚则认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蓄意挑衅行为。拉宾下令士兵驾驶装甲拖拉机强行耕种非军事区的土地，叙利亚人用大炮向拖拉机开火，双方爆发了激烈的边界冲突。随后，戈兰高地上的叙军炮击边界地区的基布兹，以军则以越过加利利海袭击叙利亚渔船和工厂进行报复。双方激烈指责，频频交火，但都还不想为此大打出手。这是一场以色列主动挑起的边界冲突，它讲不出为什么非要耕种非军事区的道理。挑起这场边界冲突的真正目的，在于把美国拖进来，加速以美军事结盟的进程。

这些摩擦事件并没吸引拉宾全部注意力，他还留着一只眼睛关注着总参的人事变动。到1957年后期事情变得微妙了，因为达扬的任期将满，谁出任下一任总参谋长成了将军们关注的大事。出人意料的是，达扬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召集几个有希望的将军征求意见。使拉宾生疑的是，达扬在会上特意提到他的名字，希望大家表态。当然，与会者谁都不吭气，因为同意提升拉宾就意味着自己还得再等三四年，这段时间内有些人早该退役了。达扬见众人不表态便宣布散会，让大家回去酝酿一下。

拉宾不明白达扬为什么要专门点他的名，是想早点儿提升他，还是暗示他该知趣引退，抑或想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决定用出国留学的问题试探一下。于是，会后他征求了达扬对自己想去哈佛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留学的看法。达扬明确表示反对，原因是国家财力不宽裕，要深造完全可以在国内大学就读。这下拉宾明白了他的真实意图，但他根本不打算提前退役，因为他还没有实现当总参谋长的目标呢！

后来证明达扬的这次民意测验毫无意义，因为任免总参谋长一事是本-古里安说了算，他任命拉斯科夫为新总参谋长。

拉宾对此很高兴，因为拉斯科夫这个人很好，他过去在拉斯科夫手下干得很舒心。更使他兴奋的是，拉斯科夫支持他去哈佛留学，哈佛也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于是他准备1959年夏季启程赴美留学。但好像老天爷执意不让他啃书本似的，当年4月一次意外事件又使他的留学梦化为泡影。

当时总参准备搞一次全国总动员的大演习。但不知怎么搞的，组织工作出了问题，演习时间没通知头头，事到临头连他们都蒙在鼓里。事发那天晚上，拉斯科夫带着一批高级将领在特拉维夫音乐厅欣赏交响乐。正当人们陶醉于那感人的交响乐中时，突然，满头大汗的传令兵闯了进来，把拉斯科夫请了出去。拉宾等人自然不敢怠慢，也忙着起身跟了出去。大批高级将领突然离席惊扰了听众，人们忐忑不安地互相打听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跟阿拉伯人开战了。见状，乐队指挥气愤地把指挥棒扔到地上，这场音乐会不欢而散。等人们拥到街上才发现事情坏了：广播电台正用数十种暗语召集后备役人员赶赴部队；一群群带枪的后备役官兵满街寻找顺路的汽车，整个社会乱成一团。

等事情弄清楚后，反对党和舆论界的尖刻抨击像冰雹一样砸向工党政府，阿拉伯国家更是得到了以色列穷兵黩武的“铁证”。本-古里安对此大发雷霆，发誓一定要严惩有关的渎职人员。最后，总参作战部长和情报部长成了替罪羊被免除职务。拉斯科夫提名拉宾出任作战部长，本-古里安迅速地批准了这项任命。就这样，拉宾第二次出任作战部长。

这次出任作战部长要比第一次难多了，因为聚积在中东地区上空的战云逐渐变得浓厚起来，他得作好再打一次大仗的准备。

当时的形势对以色列不太有利。1958年，伊拉克爆发了卡塞姆政变，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世界决心要与以色列见一高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苏联东欧集团公开地站到了阿方一边，向埃、叙等国提供大量的重型武器和经济援助，使它们的军力大为增强。而以色列当时还找不到这么慷慨大方盟友。英、法只是卖一些武器给以色列，但不愿意跟以色列结成盟邦关系。美国的态度很暧昧。为防止阿拉伯国家全投进苏联的怀抱，美国极力拉拢阿拉伯国家，因此在阿以争端中尽量表现得“不偏不倚”，不愿意卖给以色列武器。说得难听一点，以色列当时在西方大国中一个靠得住的朋友都没有。

拉宾对此焦虑万分。当时法国是以色列武器的主要供应者，但他感到把宝全押到法国身上很危险。一来戴高乐总统近来对以色列的作为颇有微词，随时都可能卡断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二来法国武器的数量也不能与阿方获得的苏联武器相比。拉宾力主从美国的渠道获得装备，美国人的武器又多又好，应尽力与美国攀上“盟友”关系。但一些军政要人不这样看，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与空军司令埃泽尔·魏茨曼就是这派人的代表。

以色列是50年代中期与法国结成亲密关系的。原因一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以色列很冷淡，拒不提供武器，只有找欧洲国家；二是法国被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殖斗争搞得焦头烂额，因而与也跟阿拉伯人斗的以色列人同病相怜；三是佩雷斯从法国搞来了大批武器，在苏伊士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佩雷斯和魏茨曼认为，法国人靠得住，军火质量也不错，没必要巴结美国人另起炉灶。从那时起，在以色列统治集团中，就分成了主张依靠欧洲或美国的两大派，拉宾是美国派的代表人物。

为此他与佩雷斯吵了个面红耳赤，但后来还是佩雷斯占了上风，因为法国还在继续供应武器，而美国没说愿意满足以色列的要求。

除这方面分歧外，拉宾早就想找茬儿跟佩雷斯算账了。

以色列国防部的首长是文职官员，不一定非要军人出身的才能担当，佩雷斯就是一个非军人出身的副部长。按理说，他俩一文一武不该有多大的矛

盾，但实际不然，两人间的龃龉由来已久。事情最初是由于取消帕尔马契一事引起的。当初本-古里安有这个想法时，他信任的佩雷斯在旁边大力支持，促使本-古里安打定了这个主意。从那时起，拉宾就对佩雷斯产生了反感：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拉宾就任总参作战部长后，又与佩雷斯发生了冲突。佩雷斯认为，购买和研制武器的事情应由国防部负责，军人使用这些武器就行了；拉宾则强调，只有打仗的军人才清楚什么武器最适用，因此应由总参决定购买或研制什么武器。接下来两人就国防部与总参的职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拉宾背面有一大群将军撑腰，在辩论上佩雷斯未能占多少上风，但从此两人互相把对方看成“刺儿头”。

恰逢此时本-古里安要去访美。拉宾也顾不上佩雷斯同意不同意了，拉着拉斯科夫紧急求见本-古里安，强烈要求他尽力打破“美国的封锁”。拉宾还越权向本-古里安递交了一份长长的武器采购单，首要的是搞一套由雷达组成的预警系统。本-古里安对此事也有同感，他很清楚与美国结盟的必要性，早在1951年5月他就企图通过情报合作与美国搭上关系。当时他对中央情报局长史密斯说：“我们很想与你们达成一项合作协议。”尔后，以色列情报及特殊使命局“摩萨德”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了合作协议，摩萨德1956年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送去作见面礼。本-古里安答应一定全力去办这件事，在访美过程中他果然搞到了预警系统，这是一个很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到了60年代初期，中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纳赛尔给以色列来了一次神经战，使拉宾惊出了一身冷汗。在那以后，事态的发展终于使拉宾实现了他的追求。

### 阿以冲突狼烟再起 如愿以偿荣任总长

1960年1月19日，以军总参收到一份语焉不详的情报，说有一个埃及装甲师正在苏伊士运河以西地区集结。总参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于是在23日派出一架飞机进行侦察。但那位飞行员没找到埃及的装甲师，报告说他在运河西面没发现异常情况，这使得人们松了一口气。但边防部队的紧急报告却使拉宾大吃一惊，原来埃军主力已秘密穿越西奈半岛逼近了以色列，而以军在边界上只有二三十辆坦克。情况危急！

局势是从1月初开始恶化的。在以色列迅速往北部地区增派兵力之后，叙利亚深感不安。1月14日到19日纳赛尔亲自前往叙利亚观察形势。在这期间苏联人向纳赛尔提供了以军在北部集结准备进攻叙利亚的“权威性情报”。17日纳赛尔下令埃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19日起埃军步兵和装甲兵开始秘密越过运河向西奈半岛纵深推进。等以色列人明白过来时，埃及人的数百门大炮已经瞄准了他们的脑袋。

24日晚以军总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在情报部长汇报敌军部署时，拉宾匆匆递了一张条子给空军司令魏茨曼，“我们已被搞得措手不及了，在未来24小时内一切都要仰仗空军！”这不是写着玩的，想把装甲部队调上去至少需要24小时，装甲部队不到位就得先用飞机顶着。好在收到第一份情报后，拉宾忙用电话给第7旅旅长以色列·塔尔打了招呼，要不然以方反应的时间就更长了。不管怎么说，手忙脚乱的拉宾总算是把大约130辆坦克调到

了前线应急。

25日，拉宾带着四五位将军乘坐一架直升机视察南方部队。拉宾正与魏茨曼商量事情，忽然瞥见两架标着大卫星的以色列战斗机径直向这架直升机扑来。很显然，这两位“空中骄子”压根儿就没看见前方有架直升机。见势不妙，魏茨曼赶紧大吼一声“俯冲！”，驾驶员本能地猛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扎去，两架战斗机呼啸着擦着机尾冲了过去。驾驶员忙把直升机拉了起来，这时擦着冷汗的将军们才不自然地傻笑起来。

在那次危机中，埃、以两军紧张地对峙着，但谁都没开火，最后埃军于3月底撤回运河西岸。埃及宣传机器自豪地宣称，埃及军队的大胆行动阻止了以色列进攻叙利亚。以色列人没怎么吭气。以军总部把这次应急调动称为“罗梯行动”，罗梯行动给了以军将领深刻的教训：第一，早期预警系统要大大改善，美国的装备一到要尽快安装起来，不能等对手冲到面前才作反应；第二，要研究出一个对付阿方类似神经战的有效方法，不能总让埃及人牵着鼻子转。

拉斯科夫的总参谋长任期很快就要满了，紧盯着这个职位的是拉宾，他甚至不想在同事面前隐瞒这一点。但他的希望再次落空，本-古里安把这一职务给了副总参谋长茨维·佐尔。后来他才知道，佩雷斯向本-古里安大力推荐他手下的空军司令魏茨曼，本-古里安觉得不好处理，才选择了第三者佐尔。拉宾对此极为不满，当众大发牢骚。这些牢骚很快就传到了本-古里安的耳朵里，他决定找拉宾私下谈谈。在宣布对佐尔的任命那天，他会后把拉宾留了下来。

“听说你对我任命佐尔为总参谋长一事非常不满，是吗？”本-古里安直截了当地问。

“对，确有此事。”拉宾气哼哼地说，“您挑选他当总长自有道理，没必要对我进行解释。”

“但我想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让佐尔当总长。”本-古里安提高了嗓门，“的确，你有一次违抗了我的命令，但这不影响我对你的看法。你一贯谨慎小心，我很欣赏这点，佐尔仅仅是职位比你高才先走了一步。你想想看，我要是任命你当总长，他肯定要辞职，这样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

本-古里安的语气异常诚恳，眼神中流露出一种父爱般的情感。拉宾从没见过他什么时候用这种语气跟别人说话，他明白本-古里安对自己的偏爱，但他还想使点小性子，于是借着“集会事件”的话茬儿撒起泼来。“我没要求您向我解释这件事，但既然您又提到那次集会的事，我想把话挑明了。我是出于责任感才留在军队中的。如果您认为我应该离开军队，我会默默地走开的，我不愿在这里受窝囊气！”

这招儿还真灵，本-古里安果然上钩了，他火爆地叫起来：“你这些想法是哪儿来的？谁想赶你走啦？我是希望你留在军队中的，你必须留下来！唉，让我怎么跟你说才好呢？”见火候到了，拉宾毫不客气地要官当，他要求本-古里安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这样一来下一任总参谋长就非他莫属了。本-古里安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事情并不那么顺当，拉宾与佐尔的关系很快变得不自然了。说到底，是拉宾认为佐尔那点才能不怎么样，他一看不起谁就跟谁处不下去。再加上佐尔对他副总参谋长的任命拖了几个星期后才宣布，而且是在本-古里安又打了招呼之后，这更使他感到不满。到后来他与佐尔的关系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佐尔布置的任务他执行，但他从不提建设性意见；佐尔征求他对自己的意见，拉宾说没意见，一切都挺好；除了工作，两人无话可谈。

拉宾理解佐尔防范他的心理，但他认为佐尔本人没那么多花招，是佩雷斯在后面给佐尔出点子，他才是最想当总参谋长的人。到 1963 年初，佐尔与拉宾的关系僵得快结冰了。佐尔是个很要脸面的人，他希望拉宾能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但拉宾打定主意自己绝不先表态，他要看看这出难演的戏如何收场。最后还是佐尔憋不住了，把拉宾请到自己家里摊牌。他告诉拉宾，本-古里安已同意把他的总长任期延长为四年。他望着拉宾毫无表情的脸迟疑了一下，鼓起勇气说：“我已决定更换作战部长。我想让你知道，我已请求本-古里安解除你的职务，让我们以绅士风度忘掉过去的不快吧！你知道，作为总参谋长我有权挑选自己的搭档，我打算坚持这一点。”

拉宾的面部仍无任何表情，这本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冷冷地说：“请允许我与本-古里安谈谈。如果他同意你的意见的话，我马上走人。”佐尔犹豫片刻后同意了，他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3 月初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接见了拉宾。他不等拉宾说话便开门见山地说：“伊扎克，我答应过你当下一任总参谋长，你会当上总参谋长的。”拉宾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记不起本-古里安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本-古里安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让佐尔再干上一年。你不是老想出国留学吗？现在是个好机会。但如果你认为现在留在军队里为好，那你就自己拿主意吧。”如久旱的大地遇上了春雨，多年来他对本-古里安的怨恨让这几句话扫得一干二净。他用颤抖的声音对本-古里安的栽培表示感谢。接着表示自己现在绝不离开军队，因为军队需要自己，以色列需要自己，即将建成的“国家输水工程”需要自己去保卫！这正是本-古里安最爱听的话，他满意地把手伸给拉宾，“好极了！伊扎克。快去把你的决定告诉佐尔吧，我相信他会知道我们今天达成的共识的！”

用本-古里安镇住佐尔后，拉宾很想找个机会拿佩雷斯开开心。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几天后他出差时与佩雷斯在巴黎相遇，拉宾拿出香槟酒在自己房间里款待他。佩雷斯绕着圈子想从拉宾嘴里套出点信息来，但拉宾故意避而不谈本-古里安接见他的事。最后佩雷斯忍不住了，“得了，伊扎克，别瞞我啦，我知道你跟本-古里安谈过。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谈得很好。”拉宾故作轻描淡写地说。

“好在哪儿？”佩雷斯紧张地盯着他。

“本-古里安答应让我当下一任总参谋长。”拉宾开心地望着他，一仰脖干了一杯酒。

佩雷斯脸色刹时变得苍白，喃喃地说：“他真这么说了吗？”

“那还能有假？”拉宾满意地给他斟上了酒，举起了自己的杯子，“干怀！”

此事确实出乎佩雷斯的意料之外，他原以为下一任总参谋长的位子是自己的。他这样想有道理。客观地说，要拿拉宾和佩雷斯两人相比，本-古里安更喜欢的是温顺的佩雷斯，而不是说话不拐弯的拉宾。而且佩雷斯的资历更深。

在以色列走后门是困难的，尤其是在艰难的建国岁月里。佩雷斯是靠自己的本事拼上来的，他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波兰移民，跟本-古里安一点关系都没有。佩雷斯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时间很早，1946 年他出席瑞士的第 22

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时，拉宾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帕尔马契低级军官。佩雷斯跟拉宾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他们少年时代都想当个农业技师。独立战争期间，25岁的佩雷斯，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就被派到美国搞武器。那年头以色列没钱，采购员都得玩空手道，用嘴巴往国内运军火。他还真行，硬是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了数百万美元的飞机大炮。正因为如此本-古里安很欣赏他，1951年任命他为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随后提为主任和副部长，在升迁方面他不比拉宾慢。本-古里安曾在报上赞扬他“以罕见的天才把整个国防部管理得井井有条”，“在为国奉献方面很难有人同他相比”，像与法国拉关系及搞核反应堆之类的大事都交给他去办。佩雷斯脾气好为人随和，从不锋芒毕露惹人反感，他与达扬关系极好，同为工党“青年帮”的首领。但本-古里安是个唯才是用的人，总参谋长他只会让军人出身的拉宾去当，因为佩雷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

提升拉宾当总参谋长原本说好是一年后的事，但一个突发事件把时间提前了。1963年6月，本-古里安突然辞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人们闻讯震惊不已。此时佐尔正在法国参加航空博览会，代总参谋长拉宾立即率领一批高级将领去本-古里安家中探望。在将领们七嘴八舌地表示了对这一决定的震惊与沮丧之后，拉宾提高了嗓门发表了令人感动的长篇讲话。他在历数了本-古里安对国家和军队的非凡贡献后，描述了以色列军队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法国即将卡断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和阿拉伯军队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噙着泪水问道：“难道，您会在这种危难时刻把以色列国防军扔下不管吗？”

本-古里安像尊石像那样端坐在沙发里，只有嘴唇微微抖动表明他内心的感情波澜。后来他终于说话了。他没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但动情地赞扬了为国防献身的男女官兵们。最后，他还是辞职了，列维·艾希科尔接替了他的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离任前本-古里安又把拉宾叫到跟前，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我答应过你当下一任总参谋长，我已把这件事跟艾希科尔谈了。我相信他会尊重我的意见的。当然，再多的事我帮不上忙了，请原谅。”拉宾含着热泪后退一步，立正，向他行了一个军礼。

新总理艾希科尔没忘记本-古里安的嘱托，决定不延长佐尔的任期，宣布任命拉宾为新总参谋长，任期从1964年1月1日开始。那一年拉宾42岁，他由一个普通一兵爬到总司令的位置仅用了23年时间。

上台伊始，拉宾全力抓起整军备战工作，因为边界冲突有增无减，形势越来越使人坐卧不安。



## 第四章 举棋不定

1964年1月1日拉宾出任以军总参谋长之际，正值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即将完工。以色列与叙利亚和约旦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60年代中期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开始激化，一个暗中怂恿、支持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国家，消除苏联影响的意图在白宫形成。以色列因而也变得更加好战了，它瞪大眼睛寻找动武的机会。

### 战云密布以军备战 首脑迟疑拉宾犯难

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是以色列北水南调总规划的主要内容。这一工程是从以、叙之间加利利海（实际上是淡水湖）西北角抽水，抽到360米高，然后通过复杂的水渠、隧道、渡槽和直径为2.74米的混凝土管道，经过145公里距离输送到缺水的中部和南部。第一期工程5月5日完工，它每年能多提供3亿立方米水，使南部内格夫地区的供水量增加了75%。曾对约旦河改道工程不满的拉比们此时眉开眼笑，声称先知以西结的“有一天将有条大河从荒漠上流过。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能成活”的预言应验了。

但水就那么多，你多我少，叙、约两国却因此受了巨大损失，整个阿拉伯世界义愤填膺。早在1月份，纳赛尔就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首脑们决定加强统一反以斗争，阻止以色列单方面从约旦河掠夺水资源。以色列的一期工程完成后，11月叙利亚也开始在约旦河上游进行河流改道工程，准备把约旦河上游支流的哈兹巴尼河的河水引到本土，把另一支流巴尼亚斯河水不经以色列全部导入约旦。这样一来，流入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的“蓄水池”——加利利海的河水就会大大减少，以色列费了几年心血建成的输水工程算是白干了。

以色列急了，决定以武力阻止叙利亚施工。打的方针是定了，但究竟怎么个打法拉宾与达扬产生了分歧。拉宾希望以不越界出兵的方法解决问题，而达扬则主张干脆攻占叙方工地让它无法施工。在琢磨到底怎么打时有件事启发了拉宾：11月上旬叙军炮击了以方边界地区定居点，以空军当即轰炸戈兰高地上的叙军炮兵进行报复，叙方在遭打击后停止了对定居点的炮击。拉宾想，能否通过摧毁叙利亚的施工机械来迫使它放弃改道计划呢？他决定试试看。他找来了作战部长、北方军区司令和装甲兵司令共商此事。

他问装甲兵司令塔尔：“我们的坦克能在1300码以外直接命中叙利亚的施工机械吗？”塔尔想了一下说没问题，于是这个方案就定了下来。

塔尔是位实干的将军，他回去后马上动手干了起来。他到仓库里挑选出能打得最远的坦克炮弹，又与炮手们研究出一种远距离瞄准射击的新方法，然后拉到靶场去试。嘿，成功了！实施炮击那天，拉宾赶到现场观战，并与挑选出的最优秀的驾驶员、炮手和车长一一握手。塔尔一声令下，坦克隆隆向停火线驶去。在坦克停顿的一瞬间，只听“咚咚咚”几声炮响，对面的叙方施工机械顿时爆炸燃烧起来，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叙利亚人不屈服，随后改用移动式机械进行施工，以色列炮手照样摧毁了它们。随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斗智斗勇的竞赛：叙利亚人把推土机后撤到1300码以外，让以色列的坦克打不着；以色列炮手们则设法加大射击距离，仍然击中它们。最后，以色列

人居然把直射距离创记录地提高到 2 英里半，叙利亚人要是再后撤就无法进行改道了。于是，叙利亚在 1965 年放弃了这一改道工程。

打掉阿方的约旦河改道计划后，以叙边界相对平静了一阵子，但到 1967 年 4 月初形势又紧张起来，而且紧张到危险的地步。4 月 7 日戈兰高地的叙军炮击以方的特尔·卡茨比基布兹，以空军的“超级神秘式”战机立即起飞轰炸叙军炮兵阵地，途中遭到叙方一个中队米格 21 的截击，以机掉头就跑，叙机全速追赶。其实这是以军设下的一个圈套。叙方米格 21 刚要展开攻击，埋伏在云层中的以方“幻影式”猛地扑了下来，接着便是一场分不清敌我的空中格斗。那天，以方一口气打下了 6 架叙方飞机，自己没损失一架，“空中骄子”们乐得手舞足蹈。拉宾趁势在 5 月 12 日恐吓叙利亚：“如果再发生这种事的话，我们将对叙利亚发动闪电战，占领大马士革并推翻那里的政权后再撤回。”

但这是鼓起腮帮子说硬话，其实他的心里很空虚，要真打起来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在空军上以色列人不怕阿拉伯人，法国造的幻影式的性能要比苏制米格 21 稍好一些，以阿空战记录常常是零比几或一比几。但在装甲兵方面以方处于劣势，手头上没有可与苏制 T—54 和 T—55 型坦克匹敌的坦克，仅有的旧式“谢尔曼”式坦克数量也不足。而且双方的差距正在加大，苏联继续向阿方提供武器，而法国总统戴高乐已停止向以方提供武器。怎么办？只有开辟其它武器供应渠道。其实早在这之前，美国已在 2 月份给了以色列 200 辆巴顿式坦克，但拉宾仍嫌太少。正值此时，艾希科尔总理要去美国访问，拉宾强烈要求他一定要从美国搞回一些“空中之鹰”式战斗机和性能更先进的坦克。

很快，艾希科尔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兴高采烈地宣布美国总统约翰逊已原则上同意向以方提供武器。人们一片欢腾，高兴地互拍对方的背。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约翰逊的允诺仅仅是“原则上”的，离以色列人拿到这些武器还早着呢！中间还要经过国会批准和国防部官僚手续的层层关卡，两年内能见到真家伙就不错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约旦也来凑热闹，要求美国提供同样的武器，侯赛因国王扬言若美国不卖他就去找苏联。这下子可击中了美国政府的要害。因为当时整个中东没几个亲美国国家，约旦是为数不多的亲西方国家之一，它要是投入苏联怀抱美国可受不了。为此，约翰逊政府决定把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与满足约旦的要求联系起来，要给双方都给。约翰逊知道以色列人反对这种“联系”，便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考麦尔和资深外交官（巡回大使）埃弗里·哈里曼来以做说服工作。

考麦尔和哈里曼都是精通此道的老手，他们熟练地扮演着白脸和红脸轮流上阵，一硬一软地对付以色列人。见软的不行，哈里曼发出了警告：如果以色列拒绝合作的话，美国将撒手不管从中东撤出。以色列人对此一笑置之：这是吓唬谁呢？简直是哄孩子的把戏，挤都挤不进中东呢，还谈什么要撤出去？见这招儿不灵，哈里曼脸不变色地使出了第二招儿。他声称美国可以迅速满足以色列的要求，但以色列也得答应美国一些“小小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不得发动美国的亲以议员反对向约旦提供武器；不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不得使用武力阻止叙利亚进行约旦河改道工程；不得谋求拥有核武器。到这时以色列人才明白，这不是什么“小小的”条件，而是要求以色列根本改变政策，其代价远比以色列同意武装约旦要大得多。于是以色列

人的脾气上来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这时考麦尔又扮成白脸上阵，他把桌子拍得砰砰响，噢噢儿地吼叫起来。而装作红脸的哈里曼，则劝他“息怒”三分。

但吵归吵，以色列人最后不得不俯首就范。当时以色列没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它的细胳膊拧不过美国的大粗腿，真与美国闹翻了是没好处的。最后，以色列代表勉强同意了美国向约旦出售武器，条件是美国以会谈纪要的形式代表约旦担保这些美国坦克不得越过约旦河。散会后以色列人悻悻地离开了谈判桌，他们似乎看到纳赛尔乐不可支的笑脸：“怎么样，伙计们，我这一招儿还不错吧。”以色列人很清楚，侯赛因国王的这一招儿是纳赛尔支的。

眉开眼笑的是拉宾。从3月到5月，他收到250架美制“空中之鹰”战机。约400辆A—2C和A—1型坦克，坦克备件及105毫米口径的大炮等重型武器也运到了以色列。有了这些本钱他觉得腰杆硬多了，借此他把军队分为防御与进攻两大部分，着手大力提高部队的突击能力。

1967年5月14日以色列的独立日，拉宾在总参收到埃军不寻常调动的情报。他在参加独立日阅兵式时，又收到大批埃军正向西奈纵深推进的报告。接着送来的情报说，埃及这次把7个师的10万人部队、1000多辆坦克开进了西奈。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埃及人又在搞神经战，在这个问题上总参军事情报部“埃曼”最初很迟钝，它曾判定埃及到1969—1970年间才会打仗。情报部长亚里夫少将认为埃及人是在重演1960年“罗梯行动”老把戏，其出场顺序是：埃军突然逼近以色列——以色列慌忙动员、戒备——持续一两个月的对峙耗尽以色列的精力——埃军撤回并大肆宣扬自己的胜利。

唯一觉得事情不对头的是拉宾，因为这次的情况跟1960年那次不同。那一次，埃及人是隐蔽行动，突然到了跟前以色列人才发觉，把自己吓了身冷汗。而这次不同，埃及人完全是大张旗鼓地来的，坦克扬起的尘烟连以色列边民都看得见。于是他决定采取了初步防范措施。15日一大早他把亚里夫叫来汇报情况，接着又与第84装甲师师长塔尔少将通了话：

“你还记得上次的‘罗梯行动’吗？”

“记得。”塔尔说。

“好，让我们现在再来一次‘罗梯行动’。立即行动！”

数小时后，大量以军主战坦克装上拖车驶向南方边界。

由于埃及最精锐的第4装甲师还没开进西奈，为避免上次那种大折腾，拉宾没让全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后来人们才弄清楚，是苏联人5月12日提供的假“情报”使得纳赛尔出兵西奈的。

但接下来的情况使拉宾确信这次不是“罗梯行动”的重演，因为5月16日纳赛尔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从边界撤到加沙和沙姆沙伊赫。纳赛尔为什么要这样作呢？“事后诸葛亮”们对他的动机有三种推测：一、如果联合国部队拒撤，安理会就要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过程本身就可以缓解紧张的阿以关系；二、纳赛尔以此举向叙利亚等国证明他不是个胆小鬼；三、周期地折腾以色列。但不管纳赛尔本人怎么想，没料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给他玩了一个绝的。同一天吴丹要求纳赛尔作出明确选择：要么，让联合国部队全部留在原地不动；要么，他们全部撤走。这下子可将了纳赛尔一军，他一咬牙，18日通知吴丹：全部撤走！一些“马后炮”后来指责吴丹，说是他把纳赛尔推上了与以色列开战的道路。

真正了解纳赛尔不想打仗的是拉宾和达扬等少数将领。很早之前拉宾就听说纳赛尔对叙利亚人讲过这样的话：“埃及绝不会因为一个北部非军事区里的拖拉机或边界事件对以色列开战的。”但纳赛尔很难把这一立场坚持到底。阿拉伯世界太复杂，有敬佩他的，也有看他的笑话的，有人公开嘲笑他是躲在联合国部队后面的反以“英雄”，他得有所表现才行。况且苏联人的情报说得活灵活现，他也不能对叙利亚兄弟见死不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拉宾就得准备打仗了。21日，他按照以色列的决策程序向内阁汇报了事态发展并回答了部长们的问题。按理说，作为军队最高长官他的职责是打好仗，而打与不打的问题应由内阁考虑决定。但实际上，内阁的决定是根据他的汇报和建议作出的，他回避不了承担决策后果的责任。在建议打或不打的问题上，他一直被时间的问题困扰着。因为要打的话，就得速战速决，但这至少需要四五天时间，而联合国或主要大国会给以色列这么长时间吗？如果不打或仅只局部动员的话，且不说阿拉伯人真打过来怎么办，光是长期处于动员状态也会把以色列拖垮的。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便去征求外长埃班的意见。埃班是反战的，而且对形势发展前景很悲观。他认为仗一打起来以色列将十分孤立，没有哪个国家会真心诚意地帮助以色列，这样一来安理会就能很快通过强制以色列停火的决议，留给它打仗的时间不会超过72小时，这点几时间以色列什么也捞不到。埃班的警告加深了拉宾的忧虑。

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他打算听本-古里安和达扬的看法，但在去本-古里安家之前他犹豫了。一是这位国父与现总理艾希科尔的关系很僵，艾希科尔要是知道自己去请教政敌是不会高兴的；二是本-古里安在心理上有些变态，与之交谈常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他不由想起1965年与本-古里安一次不大愉快的聚会情景。

那年的国会大选前，他接到本-古里安女儿玖拉的邀请，请他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拉宾历来极力避免卷入党派斗争，他知道聚会中肯定有人要谈政治，因此谢绝了这个邀请。但玖拉随后打来电话，一再强调这是个不谈政治的私人聚会，恳求他前来参加。考虑到玖拉是自己女儿达丽亚的老师，实在抹不开面子，他勉强接受了邀请。但一到那里他就发现上了当，客人是清一色的本-古里安的“拉菲党”的党徒，他们正在那里起劲儿地攻击艾希科尔的各项政策。见势不妙，拉宾马上借故告辞，但被本-古里安留住了。本-古里安拉他坐下，套近乎地说：“伊扎克，你还记得1949年来我家时的情景吗？当时你问我为什么要使你们这些帕尔马契老兵为难，你记得我是怎么说的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觉得没错的话就可以参加那个集会。”

听他这样说，拉宾惊愕得足有几秒钟说不出话来，因为这完全是弥天大谎。本-古里安不但反对他参加那个集会，而且还对他不听招呼耿耿于怀，甚至在12年之后的1960年还重提此事。他曾当着佐尔的面训斥自己：“你竟敢藐视我的命令！”但现在，他为了拉自己去反对艾希科尔，竟连脸都不红一下就把话完全颠倒过来。他感到阵阵寒意，本-古里安这块丰碑在他心中开始崩塌。想到自己后来为那次集会所付的沉重代价，他怒火上升，涨红了脸反驳说：“您说您允许我参加那次帕尔马契集会，是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什么多里要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并给我处分呢？”听到这种不客气的责问，本-古里安的眼神里流露出无邪的惊讶，“有这种事儿？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多里，就说是我允许你参加集会的？”拉宾被他这种近于无赖的表演弄得张口

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在众人面前他反倒像个作了蠢事又说不出道理的笨孩子。

尽管有这么一段不愉快的回忆，拉宾最后还是决定去请教一下本-古里安，他毕竟是个有胆魄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说不定能帮自己拿个主意。但他很失望，本-古里安给他的不是鼓励而是训斥，在照例攻击了一番艾希科尔无能之后，他转而指责拉宾不该动员后备役部队，“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和允许你这么干的人都犯了错误，你已把国家拖入到危险的境地。你绝不能开战，我们是孤立无援的，你要为此负责！”让本-古里安这盆冷水一浇，拉宾的思想负担更重了。

接着他又去拜会达扬。达扬的话虽然有责备的意思，却还说到点子上了。达扬认为，纳赛尔的举动是让以色列给逼出来的，以色列对叙利亚和约旦的报复行动也太过份了，这迫使阿拉伯领袖纳赛尔除了挺而走险外无路可走。达扬预料纳赛尔很快就会封锁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到那时以色列只有打仗一条路可走了。

从达扬家出来后，拉宾让司机在一家商店前停了车。他走进店里，从货架上取了两条“骆驼”牌香烟和一大袋咖啡，想了想，又拿了两条烟。收款的小姐显然认出了他是谁，边找零钱边问他：“伊扎克先生，您认为我们会跟埃及人打起来吗？”拉宾闻言一怔，随即苦笑着说：“谁知道纳赛尔是怎么想的？这事很难说。晚安，亲爱的姑娘。”回到车上，他迫不急待地点上一支烟猛吸了一口。他那薰黄了的手指微微发抖，他记不清这是今天抽的第几支烟了。他的嘴里苦得厉害，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 殚精竭虑积劳成疾 一日病休流言四起

果然，5月23日凌晨3点45分，埃及封锁了蒂朗海峡。随后又传来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增兵的消息。早上8点，艾希科尔来到了被人们称为“掩体”的总参地下指挥室与将军们会晤，情报部长亚里夫和作战部长魏茨曼都催他早下开战决心。艾希科尔表示再等下去确实无必要，但有必要再向约翰逊总统通报情况以示尊重，因为他明确要求以色列千万不要开第一枪。

中午，艾希科尔召开了扩大的内阁防务会议，应邀出席的有梅厄夫人、贝京和达扬等人。拉宾在会上汇报了最新动态并讲解了总参初步拟定的作战方案。有人问再等48小时行不行，拉宾回答说可以，接下来就没人发言了。这时拉宾才感到，无论是内阁部长还是反对党领袖，没人急于打这个仗，他们都相信这场危机还有政治解决的希望，应当给和平一点时间。最后，会议决定把以色列反应时间推迟48小时，让外长埃班到欧美去游说一番。但拉宾很清楚，埃班光是坐着飞机转一圈也不止48小时，更别说与约翰逊总统会谈了。照这样计算，在26日之前是打不成的。

拉宾对此很焦急。他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缺乏安全感，边界上有个风吹草动便会寝食不安。外人很难理解这点，甚至觉得以色列人多少有些神经质，有种病态的不安全感，这是由于他们不太了解犹太民族的苦难史。在长达2000多年的大流散过程中，犹太人在异土他乡饱受歧视和虐待，一战期间老沙皇杀了不少犹太人，二战期间希特勒又一口气杀了600万，犹太人对此刻骨铭心。再加上他们对建国前后与阿拉伯人的厮杀记忆犹新，因此对危险

特别敏感，确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表现。这也不能全怪他们独特心理，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和形状也使许多以色列人不安。以色列的国土小而狭长，形状很像一只裁缝用的旧式烙铁。南部内格夫地区犹如三角形的烙铁头，中部沿海平原像烙铁的细长把手，长约 50 公里宽约 20 公里。以色列人认为，不说戈兰高地上的叙军大炮随时可以轰击海法和特拉维夫，光是这个细长的“腰”就对敌人产生无穷的诱惑力，因为一支不大不小的步兵部队就能切断它。

以色列的安全政策建立在“遏制”理论上。从表面看它像个防守理论，即以自己的实力镇住对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外长埃班说过：“以色列的遏制，首先在于使阿拉伯人对企图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愿望产生怀疑，其次使他们感到无法达到自己目标，最后使他们打消消灭以色列的念头。”怎么才能作到这一点呢，一般是先借故让对方受些不大不小的损失，如像 4 月 7 日空战那样，一口气打下叙方 6 架米格 21，以此来告诫对方：不要挑起战争，否则你会输得更惨！但以色列对此理论的应用，更多的是借故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实施所谓预防性打击，以战争遏制战争。这次开战的“借口”十分充足：封锁了蒂朗海峡还让以色列人怎么活？！

当晚，拉宾在总参召集了各部部长和各军区及兵种司令的联席会议，商讨更详细的作战方案。将军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此战必须先下手突袭，为此，首先要掌握绝对的制空权。空军司令莫蒂·霍德让大家放心，他信心十足地保证，哪怕只让他进行一个小时的空袭，以军的地位也会大大的改善。霍德跟他的两个前任——托尔科夫斯基和魏茨曼——不同，他最初不是在英国皇家空军受的系统训练，而是在捷克一个空军基地接受的突击培训。他出生在著名的德加尼亚基布兹，也是个帕尔马契老兵，刚建空军就把他抽调去了。捷克卖的军火中有些德制的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他和一些同伴赶到捷克接受短期培训。直到 50 年代，他才在英国飞行学校受了正规训练。他是个敢说敢干的人，肚子里是根直肠子，说话不绕弯。霍德谈突袭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敌方空军轰炸以色列人口稠密区的忧虑，强调一定要先把埃及轰炸机悉数摧毁在地面上。虽说这只是他的一点担忧，拉宾却对此认了真，人们信心百倍的保证他全听不进去了，脑海里一再浮现出特拉维夫被炸成废墟的悲惨景情。

最动摇他信心的是全国宗教党党魁夏皮拉尖刻的质询。在一次内阁防务委员会上，夏皮拉强烈反对先敌开战。全国宗教党是工党联合政府多年的老搭档，为这一问题造成内阁危机得不偿失，于是拉宾忙把他请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单独交换意见。见拉宾表现得如此恭顺，夏皮拉觉得孺子可教，端足架子斜视着拉宾说：“你是唯一配听我解释的人。听着，你难道真的相信你们这个艾希科尔——拉宾班子要比本-古里安——达扬班子更有胆略吗？1950 年和 1951 年海峡也被封锁过，以色列那时开战了吗？从那时起海峡一直被封锁到 1956 年，以色列的安全受到危害了吗？你知道本-古里安什么时候才动手打仗？他是确信有英、法协助时才开战！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当然要为生存而战；但如果我们要先发制人，我们就要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

拉宾感到脑袋“嗡”地一声，背脊渗出了冷汗。天呐，又谈到了责任问题，这该死的“责任”！以前哪儿有这么多的责任？那时跳出战壕，把枪一挥，“弟兄们，跟我来！”就是责任。但现在这套不行了，匹夫之勇救不了

国。艾希科尔是个拿不出主意的人，而且不是军人出身，到头来国家安危的责任会全落到自己的肩上，弄不好就是千古罪人！拉宾机械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做反应的原因，但说了些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只记得夏皮拉鄙夷地哼了一声摔门而去。

他的顾虑的确很多，什么事他都习惯往坏处多想想，他太看重自己的责任了。以色列著名诗人哈依姆·古里曾形容他是一个“最不像士兵的士兵”，同时人们又公认他是个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他从不把计划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他究竟顾虑什么呢？他害怕的是重大伤亡，尤其是以军将士的重大伤亡。这回不是跟埃及一个国家打，而是跟一群阿拉伯国家斗，伤亡肯定不会小。有人说不在乎士卒伤亡的将军才爬得高，这话用在他身上不合适。以色列老百姓把自己疼爱的子女交给他，他不能让许多家庭收到阵亡通知书，他把那些朝气蓬勃的士兵都视为自己的子女。20多年后，以色列《国土报》著名军事评论员茨维·斯契夫剖析他这种表现说：“无疑，这反映了他的性格，他的内心是柔和的。他的内心相当不错，这种柔和不是出自软弱。”

总参会议结束后很晚他才回到家中。一倒在沙发里他就感到头晕得厉害，额头上直冒冷汗，心里阵阵作呕。见状莉赫要打电话请医生来，拉宾制止了她，他认为自己这是累出来的，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几天来他几乎没合过眼，就是躺在床上也在考虑打起来可能出现的薄弱环节。他想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以色列防线被突破，阿军坦克群轰鸣着向特拉维夫-海发区冲去；夜间埃及轰炸机向城市扔下一串串炸弹，惊慌失措的妇女抱着孩子尖叫着四处乱窜；以军弹尽粮绝，犹太人打着白旗向阿拉伯人走去……他越想越多，越想越怕，黑暗中只有他那红色的烟头在不停地闪动着，一直到大天亮。白天在总参会议室里，他面前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人们看见他像台蒸汽机似的不停地吞云吐雾。当然，他的下属和内阁部长们也不含糊，大家像比赛似地猛抽烟。以色列人的烟瘾普遍很大，梅厄夫人的消费量是每天3包烟和无数杯浓咖啡，她还对此有个说法，认为人不一定每天非睡七八个钟头不可。在拉宾到场的各种会议室里，烟雾弥漫，白天也得开着灯开会。

用湿毛巾擦了擦脸后他觉得好受一些，望着冉冉升起的一缕烟柱，他不由得又想起“责任”问题。本-古里安的“你要为此负责”和夏皮拉的“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的责难声又在耳边响起。这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汇成了隆隆的轰鸣，他心力交瘁地捧住了脑袋。绝望中，他请作战部长魏茨曼来一下，想向他倾诉一下心头的苦闷。魏茨曼很快就赶到了，见到拉宾那副模样大吃一惊。昔日朝气蓬勃、信心十足的拉宾不见了，眼前的拉宾是个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落难者。只见他可怜巴巴地说：“魏茨曼，你认为我应当受责备吗？是不是我该让出我的位置了？你说呀！”魏茨曼忙劝他打消辞职的念头，宽慰他说总参全体同仁都会帮他渡过难关的。接着劝他好好休息一下，有事明天再说。

魏茨曼走后拉宾更加难受，莉赫忙请来医生吉隆博士为他检查。医生诊断后告诉莉赫，拉宾是操劳过度与尼古丁中毒的综合症，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接着他开了大剂量的安眠药。服药后拉宾很快睡熟了，一觉睡到24日的中午，醒来后他仍然感到浑身酸软无力，于是又休息了半天。然而他没想到，他这一整天的病休，已在高层领导人中引起了一场“地震”，有人已经准备取代他的位置。他所信赖的魏茨曼抓住这个机会，跑到艾希科尔跟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拉宾丧失信心和精神崩溃状况，随后以自封代总参谋长身份

召集了各部首脑会议。人们的印象是：拉宾的身心已经垮得不能工作了；他已请魏茨曼接任自己的职务；艾希科尔并不反对这样做。

26日早晨拉宾上班时感到人们从背后投来的奇异目光，他感到困惑不解。一打听，才知道在24小时里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他不能指责魏茨曼篡权，辞职两个字确实是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尽管那仅仅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哀鸣。此外他病休期间魏茨曼主动承担了工作，理应受到表彰才是。接着他猜想，“这会不会是艾希科尔本人的意思？”他决定去探个虚实。见到艾希科尔时，他感到艾希科尔表情很尴尬，不愿提这件事。他迟疑片刻后鼓起勇气说：“我很抱歉用个人问题打搅您。我确信自己现在能胜任工作。但如果您认为我该辞职的话，我会毫无怨言地接受您的安排的。”艾希科尔看来不愿把这个难堪的话题继续下去，马上用“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话打住他。拉宾感激地偷看了他一限，发现他也是一副不堪重负的神态。

随即拉宾精神抖擞地回到总参，用洪亮的嗓门通知各部、各兵种首脑来开会。在会上将军们欣喜地发现，昔日那个帕尔马契老兵又回来了。只见拉宾信心十足地分析以阿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讲得头头是道，对克敌制胜深信不疑。看到他休息后与前几天判若二人，众人遂相信他的病真是累出来的。只有魏茨曼明白拉宾是表演给谁看的，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封锁了蒂朗海峡后纳赛尔把球踢给了拉宾，他要看看拉宾怎样踢这个球。拉宾没马上起脚，他接到球后盘带了几下，像是在寻找同伴的位置，看台上的以色列观众发出了不满的嘘声。当时有一首揶揄性的民歌在以色列很流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纳赛尔等候着拉宾”。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然而，并非仅仅是纳赛尔等候着拉宾，相互等候的人可以排出一大串儿来。他们是：纳赛尔等候着拉宾动手——拉宾等候着艾希科尔的决断——艾希科尔等候着他的部长们点头——部长们等候着埃班带来约翰逊首肯的消息——埃班等候着约翰逊总统的接见……拉宾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等到这条相互期待的线可以首尾衔接时，怎么说也得浪费两个星期时间。

### 急不可耐拉宾请战 众星捧月达扬出山

25日拉宾病倒那天，魏茨曼与将军们制定出一个更为大胆的作战方案，即不仅要占领阿里什和加沙，而且要占领整个西奈半岛，要挺进到苏伊士运河岸边。拉宾最初觉得这个计划胃口太大，不易达到目标而且容易招致国际反对，不大赞成。但考虑到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西奈已变成埃及进攻以色列的跳板，确有必要彻底拆除，遂同意了这一方案。但艾希科尔给他们泼了些冷水，当天严令军方在27日之前不得轻举妄动。

25日一整天内阁什么决定也没作出，人们眼巴巴地等待埃班带来好消息。这时埃及在西奈已集结了4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叙利亚也把大军集结在边境一带并把伊拉克作战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中。26日，拉宾下令各大军区处于一级戒备状态并进行了总动员。几天后以色列国变成了一架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

魏茨曼和亚里夫对艾希科尔不准动手的决定极为不满，一再催促拉宾向艾希科尔施加压力。魏茨曼的意见可以放在一边，但亚里夫的话拉宾不敢忽视，因为亚里夫是搞情报的，各种最新动态最清楚。考虑再三，他带着亚里



夫和自己的副手巴列夫向艾希科尔进言：“我们没有必要过多考虑由谁承担先动手的责任。难道您真的相信我们能使美国宣布进攻以色列就是进攻美国吗？如果你也认为我们做不到这点，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已经丧失了战略上的突击优势，如果再等下去，恐怕连战术上的突击优势也没了！”

见拉宾带两个将军前来以军方身份进谏，艾希科尔很不高兴。他沉下脸来宣布：“在政治解决的努力没有彻底失败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得发动突袭！”见他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拉宾等人只得唯命是从了。这是以色列的规矩，军人不得干预文官的政治决策；将军想掌权可以，但得先脱下军装。不过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拉宾顾不得身份自告奋勇地帮着起草了一份给埃班的电文，催促他尽早把美国人的态度搞清楚。实际上他并不怕美国佬说不管，要真是那样反倒好了，那会逼得政客们早作决断的。

但埃班没让他如愿。26日下午埃班发回了人们望眼欲穿的电文，上面清楚地写着：“美国第6舰队将参加打破海峡封锁的行动；埃及驻美大使已得到通知，在埃及进攻以色列的情况下，美国将承担保卫以色列生存权的义务；美国总统警告埃及大使，进攻以色列就意味着埃及的自杀。”人们欢声雷动，几位部长热泪盈眶地互相拥抱起来。多么坚定的支持啊，山姆大叔终于伸出了有力的援助之手！

但人们的欢声未止，美国人一盆冷水变兜头浇了下来。在跟着送来的一封美国政府的电报中，国务卿腊斯克明确澄清了四点：一、美国没有得到埃及有进攻意图的情报；二、未经国会批准，美国总统个人无权对以色列的安全作出承诺；三、如果以色列挑起战端，美国难于援助以色列，即使是政治声援也很困难；四、总统正谋求组织一支国际舰队去打破海峡封锁。人们顿时鸦雀无声，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转过头来再看埃班那封喜报，就像是他自己编造出来似的滑稽可笑。

这一次部长们真慌了，齐声问拉宾如何是好。拉宾告诉他们，一天也不能再拖了，必须下决心早打。他解释说，时间拖得越长，埃及人就准备得越充分，以色列奇袭的效果就会越小而伤亡越大。不少部长点头称是。不料夏皮拉又跳了出来，他厉声质问拉宾，在目前的情况下以埃双方谁能坚持得时间更长一些。拉宾承认是埃及人，因为埃军只是他们人口中一小部份，而以色列则是全民总动员了，经济上的损失要大得多。夏皮拉闻言冷笑一声，“如果我们进行伤亡惨重的进攻，而全世界又因此摒弃我们，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拉宾知道他不好对付，便壮着胆子用以军第一次打击就能奏效的话堵他的嘴。但夏皮拉不吃这一套，追问拉宾打起来后怎么收场，“埃及和叙利亚可以得到苏联人的充分供应，而以色列到哪里去搞军火呢？”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拉宾不免有些语塞，于是一些部长交换起赞同夏皮拉的眼色来。26日内阁仍未作出开战的决定，只是授权艾希科尔和拉宾在以色列受到袭击时有权作出“适当的反应”。

27日的讨论更是一场闹剧。原来说好26日约翰逊总统会见埃班，但美国人又借故把它拖到27日中午进行。会见时约翰逊连一丁点儿希望都没给埃班，仍是那句老话：你们千万别先动手，否则后果自负。当晚艾希科尔向内阁传达这句老话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同样的警告也传来了。这下子不少部长的信心彻底动摇了，以色列怎么受得了三个大国的压制呢？正值此际埃班也从机场赶到会议室来凑热闹，他说约翰逊让以色列给他两三个星期时间去斡旋。这下子会场全乱了，拉宾等与会将军大声疾呼多一

天也不能再等了，但许多部长仍主张再等等看。激烈的争论从 27 日晚 9 点持续到次日凌晨 3 点，谁也说服不了谁。其间艾希科尔递给拉宾一张字条，告诉他夏皮拉已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内阁赞成开战全国宗教党的部长们将集体辞职。拉宾看后欲哭无泪，埃及人 1000 辆坦克的炮口已对准了以色列，而以色列却在这关键时刻闹起了内阁危机！最后只有用投票解决问题了，但结果却是 9 票赞成开战 9 票反对开战。这就是危机发生了 14 天后的内阁状态。

散会后艾希科尔告诉拉宾，工党外长埃班也提出了类似夏皮拉那样的辞职威胁。说罢他摇摇头、叹口气走了。拉宾望着他那精疲力尽的背影很难过。艾希科尔对他拉宾本人是没说的，提拔了他并支持了他，尤其在那次由尼古丁中毒而引起的“宫廷政变”中。但谈到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及军队统帅的素质，艾希科尔比本-古里安差远了。本-古里安是处事果断、主次分明；而艾希科尔正相反，他话多心细办事一丝不苟，但这种性格在以色列往往意味着办不成大事。他内心是赞成早打的，但他没本-古里安那种能使内阁听话的本事，结果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缺乏治国安邦能力的人。在政界、军界和公众舆论中，要求改变现状以及推举贤能的呼声越来越高，他处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之中。

29 日下午艾希科尔接到了约翰逊总统的亲笔信，后者用强硬的措辞警告以色列不要走向战争，并要求给他足够的时间进行斡旋解决危机。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内阁决定同意再等两三周。消息传到总参后，愤怒的将军们顿时炸了窝，他们强烈要求艾希科尔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作。艾希科尔同意了这一要求。但在来总参之前，他临时决定对全国发表一个广播讲话，向公众解释一下政府为什么还没采取坚决行动的原因。然而这次讲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们在广播中听到的是一个有气无力、结结巴巴的声音，与艾希科尔以前口齿伶俐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并不了解这是由于他过度疲劳和成稿仓促所致，他们一致认为这种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领导不了国家。艾希科尔这次效果很糟糕的讲话，后来被称为“口吃的讲演”。

晚上，拉宾陪着艾希科尔和副总理阿隆来到总参“掩体”，与军方交换看法。从一开始会场气氛就很紧张，发言的将领们一致指责内阁在开战问题上优柔寡断，贻误战机。见耐心解释无效艾希科尔也火了，他警告将军们以色列绝不能触怒美国，因为以色列现在就这么一个半拉子盟友，在动手时和打完后以色列都要依靠美同支持。但一些少壮派军官听不进去，一位年青上校跳起来连珠炮似地反驳他的看法，根本不考虑打断总理的讲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见还有许多人抢着要放炮，阿隆觉得这个会不能再开下去了，提议暂时休会，随后陪着艾希科尔离开了会场。见艾希科尔就这么溜了，少壮派军官更火了，有的人甚至粗野地骂起娘来。这时拉宾以严厉的语气制止了他们的冲动，责令各大军区司令要向下属多作解释，不能由着性子乱来。随后，拉宾征得艾希科尔同意后把集中待命的 3 万名后备役人员解散回家。

30 日约旦也与埃及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但以色列内阁仍为打或不打吵个不停。拉宾视察部队时，发现前线官兵们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他们甚至提出是否政客们要毁掉这个国家的尖锐问题。

31 日情况发生了突变。已退役多年的达扬，公开提出要在军中担任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他甚至领了套军装和手枪去南方视察部队。散布这种舆论多时的新闻界，立即发出一片赞许声，要求艾希科尔让贤的呼声日益高涨。艾希科尔告诉拉宾，达扬提出要当南方军区司令。拉宾当即表示反对，认为

这样作会造成南方军区司令加维什被迫辞职的后果。但交谈中，拉宾发现艾希科尔并不关心加维什的命运，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事情很清楚，如果把南方军区司令位置让给达扬，艾希科尔自己的国防部长就能保住了。见他这样考虑问题，拉宾便不再坚持反对意见，于是艾希科尔便拍板定了这件事。

回到家里拉宾沉着脸猛抽烟，莉赫不敢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气的是这事又跟佩雷斯有关，他于嘛老要跟自己过不去？佩雷斯当时什么都不是，只是个普通议员。他由于追随本-古里安跟艾希科尔过不去，已辞去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跟也辞了职的达扬经营从工党分裂出来的“拉菲党”。当艾希科尔表现得举棋不定时，佩雷斯力促达扬出山重掌兵权，并提出了以拉菲党人阁跟艾希科尔作交易的建议。但这事拉宾太敏感了，佩雷斯这个建议不是冲着他来的，目标是艾希科尔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

随后，拉宾、达扬及艾希科尔三人举行了会谈。拉宾认为有必要试探一下达扬，看他是不是对自己的总参谋长职位更感兴趣。这倒不是他多心。他那次尼古丁中毒后一直有人说闲话，达扬就是要当总参谋长人们也不会反对，而且艾希科尔肯定会舍车保帅的。但拉宾不是善于言辞的人，匆忙间竟一时找不到词表达自己的意思，话问得很笨拙：“你准备服从我这个总参谋长的指挥吗？”

达扬看穿他的心思似地微微一笑：“那当然，”但接着来了个使多疑的拉宾更多疑的比喻。他说，越南战场的美军司令虽然权力很大，但也得听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指挥。“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同。”听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拉宾断定他是想当总参谋长了，于是紧张地追问：“你希望取代我当总参谋长吗？”

“不！”达扬收起了笑意，赶紧给拉宾一颗定心丸。“你当你的总参谋长，我会服从你的每一道命令的。我仅仅是渴望参加战斗不愿在家观战而已。”

看到达扬当着艾希科尔的面保证不夺权，拉宾觉得放心了一些，反正这话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但接下来的事情棘手了，因为他得通知南方军区司令加维什让出位置，他不知该怎样讲这个话。他很害怕加维什质问他：“为什么要撤我的职？我犯了什么错误？”他迟疑了许久才难堪地打了这个电话。好在加维什很通情达理，他知道这不是拉宾的本意，但他坚决拒绝当达扬的下手。他委屈地说：“不！我将离开南方军区。我会向他交权的，在那之后，你叫我去什么地方都可以！”

但实际上加维什没交权，不是他拒不交权，而是事态的发展不用他交了。6月1日山姆大叔又给了艾希科尔一记清脆的耳光。原先埃班说美国要用两星期时间组织国际舰队打破海峡封锁，以色列内阁当了真，老老实实地准备等出个名堂来。但那天总统发言人声称，那是人们误解了总统的意思，美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消息传到以色列后，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到底是埃班和约翰逊之中谁撒了谎？这不是一场天大的国际笑话吗？随之，一股汹涌的愤怒浪潮席卷了以色列，人们狂怒地质问，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在这股势不可挡的浪潮冲击下，艾希科尔失去了最后一点自信心和自制力，答应把国防部长一职交给公众拥戴的达扬。6月1日艾希科尔组成了民族团结政府，贝京首次入阁。但佩雷斯没得到好处，什么职位也没有，过意不去的达扬任命他为自己的“助理”。

6月2日早9时，拉宾在总参掩体中召开了内阁防务委员会与总参的联席会议。部长们关心的是防务，而将军们则是来倾听达扬的高见的。达扬指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大国制止这场战争之前以军有多少时间好打，他认为这个时间只有三四天。如果早决心打，埃军防线的漏洞就会更多一些，以军就能在这几天内取得更多的战果；反之，如果再拖下去，以军初期突破埃军防线的就会延长，就没多少时间去扩大战果了。会议厅里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话说到了将军们的心坎上：战争是唯一的选择！这时的会场已被歇斯底里的战争气氛所笼罩，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但艾希科尔仍打算说清政府的本意。他小心翼翼地为内阁立场辩护，当他谈到获得美国支持的必要性时，总参后勤部长马蒂·佩拉德粗暴地打断他的话，“照你这么讲，我们还得再等下去，是吗？”

这一当众抢白激怒了艾希科尔，他多日来的焦虑、窝囊和委屈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如果我现在还没把这一点说清楚的话，我就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了！”他急速地说：“我希望在战斗中不需要美国的帮助，但我们要想保住胜利果实的话，就离不开美国的帮助！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把话向约翰逊总统讲清楚。两天时间不会影响战局！”见总理真发火了，将军们老实了，没人再敢言语。

6月2日中午，艾希科尔、达扬、拉宾、埃班、阿隆与赫尔佐格在总理府作出秘密决定：在6月5日之前不发起进攻，给内阁两天时间作出开战决定。3日和4日两天，拉宾对参战部队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视察，他满意地发现一切都准备就绪，部队士气极其旺盛。当他从南方军区司令部返回特拉维夫的斯代多夫空军基地时，遇到了乘坐直升飞机赶来的达扬。达扬告诉拉宾，内阁刚刚批准了次日凌晨发动进攻的计划。接着两人把所有的计划又过了一遍，随后把空袭时间定在6月5日凌晨7点45分。

是什么促使以色列领导人作出了决断？是来自美国白宫默许的信息。几天前，以色列情报首脑、摩萨德局长阿米特秘访美国，向中央情报局长和约翰逊总统通报了以方的意图，介绍了以军的突袭方案。在私下里约翰逊总统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他表示理解以色列的观点，没有对以方先发制人的突袭行动表示反对。阿米特回来后，向艾希科尔等人汇报了这些情况，以方政、军头目一致认为美国开了绿灯，可以动手了。

那天夜里拉宾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安稳，那轻轻的酣声使莉赫忍不住打开台灯端详起他来。他的白头头发明显增多了，额头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可他才45岁。她确信，只要仗一打起来，他又会像当年的帕尔马契士兵那样向前猛冲。

## 第五章 战争英雄

1967年6月5日凌晨，在美国默许和暗中支持下，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突袭。一场震惊世界的闪击战打响了。

### 孤注一掷大胆突袭 精心策划横扫数敌

空袭的时间，是根据空军司令莫德恰·霍德（绰号“莫蒂”）的建议确定的，他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摸清了埃及飞行员的活动规律。“天刚拂晓他们就起飞巡逻，时间持续为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回基地吃早点。在7点半到8点之间，那里的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总参军情部“埃曼”和摩萨德提供了上述情报，它们告诉霍德：埃及人吃早点时雷达没人值班，有半个多小时雷达暂时失明；部分战斗机被拖出机库保养，根本无法起飞；那段时间高级军官由于塞车无法到达基地，实际上没人指挥作战。这一切看似是以方对近期事态的反应，其实不然，这次不留预备队的突袭方案，早在1963年便由当时的空军司魏茨曼提了出来。达扬很赞赏霍德的奇袭方案，他那孤注一掷的作风很合自己的脾气。霍德打算一口气派出他200架战机中的188架，不留预备队，用3个小时彻底摧毁埃及空军。打仗不留预备队的作法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但它却是帕尔马契的老传统，达扬在独立战争时多次这样行事。

战前和战后拉宾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霍德在3小时内达不到目的怎么办？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十个指头难以按住十只跳蚤，谁也不能保证以色列战机一口气把埃及飞机全炸光，有漏网之鱼怎么办？再说，就算埃及那边打得顺手，叙利亚和约旦那边还有上百架飞机呢，它们要是趁机袭击以色列怎么办？无疑，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靠剩下的12架飞机跟叙利亚和约旦硬拼了，后果不堪设想。拉宾承认，尽管他一贯谨慎最后还是冒了险，霍德、达扬和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大赌徒。只不过三人之中霍德的胆子最大而已，他没多少本钱却敢大胆下注。

达扬对先前制定的作战方案作了些修改：开始阶段不进攻加沙地带，以免以军在那个人口稠密区被拖住手脚；尽快向苏伊士运河推进，要在国际社会没反应过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要尽早地拿下控制红海的沙姆沙伊赫。

7时许，以色列军、政首脑齐聚空军司令部。7点45分，随着霍德一声“萨丁·阿多姆”（“红被单”）密令，第一批40架战机起飞了。人们紧张地倾听扬声器里的声音，扬声器中没有发出异常的无线电信号，更听不到以军飞行员的交谈。为了保证奇袭效果，指挥部严禁他们打开通讯设备，就是被敌机击落也不准吭气。几分钟后第二批40架战机又隆隆起飞了，人们的心揪得更紧了。飞机一旦升空，再担心和后悔已无济于事，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祷，祝愿空军像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旗开得胜。以军机群在接近埃及海域时，没像往常那样折头返回基地，而是深入并突然从背后扑向埃及机场。在喷射气流的轰鸣声中，黑压压的以机突然出现在埃及机场上空，地面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它们便挟着阳光恶鹰般扑了下来，4架一组的以机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轮番攻击，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已变得毫无可能。刹那间雷声电闪，火光冲天，弹片横飞，爆炸声隆隆。

消息终于传来：第一波攻击出人意料地顺利，10个埃及机场上的189架

军用飞机被摧毁于地面上！接着是第二、第三波的攻击……以色列空军基地的地勤人员展开了竞技比赛，以创记录的速度把装满了油、弹的战机重新送上蓝天，美国人在越南的记录是每机每天出动两次，以色列人的记录是每机出动八次。到 11 点，四分之三的埃及空军力量已被摧毁，419 架战机中有 304 架在地面熊熊燃烧。以军夺取西奈制空权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8 点 15 分，南方军区司令部接到“纳赫肖，行动，祝你顺利！”的密令，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立即发起进攻。在捧为“空中长臂”的空军掩护下，以军装甲部队犹如一群凶猛的猎犬，在急速行进中熟练地进行穿插、分割、围歼的战术动作，使对手根本没有喘息和重新集结的机会。

在随后几个小时里，拉宾在空指和总参“掩体”间来回奔走，为的是能同时了解空军和装甲兵的进展状况。空袭捷报传来时人们一片欢腾、几周来折磨人的恶梦顷刻消失，拉宾大大松了一口气，他甚至发现有人偷偷地打开了酒瓶。但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继续干自己的事，他就是空军司令霍德。他那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使拉宾不由地注视起他来：他在想什么？是忙于指挥作战还是故作吟持，是不是想找个机会卖弄两句“我早就说过……”不，没有，他毫不张狂，像尊雕像似地坐在椅子上。他只有一个重复的动作，那就是大口大口地喝冷水，每次一满罐儿水，这能保证他对着话筒连续喊几个钟头嗓子不嘶哑。拉宾突然感到他是总部中最可爱的人，为什么自己从前没发觉这一点呢？

在夺取了西奈上空的制空权后，拉宾没把所有的飞机都派出去协助装甲部队，他让空军主力留在机场上待命，视战场变化派它们的用场。收拾西奈的埃及部队只是个时间问题，下一个目标是约旦和叙利亚。以色列不想打约旦，战斗打响后以色列通过三条渠道向侯赛因国王打招呼。这些渠道是：以色列—约旦混合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停火观察团长奥德·布尔将军和美国驻以大使馆。以色列对约旦说：虽然你们炮击了耶路撒冷新城及停火线的以军阵地，如果你们能及时停火并保证不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仍愿意遵守双方的停火协定。但侯赛因国王根本不理睬以色列人。埃及通报给他的“战绩”太诱人了，就是石头人也要动心，若再不动手就没戏了。于是，上午 11 时 50 分，约旦、叙利亚及伊拉克的空军一起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拉宾立即下令反击，在两个小时之内，这些国家的空军主力也被彻底摧毁。从那时起，整个战区的上空都是以色列人的了。

达扬和拉宾重新制定的步骤是：继续集中重兵痛击南面的埃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垮它，夺占尽可能多的地盘；排在第二位的打击对象是东面的约旦、目标是夺占整个耶路撒冷和约旦河两岸；东北面的叙利亚放到最后收拾，要见机行事，最好能消除戈兰高地上的叙军炮击威胁。

在约军先行开火后，以军展开了进攻耶路撒冷北郊阿拉伯区和南郊约军阵地的行动。6 月 5 日夜，以军在整个西岸地区与约军展开激战。约旦军队在战斗中打得极为顽强，要不是以色列空军不断上来帮忙，以军的进展不会很顺利。在这场激战中，拉宾平时组织的空、甲协同演练显示出良好的效果，飞行员和坦克手们依照“蛇鹰理论”作战，相互掩护齐头并进。所谓蛇鹰理论，形象地解释是地上的毒蛇怕天上的老鹰，对方的坦克怕自己的飞机；进而，用自己的飞机配合坦克协同作战。现在阿方的“鹰”已经坠落，它的“蛇”处于以方“鹰蛇”的夹击中。因此从一开始，以军战机就猛炸里伏特山谷中的约旦装甲部队，阻滞它们增援耶路撒冷的守军。接着它们又攻击约旦在耶

市郊区的坦克部队，以确保以色列坦克能先敌爬上双方争夺的制高点。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约旦军队的仗变得越来越难打了。

见肥肉全让别的军区吃了，北方军区司令大卫·埃拉扎少将火了。埃拉扎绰号“达多”，二战期间随父母从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移居巴勒斯坦，父亲曾是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中一名少校。达多过去是帕尔马契部队中一员猛将，打仗极其勇猛果断，不知道死是个什么概念。拉宾率哈雷尔旅进攻耶路撒冷老城时，达多是一线的连长。就是他，第一个率领连队冲上了锡安山，又从那里冲下来拿下了锡安门，继而攻进了老城犹太区。他是凭着战功上来的，本钱很硬，发火时往往会对着上级 蹶子。

他是个典型的战地指挥官，爱穿翻袖的夏威夷式军装下基层，跟官兵一道摸爬滚打。他敢对上级使性子，但对下级一点儿脾气都没有，敦厚的性格深得部下敬重。他是以色列公认的坦克战大师，钻研过德国名将隆美尔的用兵之术，突人穿插分割动作极其熟练。他的坦克部队犹如一群群斗犬，撕破敌人防线后便迅速扇形展开，窜上去咬住猎物就不撒嘴，直到其他斗犬咬断猎物喉管为止。这次他不断向达扬提出抗议：“为什么不准我揍叙利亚人？他们是不是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达扬自有主张，不为所动，他一次次地严令达多不得轻举妄动。达多气得发抖，在司令部里大声叫骂着摔东西，他不能容许别人把他的手捆起来让他一旁观战。

激战中，拉宾颇感意外的是达扬变了，变得不像从前的达扬了。在独立战争时期，达扬敢于不进行炮火准备就率部冲入敌阵。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期，他赞赏过沙龙率部敌后空降的冒险行动。那时的达扬，给人的印象是勇敢和果断。但现在他变得求稳怕乱了，绝不轻易冒险。拉宾还注意到，达扬很注意保持各穿插部队行进速度，生怕哪支部队插得太深被敌人一口吃掉。他还不愿随机应变地更改行动计划，有些仗明明可以打他也不准打。他不但严令阻止达多进攻戈兰高地，而且还在6月6日晨阻止部队进攻耶路撒冷老城。“有必要这么谨慎和死板吗？他到底担心什么？”拉宾不禁皱起了眉头，但想想后他认为达扬这样做也有道理。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以色列只与埃及一国交战，付出一些血的代价还受得了。但这次不同了，敌国是四个，情况也更复杂，稍有闪失后果难以设想。想到这里，拉宾不由地想起自己在决战前那副瞻前顾后窝囊样，他明白人在不同的地位上有不同视野的道理。

但6月6日晨8点半达扬突然沉不住气了。他烦躁地对拉宾说：“沙姆沙伊赫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再拿不下来战争就要结束了。你到那里去看看！”原来，他听说苏联正在大搞压以色列停火的外交活动，生怕这场战争连3天都不到就被迫结束。拉宾劝他别着急，建议7日以一个空、海联合行动攻占沙姆沙伊赫，因为实践证明光增派步兵无济于事。达扬沉思片刻同意这样做，但脸上的焦虑神情没消失。然而拉宾的精心策划全白费了。7日晨安理会通过了停火决议，拉宾下令立即抢占沙姆沙伊赫，但最先抵达的海军指挥官发回一封电报：“那里空无一人。”原来，埃军总司令阿密尔元帅发出了全线撤退令，沙姆沙伊赫守军6日夜全部悄悄撤走。

停火决议虽然通过了，但达扬和拉宾认为在交战各方表态之前至少还有一整天可以利用，因此加快了战斗节奏。所以6月7日是此战最激烈的一天。在时间压力下，达扬当天凌晨7点下达了夺占耶路撒冷老城的命令，古尔旅与约旦军队在那里展开了逐街、逐屋的争夺战。

6月8日，正当拉宾在作战室里全神贯注地指挥进攻之际，几份电文相

继送到他的手中。这些电文的内容不仅震动了以色列的高层领导人，而且所涉及的事情险些引起美苏之间的一场核冲突。

### 神秘爆炸众人失色 误击美船一场虚惊

事情的起因是阿里什附近海面发生了异常情况。第一份电文很短，实际上只是一条消息：“阿里什附近的海面上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拉宾看后觉得很纳闷：阿里什早已拿下来了，攻城的塔尔部队已向西推进了五六十公里，为什么他们身后会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会不会是埃军抄后路抢滩登陆了？想到这里，他忙命令空军和海军派部队去那里察看一下。命令发出后一小时，第二份电文到了，看来是对匆忙发来的第一封电文的补充。电文说，阿里什守军在对面海域中发现了一艘身份不明的军用船只，随后以军飞机多次低空掠过该船侦察其身份并要求船长报告身份。但始终收不到船长的答复，也查不到船身上的标志。而且飞行员从船的轮廓来看，觉得它很像条埃及船。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战前以军总部下达的攻击身份不明船只命令，空军和海军猛烈地攻击了那条船并重创了它。但这份电文仍未说清楚它是哪国的船，是来干什么的。正疑惑间第三份电文到了，它不仅解答了人们的疑问，而且使他们大惊失色。原来，以军攻击的是一艘苏联船！

拉宾坐不住了，忙把这一情况向艾科尔和达扬作了汇报，随后召集各部首脑商讨对策。一时间作战室内的空气紧张地凝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像把达摩克利斯剑似地悬在他们的头顶：“我们这不是逼着苏联参战吗？”战前，苏、美都在地中海集结了重兵，单苏联人的舰船就达70多艘。现在埃及财局已定，苏联是否会利用这个事件派兵直接介入战争？如果它真得这样做的话，美国又会作何反应？人们议论纷纷，但越议论越害怕，因为以军绝不是苏军的对手，真打起来几个小时就会一败涂地。更糟糕的是，以色列挨揍时美国还不便援救，因为是以色列无端向苏联挑衅。

正害怕间第四份电文送到了，它把一切都弄清楚了。原来那艘船不是苏联的，而是美国的，是一艘名叫“自由号”的电子监听船！这时以色列军，政首脑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代之于一丝苦涩的尴尬。这件事到底怪谁呢？真是不好说了。早在6月5日开战前数小时，以色列国防部就通知了美驻以大使馆：为防止来自海上的袭击，以色列空、海军将攻击西奈附近海域的埃及舰船；请美国尽快撤离其在西奈半岛附近海域的舰船；来不及撤走的船应向以色列通报其确切位置，以免发生误击。美国海军武官及时把这一通知转告了五角大楼，后者也及时地转告了在地中海游弋的第6舰队。但由于该舰队某些军官玩忽职守，在阿里什附近海域的“自由号”竟未接到撤离通知，当然它的船长也就不会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因此当以军几架“幻影式”突然光临该船上空时，他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

“自由号”不属于第6舰队，是国防部直接调遣的间谍船，隶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向第6舰队通报了这件事，却忘记了同时通知自由号撤得远一些，看来哪国都有不负责任混饭吃的人。这艘间谍船原先是条货船，后安装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设备改为监听船，可以截获26000平方公里内一切电讯和声响。战前它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开到这里，船上装了两挺没多大用的高射机枪，一副四不像的样子。但不管怎么说它是条间



谍船，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船长当然不会随便向外人透露身份。于是，就出现了上述飞行员问而不答而且找不到标志的情况。

幻影式上的以色列飞行员，刚打了大胜仗心气儿正高，见海上孤零零的一条四不像的船晃悠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先还耐心地询问了几句，见对方不理不睬的样子鼻子都气歪了，心想你算个什么玩艺儿，问你还不回答，着家伙吧！一推机头就扎了下去，“咚咚咚”地向自由号开了火，接着火箭弹也砸了下去。打光了弹药后他们还不解气，又用无线电召来了三艘以军鱼雷快艇，其中一艘毫不客气地向自由号发射了两枚鱼雷，一枚命中。于是，便发生了第一份电文中所说的“巨大爆炸声”。

更荒唐的事还不止这些。当以军战机呼啸着进行低空侦察和攻击时，惊慌失措的船上人员竟未能弄清袭击者的身份，想当然地向第6舰队呼救他们正遭到苏联空、海军的野蛮袭击！半小时后一份紧急报告送到约翰逊总统手中，说俄国人在地中海上悍然击毁了美国的“自由号”，并煞有其事地说是被苏联的潜艇打的。约翰逊脸色苍白地叫道：“好了，这种事终于发生了！”他稳住神缓缓地说：“在美国历史上，由于它的船只遭到袭击而导致战争的事已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缅甸号’，接着是‘卢西塔尼亚号’。而现在在这艘船，可能就是他们干的，我们已经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他原先以为这场战争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开战后数小时中央情报局以色列分站站长就报告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确信以方必胜无疑。这使约翰逊放了心，但现在出了意外，而且很可能是个他收不了场的大意外。后来他在自传中说，在接到那份报告后几小时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他必须在吃哑巴亏和命令第6舰队反击之间作一个历史性选择。

万幸的是，他没头脑一热就下令反击，这多少要归功于自由号船长采取了紧急措施。当自由号中鱼雷爆炸后，全船的人都吓昏了，哭天喊地地满船乱跑乱窜。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本来就不是战斗人员，有几个人套上救生衣就要往海里跳。此时船长从驾驶室的碎玻璃片中挣扎着爬起来，用哭腔冲着大副高喊：“升旗！快升国旗！”他的想法很简单：要是再不行就投降当俘虏，总比葬身鱼腹要强。大副也吓慌了，随手抓起一面国旗就升了上去，结果抓错了，升起了一面庆典用的特大号国旗。以海军的鱼雷艇长们调转船头正要进行二次攻击，突然发现“敌船”上升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忙把“放”字咽了回去。他们犹豫了片刻，不解地驾艇围着自由号绕了几圈，最后断定这艘船确实是美国的，便不知所措地返回海法基地。弄清真相后，拉宾知道此事的厉害关系，顾不上外交程序赶紧下令直接向白宫发报，告知美国政府以色列误击了它的船。真相大白后，美国人的感觉与以色列人一样：轻松，但夹杂着令人尴尬的苦涩。他们唯一庆幸的是，约翰逊总统没有立即发出反击令，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自由号”事件的善后处理是迅速和低调的。双方都不愿多加张扬，就像两位亲家低声细语处理未婚儿女干的蠢事。8日下午，艾希科尔、达扬和拉宾向美驻以大使馆通报此事并正式道歉，并表示愿意提供处理善后事宜的一切必要帮助。同时他们强调，这次误击完全是两国情报部门互不通气造成的，今后两国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合作。美国大使在这之前已接到白宫通知，马上接受了以方的道歉，并派海军武官厄内斯特·卡斯尔上尉到“自由号”

上进行视察。

现场的情景极为悲惨：船体被以色列鱼雷开了个大天窗。钢板呲牙咧嘴地露出船内脏的肠花里肚；甲板和驾驶室被以机的枪炮扫得千疮百孔，到处是斑斑血迹和碎玻璃片；甲板上满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舱里发出一片哭喊声和呻吟声。船上有34位官兵被打死，伤者达164人。卡斯尔上尉不断地摇着头，痛苦地说：“噢，我的上帝！……”他绝望地摊开双手：这条船算是完了，以色列人的活儿干得既麻利又漂亮。

以色列人的悲痛不亚于美国人，因为死者中很多是美国犹太人，当局把他们弄到船上是为了让他们窃听以军的希伯来语通讯。拉宾向美方表示愿提供进一步的协助，但第6舰队司令冷淡地谢绝了他的好意，用自己的直升机运走了伤员，用自己的拖船把“自由号”拖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修理。为表示歉意和善意，以色列政府向伤亡人员家属支付了1300万美元赔偿。但它坚决拒绝了美方多次提出支付修理“自由号”费用的要求，理由是错误不在以色列人身上。

说时长那时短，这段充满戏剧色彩的小插曲其实并没占用多长时间。“自由号”的事刚告一段落，达扬和拉宾马上把注意力集中到耶撒冷的争夺战上。

耶路撒冷战事由中央军区司令乌兹·纳尔基斯少将指挥。他是个矮瘦的蓝眼睛老兵，也是帕尔马契出身，原为拉宾的哈雷尔旅第4营的副营长，独立战争中他的营第一个突进老城。在以军整体布局上中央军区只是个二线军区，要攻占整个耶路撒冷兵力明显不足，拉宾给纳尔基斯调来了古尔的第55伞兵旅。经过一天的苦战，古尔旅终于从狮子门突进了老城，进而配合其他部队控制了全城。

随后，在稀疏的冷枪和流弹之中，拉宾陪着达扬来到纳尔基斯设在耶路撒冷的指挥部。纳尔基斯首先向达扬敬礼报告，随后扑上来与老首长拉宾热烈拥抱，今天他能如愿以偿地攻占圣城格外激动。达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继沙梯尔之后从1948年7月起也担任过耶路撒冷战区司令，任期内他曾经秘密到约旦王宫里与阿卜杜拉国王密谈过。当他们一行抵达神圣的“西墙”（哭墙）时，只见簇拥在那里的古尔旅官兵们嘴唇颤抖泪流满面，抚摸着墙上的巨石久久不愿离去。达扬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率先把一个写着自己祝愿的小纸条塞进巨石缝隙中，人们哗地涌了上来……

有人看见拉宾哭了，很动感情地哭了，扶着西墙混身颤抖不已。在这之前，人们从来没见过他哭过，无论是在惨烈的血战中还是在英国人集中营里。后来，达扬走了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扶着他离开了西墙。

拉宾擦干脸上的泪水陪着达扬返回总部，一路上他们都默不作声地沉思着。把南面的埃及人和东面的约旦人打得差不多之后，现在轮到进攻东北面的叙利亚人了。但看来达扬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迟迟不下达进攻戈兰高地的命令，并一再制止达多的冲动。拉宾很纳闷：他究竟顾虑什么呢？

### 以军逞勇夺占西奈 达多狂躁直扑戈兰

6月6日凌晨，以、叙边界上的犹太定居点遭到戈兰高地上叙军的炮击。达扬当即下令达多还击，但严禁他越界进攻戈兰高地。达多气愤地“啪”的一声摔下电话，随口骂出一大串脏话来。达扬是了解达多的脾气的，他不敢

放松这根缰绳，稍一放松，达多就敢进攻戈兰高地和大马士革。达扬担心的正是这点。

达扬究竟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是苏联干预。

在以色列狠揍了埃及和约旦后，苏联没像它战前拍着胸脯许诺的那样出兵援救，这在阿拉伯世界中已经够丢脸了。此况下以色列再揍叙利亚人，苏联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它至少要为自己扳回些面子。叙军中有许多苏联顾问，打起了就免不了有伤亡，这便是苏联出兵的最好借口。而且苏联很清楚，美国并没对以色列安全作出承诺，而整个第三世界是同情阿拉伯国家的。

达扬怕苏联事出有因。1966年夏天，他对南越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想实地观察一下这场战争是怎么打的。许多以色列人强烈反对他进行这个访问，有耽心他的个人安危的，也有出于反对越战的。他耐心地对反对者解释：“越南战争，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正在激烈进行的地区战争，我们当中谁也没见过如此规模和投入的战争。我想研究一下这场战争，看看它有没有我们以后可资借鉴的东西。”他还是去了。美军将领很欢迎这位独眼英雄，都想听听他的高见，向他提供了一切便利，让他坐着直升机观察双方激战，甚至允许他跟突击队一起淌着河水搜索前进。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最初，他是从战术角度观察这场战争的。他在自传中说，到1966年，“离我上次参加的战争已有10年了。我不再面对敌人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时间已有10年了，不跟随自己的坦克、大炮和飞机前进的时间也有10年了。我想到那里亲眼看看，看看现代化战争是怎么进行的，新式武器是怎样操纵的，它们在作战中的效能怎样，以及我们今后能否加以采用。”但实地考察后他悟出了更多道理，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此类局部战争应尽量避免大国干预。他亲眼看到了“越共”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一排排地被扫倒，又一排排地冲上来，阵亡者穿着轮胎底做的“抗战鞋”，军用挎包内是芭蕉叶包着的冷饭团。越南人为什么如此勇敢顽强？是由于他们背后有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全力支持，就凭这点美国就输定了。因而，当他乘直升机现场观察美军扫荡越共时，他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美国人在与俄国人和中国人激烈厮杀；表面粗糙但性能优良的苏制武器：……这对他是个强烈的震撼，他得出结论：千万别招惹俄国熊，要不然会吃不了兜着走！

但在这次战争中，在南线和东线已经得手的情况下，完全不让达多动手是不可能的，况且是叙军率先炮击的。因此，达扬在7日允许达多反击，但规定他顶多只能越界一二英里，他掌握着不把苏联人引进来的尺度。拉宾没真正看透达扬的心思。好处谁不想趁机多捞点儿？但也得看时机是否合适。达扬正在等这个时机，一旦机会来临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的。

机会是有的。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定于7日晚10点生效，但9点时纳赛尔拒绝了这个决议，原因是这一决议没要求以军从所占土地上撤出。达扬和拉宾大喜过望，这等于纳赛尔又给了他们放手进攻的时间。此时苏联无法出兵干预，因为他们的盟友还想打下去，它出兵干预有拉偏架之嫌。这下达扬放心了，忙和拉宾指挥以军向苏伊士运河挺进，先在南线上捞足了再说。见形势恶化纳赛尔又在8日晚同意立即停火，但此时达扬已有恃无恐，命令部队迅速打到运河岸边去，他已看出苏联不会干预了。

这个机会让他抓住了，在埃军溃不成军的状况下以军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到后来西奈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场面：以军的坦克、装甲运兵车

和自行火炮，在公路上与全副武装的埃及部队一起向苏伊士运河前进，只不过一个是进攻一个是撤退，而且它们不可思议地互不干扰。以色列坦克手在路上修理战车时，埃及官兵川流不息地从他们身旁经过，谁也不想上前“俘虏”以色列人，甚至连放一枪的人都没有。兵败如山倒。以军除了缴获了数量惊人的武器装备外，战利品中还包括堆成小山似的军靴，那是就地释放的埃及士兵在泅渡苏伊士运河前脱下来的。

看到埃、约战线相继停止战斗，被南、东两线辉煌战绩刺激的达多径直冲到总参请战，要求立即下令进攻叙军。他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一个北部边界居民代表团进行游说。这些人直接找到艾希科尔倾诉委屈和愤懑，“以色列军队已经打败了南边和东边的敌人，难道你们打算让我们继续屈辱地生活在叙利亚人的炮口之下吗？”艾希科尔对此无言可答。他是同情这些定居者的，支持对叙利亚人采取行动，但他不便命令达扬，遂以议会防务委员会与定居点代表团联席会议说服达扬。但达扬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他仍顾虑苏联借机出兵干预，而且内阁部长们也同意他的观点。当拉宾打电话给达多通知他内阁的决定时，达多懊丧得差点哭出声来，他绝望地呻吟道：“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啦？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自己、以色列老百姓和那些定居者呢？”他进而责问拉宾，是否准备让那些向以色列人开火的叙利亚人骑到脖子上拉屎才舒服。拉宾无言可答。

看到达扬和内阁都不准进攻叙利亚，无可奈何的拉宾于9日凌晨2点回家休息。见到莉莉赫和孩子们他感到轻松多了，但睡意也猛地窜了上来，头刚靠上枕头就睡着了。他已有4天4夜没好好合眼了。7点钟他突然被电话铃惊醒，魏茨曼在电话中激动地叫道：“伊扎克，15分钟前达扬给达多打了电话，命令他立即进攻叙利亚人！”拉宾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不出是什么机遇又送到了达扬面前，让他在几个小时内又改了主意。他马上驱车赶往“掩体”，达扬已在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了，正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达扬没解释他为什么要改变初衷，拉宾也没多问，这个问题遂成了一个谜。

在调兵遣将的过程中，拉宾抽空打了个电话问达多到底是怎么回事。达多说他也不清楚，说当他接到达扬的这一进攻命令时，惊讶得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达多还说，达扬认为叙军已无斗志，将会变得不堪一击。拉宾听后一惊：还没开打怎能如此轻敌呢？这会吃大亏的。他赶紧警告达多不要大意，叙军是会坚决抵抗的。

果然，战斗打响后叙军的抵抗极为顽强，表现得比埃军和约军更为硬朗，毫无一触即溃的迹象。以军的许多进展，是凭着残酷的肉搏战一寸一寸地夺来的。要不是以色列超级间谍伊莱·利恩用生命换来的情报，这些情报精确地标出了叙军火力点的位置，以军的伤亡还要成倍地增加。但当拉宾和魏茨曼从前线回来后，达扬的主意又变了，命令拉宾通知达多必须在午前停止战斗。拉宾说自己刚命令达多增派一个伞兵旅投入战斗，现在下相反的命令恐怕有麻烦。达扬板下脸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无奈，拉宾只得通知达多不要派那旅伞兵参战了。但达多冷冷地说：“对不起，遵照你刚才的命令，那个伞兵旅已经发起了进攻，我现在没法制止他们。”拉宾觉得他的声调有些异常，好像是在耍什么花招儿似的，但懒得追究。达扬间讯不高兴地一转身走了，于是争夺戈兰高地的战斗就这样打了下去。停战后达多向拉宾坦白，他接到电话时那个伞兵旅还没动窝呢！

叙军的抵抗到9日夜间突然减弱，问题出在叙军统帅部身上。为保护首

都大马士革的安全，它命令部队逐步撤至库奈特拉城以北。但出于博得国际舆论同情的策略，叙利亚电台在 10 日早 8 点宣称以军占领了库奈特拉城。这一不是时候的广播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叙军的军心顿时大乱，逐步后撤变成了全线溃逃。达扬趁机把停火时间从 12 点改到下午 2 点。到 11 点叙军统帅部发现铸成大错时，再向部队说明实情已为时太晚，空无一人的库奈特拉城已经落入以军手中。以叙停火协定于 10 日下午 6 点半生效，但深谙“停火”奥妙的达扬知道这是趁乱打劫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谁违反了停火是说不清的。于是他命令部队在 11 日和 12 日继续抢占地盘。12 日以军一支空降兵控制了赫尔蒙山的制高点，它标志着这场为期短促而激烈的战争全面结束。

以色列人颇为这场仅用 6 天时间就连克数敌的战争深感自豪，遂把这场战争定名为“六天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拉宾与达扬一起成了举世闻名的“战争英雄”，当然是在一场侵略、扩张战争中大出风头的“英雄”，达扬的声誉要更高一些。实际上，除了那次引起一些非议的“病休”外，拉宾的表现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西方评论家在赞扬以军的出色表现时，没有忘记拉宾对训练这支军队多年来付出的心血。他在工作上是没说的。他能把军队各兵种和各部门的预算倒背如流，他熟知每支部队的光荣战史，他小到知道每个营

部署的确切位置，他能见面就叫出营长以上军官的名字。特拉维夫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沙布塔·苔维丝指出：“这支军队是他就任总参谋长后的三年中训练、规划、建设和武装出来的”。

达扬对此颇有同感。他对拉宾能把军队训练到这种水平，对他周密细致的组织和策划，非常满意。拉宾由此在军界声名鹊起，极受官兵的尊崇。

### 攻城掠地斩获颇丰 阿以敌对日益加深

六天战争闪电般的惊人胜利，给以色列的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带来了戏剧性变化。战前以色列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人们思想极其沮丧和混乱。西方国家没有援救以色列人的意思，阿拉伯人威胁要把他们全赶进地中海，一些以色列人已找好墓地等待着又一次大屠杀的来临。此仗一打，一切都魔术般地改变了：西方资金洪水般地涌了进来，经济由萧条迅速变为繁荣，一个 100 多万阿拉伯人的新市场出现了。而新占领的大片土地，缩短了以军必须防守的边界，战略纵深的加大使以色列人的安全感大增。更重要的是人们信心大增，他们相信以色列人可以保护自己，阿拉伯人将被迫向自己求和。

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仅用六天时间便夺占了相当于本国 6 倍大的土地，这在军事上确实是个奇迹。但随之也给以色列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边界”又变了。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边界不断变动的国家。1947 年的联大分治决议分给犹太人 1.49 万平方公里国土，分给巴勒斯坦人 1.12 万平方公里。独立战争一打

以色列不认这个帐了，战后它的领土扩展到 2.11 万平方公里，出现了新的“边界”——停火线，俗称为“绿线”。苏伊士运河战争以色列没捞到什么好处，吞进去的加沙和西奈半岛后来又被迫吐了出来，边界没变动。六天战争后它的控制面积一下子达到 8.7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原犹太国面积的

6 倍，这次的停火线俗称“紫线”。这样一来，地图上的以色列“腰围”大增，熨斗似的原形变成了赛车模样，以色列人的安全感提高了。但从此出现了“被占领土”的问题，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的新“边界”。

被占领土主要指的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简称加沙，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的西南角，是地中海沿岸一条 40 公里长 6.5 至 16.5 公里宽的狭长多沙丘的地带。约旦河西岸简称西岸，西与以色列的地中海沿岸平原相连，东接约旦河河谷，是块 6000 多平方公里的山地。根据 1947 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加沙和西岸原来是分给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简称巴勒斯坦人）的，但巴勒斯坦人拒绝分治决议没有及时立国。随后，这些领土在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独立战争）中被以色列、埃及和约旦分占。其中，埃及占了加沙，约旦占了西岸。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六天战争）中，以色列把上述领土连同东耶路撒冷一口全部吞下。

如何处理这些被占领土，从此成为以色列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是兼并它还是放弃它？如要兼并，是全部兼并还是部分兼并，该兼并哪些地区？如要放弃，是全部放弃还是部分放弃，在什么条件下放弃？对此，不仅工党联盟和利库德集团有争论，两大党内部派别也有分歧，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分为鹰派、鸽派和中间派。

鹰派包括贝京为首的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宗教势力和少数工党成员。他们主张把这些领土全部吞并，跟阿拉伯人没什么客气的，要建立“大以色列”这些领土还不够呢！宗教势力给这一主张披上神圣外衣，说这是上帝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许诺把以色列地送给犹太人的体现。东方犹太人“赛法尔迪”的首席拉比说：“这是我们祖先和先知生活过的、上帝许诺给我们的土地。一个犹太人，哪怕是头脑中有一丝一毫放弃它的念头，也是渎神的”。他们特别看重葬有犹太鼻祖亚伯拉罕、以撒等人的约旦河两岸，按古犹太史上的称谓把西岸叫做“朱迪亚和萨马利亚”。以色列鹰派的势力历来较大，他们得到大约 30% 的选民支持。

鸽派主要由头脑清醒的以色列人组成，他们认为这些侵占领土是吞不下去的，与其最后被迫吐出不如早日归还。他们认为，阿拉伯人的人口增长率比犹太人高几倍，现在被占领土上已有 100 多万阿拉伯人，如兼并它若干年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将超过犹太人。到那时，以色列将变成一个少数犹太人统治多数阿拉伯人的国家，一个南非白人政权式的种族主义国家。届时以色列人想讲民主都讲不成了，民族冲突引发的大乱将接踵而来，有教养的犹太人将移居它国。但在以色列这种开明的人不多，较多的是中间派。

中间派由工党联盟的多数成员组成，他们主张放弃一部分兼并一部分，以部分被占领土换取阿拉伯人罢战言和。最终可以放弃的领土包括：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加沙的人口稠密区、部分戈兰高地和西岸的中部；兼并的是犹太教圣地和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他们也看到了阿拉伯人“人口定时炸弹”的潜在威胁。副总理阿隆首先提出了撤出阿拉伯人口稠密区的计划。中间派与鸽派是以色列“以土地换和平”观点的主流，他们看到了侵占它国领土的严重后果。在六天战争中，当拉宾在耶路撒冷指挥部得知以军一下子夺占了约旦河西岸不禁惊呼道：“我们如何统治 100 万阿拉伯人？”

但问题在于，中间派加上鸽派只跟鹰派势力持平，双方谁也压不倒谁。丧失领土的阿拉伯国家当然不接受“阿隆计划”。以色列鹰派的压力又很大，

工党政府颇感棘手。此况下，它只能保持一种既不兼并又不撤军的立场，同时不时屈从鹰派压力建立一些犹太定居点，这致使被占领土上的 100 多万巴勒斯坦人敌意日益增强。

事情的真正原委，是以色列几乎找不出急于归还被占领土的人，即便他是个鸽派。历史和宗教意识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影响，耶路撒冷、杰里科、希伯伦、纳布卢斯等西岸城镇曾是古犹太史和圣经上演的舞台，人们对它们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头脑清醒的本—古里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摇摆的，他跟贝京的分歧是策略上的，而不是目的上的。他早在 1937 年就说过：“如果有人让我放弃对整个以色列地（注：即大以色列）的历史权利来换取在以色列地西部建立犹太国，我宁肯推迟建国。”外长埃班对此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论。他认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巨大收益，导致了人们的心理失衡，军事胜利被说成是神助的，政府和国会丧失了权威。此战使以色列一夜间由“脆弱”变得“强大”，人们由此产生一种悠然自得的陶醉感，工党联盟也变得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了。

其次是以色列人变成了“占领者”。在中世纪，犹太人在欧洲是排在第一位的贱民，被迫住在“隔都”里受尽歧视和排斥。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社会一动荡统治者首先拿他们当替罪羊。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是法西斯理论的攻击目标，纳粹种族主义宣称他们是该死的劣等人。在 2000 多年的时间里，他们总是被统治者，无论是在基督教的欧洲还是伊斯兰教的中东。但现在变了，他们——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占领者，换言之也就是统治者，统治着 100 多万阿拉伯“臣民”。他们始而惊愕，继而窃喜，后来便习以为常了。

于是，历史上占领者对占领地区民众所做的那些事，他们也开始学着做了。最初有些不好意思，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比如查验被征服者的身份证、没收他们的土地和抢占矿产和水源等等。久而久之，许多以色列人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倒不明白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愿意安份守己。

但拉宾无意为这些问题操心，他在考虑自己下一步怎么走，因为他的总参谋长 4 年任期将满，他得为自己谋求一个合适的差事。他在战前的 3 月份就确定了去向，他曾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艾希科尔，后者听罢故作受惊似的叫了起来，“哎哟，伊扎克，快抓住我，别让我从椅子上掉下来！”

## 第六章 驻美大使

早在六天战争前，拉宾就考虑自己下一步干什么好，因为他的总参谋长任期将满。为此他跟艾希科尔总理谈了自己的打算，艾希科尔听罢颇感意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 毛遂自荐出使美国 静观大选暗中摸底

没事时艾希科尔是很幽默的。他故作惊讶地走到拉宾面前，像打量一件商品似地把他上下左右端详了一番，戏谑他说：“你想去当大使，而且还是驻美大使，你不觉得这是个你不适合干的工作吗？当然，你那些不会打领带之类的笑话我早就忘记了。但想想，你习惯出席那些没完没了的酒会吗？你有和太太小姐们打交道的雅兴吗？你熟悉那些玄奥的谈判技巧吗？不，你根本不适合于这种工作。听我说，伊扎克，放弃这个想法吧，你根本不是块干外交官的料！”

拉宾一梗脖子，“但我准备去学，而且我也相信我学得会！我不会害怕那些鸡尾酒会的。”他毫不退缩他说。接着他向艾希科尔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想当驻美大使的原因。他强调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日益突出，但以美关系相当薄弱，要跟它结盟得花大力气，自己的总参谋长背景将有助于加强这种关系。

艾希科尔显然被他的理由打动了，答应去和外长埃班谈谈，但没当场拍板定案。战后的7、8月间，拉宾又几次找艾希科尔谈这件事，但每次艾希科尔都说埃班对此持保留意见。拉宾又急又恼，他知道这是埃班有意刁难。他担任总参谋长后常出席内阁会议，在许多问题上跟埃班有分歧，免不了叮当几句，由此他们的关系有些别扭。现在埃班报复了。拉宾的朋友闻讯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求那个书呆子干什么，趁早谋个部长当当算了。但拉宾拒绝了。他认为现在从政还为时过早，大使的职务可以积累些经验，为将来从政打一些基础。关键时刻，工党实权人物、总书记梅厄夫人拉了他一把，才使他当大使的事情定了下来。

在准备阶段，他征求了外长埃班及外交部高级官员的意见。但他觉得与埃班的会谈简直是活受罪，埃班不但话少而且对他的看法不表态，弄得他好像是对着台下一个观众念台词似的。官员们倒还友好，但他们似乎没有明确的对美外交目标，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末了，拉宾给自己定下四个目标：一、确保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二、与美国协调中东政策；三、谋求美对以的长期军事和经济援助；四、谋求美国对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作出承诺。当他把这四项目标的备忘录交给外交部时，得到了官员们典型的外交微笑，好像是说：“好极了，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吧！”

1968年2月初，拉宾带着夫人莉赫和12岁的儿子尤瓦尔上任。大女儿达丽亚没有同行，她正在上高一，高中毕业后还得服两年兵役。飞机在杜勒斯机场着陆后，以色列使馆官员径直把他们送到大使官邸，他第一个印象是有生以来从没见过如此宽敞的住宅。

上任初期他没进行过过多的活动。一来是他初来乍到需要熟悉一下环境；二来是约翰逊政府被越战和大选搞得焦头烂额，无暇关心中东问题。但他也



没消极旁观，他打算从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了解美国内外政策。当时美国人最关心的是越战问题。年复一年美国政府都向民众许愿，要让他们的孩子回家过圣诞节，但人们见到的只是用塑料裹尸袋运回来的尸体。人们对美国的强大和他们的政府已失去信心，整个国家就打下去和撤回来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越战问题既然如此困扰美国社会，那么它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他不禁皱起眉头，他知道这一影响是消极的，美国人肯定不想再卷入中东冲突。他想起基辛格博士说过的话。他出使美国前有幸跟这位哈佛大学教授进行过一次长谈。那次谈话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但他一点儿都不觉得累，他被基辛格对国际问题的渊博知识和精辟见解所倾倒。基辛格指出，越战对美国来说固有百害也有一利，那就是美国汲取了今后处理位于冲突地区的盟友关系的经验，从此美国不会轻易卷入冲突拯救自己的盟友，因为一旦陷入泥潭就很难脱身。相反，这种局面对苏联很有利，它会利用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尽力向外扩张。

但美国也有支持越战的人，不少还是上层人物，颇有影响的专栏作家约瑟夫·埃尔索普就是这些人的代表。他曾邀请拉宾共进午餐，这种殊荣在华盛顿特区只有极少数名流才能得到。说来有趣，40年代末埃尔索普曾极力反对建立以色列国，因为他害怕工党会把以色列变成苏联的卫星国，但后来他变成了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在谈到越战时，拉宾问他为什么美国不从越战中迅速脱身，打不赢就撤是个常识嘛。埃尔索普沉默了半晌，略带愠怒地高声说：“我们必须消灭越共和北越有生力量，我们没有其它选择！”拉宾不以为然地指出，当年围剿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的法国人也说过这种话，但最后还是灰溜溜地撤走了。不料这话惹恼了埃尔索普，他激愤地涨红了脸，“听着，我相信那些认为可以取胜的美国将军，在美国，只有失败主义者才认为事情一团糟！”但这一豪言壮语没能说服拉宾。拉宾感到美国对越战既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有取胜把握，在遭受惨重损失后又迟迟不肯撤出，叫人很难理解。在以色列，是没有哪位将军会干这种蠢事的。

由于拉宾是位国际知名的战争英雄，许多美国人对他很感兴趣，希望与他合影留念。而且，他们也很想了解拉宾是怎样打仗的，为什么弹丸小国以色列能横扫阿拉伯数国如卷席，而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却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越南。1968年6月4日，正在纽约一家旅馆中的拉宾突然接到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助手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与参议员先生在旅馆中合影留念。看来处于竞选高潮的肯尼迪需要战争英雄为他助威。但拉宾希望与这位政治明星长谈一次，不愿意让几分钟的合影冲掉这一机会，因此婉言谢绝了这一请求，希望另约时间在华盛顿相见。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自己与肯尼迪议员见面的最后机会。第二天，6月5日，也就是六天战争一周年的纪念日，一名叫作赛尔汉·赛尔汉的年轻巴勒斯坦人，在人群中挤到肯尼迪跟前朝他连开数枪，杀死了他。过后，拉宾为自己错过那次相见机会深感遗憾。

很明显，在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展开激烈竞选之际，是没人愿意倾听一位以色列新大使的看法的。而拉宾也逐渐了解到，美国总统大选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它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政策。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到了两党的竞选活动上。为深入了解，他参加了两党推举总统候选人的大会。

8月7日他来到共和党人设在迈阿密的会场。一进门，喧嚣的声浪及震

耳欲聋的音响迎面扑来，他颇有一种贸然走进一个正在进行精彩表演的马戏团大帐篷的感觉。只见会场中央一些身穿性感泳装的漂亮少女在起劲地跳着，不时扬起大腿和挥动纸花。来自各地的代表们，包括那些穿戴讲究的中年人，都像灌了不少啤酒似地欢叫着。巨幅标语、彩色气球和大贝思音响，使会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鼎沸状态。最后，共和党人推选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

20天后他又到芝加哥参加了民主党人的大会。尽管会场喧闹的程度不亚于共和党人，但气氛迥然不同，显得很紧张。会场外聚集着来自各地的反战示威者，以实行“铁腕”政策著称的芝加哥市长达利动用警察对付这些示威者。当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考夫要求在警察停止野蛮殴打示威者后再开会时，达利粗野地骂道：“住口，你这个肮脏的犹太佬儿！”但里比考夫坚持要把话说完，达利手下人便把麦克风线掐断了。这下子惹恼了里比考夫的支持者，他们冲上去与达利的人扭打起来，会场内乱成一团。当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会场维持秩序时，拉宾谢绝了美国朋友让他暂高会场的劝告，坚持要把这出闹剧看到底。其实呆在外面也不安全，那天达利的警察失去了理智，不少拍摄示威场面的记者也挨了警棍。最后，在紧张和混乱的气氛中，休伯特·汉弗莱当选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为进一步摸底，拉宾在大选过程中数次与尼克松和汉弗莱会晤，了解他们对以态度和向以提供鬼怪式战斗机的立场。两人之中尼克松的亲以态度比较鲜明，他支持向以色列提供这种先进的战斗机。相比之下汉弗莱的态度较暧昧，话说得很含糊，让人号不着脉搏。他这种态度，再加上芝加哥市长达利的反犹立场，使拉宾感到民主党的新人很难从约翰逊政府旧框框里摆脱出来。到了大选后期，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和选票显示了作用，反应机敏的尼克松马上向美国犹太人领袖保证坚决支持以色列，答应上台后立即向以提供50架鬼怪式飞机。见势汉弗莱也跑去参加美国犹太人组织的年会，但他在谈到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时很谨慎，而且闭口不谈向以提供鬼怪式飞机的问题。

这种对比使拉宾对尼克松产生了好感，他希望尼克松上台，因为敢说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总比不敢说这话的人强。但拉宾深感不解的是美国犹太人似乎不在乎这个问题，他们历来投民主党的票，民主党也把他们视为自己“口袋里的选票”。更奇怪的是共和党人也如此看待，并不积极争取美国犹太人。只有尼克松是例外，他准备改变这一传统，确信自己鲜明的亲以态度会给共和党及自己带来巨大的收益。

其实拉宾与尼克松是老朋友了。在六天战争前，尼克松是个在竞选中多次受挫的倒霉蛋，在以色列领导人眼中没什么份量。因此当他1966年访问以色列时，以方接待他的规格很低，拉宾出席了欢迎他的午餐会，却发现自己到场人中职位最高的人。看到尼克松受到如此冷遇，拉宾便邀请他到军中作客，并下令给他以“红地毯”规格的隆重接待。拉宾这一与众不同的举动，给处于逆境中的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迭声地表示感谢，说了不少“我永远不会忘记”之类的话。这种感激之情甚至使尼克松感到有必要发表一些亲以言论。在六天战争之后他应邀去戈兰高地参观时，竟脱口而出“如果我是个以色列人，我是绝不会归还戈兰高地的”。他说完后可能就忘了，但陪同他访问的拉宾却记牢了这句话。尼克松的第二次访以受到了高规格的接

待。这一次以色列领导人不敢怠慢了，他们已经充分估量出尼克松的政治能量。因此当他来到总理府时，上至总理下至部长，都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恭候他的大驾光临。

在投票之前，拉宾觉得有必要再到尼克松那里落实一下军售问题，因为战后以色列军火供应出了大问题。战前法国总统戴高乐就切断了对以军火供应，战后美国约翰逊政府也停止了对以的军火出售，即使是弹药和零部件也不卖，逼得以军从报废武器上拆取零部件勉强维持。约翰逊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向苏联发出信号：“我们不卖给以色列人武器，你们也不要卖给阿拉伯人武器，让我们联手来制止中东的军备竞赛。”但苏联人并不买帐，继续大规模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补足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这种状况使以色列军政首脑焦急万分。

尼克松对这个问题相当爽快。他俨然以一个总统的口吻对拉宾说：“你放心好了，我答应你这一要求。我支持以色列变得更为强大，你们会得到飞机的！”接下来的话更使拉宾喜出望外了。因为，尼克松不仅赞成向以色列提供充分的武器，而且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以色列可以在美苏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但同时，尼克松也把美国外交政策的底向拉宾交待清楚了。他强调，他和汉弗莱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与苏联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中东问题上，达成谅解是必要的，因为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指出，他与汉弗莱不同的只是处理方式。汉弗莱常表现得像是在乞求苏联人，而他则主张以实力与苏联人打交道，因为苏联人只懂得实力的语言。对尼克松要同苏联取得谅解这一点，拉宾听着不那么顺耳，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毕竟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 出尔反尔以方食言 联大决议形如虚设

拉宾出任大使时以美关系谈不上特别友好。

尽管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取得了惊人胜利，美国新闻界也发出一片喝彩，但约翰逊政府对这场战争不以为然。它认为以色列这样做激起了中东的反美情绪，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约翰逊在1967年6月19日一次讲话中表明了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基本立场。他说：“冲突的双方必须成为和平的双方。如果它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就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和平相处。”随后他提出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五项原则：一、承认各民族的生存权；二、公正解决难民问题；三、制止中东的军备竞赛；四、确保战时中东地区的通行权；五、尊重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文字表述上约翰逊的五项原则不偏不倚，它既要求阿方不要试图以战争消灭以色列，也要求以方从侵占的阿方领土上撤出。但从以色列霸占了大片阿拉伯领土的角度来看，这些原则似乎对以色列更不利。没想到，以色列政府在打了点小折扣后，迅速地接受了这些原则。

就在同一天，6月19日，艾希科尔政府作出四点决议来响应美国的要求。它们是：一、以色列准备撤到以埃国际边界；二、以西奈非军事化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及保证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航权；三、以色列准备撤到以叙边界，以戈兰高地非军事化来保证以色列的边界安全；四、西岸，加沙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将另行考虑解决。22日，以色列外长埃班把这四点通

告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当然也通知了大使拉宾。然而，以色列内阁很快就发现自己把战争成果卖得太便宜了，忙于同年8月撤销了这一立场！事后达扬辩解，是由于埃及不接受以色列的善意，以色列才放弃了最初立场的。他一再说的那句“名言”是：“如果他（纳赛尔）想谈，他是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以色列政府出尔反尔，而且还在于它同时对美国和拉宾保密，结果出了很多洋相。拉宾不知事情有变，他1968年5月回国给将军们作了形势报告，当他提到要撤到国际边界时将军们全炸了，叫国防部长达扬前来解释是怎么回事。这时达扬才告诉他们，政府已经抛弃了那四点决议。

而美国也不知道以色列改变了立场，在1968年5月前一直以为以色列是准备撤出被占领土的。得知以方食言后，美国颇感不快。

由于以色列政府出尔反尔，阿拉伯方面又持毫不妥协的立场，中东和平之路便走不通了。1967年11月22日，安理会通过了著名的242号决议。这个决议草案尽管是英国代表提出来的，但它基本上是约翰逊五项原则的翻版，只是在措词上作了对以色列有利的修改。比如，把要求以色列“从所有的领土上撤出”，改为“从领土上撤出”等。由于不知道以色列政府已在撤出被占领土问题上变了卦，美国认为尽管有些文字修改，这个决议还是明确要求以色列撤到国际边界上的。殊不知，这一文字上的让步却导致了后患无穷的问题。决议通过后阿方认为以方执行就行了，一切都写得很清楚了。但以方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要撤军得先谈判，在联合国主持下谈也可以，但首先要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并以条约的形式保证它的安全。这样一来阿以双方的主张顶了牛，再加上阿拉伯国家在同年9月的喀土穆会议上通过了“三不”原则（不与以讲和、不同以谈判、不承认以色列），242号决议便成了无法实施的一纸空文。

约翰逊政府希望推动中东和谈，以便向选民证明民主党有能力使中东地区恢复和平。但它这一愿望首先在拉宾那里就无法实现。国务卿腊斯克问拉宾以色列是否同意与所有的阿拉伯邻国签定一个和平条约，拉宾强调以色列要与各邻国分别签定双边条约；腊斯克又问他，以色列是否同意由安理会中的4个大国派部队保证蒂朗海峡的通航权，拉宾回答4个大国同床异梦还不如以埃之间直接解决问题好。腊斯克对拉宾的态度非常恼火，会谈中他甚至粗暴地对拉宾说：“听着，我希望埃班外长来这里亲自澄清如何处理未来局势的问题！”拉宾闻言色变，但强压怒火才没有拍桌子。

拉宾这口恶气没憋多久。1968年9月4日苏联给美国的照会中，提出了包括一个以军按时间表撤出被占领土在内的一揽子和解方案。10月1日，也就是腊斯克询问以方意向并对拉宾发脾气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驳回了苏联的提议。美国强调，光有一个内容泛泛的多边协议是不够的，更实际的是要有一个有足够约束力的协定。它还在照会中向苏联指出：“各方以前签定的停火协议应由一个和平的现实所取代。242号决议呼吁撤退到安全和公认的边界，但这不意味着那些边界就是1967年6月4日时的停火线。”看到这里拉宾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以色列想说的话全通过美国人的嘴说出来了，这太妙了！根本不值得与那个书呆子腊斯克怄气。

但腊斯克决意让拉宾把这口气怄下去。同年秋季，他向参加联大会议的埃及外长递交了一份后来称为“腊斯克七点”的倡议。拉宾闻讯大怒，他怒的是美国不与以色列商量就与埃及直接打交道。老实说他怒得没道理，美国

的倡议不一定非要与以色列商量才行，但拉宾要从此立下这个规矩来。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腊斯克手下人把七点倡议简要内容作了通报。他们是：1. 以色列撤出埃及领土；2. 埃、以正式结束敌对状态；3. 苏伊士运河对所有的国家开放；4. 在允许难民返回家园基础上解决难民问题；5. 在沙姆沙伊赫部署国际监督部队，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不得命令它撤走；6. 就冲突地区各方的军备水平达成总体协议；7. 埃、叙与以色列签定有关协定。拉宾当即对这个倡议内容和美国瞒着以色列私下同埃及交易提出强烈抗议，在他看来这七点简直就是针对以色列的！腊斯克多少感到有些理亏，迟迟不答复拉宾的责问，后来才叫助理国务卿西斯科把埃及的回复转交给拉宾。从那个回复文本中，拉宾发现埃及人企图吞下 1947 年分治决议划给“阿拉伯国”的加沙。作为一种“妥协”，他们仅要求以色列人退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停火线上。他对此吃惊不已。

与此同时苏联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要求美国压以色列无条件撤军。约翰逊政府在权衡了各方利弊后向苏联政府指出。“中东和平只能随着各方的谈判进程来达到……冲突的双方必须签订一个相互有约束力的契约式的协定。”在腊斯克把这封信递交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当天，即 1969 年 1 月 15 日，拉宾高兴得差点儿喝干了一瓶威士忌。他清楚地意识到，从这一天起美国在中东和谈问题上已采取了以色列的立场。尽管约翰逊在下台前 5 天才送来这份厚礼，多少显得晚了一些，但他毕竟是送来了。“祝你安度晚年！”拉宾举起酒杯对着想象中的约翰逊说。

拉宾完全有理由把那瓶威士忌喝个精光。这不仅因为他在改变美国的立场上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因为他为以色列搞到了鬼怪式飞机。

1968 年 10 月 9 日 约翰逊在大选的压力下宣布卖给以色列 50 架鬼怪式。但以方具体购买时却扯皮了。拉宾到国务院催问此事时，腊斯克叫他到国防部去谈。到了那里，拉宾又被打发去跟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尼克谈。在连续谈了好几次后他才弄明白，美国在玩拖延战术，约翰逊政府并不想真卖给以色列鬼怪式。沃尼克一再要求拉宾书面解释以色列为什么要买这种飞机。拉宾多次送交了书面解释后提出了抗议：“总统都批准了这笔交易，你干嘛要问那么多呢？”沃尼克微微一笑，把底牌摊到桌面上，他拿出一份军售条件给拉宾看。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有权监察以色列所有的武器制造厂和国防科研机构，像魏茨曼科学院和各大专院校这种学术机构也不能例外。原来如此！刹那间，拉宾像被一个无赖猛抽了一个嘴巴，呆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血一阵阵地往上涌。最后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沃尼克，他可以把这些“条件”送到耶路撒冷去研究，但以色列还找不出一个会出卖自己主权的政府！

见软的不行，拉宾也来了硬的，他亮出了一张约翰逊望而生畏的王牌——美国犹太人。回使馆后他通过各种渠道把鬼怪式交易的阻力告诉了美国犹太人组织，那些民主党的支持者们立即掀起责问约翰逊的声浪。三四天后约翰逊就软了，下令国防部赶紧无条件地向以色列出售这批飞机。

1969 年 1 月 20 日，共和党的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是拉宾将要与之打交道的白宫新主人。

尼克松会信守他的诺言吗？拉宾对此没把握。大选中，美国 80% 以上的犹太选民仍投了民主党的票，这增加了拉宾的忧虑：尼克松会因此迁怒于以色列吗？

那边厢以色列政府也换了新主人。1969 年 2 月 22 日艾希科尔死于心脏

病，工党推选 71 岁高龄的梅厄夫人担当总理。对于这位“ 婶婶 ” 当政拉宾当然舒心，唯一担心的是她的性格太倔犟，大事上很难妥协，这在外交上很容易把事情搞僵。为加强以美关系，梅厄夫人上台后立即派外长埃班访美，叫拉宾负责安排这次访问。这时与拉宾打交道的是一班新人，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和总统的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常跟拉宾打交道的是基辛格，尼克松认为他适合处理中东事务，拉宾也觉得跟他相处轻松愉快。但有一点没法回避，那就是他们俩都是犹太人，这会不会引起外人说长道短呢？拉宾在 3 月 4 日驱车去他办公室的途中，不禁想起了布热津斯基对他讲过的一个心酸的故事。

布热津斯基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是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历来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一个月，约翰逊总统把他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请到白宫座谈，议题是苏联的意图及美国的对策。会上布热津斯基的侃侃而谈给约翰逊留下深刻印象，他请布热津斯基就此提交一份详尽报告以供参考。布氏回去后马上写好报告交了上去，等待总统的再次召见。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动静，接着，第二个和第三个星期也杳无音信地过去了，布热津斯基深感不解。他找到一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任职的朋友探问究竟，那位朋友闻言笑了，告诉他此事的荒唐经过。原来，约翰逊接到那份报告后把它交给密友艾夫里尔·哈里曼看，而此公恰巧是个极力主张对苏联温和的人。哈里曼越看报告越生气，最后他竟忍不住冲进约翰逊的办公室责问：“ 你怎么能征求一个波兰佬对俄国人的看法？你知道吗，波兰人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恨俄国人！” 约翰逊一想也对，便随手将那份报告扔进了字纸篓。布热津斯基最后苦笑着对拉宾说：“ 这下你就可以想象得出，如果你在美国跟一位犹太人磋商对中东问题的看法，别人会怎样看待你们？” 尽管如此，拉宾觉得没法回避基辛格，人家叫他跟谁谈他就得跟谁谈，哪怕对方是个爱斯基摩人。此外他确信，他和基辛格忠于的都是本国的利益，犹太人背景及个人的私交只会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上考虑。

拉宾与基辛格要谈的问题是对六天战争之后边界的看法。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保了将近一年的密，直至 1968 年 7 月埃班才把以色列变卦一事告诉了腊斯克。埃班当时表示，以色列要修改 1947 年联大分治决议划定的国际边界，但具体如何修改要视它与阿拉伯当事国的谈判情况而定。埃班还声称，以色列领导人一直等着纳赛尔来电话，但等了 2 个月也没收到，是埃及人放弃了收复失土的好机会，现在怪不得以色列人了。基辛格就这个问题明确告诉拉宾，美国在这方面的观点与以色列有差异，美国认为以色列“ 将不得不生活在那些（国际）边界之内”。接着他提醒拉宾，以色列急着同邻国签和约没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同它们作出确保安全的实际安排。否则，即使双方在和约上签字画押，战争仍可能随时爆发。基辛格接着转到了正题上，他告诉拉宾，尼克松政府决定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他说，联合国特使雅林忙了一年多了，却毫无进展，现在美国要同安理会 4 大国共同推动和谈进展，希望埃班外长能带来一些具体的和谈构想。

但埃班仅带来了一双耳朵，他是来听美国人说的，自己公文包里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国务卿罗杰斯又把基辛格对拉宾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但同时表示，美国并不认为和平条约确定的边界必须是 1967 年 6 月 4 日那条线。尽管这比“ 腊斯克的七点 ” 好多了，但拉宾仍认为尼克松在这方面的政策与约翰逊区别不大。但此时拉宾的心思已不在罗杰斯与埃班的会谈上，而是忧虑地

注视着西斯科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频繁会晤。他认为，美国不同以色列协商就与苏联商谈中东问题是一种不友好行为，因为一旦与苏联人谈成了，美国势必会压以色列接受谈判结果的。

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以色列部长所罗莫·阿尔果夫对这一情况很恼火，他建议拉宾向那路撒冷汇报这些情况并要求以色列公开谴责美国这种行为。拉宾劝他不要着急，因为现在骂也没用，美国人会说“我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你呀！”有效的解决办法，一是通过外交渠道反映以色列的不满，对美施加压力；二是静观事态变化，寻找改变美国政策的机遇。很快，拉宾就发现了可改变美国立场的方法，那就是把以埃之间的“消耗战”打下去。

### 消耗战尼克松旁观 促停火罗杰斯挨批

六天战争结束后不久，埃以双方从1967年7月起展开了一场隔着苏伊士运河相互轰击的“消耗战”。以色列人依仗美国先进武器扩大事态，先是用炮还击，不久飞机也用上了。此战给埃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阿拉伯世界义愤填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齐声谴责以色列的穷兵黩武政策。拉宾敏锐地注意到，美国人对这场消耗战的影响很担心，非常希望这场战争尽快停下来。他分析，表面上看埃及人打这个仗是为了重创运河东的以军，实际上是苏联人怂恿埃及人打下去，因为继续打下去能使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大大增强。当时的中东局势似乎也在印证这种分析。为复仇雪恨，激进主义在中东占了上风：巴解组织已在约旦站稳了脚跟；利比亚落到了激进的卡扎菲手中；甚至连最保守和亲美的沙特也出现了局势不稳状况，而这一切，都与以色列继续欺侮阿拉伯国家有关。美国政府很担忧，这场消耗战拖得时间越长，坚决支持阿拉伯人的苏联的影响就会越大，向以色列提供了飞机大炮的美国的影晌就会继续下降。

拉宾这个分析很快就被西斯科一席话所证实。随着接触增多，拉宾与西斯科的私交加深了，在非正式场合西斯科说话很直率。一次共进午餐时，西斯科直言不讳他说：“我们在中东的利益不仅仅只集中在以色列一国身上。我们对以色列承担的义务，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以色列所作的每件事情。让我坦率地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友谊只会导致美国被中东世界抛弃的后果的话，那将是美国政策的一个灾难性的挫折。我们必须致力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因为它是唯一能捍卫我们在那个地区全局利益的途径。”拉宾很清楚，西斯科的这番酒后“真言”，完全是美国核心领导人的心里话。

但同时他也清楚，即使美国用切断武器供应的方法强使以方单方面停火，也加强不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苏联肯定要支持埃及继续打下去，阿拉伯世界亲苏反美情绪会更强，美国在与苏联谈判时地位会更不利。他断定聪明的尼克松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说不定尼克松还会默许以色列放手大干。有时事情要反着想才行。因此他在1969年9月19日的报告中要求梅厄政府放开了打，不仅用大炮轰，还应派飞机轰炸埃及腹地目标。他指出，只有这样才会损害纳赛尔的地位和削弱苏联的影响，并将对加强以美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保证，这样干非但不会导致美国卡断武器供应，而且以色列还会得到额外的武器。就像是验证他这句话似的，美国第一批鬼怪式飞机9月份运抵以色列，这本身就是一个默许以色列袭击埃及腹地的信号。实际上拉宾已从

他的美国朋友处获悉，尼克松等决策人物最初那些忧虑，已被鼓励以色列人狠打的期望所取代，他们已经感到以色列是个能使自己摆脱被动地位的工具。

此况下，尼克松极为隆重地接待了9月24日来访的梅厄夫人，其场面之大和热情之高使拉宾感慨不已。他一方面为自己加强以美关系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担心梅厄夫人的强硬态度会伤害这种关系。不出所料，从会谈一开始她就用不容探讨的语气宣布，以色列得不到一条“可以防御”的边界绝不撤军。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当众揭尼克松的“短”。她一再提醒尼克松，他过去曾在戈兰高地上发表过亲以言论，现在更应大力支持以色列。

坐在旁边的拉宾急得手心都出汗了，这哪叫外交，简直是她习惯的内阁训话！在以色列，梅厄夫人从来都把内阁部长们当群孩子看待，她历来对他们讲话都是家长式的。好在部长们也买这个帐，谁好意思去顶撞一位除了以色列什么都不在乎的老太太呢？但这种腔调怎么好用在世界一流强国的总统头上。尼克松要是为此变了脸怎么办？但看来，拉宾那点儿外交经验比梅厄夫人差远了，她搞外交时拉宾还穿着开裆裤呢，她懂得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也懂得有时响鼓也得用重槌敲。果然，尼克松并没怎么难堪，他坦然他说：“总理夫人，我很愿意重复那句话：如果我是个以色列人的话，我会发现确实很难放弃戈兰高地。”听到这里，拉宾才透过一口气来。

当了总统后尼克松不随便拍胸脯了，他只谈大原则，具体的事情让手下人去处理。他向梅厄夫人保证，他坚持要使以色列变得更强大的观点，只要他在台上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就不会减弱。总的来说，这次访问是成功的，尼克松实际上已承担了保证以色列安全的义务，他甚至说了即使双方有分歧他也照样供应武器的话。但这次访问也产生了使罗杰斯和埃班深感不快的结局，因为他们俩实际上已被扒到一边去了。热衷于搞首脑外交的尼克松提议：在他与梅厄夫人之间建立直线联系，有大事两人直接交谈就行了，具体的事情让基辛格与拉宾去处理。梅厄夫人同意这个建议。从此，罗杰斯和埃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拉宾和基辛格的地位升了级。最惨的是埃班，他后来要了解以美外交最新动态还得去梅厄夫人办公室看电报，只有不太机密的文件他才能拿到副本。但他忍受了这种侮辱，没有提出辞职要求。

然而，要想万事如意并非易事。梅厄夫人离开美国前的10月4日，拉宾告诉她一则传闻。外界传说，她与尼克松达成了协议：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作为“硬件”的武器，而以色列则以一些让步的“软件”回报美国的善意。梅厄夫人闻讯极为震怒，立刻打电话给基辛格并命令拉宾旁听作记录。她怒气冲冲地质问基辛格：“我听到了许多关于‘硬件’和‘软件’的议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谁跟我谈过这种问题？”在这一通连珠炮式的质问下，尴尬的基辛格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是好，他的机敏善变和应答如流风度全不见了，只能结结巴巴地解释说这纯属误会。他说，确实有人在闲谈中说过硬件和软件这些词儿，不知怎么泄露了出来，但它不会形成政策。

这场小风波过去后梅厄夫人回国了，但拉宾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因为基辛格承认美国决策人物说过软件、硬件之类的话，既然他们能说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果然，不久他的预感得到了证实。10月29日，美国向苏联和阿拉伯国家提出了“罗杰斯计划”，其内容正是以色列最担心和激烈反对的——以国际边界作为埃、以之间安全和公认的边界；两国同意恢复到正常的



和平状态：埃、以按“罗得岛模式”谈判解决加沙、沙姆沙伊赫和非军事区的问题；加沙地带按联合国管理、自治及纳入约旦三种选择加以解决。梅厄夫人当即把罗杰斯透露了这个计划很大一部分内容后，梅厄夫人于10日正式发表声明予以抗议。16日埃班就此事再次向罗杰斯提出了抗议。

但罗杰斯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提醒埃班美国并未改变自己的政策，而是以色列自己于1967年8月份改变了6月份把西奈归还埃及的决定。西斯科辛辣他说：“以色列不能在随意改变政策的情况下指望美国去迎合它的政策。”在随后的会谈中，罗杰斯还通知埃班美国可能会按照处理埃及问题的方式处理约旦问题。埃班当即警告美国不要插手以约关系，因为以约现在暗中保持着接触，如果美国硬要宣布让以色列撤回边界的主张，那么以后连这种接触都不会有了。在罗杰斯给埃班来点儿冷的之后基辛格又给他上了道热的。17日基辛格宽慰埃班说，“美国真挚地希望加强以色列的安全。总统再次保证以同情的态度考虑你们的武器需求。”他还告诉埃班，尼克松已要求不要将约旦问题提交四大国讨论。但18日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德松通知拉宾，美国已将有关以约冲突的详细文件提交给四大国讨论。

事到如此，拉宾感到没必要再让美国人把他和埃班当猴儿一样耍下去了。他急电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建议，梅厄夫人立即回电把他召回国商议。一个星期后他返回美国，带回一封梅厄夫人给尼克松的私人信，并奉命在美国发动一反对罗杰斯计划的运动。他紧急约见基辛格，见面后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对以色列大搞两面派的手法。基辛格坐在那里无动于衷，静静听完拉宾的指责后坦然反问：“在我们与总理的会谈中，我们提出过与这两个文件不同的和平主张了吗？”这一反问使拉宾顿感语塞，他确实不太好解释以色列出尔反尔的原因。但就这样被基辛格三言两语打发走也太窝囊了，于是他撒起泼来，“我告诉你，你们正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们不与我们商量就搞出文件并把它交给四大国讨论，你们正在炮制一个永不会被接受的决议。我将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发动公共舆论来反对你们的作法！”

见拉宾要去煽动美国犹太人反尼克松，基辛格突然软了下来，他急忙站起来劝道：“听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搞的。但我请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攻击美国总统，因为那意味着与美国对抗，这是应极力避免的。总统还没有谈起过这些文件，他只是叫罗杰斯去筹划有关事宜而已。只要总统还没公开表态，你们就有机会采取行动。怎么于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再次劝你不要攻击总统！”见基辛格急得把老底都交给了我，拉宾觉得没必要再闹下去了，起身准备告辞。但基辛格拦住了他，“忙什么，总统会高兴与你见面的，我们何不去与他谈几分钟呢？”拉宾明白有戏了。

基辛格把拉宾领进了总统办公室，尼克松正在那里与国防部长迈尔温·莱尔德谈话，见拉宾来了，尼克松以祝贺新年快乐的方式欢迎他。在宾主寒暄入座后，尼克松直截了当地说：“我明白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困难的时刻。我相信以色列政府有理由表明它的感受和观点，我对此完全理解。”然后他转向基辛格：

“以色列所需武器装备一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们正在审查以色列提出的要求。”

“我说过，我们不仅要满足以色列的防务需求，而且要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

“当然，我们的审查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基辛格机敏地回答，并冲

着拉宾微微一笑。

随后尼克松又转向拉宾，“我完全理解你们的焦虑。我理解你们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所面临的困难，我关心你们的防务需求。只要是与武器供应有关的事，请毫不迟疑地来找莱尔德或基辛格。实际上你去找基辛格更方便。”

拉宾愣在那里足有七八分钟。他不明白这表示什么？是表示尼克松比基辛格更亲以，还是表示尼克松比基辛格更会演戏，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个 180 度的大转弯是怎么来的。回到使馆后他又获悉了苏联也拒绝了罗杰斯计划的消息。尽管苏联是从另一角度拒绝这个计划的，但以、苏两国的拒绝，决定了罗杰斯计划势必流产的命运。

为防止美国再次在这个问题上耍滑头，拉宾决定把鞭子抽得更响一些。他不顾时值圣诞节，全力展开了反对罗杰斯计划的运动，每天与参议员、众议员及新闻界的会晤把他的日程表挤得满满的，他还抽时间在全美犹太领导人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对罗杰斯本人他更不客气了。1970 年 1 月 5 日，他当着罗杰斯和西斯科的面，对罗杰斯计划进行了长达 40 分钟的激烈抨击，指责他们削弱了以色列与邻国的谈判能力。这种近于粗鲁的毫不留情的攻击，使拉宾获得了华盛顿外交界授予的“闯进瓷器店的野牛”的雅号。罗杰斯委屈得差点哭出声来：事情是尼克松让他干的，但遭到拉宾破口大骂时总统却不出来为他撑腰，这差事哪儿像是人干的？

1 月 7 日，按照拉宾与梅厄夫人商定的程序，以色列第一次发动了对埃及腹地的空袭。那一天实际上是以美关系的转折点。22 日，纳赛尔总统秘访莫斯科紧急求援，随后苏联要求美国迫使以色列停火，否则将向埃及提供更先进的防卫武器。看到苏联人来求自己，尼克松乐了，他历来喜欢处于强者地位。他警告苏联人不要蛮干，否则美国也会向以色列供应更先

进武器的。西斯科在与拉宾共进午餐时，很难掩饰赞赏这种空袭的神情。尼克松的心腹、司法部长米切尔，则公开发表亲以言论。尼克松本人在对工会讲演中，甚至绝口不提罗杰斯计划。美国舆论界的亲以倾向也日益明显。拉宾兴奋地电告梅厄夫人：“我们在美国的地位已大大改善，进一步改善取决于对埃及心脏地区的继续空袭。”

以色列使馆的官员们发现自己的大使近来笑声增多了，他的威士忌酒量也越来越大了。拉宾对自己这两年来成绩很满意，他赴任前给自己定的四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当然还须努力更上一层楼。梅厄夫人下命以色列情报系统直接向拉宾发送情报，他因此成了以色列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使节。消耗战的炮声还在继续响着，全世界要求停战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拉宾对此并不在乎。

### 索武器拉宾求尼氏 停火期导弹越红线

美国无意制止这种空袭，而且打算用一笔新的飞机交易对苏联施加压力。白宫宣布，在提供了 50 架鬼怪式的基础上，美国还要向以色列再提供 24 架鬼怪式和 24 架空中之鹰式战机，尼克松总统将在 30 天内决定是否出售这 48 架飞机。苏联人很清楚，这 30 天是尼克松逼他们作出反应的时间。拉宾听到这则消息后不太高兴，他很反感美国把这些飞机当作与苏交易的筹码，难道苏联屈服了压力这些飞机就不给了吗？他派所罗莫·阿尔果夫到基

辛格助手黑格将军那里摸底，黑格要求他们再耐心等等看，千万不要对尼克松总统施加压力。“不要施加压力”，拉宾听到这话眼睛一亮，那就是说尼克松害怕压力。好呵，你不是怕压力么，我就给你一点儿压力！于是他又启动了，依次走访国会少数党领导人福特、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杰克逊、工会领袖米尼等人，向他们倾诉自己的不满。这些著名的亲以派一拍全蹦了起来，对尼克松大发其难。

这一招果然有效。3月12日基辛格在白宫紧急约见拉宾，从一个侧门把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中东军售问题上白宫与国务院有矛盾，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大力支持以色列的，但主管外交的罗杰斯等人反对赤裸裸地这样做。为避开国务院的耳目，基辛格只好偷偷摸摸地与拉宾接头。由于两人心中都有数，基辛格便开门见山进入正题。他告诉拉宾，尼克松决定以一揽子计划中的三个步骤来处理向以提供武器：第一个步骤是对外宣传性的，即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对以武器销售，但同时申明如果中东军备水平失衡将恢复对以供应；第二个步骤是实质性的，即美国改变以前那种卖一批武器要申请批准一次的作法，改为按照保持中东军备平衡的原则向以色列补充其报废武器；第三个步骤是担保性的，即通过尼克松给梅厄夫人的信件，承担保证以色列安全的义务并提供以所需的武器。

没等拉宾对这一揽子计划作出反应，基辛格又向他通告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一个新建议：以、埃实行不加宣扬的停火；双方停止相互空袭；停火后的短期内以色列不对埃及的炮击进行还击。听罢这个建议拉宾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明明埃及人没能力对以进行空袭，却偏要说“相互”停止空袭，而且还要求以色列作到打不还手。但随即一想基辛格为什么要在谈武器供应时转到苏联建议上呢？莫非美国想把武器与停火挂起来？他警觉起来，提醒基辛格美国正在于蠢事，因为苏联向埃及提供了防空导弹，埃及人正需个“停火期限”进行安装和部署工作。

基辛格显得很为难，他说尼克松受到国务院和国防部很大压力，老这么打下去也不是个事。他请拉宾把这个建议迭交梅厄夫人考虑一下。拉宾照办了，但以色列的反应是一通痛斥。基辛格又硬着头皮请拉宾把一封尼克松亲笔信转交梅厄夫人，尼克松请求以色列同意一个为期60天的停火。但3月18日耶路撒冷来电通知拉宾，大批苏联人已抵达埃及并操纵防守开罗的萨姆—3型防空导弹。盛怒之下拉宾要求基辛格把尼克松信中那段要求停火的话删掉。基辛格答应把这个要求转告尼克松并在当晚陪他去见尼克松本人。

那晚上的会见只有尼克松、拉宾和基辛格三人在场。尼克松在称赞了一通以色列的勇气、胆略和奋斗精神后说：“请不要对美国承担对以色列的责任及向她提供防务所需武器一事有任何怀疑。”“但是”，他用了一个实质性的转折词，“我们迄今为止采用的办事程序不好。每当你们提出武器要求，尤其是飞机要求时，新闻界马上发出一派鼓噪和评论，人人都瞪圆了眼睛观察政府的决定，这往往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另外某些行政部门也激烈反对在目前状况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我不指明它们是哪些部门，但请相信它们在尽力说服我。你可以确信我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但我将通过其他方法做到这点。以色列需要武器时可通过基辛格来找我，我会找到克服官僚主义恶习的方法。”

听罢这番话拉宾感到茫然若失。同样的保证尼克松已说过多次了，但每次讲过后武器供应仍出问题，总有人要把它与以色列政治让步联系起来，这

样下去哪天是个头呢？他一时产生了危机感。他向尼克松解释说，如果苏联人和阿拉伯人看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减弱了，他们就会得寸进尺的，后果不堪设想。他最后豁了出去，哀求地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我再次诚恳地请求您，作为我们唯一信任的人，作为同情并理解以色列的人，请您给我们所需的武器吧！”

拉宾这番突如其来的乞哀告怜的话，一时使尼克松处于不知说什么好的困境，屋里出现了长达一两分钟的沉默。最后还是尼克松自己开口打破这一难堪局面。他说：“谢谢你这样提出问题，大使先生。我理解你，也理解以色列的处境。你可以确信以色列会得到所需武器的，我只是希望以另一种方式来作到这点。”尼克松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讲下去，但离开了这一话题。在谈话间，拉宾觉得他的眼睛里闪过一道渴望神情，似乎在问：“你能告诉我有关萨姆—3型导弹更多的情况吗？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俄国人操纵的导弹，你们考虑过攻击它们吗？”拉宾被自己的联想吓了一跳，脱口而出“攻击俄国人？！”这个问题太离奇也太可怕了，尼克松是怕走投无路的以色列丧失理智地攻击苏联导弹呢，还是鼓励以色列冒险攻击它？尼克松没回答这个问题，拉宾也希望他别谈下去，这事儿也太玄了。于是忙把话头又转到武器供应上。

尼克松爽快他说：“没问题，我们将如数补充你们损失的飞机。”拉宾马上表示反对，“不，那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告诉你们战斗中损失了几架飞机，你们的人就会搬着指头跟我们一架架地算，我太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了！”

基辛格插话提议说：“我们为什么不事先确定一个损失数目呢？”尼克松温怒地瞪他一眼，高声说：“不，不能事先确定损失数目！”但他对拉宾说：“倒也是，你们可用这种方法多搞到一些飞机。”基辛格在他背后作了个鬼脸。

拉宾满心喜悦地把谈话内容转告了梅厄夫人，说明以色列可按这种方法搞到飞机。但老太太又误解了，以为美国以这种优待诱使以色列停火，于是电令他：“通知基辛格，以色列不同意按这种条件停火。”拉宾无奈，只有遵命前去传达。但基辛格脸上一点沮丧神情也没有，似乎还有些高兴，真让人摸不透。

到3月底，以色列停止了对埃及腹地的空袭。这倒不是美国人逼出来的，而是以色列人主动罢手的，因为埃及大城市周围已部署好萨姆导弹网，以军飞机有被击落的危险。这种情况一出现以色列首脑乱了手脚，今后自抬身价的戏难演了。4月7日以军情报部长雅里夫心急如焚地赴美求援，但西斯科却用美国不允许以色列处于劣势的空话敷衍他。陪同他去的拉宾火了，用将军的粗嗓门咆哮道：“你们那个见鬼的新方法有什么效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连飞机的一根毫毛也没见到！”但他这个火白发了，雅里夫什么也没搞到空手而归。同样，随后梅厄夫人给尼克松的亲笔信及拉宾开列的求购武器清单也没起作用。

尼克松内心很矛盾，苏联飞行员已开始埃及领空和地中海上巡逻飞行，这不啻于在扫他的脸。埃班5月访美时，尼克松想再澄清一下以方立场。他问：“在苏联人卷入的问题上，以色列的立场是否仍像拉宾大使所说的那样‘给我们工具，由我们来干’？”

“是的！”拉宾脱口而出。埃班狠狠瞪了他一眼。

“好极了，这正是我想了解的事情。”尼克松赞许道，但好在哪里他没有深谈。在谈到以色列已停止袭击埃及腹地时，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如果说这仅仅涉及到埃及和叙利亚人的问题，我愿意说‘揍他们，揍他们，狠狠地揍他们！’每当我听说你们深入腹地揍他们时，我就感到心满意足。我同意你们的苏联人和埃及人正在考验我们的看法。但这并不仅仅是埃及和叙利亚人的问题，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在看着我们，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我们没有其它选择，我们必须对付它，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中东失去任何东西。”说着他转向西斯科，“你认为你能作到这点吗？”西斯科有些诡秘地回答：“可以。”

尼克松转向埃班继续说：“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而你们也必须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帮助我们。该死的石油！我们不能从其它地方搞到石油。我们必须站在中东稳健国家一边。我们将在军事上支持你们，但不能允许军备竞赛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我们得做一些有政治意义的事情。”拉宾和埃班又一次被感动了，每到危难或事情办不下去时，他们总能听到尼克松这种感人的话。但他所谓的“政治意义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二人不得要领。

很快，尼克松所说的“政治意义的事情”就真相大白了。6月19日罗杰斯出面提出了“停止射击，开始谈判”的一揽子计划，它是以埃及、约旦和以色列的名义致联合国秘书长公开信的形式提出的。在这封信中三国“表示”：愿意执行242号决议；愿在雅林监督下进行和平谈判；以色列愿撤至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三国相互承认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为此，首先三国同意至少在7月1日到10月1日期间停火90天。很明显，这是罗杰斯计划的翻版。

在以色列，美国大使巴布尔向梅厄夫人介绍了这一计划，同时请求她不要在埃、约表态之前拒绝这个倡议。在华盛顿，罗杰斯向拉宾介绍了同样的内容。罗杰斯很有礼貌地表示，以色列能否能得到武器要看它对这个倡议的态度了。这样一来，一切似乎又都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即尼克松那些即使双方观点不同也不影响提供武器的话纯属空话，只有听话才能给武器。拉宾极为沮丧，这两年多的努力都到哪里去了呢？但他静下来一想，现在不是向美国人跳脚发脾气的时候，多少得给尼克松一点面子，不能每次都对美国的倡议说个“不”。想到这里他忙致电梅厄夫人，请她不要在回复中明显地拒绝这个倡议，可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委婉地表达“不”的意思。但他对梅厄夫人的僵硬程度估计不足，她在回复中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这个倡议。于是拉宾忙飞回耶路撒冷劝解她。最后梅厄夫人勉强删去草稿中刺眼的“不”字，但明眼人都可看出以色列没接受这个倡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29日夜，苏、埃将萨姆导弹群移动到运河以西30公里处，而完全由埃及人操纵的一些导弹连则越过了30公里这条红线。这条红线是达扬划的，美国人认可了这条警戒线，苏联人越过它就意味着挑战，美国人就要作出反应。但美国的反应——默许以色列攻击导弹的行动——没有奏效，苏联人的导弹不是吃素的，埃及人用它们把几架鬼怪式飞机打了下来。被激怒的尼克松，用中东是个“火药桶”警告苏联人不要玩火。但苏联人对此嗤之以鼻，继续我行我素，现在它感到腰杆硬多了。从7月20日起苏联飞行员驾米格21开始在运河上空巡逻。

## 第七章 美以结盟

1970年的1月到3月，以军战机悍然对埃及腹地20个目标进行了空袭，造成了埃方严重损失。纳赛尔1月7日秘密飞往莫斯科紧急求援，苏联从3月中旬起派大批苏联飞机、导弹和军事人员来到埃及。从4月1日起三个苏联空军中队加入埃及空军行列，开始在埃及各大城市上空巡航。尼克松认为这是苏联对美国的公然挑衅，怂恿以色列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 鬼怪式大战米格机 苏伊士以苏暗较量

7月20日，苏联飞行员开始巡逻苏伊士运河上空。他们的飞机都喷成红色，这是有意让以色列人看清楚：我们是苏联人，小心着点儿！见苏联人步步进逼，基辛格焦躁起来，见到拉宾时激愤地喊道：“快把他们赶回去！你们还等什么呢？别怕这些杂种，你们为什么单方面停止对埃及腹地的轰炸？这个达扬，他根本不了解俄国人。”拉宾知道美国想用以色列的手打苏联，他回想起尼克松5月份接见埃班时引用自己的话：“给我们工具，由我们来干！”现在美国人已经给了工具——世界一流的鬼怪式，干得漂亮不漂亮就要看以色列人了。他向梅厄夫人汇报了此事。

以色列那边也没闲着，军政首脑们一直严密注视着这一事态的发展，空军和总参坚决主张跟苏联人摊牌。但达扬有顾虑。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題，而是一定得打得漂亮的问题，要是失了手就让美国人看扁了，而且还会使得苏联人更加咄咄逼人。问题是以色列人没跟苏联人交过手，对方技艺如何以色列飞行员们没底，总认为苏联人要比阿拉伯人技高一筹。据以军总参情报部“埃曼”报告，苏联派到埃及的飞行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尖子，都有几百小时的飞行经验，受过在各种复杂气候和条件下飞行的严格训练。这个报告增加了首脑们的忧虑。要是出现鬼怪式被苏联飞行员大批击落的情况，美国人肯定会大失所望的，以后还给不给以色列好武器便成了问题。另外，苏联人还没越过达扬划的“红线”，立即开打还显得有些过早。

苏联人驾驶的是米格21战机，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之一。它是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米高扬和数学家古雷维奇共同设计的，他们针对米格15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设计出这种爬升力很强的截击机。以色列飞行员很熟悉这种飞机，细长的机身和黑色的鼻子突出地伸在进气口之前，三角形机翼要比鬼怪式更明显。实际上，真正空战时地面的观众分不出彼此，只能听得见飞机角逐时的疯狂呼啸声，胜负往往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了，燃烧的飞机坠落时人们才看得清它是哪国的。

但以色列飞行员们不怕米格21，许多人还亲自驾驶过这种飞机。

1966年8月，神通广大的摩萨德偷来一架伊拉克的米格21，以色列飞行员们立刻凑到了它的跟前，仔细观察这架拆开的神秘战机：它的外形有些粗糙，蒙皮上的铆钉头刺眼地凸出着，与法国幻影式光滑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它的发动机却是一流的，材料和工艺水平非常先进；配备的环礁式导弹绝不比美国的响尾蛇式差；而且整个驾驶系统很容易操纵。这是苏制武器一大特点，外表不大精制却十分坚固实用。最典型的要数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AK-47自动步枪，懂行的以色列人对它称赞备至，以军的“加利尔式”就

是在它的基础上改进出来的。但经过一系列试飞和模拟空战，米格 21 的一些缺点暴露了出来，以色列飞行员掌握了击落它的秘诀。叛逃的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把苏联人的整套技术拱手奉送，使得米格 21 再无秘密可言，在以后的空战阿方的米格 21 被一架架打了下来。但话说回来，米格 21 跟幻影式和鬼怪式相比确有差距，但这个差距不是很大，此况下飞行员的水平和素质往往起决定作用。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占有优势。

苏联人并不想大打，他们是赌着气来的，阿拉伯人说米格 21 太差劲儿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想跟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以色列人比试比试。于是，他们的巡航范围逐渐向苏伊士运河逼近。以色列人称这是“色拉米香肠战术”，俄国人一天咬下一小截来，直到把整根香肠吃完——把以机赶走——为止。7 月 25 日，两架以色列的空中之鹰正沿着运河飞行，8 架苏军米格 21 突然向它们扑来。接着，便是一阵刺耳的马达轰鸣、雷鸣闪电般的机炮声。未了，一架以军空中之鹰中弹负伤，拖着长长的浓烟歪歪斜斜地飞回基地。空中骄子们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摩拳擦掌地发誓报复，一场精心策划的较量开始了。

以色列人仔细分析了这次战例，发现苏联人的队形和战术完全按照教科书进行。这一发现使他们狂喜不已，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对手的技术破绽。六天战争中拔了头筹的空军司令霍德说：“俄国人的飞行动作非常正规，但过于死板教条。他们和我们的飞行员相比，有个极其不利的条件，那就是任何一个飞行员都没有喷气机的实战经验”。这话也对也不对。苏联飞行员勇敢顽强，他们有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亚音速米格 15 喷气机的经验，但没有使用二倍音速飞机跟敌人交战的实践。以色列人要钻的正是这个空子，在驾驶二马赫飞机空战方面他们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他们的实战经验使美国飞行员羡慕得眼红。

30 日两架幻影式沿着运河低空飞行，像是在执行侦察任务，下面埃以双方正用大炮对轰。突然，12 架苏军米格 21 向它们扑下来。这时，在高空指挥作战的丹尼·夏皮纳少校一声令下，躲在云层中的 8 架鬼怪式猛地俯冲下来，两架幻影式也急速跃升与同伴汇合，一个以色列式的“空中怪圈”构成了。这个怪圈没头没尾，都是头都是尾，互相掩护展开攻击。苏联人没见过这种阵势，队形一下乱了，变成了各自为战，落入了夏皮纳少校设计的陷阱。结局是悲惨的：不到一分钟 5 架苏联米格 21 坠地，苏联飞行员 2 人阵亡 2 人受伤 1 人无恙；以色列的人、机无损，全部安全返回基地；一些阿拉伯飞行员对苏联人的表现冷言冷语。

为避免事态扩大，双方都没声张此事。以军战机依旧沿运河巡航。

1970 年中东问题出现了奇怪的局面：美国以雅林名义提出了停火新倡议，但当事国以色列、埃及、约旦都保持沉默。7 月 22 日西斯科告诉拉宾埃及接受了这个倡议，但拉宾发现埃及人是把这个倡议视为 242 号决议的翻版接受的，他们着重强调以色列人必须先撤军然后再谈其他问题。这样一来以色列人更不干了。

### 尼克松立安全保证 梅厄夫人同意停火

尼克松决定用根又粗又大的胡萝卜攻克梅厄夫人这个玩固堡垒。7 月 24

日他在给她的信中宣布：“我们在以色列撤退问题上的立场是：最后的边界必须在雅林大使监督下、通过谈判手段在各方同意后才能确定。而且，我们不会强使以色列接受会改变其犹太特性或危及你们安全的难民问题。我们将坚持，最后达成的协议必须对各方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末了，他给梅厄夫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在一个有约束力的、契约式的以及能使你们感到满意的和平协定达成之前，以军一兵一卒也不应从目前的占领线上撤退！”

这根被称之为“当代贝尔福宣言”的胡萝卜，终于使怨气冲天的梅厄夫人安静下来。随之，以色列内阁通过了一项多少有些妥协的回复性决议，但这个决议导致了民族联合政府的解体。在发现无法阻止通过这个决议后，贝京领着他的部长们退出了内阁。然而，随后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从7月31日到8月10日这11天里，华盛顿始终没有收到那路撒冷的回复，连拉宾也被搞得莫名其妙。当美国人催促雅林赶快行动时，雅林说以色列人还没回话我怎么动呢？美国人忙告诉他以色列已接受了倡议。

这边话音刚落，那边梅厄夫人发难了。她打电话给西斯科，指责美国伪造了以色列的签字。西斯科闻言大惊：“您说的‘伪造’是什么意思？”

梅厄夫人怒吼起来：“你们在我们接受这个倡议之前就通知雅林说我们接受了它，这就是我说的伪造！我跟巴布尔大使达成了协议，而美国现在否认了那个协议，你们不能以我们的名义去炮制答复，我们对雅林信件内容有保留！”从声调上可以听出老太太的火憋了很久了。

西斯科越听越糊涂，放软了话音：“您几周前就接到我们倡议的文本了吧？只有一页，就一张纸，您们是接受它还是不接受它呢？”

梅厄夫人把这句话听成了最后通牒，她愤怒地叫道：“你说我们接受那个倡议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必须接受你们的表述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述！”这时在一边旁听的拉宾知道俩人说岔了，忙请梅厄夫人再澄清一下自己的意思。她余怒未休地一字一字说：“我们接受这个倡议，但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话来表述它。”西斯科不解地耸了耸肩，揩了一把汗。见西斯科莫名其妙被梅厄夫人喝斥了一顿，基辛格极为不满，晚上他如法炮制地喝斥拉宾：“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那张称为罗杰斯倡议的纸头的？”

“6个星期前，”拉宾有些心虚他说。

“6个星期时间还不够你们研究和回答一张纸上的内容吗？你们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我真不了解你们以色列人，一张纸头竟在你们手里攥了6星期之久！如果你们有看法，有不满，有要求，尽管说出来好了！埃及人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倡议，你们到底接受不接受，让我们今天把它说个清楚！”在基辛格的凌厉攻势下拉宾狼狈之极，其情其景与西斯科听梅厄夫人咆哮时状况相差无几。

就这么连吵带闹的，以埃终于在8月7日实行了停火，国际社会大大松了一口气。当时美国提议用U—2型高空侦察机监察停火状况，但遭到以色列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的反对，他甚至威胁要击落敢于拍照的美国飞机，于是美国放弃了这一主张。8月19日回国的拉宾出席了内阁会议，他想弄清楚内阁是否准备按美国编好的程序进入和谈，但一直到散会也不得要领。苦恼中他去达扬家找答案，达扬三言两语就解开了他的疑团。达扬说：“梅厄夫人不能从以色列议会8月4日声明的立场上后退，而美国人也不会从罗杰斯倡议的立场上后退，与此同时停火却生效了。现在美国人唯一的出路，是建议雅林把阿方的方案搁置起来，在242号决议基础上重新开始他的使命。因此，



以色列最好不要公开批评雅林信件。”拉宾忙返回美国和西斯科谈达扬的建议。在刚要去白宫时达扬的电话来了，告诉他埃及人正把导弹开进 30 公里禁区。拉宾气得一拳砸在茶几上，这叫他妈的什么停火啊！

但这一次美国人反而不急。西斯科漫不经心地听完拉宾对埃及人跨越红线的指控，懒洋洋地问：“真此事吗？这下可麻烦了。早先，我们提议派 U—2 侦察机核查停火，但你们拒绝了，你们的将军还威胁说要打下我们的飞机。这下可好了，我们手头上什么证据也没有，怎么去跟埃及人说呢？我总不能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吧！”拉宾要求美国公开谴责埃及人违反停火协议并要求向以提供反导弹武器，西斯科一笑了之。不过，他表示达扬的建议是可行的。

拉宾后来又找基辛格和尼克松谈，也毫无结果。9 月份梅厄夫人来了，尼克松同样用空话打发她。尼克松的态度很清楚：你们以色列人甭管有多大委屈，先坐下来跟埃及人谈。美国公众渴望中东和平，你们总得让我跟他们有个交待吧！

但到梅厄夫人 18 日结束访问时，美国的态度突然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

### 黑九月约旦起腥风 出援兵以美终结盟

梅厄夫人这次访美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回国前情绪非常低落。可也不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于是在回国前的 18 日晚，她强打精神到纽约希尔顿大酒店发表演说，向 3000 多名美国犹太阔佬推销以色列政府债券。拉宾等人一直陪着她。

晚 10 点刚过，酒店经理的助理请拉宾出来一下，让他立即给基辛格回电话。电话中基辛格的声音很慌张，“刚才约旦国王侯赛因打来电话，谈到他的军队目前所处的困境。他请我们把他的要求转达给你们，请你们迅速派出空军攻击约旦北部的叙利亚人。我需要你们给个尽快的答复。”

对约旦出现这种情况拉宾毫不惊奇，他早就料到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六天战争后大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逃到约旦，汇入到该国数十万难民大军之中。这已经是继 1948 年之后的第二次大逃亡了，难民们想体面地返回故里及收回财产已无可能，他们在临时搭就的帐篷和破铁皮屋子里艰难度日。在寒冷多雨的冬天，孩子们踩着烂泥巴走好远去提水，妇女则冒着寒风为领一些救济的食品排长队。男人们无事可干，整天凑到一起抽烟、闲聊、发呆，思绪不时地飞回到过去的日子里。“这哪像人过的日子？”他们感到沮丧、绝望和愤怒。这时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组织对他们说：“我们除了破草棚外一无所有，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话说得真切动人，许多男人掐灭烟头起身走进巴解招兵站。巴解的力量迅速扩大了，尤其在巴勒斯坦难民最集中的约旦。

侯赛因国王原先是支持巴解的。约旦人口中有一半是巴勒斯坦人，包括许多忠于他的军官和行政官员，他需要他们的继续效忠。况且巴解打击的是以色列，以色列人是抢占了自已的领土的敌人，因此他向巴解提供了许多便利。但两年后他感到不安，因为巴解的势力变得过大，威胁到了他的统治。驻约旦的巴解武装主要由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和哈巴什的“人阵”组成，它们派遣突击队在约、以边境上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或从约旦渗透到以色列境内

发动袭击，而以色列则以打击约旦境内目标进行报复。时间一长国王宠信的贝都因将军们不干了，要求严格限制巴解的行动，但侯赛因压制了他们的不满。贝都因人是阿拉伯国家中的游牧人，在约旦当时他们占了人口的一半，自视为正宗约旦人，掌管着国王最精锐的装甲部队。

到 1970 年 9 月份事情恶化了：法塔赫和人阵控制了不少地盘，国王的军队都很难进入这些地区；法塔赫给自己的汽车发放了巴解牌照，巴解战士接管了首都安曼一部分警察的职能，俨然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巴解首领公开把安曼比作“阿拉伯人的河内”，阿拉法特声称：“只要侯赛因国王让我们自由行动，他就可以一直坐在自己的王位上。”但随即发生了枪击王室成员座车事件，侯赛因大为震惊。这时贝都因将军们又把国王围了起来，压他与巴解摊牌。侯赛因正犹豫间，哈巴什的部下在安曼附近机场上一口气炸毁了 3 架劫持来的外国飞机，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这是阿拉伯人的耻辱！”侯赛因怒吼起来，贝都因将军立刻扑了出去，发动了对巴解最凶猛的进攻。“黑九月事件”爆发了。

内战往往比外战更惨烈。贝都因人的坦克部队进攻难民营的战斗异常残酷，巴解部队进行了殊死抗争。但他们的轻武器很难抵挡正规军坦克大炮的进攻，一座座难民营失陷了，近二万名巴勒斯坦人倒在血泊之中。在阿拉法特的呼救声中，叙利亚的装甲部队和空军越过边界对约旦军队展开进攻，招架不住的侯赛因绝望地通过美国向以色列人求救。看来他很清楚，真正能救他的是谁。

约旦与以色列暗中有来往，在阿拉伯世界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要说仇恨当然有，以色列人抢了侯赛因统治多年的耶路撒冷东区和约旦河西岸，他一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心里明白，严格他说以色列抢去的地盘不是他的，而是联合国分给巴勒斯坦人的。因此他对以色列的仇恨是有限的。他祖父阿卜杜拉国王曾与梅厄夫人和达扬密谈过，以色列领导人一直认为这个家族好打交道，因此约旦有事他们愿意帮忙，况且这有利于分化阿拉伯的反以阵线。

但救侯赛因国王是一回事，借机要挟美国又是另一回事，拉宾更感兴趣的是后者。拉宾见基辛格来求自己，知道难得的机会来了，端足架子开始要价。听完基辛格的请求后，他在电话中讥讽他说：“美国政府像个约旦的邮差似地向我们传话，使我大为惊讶。在我没了解你们的真实意图之前，我不会把这个请求转告梅厄夫人。我想搞清楚，你们是不是建议我们出兵援助约旦人？”

基辛格急得腔调都变了。“哎呀，你这么说就让我大为难了，”他哀求道，“现在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或许，半个钟头以后我能答复你。”

放下电话拉宾赶紧把梅厄夫人从酒会上请出来，在前厅里向她汇报了这件事。他们决定立即把此事通知代总理阿隆，征求一下他和达扬的意见。随后，梅厄夫人分别与阿隆和达扬通了话。在交谈中梅厄夫人发现他们两人看法不大相同：阿隆赞成出兵援救约旦人，而达扬却有保留。达扬还是顾虑苏联，他说：“叙利亚是莫斯科的宠儿。我们如果出兵干涉，很可能导致俄国人从运河方向袭击我们的背后。”见内阁核心人物的意见都不统一，拉宾急了。他建议立即派出飞机侦察战区情况，并尽最大努力与约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实在联系不上通过华盛顿转达也行。

一个钟头后基辛格的电话来了，他笼统他说：“美国政府支持约旦人的请求。”看到他还不明说，拉宾感到有些好笑，故意逼基辛格亲口吐出这

句话来。于是紧追不舍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建议由以色列来干这件事？”

“是一的，”基辛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当然，你们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行事。”

事情一变成美国求以色列，整个气氛立时完全改变，基辛格下令用最快最好最周全的服务来满足以色列贵宾一切需求。于是梅厄夫人回国时，乘坐的是基辛格派来的白宫专机，拉宾陪着她从纽约返回华盛顿。接着，又陪她乘白宫专车驶往肯尼迪机场，在那里她乘坐自己的专机返回以色列。随后，白宫的专车又把拉宾送到瓜迪亚机场，从那里他乘白宫专机降落到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坐上白宫专车回到大使官邸。当时已是次日凌晨3点半了，他心满意足地打了个电话给基辛格。在交谈时他感到似乎有人用分机旁听、后来才知道那人就是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不让拉宾放下电话，说这个月使馆的电话费他包了。随后，拉宾——基辛格——西斯科三人的电话连通了，开始了小型电话会议。基辛格呆在白宫情况分析室的沙盘边不断发问，西斯科留在国务院的作战中心里补充问题，拉宾则坐在沙发里边呷威士忌边回答。上午10点钟白宫接他的专车又来了，尼克松指示由基辛格和拉宾共同商定援救约旦的军事行动，两人在白宫地下室里逐项审定了全部行动计划。可惜的是约旦大使不能参加讨论，因为约旦与以色列没有邦交，他只好呆在隔壁房间里不停地喝咖啡。

梅厄夫人的专机还在飞行之际，拉宾接到以色列内阁的电话，通知他以军已准备采取行动。一看火候到了，拉宾像个精明的商人那样与基辛格侃起价来。他开列的价格是：如果埃及因此重开消耗战的话，美国要公开支持以色列；如果苏联因此直接威胁以色列的话，美国要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证”——这一点必须写成备忘录；以色列要求获得更多更好的武器。对于拉宾的武器要求，基辛格连眼睛都不眨地答应下来了。但谈到向以提供“安全保证”时，基辛格变得支支吾吾了，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要冒与苏联核冲突的风险。但拉宾毫不松口，一直到美方同意出具书面保证后，他才说以方在23日拂晓采取行动。

以色列并不想真打，它的策略是以牵制叙军来援救约军。于是，短时间内大量以军集结到戈兰高地上，一个装甲旅的坦克纵风疾驰掀起的尘埃大马蹄革看得清清楚楚，完全是一副要发动进攻的架势。与此同时，以军战机也呼啸着在叙军坦克纵队上面低空飞行，进行示威。这样，约旦军队总算是顶住了三心二意的300辆叙军坦克的进攻，情况有了好转。在地中海，美国第6舰队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全速驶往东部海域，一些美国军官从上面乘飞机来到以色列，与以色列军官商讨协同作战的计划。这一切都是基辛格故意做给苏联人看的。看到美国和以色列要动真格的了，苏联和叙利亚迟疑了。最后，叙军装甲部队在22日下午6时撤回了本土。约旦危机算是过去了。

以色列在这场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对加强以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美以关系以及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一方面，通过这次考验美国认识了以色列的价值，发现它是个在危难时刻愿为美国利益效劳的伙计，一个美国在中东地区可以完全信赖的盟友；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感到在中东地区必须用实力与苏联打交道，以色列能胜任“实力”这一角色。这使美国外交的天平开始大幅度朝以色列倾斜。以色列不是北约成员，但它在美国眼里比北约成员还顶用，它从此成了不挂名的美国盟国。25日基辛格打电话给拉宾表示感谢，并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向梅厄夫人致意。他指

出：“总统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在防止约旦局势恶化以及粉碎推翻约旦政府企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统说，美国对在 中东拥有像以色列这样的盟友深感荣幸，美国在未来的事态发展中将会充分考虑这一点。”

那天晚上拉宾的心情非常愉快。莉赫与孩子已经入睡了，他还一个人在书房里独酌，毫无睡意。他很清楚，尼克松总统对以色列这么一个小国说出那么多感激话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真诚的。但由此指望美国永远支持以色列任何要求，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尼克松现在是美国总统，不是一位能在戈兰高地上信口开河的普通公民。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全球战略及中东利益要求尼克松尽可能把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拉到自己一方来。因此，美国无论如何也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至少要探索出一条和解途径。

### 雅林询问美国施压 拉宾越权打破僵局

1970年9月28日一条消息震惊了世界：埃及总统纳赛尔因操劳过度和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他的助手安瓦尔·萨达特接任了总统职务。人们对这位一副农民相的新总统所知甚少，就连摩萨德这种一流情报机构也未能向以色列内阁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美、以政府要人对他作过许多刻薄的评论，有些评头论足已颇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比如，外长埃班曾大为不恭地形容萨达特是一位对观众最缺乏魅力的时装模特儿，达扬则认为他的价值还不如以军的一发迫击炮弹。对这些轻侮，萨达特都忍了。但不久他就让人们明白，他是中东政治舞台上一位超级明星，他那纵横捭阖的手法和极为大胆的举动，使那些曾嘲笑过他的人深感自惭形秽。

到12月以、埃的90天的停火期就要满了，但以色列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而美国也似乎无意催促以色列前行。于是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停火期又被延长到次年的3月6日。1971年1月萨达特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他通过一位亲信将军向美国传达了一个建议：埃及愿意重开苏伊士运河国际水道。条件是以军从运河东岸后撤20英里。美国政府认为这一提议有建设性，西斯科把这一建议通报给拉宾。其实这一建议对拉宾来说并不新鲜，因为早在六天战争中达扬就提出过类似主张。达扬历来主张不要逼人太甚，他认为让大卫星旗在埃及人面前飘扬本身就是个不必要的刺激。但他手下的将军们激情难遏，他本人后来也改变了主意。拉宾认为这个建议确有新意，起码不是过去那种要么不谈要谈就得先还领土的主张，就凭这点也值得考虑。但在向国内汇报之前，他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美国人的看法，免得以色列的表态使尼克松感到为难。

美国各方对此意见不一。五角大楼从越战教训及战略角度出发反对这一建议，而国务院则倾向于支持这一务实性建议。拉宾通过基辛格去摸尼克松的底，尼克松认为：“从我们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宁愿让那条运河继续关闭着。但雅林的和谈进程至今毫无进展，这可能导致中东局势再度恶化以及战端重开。

我们要防止这种局面出现，因此美国赞成以色列与埃及讨论重开运河问题。”西斯科也劝以色列与埃及进行谈判，这一来可减轻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压力，二来说不定能促成以、埃间的单独媾和。

但拉宾还没来得及将有关信息发回本国，联合国特使雅林突然扔出一颗

政治炸弹。2月8日，雅林向埃、以双方提出了非常简短明确的问题。他向埃及提出的问题是：埃及是否愿意用同以色列和解来换取以军退到国际边界；他向以色列提出的问题是：以色列是否愿意用撤回国际边界来换取与埃及和解。

雅林不要求双方长篇大论地诉委屈讲条件，只要求它们明确回答“愿意”或“不愿意”，简明得就像学生填空题似的。“雅林询问”一提出，世界各国新闻媒介马上把关注焦点集中到以、埃两国身上，以色列首先感到了巨大压力。拉宾对此很恼火，心中暗骂：“你雅林算个什么东西，给你顶‘联合国特使’的帽子戴戴就不知道姓什么了，你的作用只是调停与撮合，谁请你出来充当判官了？”他恼怒地向美国官员大发雅林严重越权的牢骚，但美国人还是那句老话：你们千万不要首先表示反对。

2月17日埃及人首先作了回答。但它并没有回答“愿意”或“不愿意”，而是提出只要以色列撤出西奈和加沙它就进行和谈。雅林看着这个答复皱起了眉头：埃及人表示愿谈，但把顺序颠倒了过来，即先撤军后谈判，而且把加沙地带看成是自己的。拉宾看到这个答复却笑了，因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第一次公开表示愿与以色列和谈，这简直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当然里面也有不中听的话，那就是仍要求以色列撤到1967年6月4日线上去。西斯科认为埃及的答复是“严肃的和具体的，以色列对这个文件的态度是对它谋求和平愿望的考验。”他的话代表了国务院的立场。

为此，拉宾飞回耶路撒冷协助内阁也搞出了个类似的答复。这个答复首先大声赞扬埃及愿意与以色列谈判的态度，然后强调两国在边界和难民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这个滑头没逃过罗杰斯的眼睛，他当面告诉拉宾：“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的答复是推诿性的。”拉宾立刻大喊大叫起来：“我们的答复是认真的和负责的，”接着，他声色俱厉地指责罗杰斯和西斯科违背了尼克松的不压以色列撤军及解决难民问题的诺言。

见拉宾如此嚣张罗杰斯和西斯科也火了，他们一口咬定埃及的答复是积极的而以色列的答复是消极的。在双方面红耳赤的争吵中，罗杰斯愤怒地高叫道：“你们被迫用让步来谋求和平只是个时间问题！”

原先拉宾认为以色列内阁的正式回复不会有问题，但等拿到正式文本一看傻了眼。原来内阁没有采用他的主张，而是用一大堆以前的决议拼凑成一个似是而非的大杂烩，连职业外交官也看不出以色列想要什么和准备放弃什么。拉宾深感失望，他甚至不愿把这份文件交给美国国务院。

但西斯科和基辛格没有放过他。西斯科认为这种下等货色只会败坏美国声誉，而且会打击开罗和安曼那些想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人的威信。西斯科略带忧伤地对拉宾说：“20多年来，你们不知和平为何物。如果你们再这样任性走下去，以色列就永不会有和平的那一天。”基辛格甚至连这种劝告都懒得讲，他非常干脆他说：“如果美国用切断军援的方式对你们施压的话，你想会发生什么情形？到那时以色列还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吗？”最使拉宾惊慌的是尼克松也表了同样的态。尼克松对来访以色列总统扎尔曼·夏札尔说：“你们应当记住，你们的军备输送渠道是有可能干涸的。只要我还在台上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我不可能一辈子当总统。”

反应机敏的萨达特立刻火上加油，宣布停火期限到3月6日后不再延长了。这样一来美国人急了，决定敲打一下顽石似的以色列人。于是当埃班访美时，基辛格毫不客气地对他使用了居高临下的语言。

基辛格直截了当地问埃班，以色列到底想不想把沙姆沙伊赫还给埃及，埃班支支吾吾地吭味了半天也没道出个所以然来。基辛格怜悯地望了他一眼，身子往后一靠讥讽他说：“我尊敬的先生，您能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告诉您这些洗耳恭听的朋友，您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您们是否准备撤到国际边界来换取和平，是，还是不是？假如你们不想撤到国际边界，那么你们打算撤多远？……”基辛格越说越上火，越讲越来气，嗓门也提高了，“老实说，没有人了解你们，也没有人知道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人们现在确信你们尽力避免与对手和解，这样你们就可以赖在被占领土上不走了！”

最后基辛格用审讯的口吻逼着埃班对埃及建议当场表态。他探出身子紧盯着埃班问道：“你们同意吗？你们反对吗？你们对这个建议有何看法？”老实的埃班又吭味起来。他不是不会说话，否则也当不了外交部长，而是梅厄夫人不让他对此明确表态。梅厄夫人还教他，如果美国人逼得太厉害，可以说7至10天内就会有正式答复。情急中埃班把梅厄夫人的指示端了出来，基辛格气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你们究竟打算与美国保持一种什么关系？你们要求与我们保持一种紧密的、坦诚的和亲密的关系，但你们却不告诉你们们想什么和要什么？要知道，亲密关系只能建立在相互坦诚的基础上。噢，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至少把部分解决方案告诉我们吧！”

3月20日罗杰斯又以同样的方式把埃班训了一顿。见美国上下齐心，拉宾头一次与埃班取得了完全一致，决定由埃班写报告给内阁阐述把话说明白的必要性。但以色列内阁并不着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认定谈要比不谈更糟糕。这可使拉宾为难了。罗杰斯在参议院公开抨击以色列缺乏灵活性，许多参议员倾向于接受他的看法。更糟糕的是，许多美国犹太人领袖也有了同感。拉宾有口难辩，极为被动。他觉得以色列内阁这种沉默对抗的方法很笨，最起码可以提出一个反建议嘛，为什么两个半月都写不出一个字呢？

谢天谢地，最后以色列部长们终于从他们脑袋瓜子里挤出了一些与埃及人谈判的东西。说实话拉宾只能把这些馊点子称为“东西”，因为它们净是些卖不出去的货色。拉宾粗看了一下，发现它的特点是好处要占完占尽，要说回报，对不起，没有！这份“货单”的内容有：运河要对以色列开放；埃及人要保证永不开火；和解后以军后撤一点；运河开通后埃军不得进入运河区；埃及减少其在运河西岸驻军；签约15天后埃及人释放以军俘虏……

基辛格看完这份“货单”后厌恶地问：“这是什么玩艺儿？里面有新东西吗？”拉宾硬着头皮说他奉命不讨论以军后撤距离的问题。

基辛格气愤地把这份文件往桌子上一摔，“你想让我把这种东西呈送总统吗？假如这是你们的建议，我不愿处理它，请你把它交给西斯科吧，我碰都不想碰它！这表明你们在基本问题和对美国立场上有根本性的错误概念，它会引起两国关系的停滞和对抗的。好啦，你现在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好了，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清静一会儿吧！”

拉宾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他有些慌。他与基辛格会谈过几百次，吵也吵过，闹也闹过，但从来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拉宾明白，要不是以色列政府作得太过分，基辛格是不会气成这样。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每当他接到这种三流货色时，总要跟自己的政府讨价还价地多争取一些让步，就好像他这个大使也在与自己的政府谈判似的。他已不止一次想辞去这个两头不是人的大使职务。看到基辛格还在生气，他想缓和一下气氛，轻声问：“我可以给您留下一份文件的副本吗？”

“你爱留多少就留多少，这跟我没关系！”基辛格气哼哼地说。

无奈，拉宾只有把基辛格发火的事告诉梅厄夫人。但她似乎并不在意这点，下令：“把它交给西斯科！”

为了推动美国导演的中东和平进程，罗杰斯和西斯科等要员5月份对埃及等中东国家进行了访问。在访以过程中，西斯科对同达扬的会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达扬提出的后撤距离要比以色列内阁更远一些。此外西斯科对萨达特的印象很好，他告诉拉宾：“我发现萨达特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他想与以色列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必须是他能向阿拉伯国家作出解释并证明是正当的。”这句话引起了拉宾的注意，看来这位纳赛尔的继承人在胆略上要比他的前任更大。但当西斯科说他们已经把达扬的话传给了萨达特时，拉宾觉得该跟美国人打打招呼了，因为这事要是让梅厄夫人知道了，老太太肯定又要大吵大闹一番的。

10月2日他找基辛格谈了这件事。基辛格对此事看得很开，他指出若没有美苏两家点头中东是不会有和解的。那天他情绪不错，顺便给拉宾上了一堂外交学基础课。他承认自己很怕失败，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处理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我已经树立了能达到目的声誉。我绝不会去处理那些显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这番谆谆教导拉宾牢记在心。后来他当了总理，常用这个原则去处理棘手的问题，效果的确不凡。

由于拉宾并不赞同以色列内阁的僵硬立场，想把和谈稍稍向前推进一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件越权的事。基辛格追问以色列到底能后撤多远。拉宾说他个人认为，在吉迪和米特拉山口以西控制在以方手中情况下有些地方可以后撤30公里。基辛格笑了，没再追问下去。事后拉宾赶紧向梅厄夫人作了汇报，承认自己越了权，但目的是放个试探性气球。梅厄夫人当时没说什么，但一个星期后来电批评了他的轻率举动。拉宾当时没想到，他的这一越权行为，弄得梅厄夫人差点下不了台。

12月1日梅厄夫人应邀访美，在预备性会谈中基辛格突然扔出了“拉宾炸弹”。尽管拉宾早已向基辛格强调过梅厄夫人不赞成他的主张，但基辛格仍犯傻似地问她：“您对拉宾大使的部分解决方案有何看法？”梅厄夫人恼怒地沉默了一两秒钟，然后克制他说：“那并不完全是以色列的立场。有两点我们必须坚持：一、埃及军队不得进入以军撤离的地区；二、我们将只撤到两山口的西端。”而基辛格却像没察觉她不高兴似地再次犯傻，“这个由拉宾大使提出的想法，是否能构成部分解决的基础呢？”这时拉宾气得牙根直痒痒：基辛格啊基辛格，你到底想干什么？是想让我当众出丑还是想让梅厄夫人再骂我越权行事？梅厄夫人已经从以前的只撤几公里的立场大大后退了，你还不肯罢休吗？但拉宾万万没想到，梅厄夫人毫不迟疑地给了基辛格一个惊人的回答：“埃及的民用技术人员和警察可以越过运河进入东岸地区。”这时基辛格才得意地冲拉宾一笑。

次日，尼克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梅厄夫人。为压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让步，他打出一张使她坐卧不安的牌，这张牌就是大国政治。

### 基辛格妙施心理战 梅厄夫人最终俯首

尼克松首先慷慨地许诺要满足以色列最近提出的鬼怪式飞机要求，接着

转到政治话题上。他明确表示了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深感不安。他指出，此况下美国只有在来年 5 月的美苏首脑会晤中与苏联人谈这个问题了。接着他指定基辛格与以方共同协调美以政策，以便到时有个对付苏联人的统一立场。听到这里拉宾很不高兴，难道梅厄夫人这把年纪从 6000 英里之外赶到华盛就是为听“12 月 10 日与基辛格再谈”这句话吗？你尼克松把以色列总理当成什么人了？

梅厄夫人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她脸上没显出不满，但严肃指出：以色列认为罗杰斯计划已经寿终正寝了，最好不要再提它。以色列将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部分解决和全面解决方案的看法。如果无视以色列的利益的话，美苏两国就是达成了交易也是白搭。老练的尼克松立即表示同意这一看法。12 月 10 日，梅厄夫人与基辛格，就以埃两国军队的第二次脱离接触协议达成共识。第一次协议是赎罪日战争后达成的。这一次协议主要内容为：以色列撤退到西奈山口的西端地区；停火期再延长一年半到两年半；埃及的技术人员和“穿制服的部队”可以在方案允许的范围内越过运河。这时基辛格不失时机地显示了他的幽默感，他打诨他说：“先生们，我会向埃及人讲清楚的，我要让他们明白，那些‘穿制服的部队’肯定不是纽约大酒店里的服务员！”除此之外美、以还达成以下谅解：美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迫使以色列按罗杰

斯计划达成部分或全面和解的协议；授权西斯科和拉宾探索以、埃对话的可能性；美国应在 1972 年和 1973 年计划供应的基础上，再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鬼怪式和空中之鹰式飞机。

梅厄夫人回去了，在华盛顿的以，美双方谈判人员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在拍了桌子骂了娘之后，以色列终于作出了撤退的让步，美国人也打开了供应军火的闸门，双方都有收获，皆大欢喜。高兴之余，基辛格还卖好似地宽慰拉宾。他说，苏联人正忙于应付印巴战争，无暇关注中东问题；而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也不急于就中东问题与苏联达成谅解；埃及不会在 1972 年重开战端，因为那需要苏联大力支持才行，而现在苏联人并不积极。随着这一“宽慰”美国给飞机的速度也放慢了，原来是每月两架，现在变成了每月一架。

但梅厄夫人对领土问题仍非常敏感，基辛格就这个问题一次闲谈又惹得她吵闹了一番。

1972 年 1 月，在与拉宾的一次例行会晤中，基辛格谈起他前不久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会谈的情况。当时基辛格以打招呼的方式告诉多勃雷宁，以色列坚持在国际边界之外的存在，具体范围有待于以色列与有关国家谈判确定。拉宾把这次会晤内容发回了耶路撒冷。梅厄夫人立即回电追问：“解释一下基辛格说的‘在西奈地区国际边界之外存在’是什么意思？”拉宾多少有些厌烦，因为连他这个大使也不清楚自己政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所以他干脆回电说：“我们的立场不大清晰。请授权政府发言人公开声明，以色列无意吞并西奈任何部分或将其置于以色列的管辖之下，它只希望‘控制’那些地区。此外，我本人也要求澄清这方面的立场。”看到连拉宾都不了解自己的思想，梅厄夫人很恼火，她回电训导道：“以色列的政策是致力于对以埃边界作相当大的改变，它意味着主权的改变，而不仅仅是以色列在那里的存在。我们不使用‘兼并’一词，因为它具有消极的含义。”

到这时拉宾才真正明白梅厄政府想干什么，他不以为然地追问以色列想



吞并西奈哪些地区。梅厄夫人回电清楚地告诉他，想吞并地区包括加沙地带、沙姆伊赫以及连接以色列与沙姆沙伊赫的陆上通道。见她把话说得如此清楚，拉宾也就不再多问了。他随后对基辛格说：“以色列要求边界变动，你可以把这点告诉多勃雷宁。”基辛格眼皮都不眨他说：“苏联根本不会同意边界变动，请你把这点跟总理说清楚。”这话传到耶路撒冷后梅厄夫人一下子变得忧心忡忡。她到底上了年纪，身体和记性都差多了，一有烦心事就唠叨不止。她告诉拉宾，尼克松曾当众同意过对边界进行变动。但拉宾从没听见尼克松说过这种话。

见梅厄夫人不经折腾，基辛格熟练地发起了心理战。2月7日他以警告的口吻对来访的达扬说：“我很难说，尼克松在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中会达成什么共识。”这话传到梅厄夫人耳朵里后，她变得更焦躁不安了。3月7日基辛格又故作神秘地告诉拉宾，苏联人提出了他们撤出埃及和以色列人撤到6月4日线上的一揽子交易。但到16日他又对拉宾说他不与多勃雷宁谈了，因为他不作无把握的事。其实基辛格在撒谎，取消会谈的原因是北越军队对美军发动了凶猛进攻，被打痛了的美国人宣布取消莫斯科会晤。局势好转后基辛格又飞到莫斯科为会晤作准备。回来后他暗示拉宾，作为对苏联抑制北越的回报，美国在会谈中牺牲一些以色列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连串“坏消息”搅得梅厄夫人寝食不安，她生性美国在与苏联会谈中把以色列给卖了，她的香烟消耗量又上升到每天三包半的水平。

最后，“救”以色列的还是那个想“卖”它的尼克松。但与其说他是实践要维护以色列利益的诺言，不如说他是被苏联领导人蛮横态度激怒了。在第一天的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轮番地对他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猛烈“轰炸”，他们连吼带叫地要求美国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走。但他们选错了对象。尼克松素来吃软不吃硬，他早在当副总统时就与赫鲁晓夫进行过激烈的“厨房辩论”，现在身为总统哪能吃这套？于是，他在基辛格的配合下对苏联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强调一定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迫使苏联人退了回去。最后，基辛格与柯西金共同拟定了一个会谈纪要。当拉宾看到这份绝密文件时惊喜地发现，除了那些242号决议的语言外，苏联竟然也同意以色列可对边界进行当事国同意的变动。双方的分歧是：苏联不同意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与阿拉伯国家直接谈判；美国则不同意限期按联大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基辛格告诉拉宾，除了措词上的修改外，这份纪要将作为今后美苏磋商中东问题的基础。拉宾对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大力相助千恩万谢，耶路撒冷那边更是喜笑颜开。

但萨达特不允许苏美两国决定埃及的命运。7月11日，他毅然宣布把苏联军事专家赶出埃及。此言一出，举世震惊，萨达特立时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萨达特事先没与华盛顿磋商，白宫的惊讶程度绝不亚于克里姆林宫。苏联人认为这肯定是美国人捣的鬼，多勃雷宁气急败坏地指责美国让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基辛格微笑着请他坐下，“尊敬的大使先生，我本人所了解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您知道的多。谁知道萨达特

是怎么想的呢？”

到了1972年秋季，以色列内阁感到日子好过多了，原因是美国进入了总统大选季节，减少了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但大选一结束，尼克松总统又开始挤以色列这根牙膏。拉宾的大使任期到1973年3月10日届满，尼克松在这年1月份的一次送别性质的晚宴上表示，希望2月底来访的梅厄夫人能带

些新建议来。拉宾听出了他要求以色列再作些让步的弦外之音，新当选或连任的总统开始时总来点儿硬的己成为惯例。糟糕的是，在梅厄夫人访美前夕以色列在西奈上空击落了一架利比亚客机，这就使美国的不满显得更有理由了。因此，梅厄夫人2月28日的第二天访问完全失败。

当梅厄夫人娓娓而谈他说以色列有诚意推进和平进程时，基辛格不客气地抢白道：“如果你们对此没有新见解或新建议就谈不上会有什么新进展。”让她碰了一鼻子灰。中午梅厄夫人又与副国务卿肯尼斯·鲁比什会谈，后者强调了美国对边界的看法与以色列迥然不同。下午她与国防部长艾里奥特理查德逊会谈时，对方把进一步供应武器的大门关得紧紧的。三管齐下梅厄夫人受不了了，她沮丧地对拉宾说：“要是总统也打算对我重复他手下人那些话，我看不如趁早收拾东西回国！”拉宾劝她再忍一下，何不现在就想出一些新建议呢？但梅厄夫人实在想不出能作什么让步了，她说得出的还是些陈年旧货。无奈，拉宾只好自己搞出一个提纲去见基辛格。

晚上7点半基辛格带着洞若观火的神情会见了拉宾，他以不加掩饰的快意说：“我想总理夫人一定度过了艰难和令人沮丧的一天。”看来他什么都知道，他就像是躲在暗处把什么都看清楚了似的，而且还很得意自己的出色导演。拉宾愤怒地涨红了脸，“我真不了解你，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把我们总理请来仅是为了让她空手而归！”见拉宾动怒基辛格收起了笑脸，问拉宾是否还记得1968年3月的会谈，他当时就提醒以色列应注重实际的军事存在状况。他保证，只要以色列接受这一原则，飞机之类的小事好说。拉宾叹口气低下了头，他明白以色列是扭不过美国的。对苏联，美国尽力维持着以色列的脸面；但对以色列，它坚持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在大国政治中，以色列只是个小卒子。当以色列任性地大吵大闹时美国可以暂作退让，但美国贯彻自己意图的软、硬手段都有，以色列不能永远说“不”。回去后他把情况一谈，梅厄夫人只得接受美、埃共同制定的协议。拉宾随后通知了基辛格。

等手下人把戏演够了，3月1日尼克松登场了。他的任务是说最热情支持以色列的话，为达成的协议拍板定案以及付给以色列飞机之类的报酬。总之，大善人的角色要由他来扮演，他消除了梅厄夫人头天的不快并使她微笑起来。但这一回合谁赢了呢？双方都有意回避这一点。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尼克松也活跃了起来。他在梅厄夫人面前大大称赞了一番拉宾的能干，然后拿出一件刻着自己名字的白宫纪念品送给拉宾作为生日礼物，而陷入紧张谈判的拉宾竟忘了当天是自己的生日。尼克松笑着问梅厄夫人，拉宾回国后给他个什么职位，梅厄夫人故作玄虚他说：“那要看他的表现如何了。”尼克松开心地大笑起来，“那好啊，要是你们不用他的话，把他留在这里好了，我愿意用他！”

这是拉宾以大使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谈，5年来他头一次感到即将卸任前的轻松，仿佛全身的神经都放松了似的。在这5年中，他出席过难以数计的招待会，也在大使官邸招待过无数位客人。很奇怪，美国新闻界对这位不善交际、脾气大而且一口希伯来腔英语的以色列大使很感兴趣。尽管他有“闯进瓷器店的野牛”的声誉，美国《新闻周刊》仍在120位驻美大使中把他评为五位最佳大使之一。当然，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外交官，他在美国闹点儿不大不小的笑话是难免的。

## 第八章 趣闻轶事

出使美国前拉宾向艾希科尔总理拍了胸脯，说自己学得会外交官那套温文尔雅，不就是在灯红酒绿的招待会上与太太小姐周旋吗？有什么了不起。但他没想到，外交是门高深的学问，而且是门得好好琢磨的学问。大兵出身的他，从小就不注重礼仪，在华盛顿的高雅场合就免不了闹些笑话了。

### 黑雪茄触怒国务院 白领带笑煞外交官

出使华盛顿不久，拉宾从一位刚访问过古巴的以色列部长那里弄到份令人垂涎的礼物——一箱特制的哈瓦那雪茄。尽管美国跟古巴的关系很僵，但当时以色列与古巴的关系不错。卡斯特罗拿出一箱哈瓦那雪茄送给拉宾那位好友，“分给你的同事们尝尝，我相信他们会喜欢的。”这些雪茄味道极佳，拉宾常用它们款待贵客，人们无不交口称赞。

不久，拉宾的老上司、达扬的特别助理茨维·佐尔访美，拉宾便以佐尔的名义在大使官邸举行了两次家宴招待美国高级官员。有人告诉过他，家宴要比在高级餐馆中请客的效果好得多，省钱不说，客人们不仅自在而且更加领情。

头一天请的是国务院官员，一群文质彬彬的客人。在美酒佳肴结束之前，拉宾请这些举止文雅的客人稍等片刻，然后到书房里取出那些哈瓦那雪茄递给客人。看到雪茄上来了，客人们脸上布满笑容，款待得可真够周到的。一位高个儿的官员兴奋地叫着：“嘿，大使先生，没想到你还有……”他的声音突然打住了，接着脸上变了颜色，口吃地说道：“怎——么，是古巴雪茄？”他这么一说，其他伸过来的手全僵住了，刚才还喜笑颜开的脸一下子全变得冷若冰霜，好像拉宾塞给他们的是海洛因之类的违禁品。最后，这次午宴在一种不大自然的气氛中结束了，制定抵制古巴政策的国务院官员要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还好，他们总算给拉宾留了点儿面子，没把他有失检点的行为扩大为一场外交风波。

第二天请的是五角大楼的官员，一伙体魄健壮的将军。这回拉宾学乖了，摆在茶几上的是美国雪茄和荷兰雪茄。这伙人爽快，不会玩儿虚的，酒足饭饱之后便二三两两抽起雪茄来。闲聊间，拉宾谈起自己昨天出的大洋相，自责不懂美国的规矩不料，他说话间，这些将军互相传递起会意的眼色来。末了，一位肥胖的将军直率地问：“你说什么来着，你搞到哈瓦那雪茄了？快拿出来看看！”这时其他将军也嘻笑起来，纷纷把手上的二流货扔进烟灰缸，凑到了“教唆犯”拉宾的身旁。很快，客厅里飘起哈瓦那雪茄那醉人的芳香，看来五角大楼的美国将军并不害怕古巴共产党人对他们发起的糖弹进攻！

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多，拉宾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应付各种场面：别把外交吹得那么神。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吃喝玩乐加谈判，只要注意别让自己的体重增加得太快就行了。这是他对大使社交活动的简单概括。但不久，他开始懂得这门学问不简单，名堂多着呢！

尼克松入主白宫不久，拉宾接到一份请柬，邀请他出席白宫招待外国使团的酒会。在那张印制精美的请柬末尾，清楚地印有“白领带”三个字。他困惑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白领带究竟指的是什么，是要求他打上白领带还

是禁忌他打白领带。在 1949 年罗得岛谈判时他出了不会打领带的笑话后，最后总算学会了打领带的手艺。出使华盛顿前，以色列外交部的礼宾司官员们在他身上没少花功夫。

他没敢打电话到白宫问人家白领带是什么意思，他知道那肯定会在华盛顿外交界传为“美谈”的。于是，他当晚悄悄驱车去找自己的好朋友、五星级的麦迪逊大酒店老板马歇尔·科亨，请他私下指教一下。见旁边没人，他掏出那张请柬给科亨看，请他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科亨看了他一眼，笑了，但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按铃叫侍者给拉宾端上他爱喝的威士忌，并俯耳对侍者说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位侍者会意地看了拉宾一眼，点点头退了出去。接着科亨大谈起他上个月的拉美之行，根本不提白领带的事。拉宾颇感不解。不多时，一拉头发花白、上年纪的人走了进来，原来他是科亨请来的华盛顿特区最负盛名的裁缝，是来给拉宾量体裁衣的。这位老裁缝一句话也不问，只是站在几米开外眯起眼睛打量了一下拉宾，又围着他转了一圈儿记了几个数，就算完成了测量尺寸的任务。

很快，成品送来了，到那时拉宾才懂得什么是“白领带”的含意。原来它是套装晚礼服，包括：一件黑色的燕尾服，一条带条纹的深色裤子，一件背后扣紧带硬衬胸的衬衣和一个白色蝴蝶结。尼克松的白宫主管是很注重社交礼仪的，但从小穿惯了便服和卡叽布军装的拉宾却觉得很难适应这套行头。每当他穿上这套晚礼服出席白宫酒会时，总觉得像一只大脚被塞进小鞋般地难受，他对莉赫形容自己走起路来就像个没上足润滑油的机器人那般僵硬。

但出席酒会的贵宾并没注意到他的难受，相反不少人称赞他这套礼服做得非常合体和精美。拉宾注意到，他们这样说时都不解地打量着自己的胸前，原来自己胸前一枚勋章也没有！在各国驻美大使当中，军人出身的占很大的比例，不管他们的大使职位是怎样搞到手的，他们都愿意用一排排勋章来炫耀自己的“战功”。而他们面前这位货真价实的战争英雄，胸前却连一枚勋章都没有，这就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了。于是每次酒会，拉宾都得耐心地向那些好奇者解释以色列国防军不颁发战功勋章的规矩，以军没这种传统。他讲得口干舌燥，但听众们仍难以理解地摇着头：这也太小气了，发几枚勋章算什么，可以自己发给自己嘛！

要说拉宾风流倜傥，有些用词不当。但说他对女人颇具魅力，毫不过分，当兵时他可是个颇惹姑娘喜爱的帅哥。当了大使后他仍很引人注目，端正的五官，蓝眼睛，红扑扑的脸上透出英武气质。这个常被请进白宫的将军，在酒会上常引得太太小姐们盯着他。俗话说“将军爱美人”，反过来也一样，美人也爱将军。但他那副不苟言笑的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凛然正气，使她们没胆量与他攀谈。但有位贵夫人不信邪，她想看看拉宾会不会跟女人调笑，她不相信自己能驯服不了这头狮子。于是，在一次酒会上，她冲女伴们使个服色，便端着酒杯闯了上来。“噢，拉宾先生！”她扭动着柔软的腰肢，媚态万千地对他说：“您不知道，我是多么想见到您！”她盼望拉宾给她一个欣喜而多情的注视，一句蕴意无穷的“这是我的荣幸”。若再能当晚与他共舞一番，那些女伴准会嫉妒地眼睛里冒出火来。没想到，拉宾像累了一天的小职员似地苦笑了一下，跟着扔石头似地来了一句，“是吗？那你现在算见到我了。”说完，便没下文了。更使那位夫人难堪的是，他连句“对不起”都不说，便丢下她与法国大使聊了起来。

别说对太太小姐，他对总统夫人也是如此，1977年他应邀访美，卡特总统跟他谈了一天，结束时天色已晚。离别时，卡特按照外交惯例问他是否愿意跟总统夫人阿米道声“晚安”。拉宾像听见句乏味的话似地打了个哈欠，抬起手看看表，无所谓他说：“今天太晚了，下次再说吧。”

当然识货的人也不少，五角大楼的将军就很了解拉宾的价值，而且他们聪明地尽力利用这一价值。每当国会要卡一卡军方那胃口大得惊人的武器要求时，他们便毕恭毕敬地请拉宾出山支持军方的要求。于是他这位世界著名的将领便成了国会山各种听证会的常客。对这类请求拉宾一般不加拒绝，因为这是培养五角大楼亲以感情的好机会，此外也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何乐而不为呢？但拉宾很注意听证会的内容，跟以色列一点都不沾边的事他婉言谢绝。当五角大楼请他去支持在希腊保持一个为第6舰队服务的基地时，他二话没说便去了，因为保证第6舰队的正常活动对以色列太重要了。

有些事情他干得比五角大楼还漂亮。有一次许多显要的参议员反对为海军再造一艘航空母舰，拉宾认为此事与以色列的安全有很大关系，于是在听证会上侃侃而谈，充分论证了这一要求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他有论有据他说了两个多小时，使得许多参议员连连点头称是。听证会结束后里比考夫参议员热情地与他握手，“拉宾先生，您说服了我，我原本是反对造这艘航母的。您愿意把您的观点写成一个备忘录吗？”“那当然，参议员先生。”拉宾说，并很快把写好的备忘录交给了他。看过这份备忘录的另一位参议员约翰·斯特恩尼斯见到拉宾时感慨地说：“您知道吗，拉宾先生，您这份备忘录要比海军那份报告更具有说服力！”最后，国会满足了海军的这个要求，并在有关决议文件中特别提到拉宾的备忘录。在欠着拉宾人情的情况下，军方协助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事情变得顺当多了，五角大楼对政府从它的武器库中抽调飞机坦克的牢骚大为减少。

1972年3月的一天，基辛格突然很神秘地请拉宾立即来一下，但没有解释是什么事。到了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他才知道此事跟以色列无关，基辛格是特地向他咨询的。事情是美军已摆好阵势，准备迎击北越部队发起的一场攻势，基辛格想请他判断一下北越军队会向哪些地区发动进攻，该如何部署兵力。事情来得很突然，基辛格深表歉意，但拉宾并不觉得有什么为难。他听取了一位美国将军对各方面情况的简介后，看着军用地图默默地思考着。基辛格紧张地注视着他，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未了，他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标出北越军队进攻的方位。

“他们可能会进攻这里及这里。你们的部队在这一线力量不强，我想他们会向侧翼运动并试图包围你们。”拉宾肯定地对基辛格说。

基辛格吃惊地扬起了眉毛，“唔，这很有意思，你是我问过的将军中唯一这样看的人。”

战斗一打响，一群美国将军赶紧俯身地图标出北越军队的进攻线路，他们想看看这位被吹得挺神的以色列将军的笑话但他们沮丧地发现，敌军进攻路线与拉宾标出的方位完全相同。基辛格对他们的连日辛劳没有只言片语的表扬，而是挖苦他说：“你们知道吗？在我请教的人当中，唯一能够精确地预测敌军突击方位的将军是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将军们的脸立时涨成猪肝色。

有了这些声誉，这位能帮五角大楼解决大问题的以色列大使成了颇受美国军方欢迎的人物。他被请到各种军事院校中作报告，将军们像中学生一样

认真地做课堂笔记。他对以色列后备役体制的评价及对苏联武器的看法，都成为美军极为重视的研究内容。美国国防部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的观点同国会争预算，理由是用美制武器打过仗的人都认为美国武器还应提高一个档次。作为回报，五角大楼给这位说话直率的大使许多令人羡慕的特权。早在以色列飞行员到美国熟悉鬼怪式的性能之前，拉宾就乘坐过这种飞机直上蓝天了。此外，美国将军还热情地邀请他参观美国战略空军地下指挥部，并允许他了解绝密的美国该潜艇的通讯系统。

在美国上层社会，拉宾是个受欢迎的人物，但在社会大众中情况就不同了，许多人并不欢迎他。

### 警铃长鸣会场大乱 炸弹威胁阻止讲演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社会最动荡时期，电视中几乎每天都有示威群众与军警扭打的场面。美国政府迟迟不从越战泥潭中脱身激怒了整个社会，被称为“愤怒的一代”的美国青年成了反对政府内外政策的主力军。更复杂的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此时也达到了高潮，他们与反战的学生汇成一股反对民族压迫的洪流。在他们心目中，以色列欺压阿拉伯国家的行为是美国支持民族压迫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大多数美国青年学生和黑人中亲阿反以的情绪相当强烈。作为以色列国驻美国的代表，作为一名以色列的战争英雄，拉宾自然成为造反者猛烈攻击的目标。

除了军事院校外，拉宾也接到许多美国大学的讲演邀请，但他的前以军总参谋长的背景，使他在大学校园中遇到很多麻烦。

当他的汽车抵达一些大学的校园时，往往会受到这样的“接待”：一群男女大学生高举着一个横幅标语，上面用大字写着“大使——将军——凶手”；当他的座车从人群中穿过时，示威者们常常用吐唾沫、敲车窗和作鄙视手势的方式进行“夹道欢迎”；此时阿拉伯留学生在人群中散发他的“传记”，上面历数他亲手杀害阿拉伯人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人们对“民主自由”有不同的解释，许多人认为敲车窗吐唾沫算不上伤害罪。

当这种夹道欢迎不能打消他讲演的决心时，示威者们便涌进讲演大厅，用嘘声、诘难和嘲笑的声浪来淹没他的声音。在卡罗拉多大学讲演时，拉宾发现涌进来的示威者比听众还要多，整个会场成为标语和旗帜的海洋，站在前排的学生用大合唱淹没了他的讲演。

最混乱的一次是在名牌大学斯坦福。他讲演的日期恰巧与美军到学校招兵的日期重合，这无异是火上加油。为使师生能听得清他的话，学校当局把讲演厅设在一个周围是玻璃门窗的大会议室内。但这根本难不倒示威者。还没等他开口讲话，包围了这栋建筑的学生们便开始用拳头敲打玻璃，唯恐碎玻璃掉到自己脑袋上的听众立刻慌乱起来。这时被激怒的拉宾企图用高声盖过示威者的敲玻璃声，他凑近麦克风提高嗓门喊道。“女士们，先生们，我……”刚蹦出这几个字儿，“丁零零……”火警的铃声聚然响了起来，那刺耳的声音顿时使听众大惊失色，立起身来准备往外跑。拉宾见势不妙，立刻拿出战地司令的派头喝令“不许动！”他知道这时人们一乱跑准会出大事，非踩死两三人不可。使人心惊胆战的火警铃声一直响着，但谁也不敢拉闸叫它停下来，因为那是违反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该州法律规定，只有赶到现

场的救火队员才有权关掉警铃。就这样，那警铃足足响了 10 分钟之久，当呼啸着赶到的救火队关掉警铃时，听众们已没心思再听什么讲演了。门打开听众向外走时，示威的学生们发出了胜利的欢笑声和口哨声。

为了使拉宾的嘴永远闭上，示威者后来又想出了一个新招：每当他到某校去讲演的前几分钟，当地警察局或校长办公室总会接到一个会场内已安了炸弹的电话。为防止发生惨重伤亡事件，警察局和学校当局总是劝拉宾取消讲演。这一招儿很灵，拉宾的许多次讲演就这样被取消了。他为此怒火万丈。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炸弹恐吓事件发生在芝加哥的女子神学院。那天当他步入会场时，受到了座无虚席的师生、当地教士及教徒们的热烈欢迎。但当他走上讲台时，凄厉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刹那间一队闪耀着蓝、红色警灯的警车包围了会场，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冲了进来。一位粗壮的黑人警官跳到台上宣布，他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声称大厅里安置了炸弹，因此他要求大家立即撤离会场。说完后这位警官转向拉宾低声说：“大使先生，考虑到目前中东局势极其紧张，我们认为这次讲演取消为好。”

“不！在防爆专家找出那颗炸弹之前我绝不取消这次讲演！”拉宾怒不可遏地说，“听着，警官，他们的炸弹是冲我来的，它很可能就埋在讲台下面或讲台附近，你们查查吧。但我把话说明白，不管这颗炸弹炸不炸，我都呆在这里，绝不离开一步！”接着他向主持讲演会的嬷嬷及听众们解释，这是恐怖主义分子惯用的伎俩，以卑劣的恐吓来中止人们的正常活动。如果人们第一次屈服了，接着就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他们将永远屈服于这种讹诈。

见拉宾这么不识相，那位警官转向嬷嬷耸了耸肩膀，似乎说：“他不怕死是他的事儿，你们呢？你们不想跟他一起被炸死吧！”没想到这位纤弱的修女对拉宾说：“不！大使先生。”然后她又转向那位警官朗声他说：“不，我们绝不离开！讲演将按原计划进行，我将紧挨着大使先生坐在台上。”台上台下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防爆小组忙了一阵，没有发现爆炸物，拉宾最后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结束了讲演。在返回下榻旅馆的途中，他的耳边一再响起那位嬷嬷“我将紧挨着大使先生坐在台上”的坚定声

但他同时也感到困惑，他不明白美国男女青年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儿阻止一位年长的人说话，而这种事正好发生在他们为之自豪的“民主”国度里。他承认自己争取美国青年的工作不大成功。他多次试图以犹太人的苦难史开导他们，以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引导他们理解以色列，但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想听这些事。有的学生还质问他，以色列人是怎样对待阿拉伯人的。而且，越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越是智商高的人越是如此，他心中感到阵阵苦楚。因为那些示威者异口同声地骂他为“凶手”，这正是中世纪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称呼。他对此深感悲哀。

可以自慰的是，他在美国有一个极为强大的靠山，那就是美国犹太人社团。美国犹太人不仅从各方面支持以色列，而且全力支持他为建立以美特殊关系的努力。他深深感到，美国犹太人的影响是他克敌致胜的法宝。

### 犹太势强国会亲以 拉宾支持尼氏连任

说到美国犹太人，拉宾想起 1957 年一件事。当时他是北方军区司令，受

命到美国推销以色列债券。一天，他乘坐美国航班从芝加哥飞往纽约，身旁坐着一位因公出差的美国空军上校。这位美国大兵是位健谈的粗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嘴巴闲着，而拉宾也想在旅途中找个人聊聊，双方顷刻间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几杯威士忌灌下去美国佬的话匣子打开了，他顺手扯开领带喷着酒气凑过来，“喂，我说伙计，噢不，将军先生。您想听听我对犹太人的看法吗？我指的是美国犹太人。”他打了一个酒呃后继续说：“我说什么来着？对，美国犹太人，你知道，我父母从小就教我恨犹太人，对，就是那些活得挺滋润的犹太佬儿。他们来美国时全是些穷光蛋，身无分文，可现在却肥得流油了。对，全富了。我从小就恨他们，我在学校里没少揍他们。但后来我不恨他们了，不恨了。你问我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全变了。在你们以色列国成立后全变了，变得正常了。知道吗，他们的腰杆全挺起来了，你说怪不怪？……”

他后来唠叨了些什么，拉宾记不清了。但那位上校的心里话打动了他。

是啊，美国犹太人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想当初，早期的犹太移民也像中国人一样凭着“三把刀”起家，只不过他们的强项是服装业。而且他们跟中国人一样，早年在美国社会中受过不少歧视，一直到他们大把大把的钱把“正宗”美国人驯服为止。但必须指出，反犹主义在美国从来没形成社会潮流，这是美国与欧洲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但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反犹活动。一战中，别有用心的人把犹太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和美国劳工运动联系起来，三K党从1916年起在袭击黑人同时也殴辱犹太人，后来，世界头号富翁、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成了反犹带头人。他出于一种说不清的目的，1927年出资大量印发犹太人要统治世界的《锡安贤士议事录》，他本人也写了一本恶毒反犹的《永恒的犹太人》。

二战前，美国天主教大主教查理斯·考林和世界闻名的飞行家查理斯·林白上校成了新的反犹领袖。他们已不是一般性地骂犹太人混蛋，而是学着希特勒的腔调煽动种族主义，说犹太人要美国拖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由于林白是个创造不着陆环球飞行奇迹的英雄，人又长得挺帅，在全国各地有无数的少男少女崇拜者，他的反犹宣传产生了特别恶劣的影响。直到珍珠港事件前他还这么说，逼得愤怒的罗斯福总统命令他闭嘴为止。

跟中国移民不同，犹太人在美国发得早也发得猛，他们很团结。美国有600万犹太人，约占总人口的3%。到70年代末，他们控制了25%的钢铁工业，90%的皮毛工业，60%的食品加工业，50%的屠宰场、餐馆、酒吧和娱乐业，40%的电影业。好莱坞八大公司之一华纳公司是犹太人开的。1985年，有四分之一的头号富翁是犹太人。此外，美国近三分之一诺贝尔获得者是犹太人，东部名牌大学三分之一教授是犹太人，五个律师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这样一来没人敢反犹了，除非他想跟自己过不去。犹太人叮当作响的金钱，彻底驯服了绝大多数政客，他们亲犹亲以是必然的。

美国犹太人并不特别愿意移居以色列，这使想在巴勒斯坦搞犹太人大团聚的以色列拉比很伤心。但美国犹太人很自然地对以色列有特殊的情感，他们把自己跟以色列国拴在一起。他们不用大力动员，自觉自愿地组成了国会山上最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尽力为美以结成特殊关系效力。每当以色列处于危难时刻，美国犹太人的钱就洪水般地涌来，跟着大批志愿者“马哈尔”便赶到以色列参战。

原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在美国时有天他去照像，在相馆里遇到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大使，两人点头致意后就围绕一本《夜垂绳》的书展开了辩论。内塔尼亚胡仪表堂堂，能言善辩，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说起话来不打隔顿；那位阿拉伯大使也不含糊，俗话说犹太人的脑袋阿拉伯人的舌头，他口若悬河，论起理来滴水不漏。两人激烈而又不失文雅的唇枪舌剑，使得其他顾客都听迷了，连摄影师们都不知不觉地放慢了动作。两人半斤八两，谁也没明显地占上风。末了，内塔尼亚胡照完像要离开时，一位摄影师走过来笑着说：“你赢了。”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内塔尼亚胡不解地问。

“这还用问？你没开口我就知道你赢了。”

“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你叫内塔尼亚胡，他叫阿卜杜拉，就凭这点他输定了。”

拉宾承认自己对美国犹太人作了大量工作，但不承认以色列已经操纵了美国犹太社团。这话有几分道理，美国犹太人有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并不是完全盲从。

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提出他那个著名的限制苏联取得贸易最惠国待遇的修正案之后，深感恼火的国务院官员们找上门来做拉宾的工作，劝他别再鼓动其他议员支持这个议案。杰克逊修正案的目的是要迫使苏联取消卡犹太人出国的规定。当时苏联政府规定，想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必须在缴纳一笔“教育费”后才有可能得到批准。杰克逊主张，苏联取消这一规定就让它享受最惠国待遇，否则就让它受些经济损失。而尼克松政府的要员们认为不能这样干，要让北极熊变得温顺些，总得先给它几块肉吧！

美国犹太人坚决支持杰克逊这一修正案，他们的能量很快就在国会山显示出来，附议这个提案的议员人数越来越多。基辛格等人急了，请求拉宾不要支持这种活动。拉宾断然予以拒绝，他说：“是的，我说过我支持这个提案，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我有权这么说，况且这个提案也不是以色列提出的。这是美国的内政，我无权干涉！”

看到拉宾欲盖弥彰，还提什么言论自由，基辛格不高兴了。“你希望我们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但同时你又一再要求我们不要把对你们的经济、军事援助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你不觉得这很难自圆其说吗？”

“不，这是两码事！你们向我们提供武器，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难道你真得认为这跟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是一码事吗？”

尼克松听到拉宾这样强词夺理，决定跟梅厄夫人打打招呼。当她 1972 年 3 月 1 日来访时，尼克松劝她不要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逼得太狠了，“如果我们不照着他们的脑袋瓜猛打的话，我想结果会更好一些。您说呢，夫人？”梅厄夫人并不糊涂，忙用一句“您可以确信我们会尽力而为”的模棱两可的话想绕过去。但精明的尼克松截住她，“问题在于国会议员们说他们受到这里犹太人组织的摆布。”

这时基辛格插进来把话挑明了，“不要让这里的犹太领导人对国会施加压力！”

这下梅厄夫人搪塞不过去了，只有硬着头皮说：“你们应当了解我的处境。我不能对美国犹太人说‘你们不要关心在苏联的兄弟姐妹’。”

“那当然，您大可不必说这个话。”基辛格启示地说：“您只要给参议员们一些对于杰克逊修正案的暗示就可以了……您知道。大使先生在我们参议院里有许多朋友……”基辛格故意用这种闪烁其辞的话让梅厄夫人制止拉

宾的活动，但拉宾打定主意绝不停止这一活动。

他是在 1968 年底结识杰克逊参议员的。当时杰克逊那种赤裸裸的亲以、亲犹态度简直到了使他吃惊的地步。开始他认为杰克逊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政客，后来才知道不完全是这样。杰克逊这样做事出有因，因为他本人就是个挪威裔美国人。他对拉宾说：“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两个小民族，犹太人和挪威人，敢于面对双重挑战——抵抗外来威胁及战胜内部困难。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战斗，这种息息相通的情感使我时刻把以色列的事情放在心上。”提出修正案后他又形象地对拉宾说：“你想想看，如果当初挪威政府也制定一个类似苏联政府的法规，我的穷父亲还能移居美国吗？那我现在也成不了美国议员了。”

拉宾支持杰克逊议案还说得过去，但他偏向某位总统候选人的作法就生事了，拉宾露骨地支持尼克松的活动招致了民主党人的不满。1972 年 6 月 11 日，在两党推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前夕，《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其驻耶路撒冷记者尤瓦尔·埃利祖尔一篇文章，指责拉宾在以色列大造支持尼克松连任总统的舆论。他引用拉宾对以色列电台的谈话，说拉宾盛赞尼克松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亲以的总统。亲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批评拉宾干预美国政治，并警告他，他的这些言论将会触怒亲以的民主党人及两党中犹太人的支持者。拉宾对这些指责置之不理，他不愿隐瞒偏爱尼克松的观点，这更惹火了这家支持民主党的报纸。它在 6 月 15 日再次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厉的社论抨击拉宾，社论的大标题是：“不懂外交的以色列外交官”。

但民主党的一些显要人物却执意在这个问题上与自己的党划清界限。最亲以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及赛明顿写信给梅厄尔夫人，对拉宾出色的外交活动大加称赞。就连民主党主席劳伦斯·奥伯林也主动与拉宾会晤，而且肯定了拉宾没有插手美国的竞选活动。

见火候差不多了，拉宾在美国犹太社团的大力支持下发起了反击。他在一个由美国犹太人组织举办的、有 1400 位各界名流光临的晚餐会上指出：“美国新闻界指名道姓攻击我的时间不短了，但我没有申辩。我对以色列电台说的话，是感谢帮助以色列的美国政府、两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我愿意在今晚当着你们的面再次重复这个话！”到会的贵宾当即用雷鸣般的掌声表示自己犹太人事业的全力支持。

在拉宾公开号召投尼克松一票的情况下。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改变了传统的立场、投了共和党的票，尼克松顺利地连任总统。尼克松等人对他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竞选班子老板约翰·米切尔不无用意地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听说你在回国后准备从政。如果你需要一个得力的竞选班子主管的话，鄙人甘愿效犬马之劳！”

卸任回国的日期临近了，拉宾不由地想梅厄夫人会给他个什么职位，他相信自己当个部长不成问题。

## 第九章 出任总理

拉宾任驻美大使期间，梅厄夫人曾三次说过要把他调回国当内阁部长，但三次都食言了。理由要么是内阁中暂无空缺，要么是还没找到理想的驻美大使人选。但不管怎么说，拉宾觉得这次回国头头们不会亏待他

### 卸任回国拉宾失算 追查责任内阁倒台

但他想错了。1973年3月11日回国后工党领袖们告诉他，目前不可能安排他当部长，其他合适的位子也没有。“你先休息段时间后再说吧，你的部长问题只有到今年10月大选后再考虑。”

这一当头棒喝，使他从自视颇高的陶醉感中清醒过来。他心里承认，尽管自己战功卓著驻外成就斐然，但论资排辈他没法跟工党现任部长们相比，自己在党里还算不上什么角色。他：

明白，到了部长这一级光凭梅厄夫人拉扯是上不去的，况且以色列人也见不得这种歪门邪道。当务之急是得干出个样子来。

让党内元老们对自己刮目相待。一切从零开始吧！

转眼间秋季的大选到了，他又拿出当年帕尔马契新兵的劲头投入到为工党拉选票的活动中。他旋风般地奔走于全国各地，到处发表演说宣传工党的成就，并顺便温旧情交新友，搞得风风火火。他的卖力效劳终于感动了工党元老，他们决定给这个勤奋的后生一点儿犒赏，于是把他的名字列入工党候选人的行列。使拉宾寒心的是，他的名字被排在第20位，这就是他在工党领袖心目中的地位！拉宾对此既委屈又无可奈何。排到20位想当内阁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混个国会议员没有问题。

想到自己为工党卖了30多年的命，熬到了50多岁才捞到个议员，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老天有眼，萨达特总统突然打出了一张漂亮的牌，把一切都变了过来。他策划的一场战争大大加速了拉宾的上升。

10月6日早上8点半拉宾在家中接到总参电话，请他下午3点钟同其他前总参谋长们一道去见国防部长达扬。他觉得事情有些反常，这天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达扬为什么单拣这个日子跟大家会面呢？再一想，情况的确有些不对头。昨天，二儿子尤瓦尔刚回家不久就被部队叫了回去。见势不妙，身为西奈的坦克部队军官的妹夫也自行归队了。拉宾明白，这意味着部队进入了警戒状态，但他万万没想到一场空前残酷的大战已迫在眉睫。

下午2点大街上响起了空袭警报，3点钟他和其他前总参谋长已在听达扬讲述前线局势了。这一次是萨达特与阿萨德用六天战争同样的手法回敬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以大无畏的反击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他们把自己的战争计划瞒到了最后一分钟。以色列有所察觉。但没启动战争机器，原因是太轻敌。说老实话，以军将领不相信阿拉伯人还敢再打，他们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了吗？不是打一次输一次吗？但他们没想到，萨达特把苏联顾问赶走真动手了，而且策划得很周密，初期一阵猛冲猛打把以军揍得晕头转向。由于此战发生在赎罪日那天，以色列人称这场第四次中东战争为“赎罪日战争”。散会后，拉宾等以前的老总走访了总参指挥室。但他们发现自己在那里是多

余的人，年轻的军官们跑来跑去地忙活着，连看他们一眼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有人要请教他们了。他摇摇头，叹口气，转身离去。

但头头们没忘记他。战争打响后他们给拉宾安排了一个差事，让他陪着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达多”）到前线视察。工作是达多有问题时提供一些建议。战争打到第四天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把他从前线调了回来，请他负责战争紧急筹款工作，因为以色列的国库见底了。这场战争每天平均耗资 14 亿美元，以色列国库中只有 86 亿美元的家底。拉宾对这种工作没什么兴趣，但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就尽力而为，凭着在美国的老关系弄回不少钱来。萨皮尔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但拉宾对自己离开前线很遗憾。他当时根本没意识到，决定他命运的就是自己身旁这位和蔼的老人。

由于发生了赎罪日战争，原订的 10 月大选被推迟到 12 月底举行。这场战争改变了中东的格局，也改变了以色列人的信念。六天战争后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自己获得了安全，被打得望风而逃的阿拉伯人至少一二十年爬不起来。现在没人这样认为了。阿拉伯人仅用了六年时间就爬了起来并给了以色列沉重一击，谁能保证他们几年后不会再来一下呢？他们心中暗中承认阿拉伯人是不可征服的。军队的三人小组向军属们送去了 2550 多份阵亡通知书，这个数字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 10 倍及六天战争的 2 倍半，按人口比例相当于美国一下子死了 17 万人，而下一次是多少呢？当人们从战争的恶梦中醒过来之后。郁积在心头的沮丧、悲痛、失望的情绪汇集为愤怒的指责浪潮，他们要求查明谁应为这次被动挨打负责，为什么工党政府会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人们愤怒地指责工党政府为“瞎子政府”。于是，头头们相互间推诿、揭短和拆台使得议会和工党内部乱成一锅粥，原先的英雄成了狗熊，新一轮排列组合开始了。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拉宾受到人们注重。作为争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飞快地上升了！

12 月底的大选对工党是个沉重打击。它一下子丢了 5 个议席，而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却猛增了 13 席，执政了 25 年的工党政权的统治根基动摇了，此况下，如果梅厄夫人能组成一个团结并有威望的领导班子，工党重振雄风或许还有希望。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她感情用事，不仅组阁之事一再难产。最后连她自己都被推下了台。

问题出在她执意重用达扬一事上。赎罪日战争之后，深受其害的广大公众强烈要求找出为这次挫折负责的人来，负责安全的国防部长达扬自然成为人们怨恨的焦点。反对党和新闻界的推波助澜不说，更要命的是许多工党要人也趁火打劫，异口同声地要求达扬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使达扬深感震动的事情是，一天当他在议会中出来时，一名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年青妇女从示威人群中冲到他的面前，对着他高喊：“杀人凶手！”他像遭到电击似地后退了一步，他的镇定自若在那一刹那消失了，那位遗孀泪流满面惨白的脸，像把匕首似地深深插入他的心脏。那天夜里，他一宿没合眼。

司法部长夏皮罗毫不迟疑地向他抛来一块巨石。他在议会里口沫横飞地煽动：“你们大家一定有兴趣了解国防部长大人在战争爆发时正忙什么吧！告诉你们，他正忙着改组飞机工业公司董事会，以便使他的好友莫蒂·霍德将军当选为董事长！”这番话就像一瓢冷水猛地倒进滚烫的油锅，议员们一下子全变得歇斯底里了，人们狂怒地吼叫着，要把面无表情的达扬从讲坛上揪下来。

最使达扬寒心的不是夏皮罗等人，而是他一手提拔的阿里尔·沙龙。他

很偏爱沙龙，当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时一再提升他，即使在沙龙于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冒险闯了大祸后，他仍极力庇护使沙龙免遭严厉处分。但沙龙并不感恩，他对自己没能当上总参谋长耿耿于怀，并迁怒于达扬。沙龙在追查风潮中多次指责达扬，说他对战争准备不力指挥失当，并用不能公开的军事机密加以证明。达扬告诫沙龙不要随便泄密，沙龙马上用脏话破口大骂。他大骂达扬是个“惯坏了的明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衰老不堪”。

此况下梅厄夫人组阁应特别小心才是，但她偏不。她坚持拉达扬和佩雷斯入阁作为核心人物，工党内外对此一片哗然。两人见状推辞得更厉害了。到后来，她的组阁如同一场闹剧。她不顾老脸地恳求达扬和佩雷斯入阁，仍遭两人拒绝，弄得她下不了台。见他们这样不听招呼，老太太灵机一动声称要让拉宾出任国防部长，她指望用这个激将法把达扬给“逼”出来！殊不知达扬假戏真演，马上写一封便函祝贺拉宾荣登国防部长宝座，并且在3月5日早上打电话向拉宾汇报工作。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拉宾赶紧声明自己不是国防部长，一切等事情有个眉目再说。但达扬正色地说：“听着，伊扎克，我懂政治。今天工党中央就要批准所有工党部长的任命，你将担任国防部长！”

见达扬装傻充愣，梅厄夫人不玩激将法了，当天她在中央委员会上坚决要求达扬和佩雷斯入阁。到这时拉宾才明白自己又被老太太耍了一顿，他恼羞成怒地当众顶撞道：“我认为推选阁员不是开玩笑。如果我们确实希望防止党内分裂的话，我们就应当严肃地组阁！”全体中央委员立即报以长时间的掌声。但这掌声到底是给谁的，后来却说不清了，因为这时达扬和佩雷斯接受了入阁要求。由于过度激动，梅厄夫人肩膀颤动着轻声哭泣起来，这幕闹剧也就到此收场。

由于这是她四次说要让拉宾当部长，再食言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她在3月10日任命拉宾为劳工部长。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由一名新议员坐上了部长的交椅，算得上是火箭速度了。但他仍不满足，认为这个职位太低了，居然让自己当个调解劳资纠纷的部长！他的追随者也为之忿忿不平。

但他的不满没维持多久，他的部长没当多少天便下台了，原因是梅厄夫人这届内阁只存活了一个月。新内阁成立后，追查战争责任的风潮并没停息，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纳特主持的特别委员会继续调查这一问题。最后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认定。总参军情部门和总参谋长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并迟迟未能进入动员状态，但不认为政府领导人该为此承担责任。调查委员会因而要求总参谋长埃拉扎（达多）和军情部长泽拉等几名军官辞职，但达扬不在它建议撤职的名单之列。

但公众不同意达扬没责任的结论，各种示威和集会强烈要求他立即辞职。这一次达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知道这已不是有责任或没责任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已经抛弃了他的问题，人们不再需要他这个“独眼将军”。既然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没必要再恋栈不舍了，否则人们还会说出他偷文物搞女人之类更难听的话来。

1950年他任北方军区司令时，一天，他带着9岁的儿子尤迪出去打野鸽子。当他们驱车登上了著名的考古地区特拉萨菲土丘时，他发现在一条干涸河道的土岸中露出了一排坛子。他预感到这些坛子可能有些名堂，便带回去一只请专家鉴定。那位朋友告诉他，这坛子是公元前9世纪时制作的，价值不菲。他闻讯大喜。到了下周休假日，悄悄一个人把那批坛子全挖出来带回家中，从此他变成了一个业余的“古董收藏家”。为充实业务知识，他还在

1958年到耶路撒冷大学坐了几年冷板凳。由于长期身居高位，他的古董收藏量急剧增加了，有些是他自己“找”到的，更多的是别人孝敬的。对此社会上的冷言冷语不胫而走，仅仅由于他是一位屡建奇功的民族英雄，这种私下的非议才没发展为新闻界大加宣扬的丑闻。

1971年达扬的第一位妻子鲁恩·施瓦茨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次年他与一位名叫拉赫尔的女士结了婚，拉赫尔相貌出众，颇具魅力。对于离异原因，达扬轻描淡写地说是“婚后生活并不美满”及“缺乏很好的思想交流”等，但实际上他早在20岁时就与鲁恩结了婚并与她生了三个孩子，而拉赫尔女士在1958年离了婚，此后一直执著地追求自己的崇拜者达扬将军，时间长达18年之久。他们之间关系早在打得火热之前就尽人皆知了，但谁愿意管这种馊事呢？人们常看到他和拉赫尔在总参附近一家小咖啡馆里约会。劳累一天的达扬往往很晚时才步入咖啡馆，拉赫尔早已在那里等待多时。他们常常是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吃着热面包卷。这时拉赫尔的话很少，总是用含情脉脉的目光凝视着他，那深情的目光常使他亢奋不已。

鲁恩多次向本一古里安哭诉自己丈夫的风流韵事，但本一古里安总是劝她把这种男欢女爱的小事看得淡一些，“你得习惯这种事，大人物的私生活与公开生活常常是在两块平行的、永不碰头的平面上进行的。”当事情发展到达扬已与拉赫尔明铺暗盖时，鲁恩毅然与他离了婚，并拒绝分任何家产。

看到大势已去，达扬向梅厄夫人递交了辞呈。很快，感到众叛亲离和身心交瘁的梅厄夫人也在1974年4月11日向议会宣布了她那“不可更改的”辞职决定。同时她也辞去工党主席的职务。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总理的辞职就意味着整个内阁的辞职，于是才当了一个月劳工部长的拉宾也跟着下了台。他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遗憾。他早就看出梅厄夫人这届内阁是条千疮百孔的破船，即使搭上它也驶不了多远，索性早点儿沉了也好，那就有理由造条新船了。

## 双雄对阵竞争党魁 拉宾鸿运一步登天

梅厄夫人的辞职并不意味工党政权垮台，只表示工党需要另推出一位总理。它意味着工党领导人要重新排定前后次序。谁能当选党主席就意味着他将出任新总理，因此推举总理候选人也就是选党主席。拉宾对这场搏斗信心十足。以色列人很爱引用本一古里安的“凡不相信奇迹的人都不是现实主义者”这句名言。拉宾就是一个相信奇迹的人，他期望这次奇迹能出现在自己头上。

但要论资排辈，总理候选人还轮不着他。工党权贵们看中的是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他们一致认为他是新总理的最佳人选。萨皮尔资历很深并且平易近人，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信，只要他点头同意，党主席一总理一职非他莫属。许多人记得很清楚，在那场每小时耗资6000万美元的赎罪日战争中，这位可敬的老人是怎样用眼泪和激昂慷慨的游说为以色列募集到20亿美元的。但人们没想到，萨皮尔坚决拒绝了总理候选人的提名。这就为其他凯觐总理宝座的人扫清了道路。最先出马竞选的是佩雷斯。他的资历不算浅，早在本一古里安时期他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以后一直担任各种部长职务。他不但有能力有口才，而且在工党上层中有一大批朋友，颇具实力。

见佩雷斯率先出阵，拉宾也催马应战。拉宾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比佩雷斯差：的确，佩雷斯是当过国防部副部长，那又怎么样，那不过是个文官职务，管管计划和采购装备之类的事。而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军人，是真刀真枪地打出来的英雄，要论战功他不能跟自己比；佩雷斯是在政府中混过多年，但拿不出吹得响的成就来。而自己别的不说，光是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就敲定了以美联盟关系，为国家搞来了大量的武器和贷款；佩雷斯连一个忠诚的工党信徒都谈不上，他曾经尾随本一古里安从工党中拉出个“拉非党”。而自己始终是一个为工党忠心耿耿效力的人。

很可惜，这只是拉宾自己的良好感觉，别人并不这样看。

佩雷斯在以色列相当受人尊敬，不仅是老百姓而且有大批军人，许多将领不仅尊敬他而且感激他。将军们清楚地记得，是佩雷斯搞来的一流法国飞机，让以色列空军在世界上大出了风头；是他排除万难为飞机导弹电子工业打下基础，这才使以色列人的腰杆越来越硬。他的“空手道”也玩得让人叹为观止。独立战争期间，他顶着一个哈佛大学学生的虚名到处跑，一个子儿没花就从加拿大运回几十门大炮，接着又是几十架飞机。60年代初，是他第一个打破了美国的“封锁”，从肯尼迪政府那里搞回了“霍克式”防空导弹。他是以色列公认的“原子弹之父”，一手建起了以色列的核威慑力量，从此以色列首脑不再害怕被人赶进地中海了。

拉宾与佩雷斯一交手，其他人要么止步不前，要么退出沙场，这样党内便出现了拉宾与佩雷斯公开竞选的局面。与过去那种指派式的推举相比，这次倒是头一回出现的公平竞争。佩雷斯见拉宾来势不善，便摆出绅士风度稳住他。他邀请拉宾共进午餐并对他说：“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俩竞争总理职务，让我们从年长的同事那里汲取一些教训吧。不管是谁输了，都应以大丈夫的气度接受结果，并保证忠于取得胜利的人。”他说的“年长的同事”指的是阿隆和达扬，两人1969年撕破脸皮地竞选过总理，最后两败俱伤谁都没有当选。佩雷斯不提这事还好，一提拉宾更来了气。当时，拉宾到处为阿隆拉选票，佩雷斯则是达扬的啦啦队长，他俩见面就要叮当几句。拉宾并不信佩雷斯的话，也不愿在他的内阁中当部长，但同意了君子协定。

真正竞争开始后拉宾心虚了。因为，说到底这不是他看不起佩雷斯的问题，而是工党元老是否愿意推举他当总理的问题。这一点他毫无把握，而佩雷斯恰恰在这一点上比他强。因为佩雷斯多年位居政府高职，从1959年起就是国会工党议员，在工党中央委员中有许多朋友，投起票来拉宾肯定占不了便宜。拉宾慌了。在这关键时刻，萨皮尔伸出了有力的手，公开表态支持拉宾当选。同时表态支持他的还有梅厄夫人，她与佩雷斯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好。萨皮尔和梅厄夫人周围都有大批支持者，他俩一表态就把这些中央委员推到了拉宾一边，形势立刻变得对拉宾有利了。无疑，拉宾当大使时弄到不少美援给萨皮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还有他在赎罪日战争中筹款的出色表现。但更主要的是，萨皮尔认为工党当前需要一个新人出任领导，拉宾正符合这个条件。他认为，拉宾一来跟党内各派系没什么瓜葛，人们不太了解他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是之处，这种“新面孔”的人好当领导；二来他出身于工党名门望族，本人又战功卓著，堪当重任；三是以色列人始终喜欢讲话直率的将军，他在老百姓中很有威望。

但佩雷斯的支持者也不是吃素的。就在4月22日工党中央委员表决总理候选人的前夕，在民众中很有影响的魏茨曼突然向拉宾发射了一颗重磅炮

弹。他对公众详细地披露了拉宾在 1967 年 5 月 23 日的表现。在他的生动的描绘中，拉宾在六天战争中是个在紧要关头信心不足的胆小鬼。他直言不讳地说：“拉宾不适合当总理，总理候选人必须是个能在复杂形势下果敢作出决断的人。”这发炮弹击中了拉宾的要害，他感到有口难辩，因为他那时的表现确实有些反常。这时他记起魏茨曼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我不是巴勒斯坦工人党的成员，但我是佩雷斯的好朋友。”所幸的是魏茨曼这一炮放晚了。在拉宾已明显占上风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政客的庸俗拆台手腕，而且他们也不信拉宾这位战争英雄会是个胆小鬼。

尽管如此，4 月 22 日的秘密投票的结果很玄，拉宾仅以 298 比 254 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了佩雷斯。他为此惊出了一身冷汗。投票一结束他的身份立即改变，身边马上出现了一群政府派来的保镖，他已经是以色列的第五届第六任总理了。选举后他发表了即席讲话。他首先对梅厄夫人、萨皮尔和其他一直支持他的元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许诺要出以公心搞好本职工作和党内关系。他激动地对代表们说：“这个时代已经到来，由这个国家的创建者的儿子发挥他们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

散会后虽然天色已晚，但支持者的鲜花和祝贺仍如潮水般地向他涌来，家中的电话铃那晚上就没停息过，远在各地的朋友和不相识的人纷纷表示祝贺和支持。这可是个大众媒介演重头戏的时刻，新闻记者们把他和莉赫夫人当做一对玩偶似地摆弄到半夜才撒手。他在送别密友埃坦·哈伯尔时坦率地承认，自己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一名新议员急速地上升为总理，确实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情是组阁和处理国家大事。从第一天起，他就感到处理每件事都很棘手，尽管他才 52 岁，还很“年轻”，仍感到干什么都有些力不从心。

### 总理难当步履维艰 舞场出丑拉宾汗颜

拉宾当选为以色列总理，标志着国家领导权已由早期东欧移民创业者转移到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下一代人手中。以色列人对本地出生的人有个昵称，称他们为“萨巴拉”，萨巴拉指的是沙漠中刺多肉甜的仙人掌果。但正是由于这种质的变化，早期领导人那种半独裁式的统治难以为继了。在本-古里安时代，国家大事基本上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在工党内敢跟他较量的人不多。到了梅厄夫人时代，这种传统仍在继续着，任何人想改变她的决定是极其困难的。她甚至习惯于在自己的厨房里决定国家大事，“厨房内阁”因此而得名。但到了拉宾时代这种独断专行的作法行不通了，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内头面人物集体决定，并且还得更加尊重人阁的小党的意见。

从一开始他就觉得每一步都很难走。

首先，麻烦的是多年合作伙伴——全国宗教党变得桀骜不驯了。与工党一样，全国宗教党的领导权也传到年轻一代手中，他们的特点是更加保守和右倾，在观点上越来越接近后来的利库德集团。由于他们对联合组阁索价太高，拉宾最后决定与其它更小的党合作。这样一来，拉宾的联合政府仅拥有 61 个议席，也就是说它只有一票优势，在政坛上如履薄冰。后来，在权衡了利弊后全国宗教党又于当年 10 月加入联合政府。但这与其说是件好事，还不如说是件坏事，它使拉宾政府更脆弱了。全国宗教党的加入，使牵制工党的



力量更大了，不仅难以形成决议而且更容易垮台。

其次，是他沮丧地发现自己连挑选部长的权力都没有。那些参加工党政府的小党自不必说，它们根本不与拉宾商量就自己决定谁出任部氏。它们拿出的名单，拉宾必须接受，没有商量的余地。更有甚者，工党的部长人选他也不能多嘴，党让谁当部长谁就可以当部长。拉宾认为自己的挚友阿隆是国防部长最佳人选，但拉菲党却坚持要佩雷斯担任这一职务，工党领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位子给拉菲党，拉宾只得像吃了只苍蝇似地接受了。

他在外交部长人选上也遇到了麻烦。拉宾把这一职位给了阿隆，并请已当过9年外长的埃班出任情报部长。埃班闻讯大怒，愤然拒绝接受这一任命。由于阿隆在党内的声望也很高，因此工党元老们决定在这个问题上给拉宾一点自主权。拉宾认为埃班怒得没道理。因为长期以来埃班一直是总理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且还常常干得不漂亮，基辛格等人甚至不屑与他打交道，他还争什么？但为表示对这位老资格党员的尊重，拉宾亲自到埃班家邀请他入阁。埃班根本不买帐，怒气冲冲地当面拒绝，拉宾只有随他去了。

就这样，经过复杂的幕后交易，拉宾终于能在6月3日代表工党向议会提交了内阁名单。议会批准了他的“提名”，他的政府开始了运转。他为自己的政府规定了内外政策的纲领。对外：拉宾希望能把以、阿之间政治谈判继续下去，但要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不能老作为美国或阿拉伯方面倡议的响应者，自己也得有新倡议；要进一步加强以美关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美国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枪和钱，只有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使阿拉伯人相信谈判是唯一出路；要进一步加强打击国内外恐怖主义活动。对内：要医治战争创伤和重振经济；要加快建房速度防止移民人数进一步下降。在上述目标中，拉宾认为最重要的是使以色列摆脱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状态。这方面有利的条件是以埃军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已经实施，5月底又与叙利亚签定了同样的协定。

就职不到两星期他就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外事活动：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中东过程中即将访以。当时尼克松已被倒霉的“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他能向美国公众炫耀的是他的外交成就，他这次出访中东就有借此改变自己形象的意图。拉宾希望他能度过难关，准备充分尽力配合他的表演，同时也打算再与他商量一下中东和谈和武器供应问题。

6月16日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到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从机场一直排列到市中心。虽然在欢迎场面和人数上以色列比不上埃及，但尼克松明白这么多老百姓自发出来欢迎他是空前的。沿途中群众不断向他高呼：“欢迎您，尼克松先生！”他频频向人群招手致意，并一再向他们高喊：“谢谢你们！”在专车中他自豪地对拉宾说：“他们知道我为以色列作了些什么！”在随后的会谈中，拉宾和尼克松都同意把埃及定为下一轮和谈的主要对象。但拉宾强调，以色列要是得不到实际好处就不再往后撤了；尼克松认为，埃及人已放弃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应多给他们一些机会。但这次访问没取得实在的成果，尼克松被“水门事件”搅乱了思绪，已无心再作更多的承诺。而且，这次出访中东也未能改变他被赶下台的厄运，他回国后不久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听到这一消息拉宾感到很遗憾。因为尼克松毕竟是到那时为止最亲以的美国总统，他给以色列的武器要比任何一位前任都要多，而且始终没用强制手段压以色列作政治让步。

1974年9月10日拉宾应邀访美，他的东道主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

他与福特也是老相识，他出任大使时福特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现在两人的身份都变了。福特在亲以态度上毫不比尼克松逊色，但他不同意拉宾急于同埃及达成一项全面和解协议的想法，讥笑这完全是个“乌托邦式”的愿望，“现在还过早”。为从一开始就把武器供应渠道拓宽一些，拉宾一口气交给福特三份求购武器清单，其中一份是要求立即提供

的，其余两份是希望长期供应的。拉宾解释了为什么要提出长期供应问题的原因。那是由于尼克松总统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从美军武库中抽调大批武器紧急支援以色列，使得五角大楼对以色列极为不满，以色列为使五角大楼有准备故把要求提在前头。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对此没有明确表态。

当天晚上福特为拉宾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在一通热情洋溢的致词和答词之后，宾主在轻松的乐曲中享用起美式珍馐佳肴来。客人刚放下刀叉，迎宾曲便停了，接着白宫主管宣布下一个节目是舞会！福特兴高采烈地带头鼓起掌来，拉宾暗叫一声“不好！”

很快，乐队奏起了欢快的舞曲，人们把期待的目光集中到福特、拉宾身上。福特总统看来是精于此道，他快步走到拉宾夫人莉赫面前，以骑士风度躬请她起身共舞，随后便以滞洒的舞姿带着她飞旋起来。这时拉宾看到众人正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并用掌声鼓励自己去邀请福特夫人跳舞。此时一层惶恐不安的细汗从他的脊背上渗了出来，原因是他根本不会跳舞！于是他忙转身找人说话，借此表示他忙得无意跳舞，心中盼望着有个仰慕第一夫人风采的冒失鬼替他完成这一可怕使命。但那天晚上，这么不懂外交礼节的冒失鬼始终没出现，因为按规矩福特夫人的第一个男舞伴应该是贵客拉宾总理阁下。为争取主动，拉宾鼓起余勇大步走向福特夫人，她立刻起身相迎。无疑，她确信拉宾是来邀她跳舞的。不料，却听到拉宾满脸尴尬的低声解释：“很抱歉，夫人，我根本不会跳舞，连一步都不会。我不想踩疼您的脚。”说完这句吃力的话后拉宾觉得轻松多了，他确信福特夫人会以宽恕的一笑让他过关。殊不知，福特夫人的确笑了，但在微笑后跟着说了句使他汗颜不止的话：“别害怕，总理先生，我年轻时常教人跳舞，比您笨得多的人也踩不到我的脚指头。来吧！”

这下子拉宾躲不开了，因为再推辞就显得很不礼貌。接下来发生的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福特夫人挽住他，嘴里轻轻打着拍子教他踩舞步，同时敏捷地躲闪着他的脚的大脚的袭击；拉宾满头大汗笨拙地扭动着身躯，双眼紧紧盯着自己那双不听指挥的大脚，竭力防止它们踩到福特夫人的红皮鞋上。舞曲悠扬地鸣奏着，福特总统像睡足了觉似的精力充沛地跳着，看样子他决意那晚上要把莉赫“垄断”到底。拉宾可惨了。脸红得像只公鸡，一头一身的大汗，在那里像个机器人似地踱着步子，而福特夫人决意非把这个笨得出奇的学生教会不可。拉宾心中祈祷着那该死的舞曲快些终止吧，想不到乐队指挥为取悦总统有意延长了舞曲。最后，看到拉宾的目光中已有乞求的神色了，基辛格才赶来“救驾”。他借口有急事相告把拉宾从第一夫人手中解放出来，把他带到隔壁一间屋子里让他擦擦汗。拉宾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出了这么大的洋相，对基辛格的及时相救千恩万谢。他甚至认为，如果说基辛格没为以色列作过什么事的话，起码他的这次义举是值得永远感谢的！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就送来了福特总统批准的紧急供应武器的清单。拉宾匆匆看了一眼，发现他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美方都同意了，供应的武器包括集束炸弹、武器零件、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大炮等。这批价值 7.5 亿美元的武

器将在 7 个月内运交以色列。在随后的会谈中，拉宾对福特总统的慷慨解囊深表感谢，并赞成基辛格在 10 月到中东再次推进以埃和谈。

在以埃达成过渡性协议问题上，拉宾主要考虑两点：一是以色列能再后撤多远；二是埃及给以色列什么回报。拉宾认为色列还能再后撤 30—50 公里，但他希望埃及能作出终止交战状态的回报。他手中有两张可讨价还价的好牌，一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西奈阿布·鲁迪斯油田，另一张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吉迪和米特拉山口。

基辛格在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之后，于 10 月 12 日抵达以色列。基辛格的印象是，上述国家似乎并不急于与以色列达成一个过渡性和解协议，它们好像是在等待即将召开的拉巴特首脑会议的讨论结果。而且，它们的要求各不相同，相互间也有些芥蒂。拉宾不愿意也跟着阿拉伯邻国一起等待拉巴特会议结果，他想先与埃及单独达成协议。但萨达特对以色列只肯后撤 30—50 公里不满足，而且他也受到阿萨德等阿拉伯领导人的压力，不愿单独走得太远。因此，基辛格在 1974 年 10 月到 1975 年 3 月间多次进行穿梭外交，以埃双方在单独媾和方面没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到 3 月份，双方再次表现出推进和谈的意望。它们都对基辛格表明了愿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冲突的诚意，都降低了战争宣传的调子，一些挂着外国旗子的以色列轮船也通过了苏伊士运河。此况下福特要求基辛格再度施展其娴熟的外交手腕，务必使以埃能够单独达成过渡性和解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于是基辛格又一次穿梭飞行起来，在拉宾和萨达特这两个愿意成交但又锱铢必较的顾客间充当起“诚实的掮客”来。在撮合过程中基辛格发现，拉宾不要足价钱绝不轻易点头。为使双方能够谈成，基辛格使出浑身解数来往奔波，极力压低以方要价促其成交。

### 天马行空基氏穿梭 锱铢必较拉宾难缠

3 月份，基辛格给带来一幅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将军标注的西奈地图。贾马斯在那幅地图上提出了埃及的新建议：以军后撤到山口以东、国际边界以西 15—20 公里的一线；在埃、以两军之间设立一个防止冲突的缓冲区。美国对此大为赞赏，但以色列却不同意。拉宾、佩雷斯和阿隆组成的谈判班子，坚持以军后撤线只能划在山口以东。但拉宾也没把话说死，他请基辛格告诉萨达特：如果埃及同意结束两国交战状态，以色列可以撤到阿里什——拉斯·穆哈默德一线，即山口以东的地区；如果埃及愿同以色列达成部分或全面和解协议的话，以色列愿意把绝大部分乃至全部西奈半岛都还给埃及。

萨达特显然被这个建议打动了，他沉默着考虑了半晌，然后摇摇头对基辛格说他不能单独与以媾和。但在另一次会谈时他告诉基辛格，如果以色列同意撤到贾马斯线上的话，埃及可以考虑终止埃以交战状态。

基辛格一看有门来了劲，决定以楔而不舍的精神把事情弄出个眉目来。于是他的专机开始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频繁来回飞行。这下拉宾可惨了。基辛格根本不顾人们公认的作息时间表，他起飞或降落的时间常常怪得出奇，把拉宾从被窝里叫起来并长谈一夜是常有的事。这样一来不仅拉宾的时间表全打乱了，他的谈判班子也被基辛格牵着鼻子转。最不可思议的是，基

辛格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当他拖着拉宾等人进行马拉松式的彻夜长谈时，对方已困得睁不开眼了，他却像刚睡了10个钟头那样精神抖擞，侃侃而谈。

在他不断斡旋、撮合下，埃及又分别拿出自己的新方案。3月20日埃及提出的方案包含两种选择：一，两军共同控制山口。埃军控制西段，以军控制东段，中间10—20公里宽的缓冲区由联合国部队控制；二，整个山口地区都由联合国部队控制。埃、以两军分驻在距山口相等的西、东地带，但以军设在山顶的预警雷达站得撤走。埃及这两个方案实际上都要求以军后撤50—70公里，而埃军则前进20—30公里，并且能够收回油田。

以色列最初的方案是以军撤至山口地区的中段，埃军至多可前进到以军撤走前的位置。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乌姆·哈什瓦山顶的预警雷达站。随后在基辛格的压力下，以色列又作了些让步：以军撤到山口地区东段；把油田以一块飞地的形式归还埃及；埃及要保证遵循“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对于以色列后一个方案，萨达特表示埃及顶多能忍受两年，过期后仍要求收回整个西奈半岛。萨达特曾疑惑地问基辛格，“以色列政府是否真的希望取得和平？以色列人是否真的从安全敏感症中摆脱出来了？”基辛格因此劝拉宾写一封亲笔信给萨达特表示和平诚意。拉宾立即照办了。等基辛格下一次来时他问那封信怎么样了，基辛格说，“萨达特当着我的面阅读了你的信，他被深深感动了。”但拉宾并没收到萨达特的回信。

来回穿梭折腾时间一长基辛格烦了，他逐渐变得沮丧和焦躁起来。他不满地对拉宾说：“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挫折，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统本人如何看待此事。苏联人肯定会对此感到高兴，他们和阿拉伯人将会要求重开日内瓦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保证美国政策不发生变化。”就像印证他的话似的，福特总统很快来信对和谈没有进展及以色列态度僵硬表示失望。他接着警告这会影晌美以关系，并说他已下令重新估价美国的中东政策。但福特没想到，他这番话在以色列正好起到相反作用，被这种赤裸裸的威胁激怒的全体阁员一致要求拉宾坚持自己的立场。《国上报》评论员茨维·斯契夫打气说：“拉宾对美国人说‘不’是绝对正确的。这引起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不和，这跟赎罪日战争是通向戴维营之路的基石一样重要。”

3月22日晚宣布斡旋失败的基辛格打算次日回国。当晚拉宾又找他进行了一次双方都深感苦恼的长谈，因为除分歧外他发现基辛格已对自己产生了不信任感，怀疑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拉宾解释说，他的确说过以色列愿意大幅度从西奈撤退的话，但条件是埃及也得作出终止交战状态的承诺。但看在你基辛格的面子上，作为让步以色列现在已不提这一条件了，降为满足埃及说一句“不使用武力”的话，怎么能全怪以色列一点不肯让步呢？况且以色列不是同意往后撤了吗？基辛格叹息着，摇摇头，但没说什么。

23日清晨拉宾到机场为基辛格送行。到那里，他认为仍有必要再对基辛格说说心里话，于是把基辛格带到机场大厅的新闻发布室里。但没开口他就觉得感情起伏跌宕得厉害。在所有交往的人当中，没有谁比基辛格更了解自己是如何为加强以美关系而操劳的了，但他这次斡旋失败势必损害这种个人关系。想到自己在美拼搏多年的成果有可能付之东流，他觉得极为沮丧、遗憾和痛心。而更使他难过的是他与基辛格多年建立的友情也受到损害，而这又是由于对以色列安全的看法不同引起的。于是他动情地对基辛格说：“我充分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充满着危险，这对我本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政治问

题，我对于每一位以色列士兵都有对待儿子那样的责任。你知道，我儿子是驻守西奈前线的一位坦克排长，我妹夫在那里指挥着一个坦克营。我很清楚，仗一打起来他们可能会有什么下场，但以色列不能按照目前的条件签定协议。现在我除了肩负起沉重的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外，没有其它路可以走。”

基辛格显然被这番肺腑之言感动了。他的嘴唇颤抖着，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用右手轻轻地拍着拉宾的手背。登机时间到了，拉宾把他送到舷梯旁，欢迎他再来以色列。基辛格抑制不住感情的激荡，说再见时已热泪盈眶，紧紧握住拉宾的手不肯放开。举着镜头对准他们的新闻记者也被这一场面感动了，不少人放下摄影机擦起眼泪来，其中两个美国大报的记者竟像孩子那样哭出声来。

基辛格的专机逐渐变为一个小黑点消逝在天际，拉宾仍仁立在机场上久久不愿离去。他承认自己对基辛格的感情既复杂又深沉。他代表以色列，基辛格代表美国，在维护本国利益时谁也不让谁，拍桌子瞪眼睛是常有的事情。但基辛格有这样的本事：他能在挖苦和训斥了你之后还让你喜欢他。他机警、幽默、聪明和博学，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国王、总统和总理被他的手腕、才能和风趣所倾倒。他有个阿拉伯人厌恶透顶的犹太人背景，但阿拉伯的国王、埃米尔和总统们张开双臂地欢迎他。他让以色列得到了实惠，同时又使阿拉伯人认为自己夺回了尊严，因此他是一个在世界各地都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拉宾最钦佩的是他的幽默感，他常用几句得体的幽默驱散谈判桌上紧张得要爆炸的气氛，使双方快绷断了的弦松弛下来，在众人捧腹大笑声中原先越不过去的障碍消失了。拉宾记得有一次基辛格急于得到以色列对埃及提议的答复，站在那里等着，好像是等拿到答复后马上要上飞机似的。拉宾劝他别急，说自己得等内阁讨论后才能给他一个答复。基辛格脸上马上显出鄙夷的神色，“什么，你们还要讨论？人家萨达特总是立即给我一个干脆的回答，而你们却什么事情都要讨论！你们内阁究竟要讨论多久呢？”拉宾解释，上次内阁开会马拉松式地讨论了10个多小时。佩雷斯插话说：“即使那样还有些部长抢着要发言呢！”基辛格夸张地睁大眼睛，“你说什么，难道真的你们每位部长都有权在会上发言？”拉宾和佩雷斯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这可真够民主的，”基辛格讥讽地一笑，接着给他们讲了一个发生在西德的笑话。西德总统阿登纳内阁里有位激烈反对他的部长，阿登纳对他既讨厌又头疼，便设法让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这位部长每次内阁会议都要求发言，但阿登纳总装作没看见不予理睬，弄得那位可怜的绅士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最后这位部长急了，在一次内阁会上干脆站起来举着手不放下，这时阿登纳再装没看见就显得过份了。于是，他在会议结束前巡视会场似地缓慢地把目光转向了这位气疯了的部长，并故作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说：“噢，对不起，亲爱的先生，如果您要上厕所的话，那就请便吧！”讲完这个笑话基辛格挖苦地说：“我想你们的内阁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吗？”拉宾和佩雷斯尴尬地承认的确如此。

基辛格那颗脑袋具有超级电脑的记忆功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只要跟一个人交谈过，此人知识、水平和能力等资料便全部储存到他的大脑中。有一次他把以色列的建议文本交给了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后者接过来扫了一眼便说：“这是以色列外交部法律顾问梅厄·罗森起草的，以色列官员中只有他能拟定这种文件。”基辛格不认识罗森，他推测这是总理办公厅主任莫德恰·戈兹特的作品。但法赫米坚定地说：“不，绝不可能！只有罗

森才有写出这种文件的水平。”说完后基辛格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拉宾与阿隆，但两人都不吭气。实际上那份建议正是罗森起草的，他们对埃及人这么了解以色列的情况深感吃惊和担忧。

基辛格空手而归使福特大为不满，他随后正式宣布要重新估价美国的中东政策，其含义是要重新摆一摆以色列的位置了。与此同时大棒也砸了下来，在1975年3月到9月的半年时间里，美国一直拒绝与以色列签定新的军售合同。人人都看得出，美以关系进入了近年来最僵的时期。但以色列的外交很有特点，往往在这种时候沉得住气，好像这事不存在似的。它一方面策动各种力量改变这种局面，另一方面摆出一副爱谈不谈的架势，处惊不乱。憋到最后还是萨达特采取了主动，他要求美国介入使埃以和谈继续进行下去。福特看以方不就范也感到有必要动动，遂邀请拉宾在6月10日来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

拉宾一到美国就感到福特政府的不快，原因是76位参议员5月21日联名致函总统要求他支持以色列并向它提供先进武器，福特对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这种施压方式极为不快。在预备性会谈中，基辛格说萨达特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已同意将双方过渡性协议及以军撤离期限放得更长一些。但拉宾认为这没多大意思。而且他认为，要是双方没希望达成协议，基辛格最好别再搞穿梭了，免得再不成功时以色列又被世人责骂一番。

在随后的正式会谈中福特软中带硬地对拉宾说：“我愿意坦率地告诉你我的烦恼，然后让我们共同把我们两国的关系翻到新的一页。我们重新估价中东政策并不是要惩罚以色列。尽管我们作出巨大努力使中东能达成一项协议，但我们没达到目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当然，我认为有必要先听听你们的看法。我倾向于赞成召开日内瓦会议，以便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它将使以色列与邻国之间出现和平，它们之间的最终边界的安全将由有关大国进行保证。”

拉宾一服就看穿了福特虚张声势的试探把戏，他无非是想摸一下以色列能“硬”到何种程度，岂有把刚被埃及赶走的苏联再请回来之理？于是他平静但又明确地告诉福特，要想让以色列回到1967年6月4日线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是条易于触发战争的停火线，阿拉伯军队的大规模调动很容易导致以军先发制人的进攻。即使到了日内瓦，以色列仍是这个立场，不会改变。

见总统碰了钉子，基辛格出面尽他的国务卿的职责了。他6月12日晚焦躁地对拉宾说：“你们坚持要控制山口东段使外交努力无法继续进行，这样一来日内瓦会议就变得势在必行了。我很难说美国到那时会采取什么立场！”听他口气不善拉宾也来了火气，“请不要用日内瓦会议吓唬我们，我们绝不会屈从埃及人的要求。我们将反对任何会危及我们安全的决议，即使这些决议是由多数票通过的也罢！”见两人都红了脸，西斯科忙出来打圆场，借口天色已晚有事明天再谈。拉宾和基辛格就此下了台。

回去后拉宾越想越生气：美国人为什么动辄要提日内瓦会议，他们究竟要以色列退到什么地方才满意呢？想到这里，他又爬起来去找基辛格问个究竟。见旁边没外人，基辛格又恢复了往常的老样子。拉宾直截了当地问基辛格，照他的看法以色列的边界应当划到哪里。基辛格世故地一笑，“你过去从没听我谈过这一点，现在你也不会听到这一点。我希望，当决定以色列边界的那天到来之际，我已不再是国务卿了。”

拉宾这次访美最后以失败告终。他非但没有扭转福特等人对以色列政府顽固不化的看法，反而还加深了对方这种印象。他也明白这样僵下去对以色列没什么好处，因为美国公众已开始怀疑以色列占领埃及领土的真正动机了。

为打破僵局以色列自己开始行动。佩雷斯提出了个方案，主张划出一个包括整个山口地区的长方形非军事区，这个非军事区由美、苏联合部队控制。拉宾恼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斥责这个想法真是糊涂到家了：“别说不能让苏联人进来，就是让美国人呆在那也不见得是件好事！”佩雷斯闻言红着脸走开了。随后总参又提出一个方案，提议以军撤到吉迪山口以北和米特拉山口以南，但控制两山口东面的山坡。这既能满足埃及坚持控制山口东端的要求，又能保证以色列不失去对山口通道的控制。拉宾赞同这一方案，基辛格也认为可以接受，但福特对此不太热心。因为这个方案要求美国派人接管以色列在山顶的预警雷达站，而患上了“越战恐惧症”的美国公众反对再派军队到国外的冲突地区。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福特和基辛格相信以色列有点诚意了，这样基辛格又奉命到中东斡旋。

### 基氏撮合埃以成交 过渡协议打开缺口

到了耶路撒冷，基辛格有些愠怒地对拉宾说：“我知道你们的民主是怎么回事，最好你们把这种‘民主’收起来一些！”原来，以前以色列报纸曾让他出了一次“以色列的掮客”的大洋相。

这个洋相出在赎罪日战争之后。当时基辛格作为以、叙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停人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来回奔走，促使它们达成一项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这位帮助解决了越战问题的谈判大师精通谈判技巧，那就是成交前给对手留下些杀价的余地，以使对方最后杀价成交时获得极大的胜利感。本着这一原则，基辛格在大马士革极力压低叙利亚的要求，反过来在耶路撒冷则压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让步。本来梅厄夫人已经给他交了底，他的公文包中有以方同意最大限度后撤的地图，但他仍顽强地与阿萨德总统在地图上一英寸一英寸地侃价，活像个与顾客争尺寸的卖地毯的小商人。

最后阿萨德望着这位不知疲倦的“以色列的掮客”笑了，而且笑得很开心。他问基辛格：“你看过以色列今天的《国土报》了吗？”

“没有。那上面说了些什么？”

“那上面说以色列同意撤出的地盘比你声称的‘最大限度’的撤离要大得多！”阿萨德说罢开怀大笑起来，招手让侍者给基辛格送上咖啡，然后满意地欣赏他那副狼狈不堪的表情。

鉴于这一教训，基辛格要求以色列内阁对讨论内容严加保密，不要走露有关最新后撤线的风声，由他去跟萨达特讨价还价。拉宾难堪地接受了这一要求。最后他们定下了以色列的原则立场：以色列在控制山口周围地区及保持乌姆·哈希瓦雷达站的条件下，把整个山口还给埃及；埃及军队不得越过缓冲区进入以军撤离地带。

然而，正当基辛格8月下旬的这次斡旋取得明显进展之际，以色列掀起一场反对他的风暴。

以色列一直存在着反对基辛格调解阿以冲突的势力。早期的反对者主要是军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流血夺得的地盘又被基辛格还给阿拉伯人，同时也担心这种退让会鼓励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因此，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基辛格压梅厄夫人让步时，许多以色列将军破口大骂他。但后来将军们改变了看法，他们懂得了把刺刀尖伸到埃及人鼻子底下没好处，况且先进的美国武器可以弥补战略纵深不足的缺陷，因此同意作一些使美国佬高兴的让步。后来的反对者主要是极右的政治和宗教势力，他们是从恢复“大以色列”的版图和保卫“神赐之地”的角度看待退让问题的，他们认为这是背叛。而现在，压着以色列“以土地换和平”的居然还是个犹太人，这就更使他们怒不可遏了。他们认定基辛格一直在出卖以色列的利益，与埃及的核交易便是一例。

尼克松下台前访问中东的第一站是埃及的开罗，萨达特在那里组织了一个 300 万人参加的欢迎仪式，调集来的群众用山呼海啸般的声浪欢迎尼克松。这使尼克松大受感动，于是许诺用一核反应堆来酬谢萨达特的热情。这件事美国没跟以色列商量，当以色列人从埃及报纸上知道这件事时，那个核反应堆已变成了核电站。尼克松访以时人们不便责问总统本人，便去问基辛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基辛格马上一迭声的道歉，声称是由于“疏忽”忘了提前通告以色列，但他一再强调那是一个民用的核电站。这时有人追问，怎样才能保证那座核电站不会用于造核武器呢？基辛格耸耸肩说不知道。以色列人立刻发出不满的责难声。

这时基辛格取下眼镜擦拭起来，随后说：“很抱歉，我确实不知道如何防止埃及人利用那座核电站造原子弹。你们之中谁能告诉我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是派美国专家去监管那座核电站！”人群中一位年轻人脱口而出。

“唔，这是个好主意。”基辛格悠然自得地戴上眼镜，“我会告诉埃及人你们这个建议的。但是，对不起，如果埃及人也要求我们来监管以色列的核反应堆，我该怎么回答他们呢？”

在场的以色列人一下全傻了，谁也说不出话来，因为只有白痴才会请外国专家来管理自己造原子弹的核设施。但是，自己都不同意的事怎么要求埃及人作呢？到这时，人们才明白自己全钻进了基辛格“漫不经心”编织的圈套。他诱导人们自己说出不合情理的要求，然后使他们感到理亏后自行取消这一不合理的要求。果然，以色列从此不再提埃及核电站的问题了。

反基辛格的人明白，要进行辩论他们绝不是基辛格的对手，于是便把抗议活动变成一场谩骂和捣乱。于是，基辛格一到以色列，一伙自称为“信仰卫士”的极右宗教人士便用“犹太孩子”称呼他。他们的领导人，大拉比茨维·雅胡达·库克，干脆称基辛格为“一个异教徒女人的丈夫”。有位精英分子公然在报上煽动杀死他，说基辛格应得到贝纳多特伯爵同样的下场。那位瑞典伯爵在 1948 年作为联合国调停人来以解决阿犹冲突问题，到任不久便被以色列右翼组织刺死于街头。对于无赖基辛格历来是不屑一顾的，见辱骂不管用这伙人便包围议会大吵大闹，迫使拉宾从一个侧门把基辛格送回了大卫王饭店。基辛格这种事见多了，看来对此无所谓，拉宾却气得发抖。第二天他命令警察总监制止这种所谓的“抗议”活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

福特总统极为重视这次谈判，下决心一定要搞出些名堂来，遂派了一个美国地理专家小组随基辛格来工作。这些专家在以色列军官陪同下踏勘了整个争执地区。他们在美国卫星的帮助下绘制出山口及附近地区的精确地图，



从而为谈判作好了周密准备。随后，基辛格拿着这份地图又在耶路撒冷和开罗之间奔忙起来。买卖双方都精明过人，他们通过基辛格以米为单位进行讨价还价，曾出现过为 100 米长的一段沙地激烈地争了 5 个小时的情况。这对三方来说都是一种耐心、恒心甚至体力的考验，谁坚持得住谁就能多得一些地盘。埃以双方都多次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让步”的话，但基辛格像没听见这句话似地撮合着，用开导、威胁和利诱的方法使它们的两条线一寸寸地靠拢起来。

看到基辛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拉宾内心深处不免几分歉意。作为一个前总参谋长他很清楚，根本没必要为几米、几十米或几公里的沙地争来争去，真打起仗来坦克越过这点距离不过是一脚油门的事。实际上争执的意义在于给国民看：你们看，我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可是在寸土必争呵！

1975 年 8 月 31 日，以埃第二个军队脱离接触的过渡性协议终于定案了。这个协议把西奈半岛两山口以西地区大致上分为三部分：沿苏伊士运河东岸一条较宽的地区埃军可以进驻；中间是更宽的一块缓冲区；山口以东细细的一条也归还给埃及。山口地段设有三个预警雷达站，以方的在西边，埃方的在东边，中间最大的雷达站由美国人管理。这个协议搞完后，拉宾又要求基辛格再与他签订一个美以保证协议。目的—是跟美国要钱作为对让步的酬谢，二是要求美国担保以色列的安全。于是双方又连夜讨论起这个附加协议来，会谈一直从深夜拖到次日凌晨 6 点。最后，桌子边上只剩下拉宾和基辛格两人了，周围传来一片助手们熟睡的鼾声。通过这个附加协议，拉宾又为以色列争得约 20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且美国答应提供包括最先进的 F—16 战斗机在内的各类先进武器。在政治方面，美国答应不压以色列与约旦也搞一个类似的协议，并保证不与巴解组织谈判。

9 月 1 日，以色列议会批准了这两个协议，拉宾感到自己像长途跋涉后卸下了重担那样的轻松。但不久，他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又被搅坏了。

1976 年元月拉宾率团访美，目的—是与美国探讨继续与阿拉伯国家和谈的可能性，二是要求美国供应更多更好的武器。在会谈中福特总统显得很高兴，因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以埃协议是在他的敦促下谈成的，这无异是给他的脸上贴了金。心里—高兴，福特就把供应武器的绿灯全打开了，大笔一挥就把价值 5 亿美元的武器慷慨地批给了以色列，其数额比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的还要高。

但拉宾还没来得及用香槟酒庆贺问题就来了。原来福特总统是按照佩雷斯拟定的清单批准的交易，而当时忙着会谈的他和拉宾都没细看那张清单上写了些什么。但审查这笔交易的美国议员没那么粗心。他们一看清单就来气了，原来以色列要求

美国提供世界上只有美、苏两家才拥有的最先进的监听设备，而单是这套设备就值 10 亿美元。议员们不客气，他们质问拉宾这是怎么回事，以色列的胃口为什么那么大，除了窃听阿拉伯人的机密外是不是对白宫的密谈也感兴趣。随后与这桩交易沾得上边的各种委员会都要求拉宾出席它们的听证会，他只好走马灯似地出席这些会议并尴尬地回答议员们的质询。他回到使馆后窝了一肚子的火爆发了，当着—大群以色列记者大发雷霆，用“轻率”和“考虑欠妥”等尖刻语言批评佩雷斯，指责他交给美国人—张“漫天要价”的武器清单，搞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此话—出就捅了漏子。如获至宝的各报记者忙用最快速度把他的话发回

以色列，并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他与佩雷斯的矛盾与摩擦，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佩雷斯在新闻界里有一批朋友，他们在评论中把拉宾描绘成一个爱耍威风 and 乱发脾气的人。他们打抱不平地问道：就算佩雷斯对美国人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又怎么样，他也是为以色列着想，你拉宾犯得着对他大发淫威吗？结果，等拉宾从美国回来后，发现佩雷斯的形象比自己更高大，简直是个为国为民“忍辱负重”的人，而自己争得的5亿美元武器根本没人感兴趣。想到自己出力不讨好，他气得发昏。

直到半年之后他这口窝囊气才算吐了出来。当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精心策划了一次劫机行动，把近百名以色列公民劫持到一个遥远地方充当人质。在营救这些人质的过程中，他漂亮地露了一手。

## 第十章 勇夺人质

六天战争之后，某些巴勒斯坦组织采用恐怖手段与以色列斗争，祸及到许多无辜的平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72年9月“黑九月”组织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劫持并杀死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梅厄夫人事后下令进行以牙还牙式的报复，“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消灭杀人成性的恐怖分子的战斗。”摩萨德等以色列五大情报机构闻声而动，与巴方恐怖组织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展开了殊死搏斗，一些恐怖分子相继在有关国家落网。但对方并未屈服。

1976年6月27日，一个震动全世界的劫持以色列人质的事件发生了。

### 遭劫持人质陷牢笼 晃虚枪定计大力神

那天是星期天，公历的星期天以色列人不休息，他们在星期六那天休息。上午，拉宾正在总理府主持内阁每周例会，突然一位助手匆匆走进会议室来到他的身边，神色紧张地递给他一份刚收到的报告。那份报告说：今晨零时许，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139次航班，在雅典重新起飞时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劫持。机上有以色列公民。听到这个消息，内阁部长们全惊呆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人们最关心的是：飞机上有多少以色列人，劫机者要把他们弄到什么地方去，会对他们怎么样。这一事件使内阁会议无法进行了，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被劫持的以色列公民身上。随后，摩萨德送来更详细的报告：那架法航的“空中客车”上共有230位乘客，其中有83名以色列公民；飞机越过地中海来到北非上空，要求在利比亚的班加西机场着陆加油，利比亚政府勉强同意了劫机者的要求；但劫机者的身份、要求和飞行终点现在还不清楚。

拉宾迅速组成了一个应急班子处理此事。除他以外，应急班子成员有副总理兼外长阿隆、国防部长佩雷斯、运输部长雅柯、司法部长扎多克和不管部长加利利。没列入这个班子的部长们陆续离去了。由于各方面情况还不太清楚，尤其是劫机分子的去向和要求还没透露，应急班子一时难以作出相应决定。

但大家一致同意向法国政府要人，因为事情出在该国的航班上，法国有责任保证人质的安全。随后应急班子也散会了，会议室里只剩下拉宾一人，他夹着香烟陷入了沉思。

凭直觉，他判定这次劫机行动是那位在黎巴嫩受过足够教育的瓦迪亚·哈达德博士策划的。哈达德博士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的首领，他的总部起先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来迁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跟乔治·哈巴什博士都是学医的，两人曾在约旦的安曼合开过诊所。哈达德不是单枪匹马与以色列周旋的夜行大侠，他与西德巴德尔—麦因霍夫集团、北爱尔兰共和军和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有密切联系，他们经费充足、人员强悍、手段狠毒。70年代以来这些组织对以色列发起了联合攻势，所有的行动计划都是深思熟虑后制定出来的，其精确程度不亚于哈达德当医生时的手术方案。拉宾为此下令对以色列易受袭击的目标，尤其是飞机和候机厅，采取“软贝雷帽”防范措施。伪装成乘客的保安人员，多次挫败恐怖分子劫持以色列航班的企图，他们都身怀出枪快和首发命中的绝技。

但在以色列的外国航空公司拒绝这样作。它们异口同声地说，要是也像航那样盘查乘客和不顾后果地动武的话，就没人坐它们的飞机了，这条赚钱的航线也就完了。以色列当局对此无可奈何，而恐怖组织则看到了可乘之机，这次劫机正是发生在查得最松的法航班机上。

恐怖组织的新策略是“以人质换同志”，即用劫持到的以色列人质换出它们被关押在各国监狱中的成员，以色列政府对此很头疼。因为它无法绝对防止以色列人被劫，而公众不允许对被扣人质安全置之不顾，实在没办法时它只好用恐怖分子换人质。以色列人很看重这点，就是死在国外埋在异乡的遗骸也必须弄回来，那怕是用被俘敌方间谍或将军换回以方阵亡士兵尸骨也罢。哈达德博士曾几次得手。1968年7月23日，他用劫持的一架从罗马至特拉维夫的班机换回20多名关在以色列的成员。摩萨德急了，1970年7月11日凌晨2点，向他的黎巴嫩住所发射了6发喀秋莎炮弹。但他奇迹般地大难不死。当这6发能炸平一个小山包的火箭弹爆炸时，他恰巧正在地下室里工作，一根毫毛都没伤着。事后他从贝鲁特迁到巴格达，并从此频繁更换睡觉地点，从不在一张床上过两夜。

拉宾历来对恐怖分子持强硬立场，坚决主张针锋相对地进行打击，而且力主击杀其首领。对于劫机事件，他力主用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与恐怖分子谈判只能导致越来越被动的后果。因此在国内一出劫机事件，他马上派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去“解决”问题。在国外出了这种事解决起来要麻烦得多，须区别对待：如果事情出在友好国家，以色列就会敦促对方仿效以色列进行武力解决；如果事情出在非友好国家，第一选择是派去突击队制服劫机者。在绝无可能动武的情况下，才考虑与劫机者进行谈判。

晚9时摩萨德又送来最新情报：那架飞机已从利比亚的班加西起飞，但去向不明。“它会飞到哪国去呢？”拉宾皱着眉头猛吸一口烟。去索马里吗？很可能，因为索马里当局是欢迎哈达德博士的，并允许他在该国设立训练基地。如果贸然武力强攻，摩加迪沙机场上定会发生一场血战，最后结局很可能是以色列突击队与机场守军同归于尽，尸横遍野，那架飞机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熊熊燃烧。拉宾痛苦地闭上眼睛，太阳穴怦怦地跳动起来。随后又传来消息：劫机者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上空要求降落，但遭到苏丹当局的坚决拒绝。拉宾一阵惊喜，看来事情还有转机，摆手叫内阁核心成员回家休息，但人们似乎没看见他的手势。以色列电台播音员不断播报的这架飞机最新动向，全体以色列人的心都揪紧了。

28日星期一凌晨4时许，摩萨德送来了确切的情报：飞机降落到乌干达首都坎培拉的恩德培国际机场上。听到这个消息后，拉宾心头立时产生了轻松感。因为乌干达独裁者阿明在以色列受过军事训练，而且跟达扬等高级军官的关系很熟，他总不会把以方的友情忘得一干二净吧。为了多交几个朋友，以色列五六十年代在第三世界没少下功夫，在黑非洲投入了大量的本钱和心血，帮他们发展农业和国防。就拿乌干达来说，它的各种军事装备都是以色列提供的，它的空军是以色列专家一手建立起来的。拉宾想，有这么深的关系，阿明肯定会伸出援助之手。但他错了，大错特错了，在某些国家中讲信义是个可笑之极的概念，有奶便是娘是人们唯一的行为准则。那位有着包括“博士”在内很长一串头衔的阿明元帅，早把以色列人免费培训的友情抛到了脑后，尤其是在搞到一些苏式装备之后。他后来宣布要全力支持劫机分子，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6月29日下午2点钟，拉宾从乌干达电台一则声明中了解到劫机者的要求。他们要求有关国家立即释放53名他们的“自由战士”来换取人质，最后期限是7月1日下午2点钟。这53个人分别关押在5个国家：以色列有40名，西德有6名，肯尼亚有5名，瑞士与法国各有1名。劫机者还提出，关押在以色列的40人要用法国客机送到恩德培机场来，其他人犯由所在国提供飞机送来。

拉宾当天下午5点半召集应急班子会议商讨对策。会前他让助手米兹拉奇通知佩雷斯把总参谋长莫塔·古尔找来。当时古尔正在前往西奈的途中，听到召唤后立即调转头返回耶路撒冷。古尔来到会议室后拉宾立即宣布开会。他直截了当地问古尔：“以色列国防军能不能通过军事行动救出人质？如果能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将考虑与劫机者进行谈判。”

古尔还没答话，佩雷斯插嘴说：“国防部还没考虑这个问题，我还没与总参谋长讨论这事……”他没再说下去，他看到拉宾正用冒火的眼睛瞪着自己，便挥挥手打住了话头。这事拉宾太性急，他一副要吵架的样子别人就不愿谈了，他并不了解佩雷斯已干了很多事。出事那天佩雷斯就跟古尔合计过营救方案，他们商定如果那架飞机返回以色列就让它降落，然后派突击队去制服劫机者；28日他又亲自在本—古里安机场部署突击队，后来听说飞机去了乌干达才把部队撤走；他还找到与阿明私交很深的巴鲁克·巴列夫，让后者打电话套近乎稳住阿明。佩雷斯还没考虑的是如何在乌干达动武的问题，见拉宾横眉立目就不谈了，而拉宾却认为他不关心人质死活。两人间的误解确实很深。见拉宾发火，古尔赶紧说明他已命令作战部长研究武力营救方案。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摸清阿明态度，如果阿明愿意协助这事就好办了。

由于法国已宣布它愿意释放那名在押犯，而且瑞士和西德也有意这样作，见佩雷斯拿不出方案，拉宾提议与劫机者谈判。但他话音刚落佩雷斯就表示反对。“不行！绝对不行！”佩雷斯有些激动地说，“我们没有拿杀人犯去换人质的先例，也没有这个习惯。”他接着说了许多激昂慷慨的话，对政府准备向恐怖分子屈服深表遗憾，因为那违反了犹太人誓死不屈的斗争传统。

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之际，拉宾的怒火一阵阵地往头顶上

冲。好不容易捱到佩雷斯讲完了，他霍地跳起身来呵斥：“当前的问题绝不是讲几句漂亮话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有好主意的话，就请讲出来！说说你的建议到底是什么？谁说我们没有用罪犯换人质的先例？以前我们的飞机曾被劫持到阿尔及利亚，我们最后是用在押犯换取了人质的获释。此外，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换回关押在叙利亚的以色列特工人员。这怎么是向敌人屈服呢？”

佩雷斯没正面回答他的质问，脸扭向一旁，仍强调用人质换罪犯方法不可取。这次会议弄得大不欢而散，拉宾催促古尔尽快拿出营救人质的方案。

但古尔直到7月1日早上还拿不出方案。拉宾望着这员猛将脑门子上的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不想责备古尔，因为劫机分子有乌干达军队配合力量强多了，要求总参用一天多的时间拿出万无一失的方案的确有些过份。另外他也不愿训斥古尔，他知道古尔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立逼他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是难为他。赎罪日战争后，立下大功的将领成了新闻记者及传记作家追逐的对象，攻占了耶路撒冷老城的古尔也不例外。著名传记作

家伊利·威斯尔抢先一步采访他，想从他那里搞点创作素材，却不料碰上了一把倒不出饺子的茶壶。

威斯尔满怀希望地问他：“你激动了吗？”他指的是当古尔率部冲到西墙前的心情。他满以为古尔会侃侃而谈的。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许多将军很热衷搞自我宣传，立点小功就能侃出两三本书来。

“你说呢？”古尔反问起他来，他根本不想谈。

“你哭了吗？”威斯尔不甘心地追问。

“没有。”

“为什么没哭？”

“不知道，我不喜欢流泪。”

“你当时有什么感受？”

“我认为这无法用语言表达。”

采访就以这种挤牙膏的方式进行着，威斯尔什么也问不出来。最后这位纳粹灭绝营的幸存者火了，“命令”古尔老实回答他的问题，说这是对犹太民族负责的表现。古尔憨厚地笑了，摸着后脑勺用悦耳的男低音说：“我不会告诉你的。我只能说，我当时感受到某种非常深沉的东西。”

其实古尔并没笨到想不出方案的地步，搞突击是他的老本行。他想出了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连佩雷斯都看不上，因而他不敢在拉宾面前提它。他的方案是个“越湖奇袭方案”，具体作法是：先派一支小型突击队飞抵肯尼亚，然后队员们乘快艇渡维多利亚湖直奔恩德培机场，随后是对机场的突袭，在悉数消灭劫机者后沿原路返回。“那么，那些人质怎么办呢？”佩雷斯问他。古尔说人质随后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接回来，劫机者一死阿明就不会纠缠了。佩雷斯听罢摇摇头，说阿明这个人靠不住，他不会容忍以色列人在他的老窝里杀人。这些情况拉宾并不了解。

到7月1日中午拉宾急了，因为下午2点就是劫机分子最后期限。人命关天，他担当不起，遂再次提议与劫机者谈判，但佩雷斯再次表示反对。于是拉宾要求内阁部长们投票表决这个问题。投票结果是全体部长一致同意用在押犯换回人质。佩雷斯也投了赞成票，他在投票前的休会时听说阿明打算放人后改变了主意。拉宾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强调军队要继续作好武力营救的准备。当把内阁决定传达给议会的外交和防务委员会时，贝京代表反对党表态支持政府的谈判决定。贝京说：“这不是联合政府与反对党之间展开辩论的问题，这是必须置于首位的全民族的问题。我们支持政府的决定，我们会使人们了解我们的态度。”拉宾闻言大受感动。当他把贝京的话告诉内阁部长时，佩雷斯脸上也现出惊讶神色，他没想到贝京会支持拉宾。

劫机的事出在法国飞机上，法国政府承担了力促人质安全获释的责任，法国外交部巡视员马克·伯纳夫奉命前去与阿明谈判。7月1日格林威治时间10时许，以色列大使馆通知法国外交部，以色列同意通过法国与劫机者谈判。这个消息传到坎培拉后，劫机分子欣喜若狂，他们为能把以色列逼得走投无路而感到自豪。最高兴的还是阿明本人，这位身穿漂亮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前非洲青年拳击冠军，深为自己领导的非洲“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欢欣鼓舞。在狂喜之中恐怖分子大发慈悲，决定在已放了48名乘客的基础上再释放101名非以色列人质，并把谈判的最后期限延长到7月4日下午2时。当拉宾得知恐怖分子又给了以色列72个小时后击掌叫好，叫古尔加速制定可行的武力营救方案。

但佩雷斯似乎仍没睡醒。7月1日中午他与古尔带来一个新建议，拉宾一听他们的主意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原来佩雷斯建议派达扬去乌干达跟阿明谈判，利用他们的老交情来争取人质获释。“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拉宾差点儿叫出声来。试想，把以色列最著名的将领送到一位以反复无常著称的暴君手中，听凭他捏瘪搓圆随意摆布，这不是馊主意是什么？尽人皆知，这位身躯肥大的乌干达独裁者是从不讲什么友情的，他是个专咬喂饭人的手的主儿。早在赎罪日战争前他就把该国的以色列顾问全部赶走，并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那场战争爆发后，他打电报给尼日利亚元首说：“我奉劝你下令驱逐以色列大使出境！”尼日利亚照办了，接着一大批非洲国家也跟着与以色列断了交。他甚至扬言要派300万“志愿军”去埃及打以色列。萨达特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生怕他把半个国家的饥民送到埃及找饭吃，赶忙谢绝了他的“好意”。更可怕的是这位元帅博士还是个虐待狂，他的嗜好是把人扔到鳄鱼当中，欣赏人被撕成碎片前的惨叫。在此次劫机事件前不久，他找了个借口把一名英国人关进了大牢，他的监狱是以滥施酷刑而闻名于世的。英国政府赶紧派去一位以前与他交往甚密的将军进行调解，但这无异是在兔子之后又把一只山羊送进虎口，那位可怜的将军在他手中饱受了一通凌辱和虐待。现在佩雷斯要把达扬这样的人物送到他的魔爪中，还不定要出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拉宾铁青着脸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拉宾满脸乌云，暴躁起来。在他大声催促下，以色列各种应变机构开足马力运转，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凝聚起来。摩萨德通过西方情报机构最后搞清楚，这次劫机行动是欧洲恐怖组织大头目卡洛斯与哈达德博士共同策划的。他们目的之一是要证明自己说话算数，凡是被捕的成员都会被营救出来，而且要逼着以色列人乖乖地把他们送回来。这对鼓励下属卖命效劳起着重要作用。这次他们提出的释放名单中就有日本人冈本公三，他是1972年5月在特拉维夫机场一口气杀死杀伤100多名旅客的三人敢死队唯一幸存者，日本赤军组织已多次向哈达德博士要这个人。但恐怖分子放了149名人质犯了个大错误，西方情报专家们从他们嘴里了解到不少情况。一些获释人质还自愿接受摩萨德推荐的“朦胧询问法”，在被催眠入睡前的朦胧状态中回答提问，据说人在这种状态下的回答是最清晰准确的。所有汇集来的信息迅速输入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个恐怖分子的相貌。更难得的是，一位被释人质趁乱在机场偷拍了几张照片，它使摩萨德更清楚对手的情况了。

7月2日早上10点钟古尔匆匆来到总理府，交给拉宾一份代号为“大力神计划”的武力营救方案。拉宾迅速浏览了一下内容便拍板定案，吩咐古尔立即照这个方案进行准备。这个方案的核心，是派一支突击队乘大力神式运输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随后对关押人质的候机大楼发起突袭，救出人质后突击队与人质共乘飞机撤离乌干达。这个方案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存在不少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岔子整个计划就会以惨败而告终。可能出岔子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飞机中途加油问题，二是对手防范的周密程度。从以色列到恩德培机场的最短距离为4000公里，一个来回8000公里，穿越非洲腹地时可能遭到炮火射击的危险暂且不计，更现实的问题是飞机在往返途中必须加一次油，而这个油到哪儿去加呢？赎罪日战争后整个黑非洲都是反以的，因为沙龙率领的突击兵团曾打进埃及，激怒了许多非洲国家。第二个问题更棘手，即如何保证突击队能出其不意地抵达恩德培机场，如何防止他们落入

对手精心设计的伏击圈，如何使得恐怖分子来不及屠杀人质？坦率地说，任何人对第二点都不敢打保票。

拉宾重新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他知道考验自己的时刻又到了。六天战争前他也这样焦虑过，因为那时他不是个旅长而是总参谋长，得对整个战争的胜败负责。现在同样如此，他现在不是总参谋长而是总理，各种方案拿来后最后拍板定案的是他，出了岔子他得负全部责任。他明白这又是一场赌博式冒险。他不想赌博，但不赌不行，没有现成的条件。成功了皆大欢喜，失败了恐怕自己的总理宝座难保，因为他搞的是奇袭而内阁定的是谈判。而且计划再周密也难免出问题，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事。他不由想起 1972 年 9 月 5 日发生在慕尼黑的那场惨案。在恐怖分子扣押了 11 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后，以色列与西德共同制定了周密的武力营救计划。但这个“周密计划”，仅仅由于德国神枪手第一枪没击中目标而彻底破产，11 名运动员全倒在血泊中，据说问题出在那杆老掉了牙的枪上。谁能保证这次行动不出这种岔子呢？万一 100 多名以色列人又死在恐怖分子的枪口下，他怎么跟国人交待呢？

一截长长的烟灰悄然地落在桌面上，他惊醒过来，用抹布把桌面擦干净。不能犹豫不决了，不能再让魏茨曼和佩雷斯把自己看成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了。他轻轻用拳头擂了一下桌面，干！要让恐怖分子领教一下他的铁拳！

### 恩德培机场霹雳鸣 突击队神勇笑阿明

古尔从以军 6 个师中挑选出 180 名最精悍的官兵组成了突击队。他们的行动总指挥是伞兵司令丹·肖姆隆将军，他有权在行动中作随机应变的决定。突击队指挥官是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中校（以色列现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兄长），他是以军中公认最优秀的军官，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跟弟弟一起在美国长大，后迁居以色列，昵称“约尼”。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希伯来大学受过教育，先学哲学后攻数学，后来任以色列一支突击队的少校指挥官。1968 年以色列客机第一次被劫时他在美国，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他写信给家人：“这种行径促使我想尽快回到以色列。既然法塔赫的人找上门来挑衅，他将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战士我比他们之中任何人都强，而且我的民族意识要比他们更强烈。假如他们希望战争，我唯一的选择就是为生存而战。”1973 年 4 月以军准备突袭贝鲁特的巴解总部，他坚决要求参加这一行动，并强行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加入了突击队。战斗中他的勇敢和镇静使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激战中他镇定而又仔细地搜集巴方机密文件，高等教育使他懂得这才是最值钱的东西。他搜集到的几大箱文件价值连城，巴方人员名单、情报网、行动计划和在巴解中受训的外国组织状况，全部落到他的手中。撤退时，他又跳下车来一个人对着追兵猛扫，掩护众人安全撤离。

肖姆隆把这支最精锐的部队带到沙姆沙伊赫一个空军基地，全体人员一下车就投入到紧张的模拟突击演习。肖姆隆站在吉普车上皱着眉头看着秒表，嘴里不停地喊道：“快，再快些，不行，重来！”他是用秒来计算每个步骤完成时间的。摩萨德的特工不厌其烦地让突击队员们记住恐怖分子相貌和守卫位置，他们还用粉笔标出了从机场跑道到候机大楼突击点的最短距



离。他们的同事及时从乌干达发回了更详细的情报和照片，伪装成机场清洁工的摩萨德特工用隐藏在拖把中的相机把所有的建筑物照了个遍。据侦察，扣押人质的地点是恩德培机场旧候机楼的顶层，第二层是乌干达士兵，6男1女7名恐怖分子分散在顶层、二楼及底层候机厅中。

突击队7月2日夜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古尔观看了演习后7月3日晨向拉宾报告：“看了演习后我建议内阁批准这次行动，并命令突击队在沙姆沙伊赫待命，现在最后的问题是获得内阁的批准”。

7月3日下午2点半拉宾召开内阁会议。最先到达的是宗教部氏，他是从家里徒步走来的，因为当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不能坐汽车便提前出发步行着来了。会议一开始拉宾就作了一个特别说明。他告诉部长们，由于从沙姆沙伊赫飞到恩德培需要7小时，为不打乱已精确到分秒的行动时间表，他已下令搭乘突击队的飞机起飞了。如果大家同意突袭计划，就让飞机继续往前飞；如果内阁否定这个计划，他可以立即让飞机折头返回基地。部长们个个神色紧张，欲言又止，但没人反对这个决定。接着，拉宾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要选择武力解决的原因。这是因为恐怖分子已提高了他们的要价，诛求无已，而且连阿明本人也加入到要价者的行列，释放人质的条件远远不是送交53名在押的恐怖分子了。应急班子和欧洲情报部门首脑一致认为，即使谈判也很难成功。因此，他决意动武，有必要让国际恐怖组织领教一下以色列政府反恐怖斗争的决心和铁拳。

“我知道这次营救人质行动难免会有伤亡，无论是人质还是营救者都可能会伤亡。我现在很难预料这个伤亡有多大，但即使我们牺牲了15人到20个人，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次行动对恐怖主义的沉重打击。只要有武力解决的可能，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哪怕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也绝不把机会留给恐怖分子！”

阿隆插话说：“正因为这个计划看起来毫无成功的可能，因此它才是完全可行的。”

“说得对！”拉宾赞许道。他进一步解释说，恐怖分子认为他们在两点上使以色列束手无策：第一点是世界上还没有不加油就能飞行8000公里的飞机，而且在非洲大陆找不到同意为以色列飞机加油的国家；第二点是他们不相信以色列敢于冒险去武力营救，因为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人很害怕再遭到人员伤亡。“但正是这两点使我确信我们会取得成功！”拉宾自信地挥了一下手。他告诉部长们，肯尼亚政府已同意为这次行动提供必要的协助，以色列的飞机在返程途中将在内罗毕机场上加油。此外，总参和肖姆隆将军的特遣突击队已为整个行动作了周密的准备，官兵们信心十足，志在必得。“我要让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明白这一点，只要他们敢于伸出肮脏的手损害以色列的利益，即使他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上去打断他们的骨头！”

要问为什么拉宾后来能下那么大的决心，关键是他原先担忧的飞机中途加油问题解决了，肯尼亚总统莫伊助了一臂之力。但这事得归功于佩雷斯，他跟莫伊有不同寻常的交情。早在20年前的1957年，佩雷斯把肯雅塔总统的亲密助手、当时正在以色列军事学院受训的莫伊，带到了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家中。三人一番商议，达成了个“君子协议”：以色列负责训练正与英国人斗争的肯尼亚民族武装；西德负责向这支武装供应武器弹药；肯尼亚日后对以、德两国的友好支持给予某种回报。尽管这只是个口头协议，但以、德两国都严格履行了，现在肯尼亚也进行了相应的回报。另一个原因是半年

前以色列帮肯尼亚破了案。当时肯尼亚警方在机场跑道尽头抓了3名恐怖分子，他们肩扛苏制萨姆7型导弹，正准备向即将到来的以航班机开火。情报是以色列摩萨德提供的。

尽管时间紧迫，已没时间过多讨论了，还是有位部长决定出来捍卫以色列的民主传统。他颇为不满地对拉宾说：“我不反对武力营救计划。但我要提醒您，总理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先让飞机起飞，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您这不是先斩后奏吗？”于是拉宾只有耐心地向他解释，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了，前几届政府有过多次因内阁不同意而把派出的部队召回来的事。这一次主要是时间问题，营救行动定在7月3日夜间进行，如果等内阁讨论个半天一天后再让飞机起飞，飞机就可能在7月4日早晨或中午才到恩德培机场，那样事情就全砸了。最后，部长们在听取了总参谋长古尔的详尽介绍后，一致同意了“大力神计划”。

霹雳行动拉开了序幕。

拉宾下令对这次行动严加保密，新闻官没发布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的消息。但此事瞒得过苏联人瞒不过美国人。驻美国的摩萨德特工报告说，一些能够接触机密的美国人，已在议论停在利达机场的一架大力神运输机被喷上伪装色的消息了。但还好，美国人只是好奇没有多嘴，华盛顿没有刨根寻底地询问耶路撒冷的用意。

3日晚4架喷上伪装色的C-130大力神式运输机在云层上空飞行，驾驶员切断了无线电通讯，就是被打下来也不准呼救。1号机搭乘的是突击队的主力，任务是突袭候机楼营救人质，由肖姆隆和内塔尼亚胡指挥；二号机的任务是火力压制，阻止乌干达军队靠近候机楼；三号机的任务是破袭行动，炸毁机场上的乌干达战机；4号机里装上了储油罐，负责给其它三架飞机加油。在它们前面有两架波音707客机，它们将降落到内罗毕机场待命。一架是这次行动的指挥部，里面的空军司令佩莱德负责总体指挥和通讯工作；另一架是个空中医院，里面的33名医护人员准备抢救伤员。

当晚，拉宾与阿隆与以色列驻法大使打了长途电话，指示大使努力与有关方面进行谈判，要不惜任何代价确保人质安全获释，即使多出一些赎金也不要紧。这次国际长途打的时间很长，以色列大使很奇怪为什么总理和副总理轮番对着话筒高喊，而且有些话反复讲了两三遍，好像他们认为自己的耳朵有毛病似的。他没看到的是，拉宾与阿隆打完电话后相视一笑，他们知道这次谈话已被卡洛斯的人窃听，恩德培的恐怖分子马上能得到以色列已彻底屈服的信息。

第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分秒不差地飞抵恩德培机场上空，到达时间设计在两次正常的航班降落之间。驾驶员用纯正的曼彻斯特口音回答了机场指挥塔的询问，他声称自己的飞机出了点儿小故障，需要降落检修一下。机场调度同意降落，他的话音中没有流露出惊奇和怀疑。大力神在主跑道上滑行着，减速，后舱门打开，母鸡下蛋似地从飞机肚子里滑出了一支车队。打头的是一辆英式“兰德·罗维尔”吉普车，车上是几个荷枪实弹的“黑人”彪形大汉，个个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吉普车后面是一辆豪华型黑色奔驰轿车，里面坐着乌干达人望而生畏的元首“阿明”。车队在机场上绕了半个圈子向旧候机楼驶来，守卫大楼的乌干达士兵看清是“元首”后忙把枪放下来，立正敬礼。但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便在“扑扑扑”一阵短促的响声中倒下了。脸上涂着黑油彩、手持带消音器冲锋枪的“卫士”们，迅速抢占好位

置，另分出七八个人簇拥着“阿明”向大厅走去。这时第二架大力神飞机已在跑道上滑行了，它兼有控制新候机楼及必要时另开辟一条退路的任务。这时驾驶员们听到的已是以色列式的英语了，摩萨德特工们已控制了机场指挥系统。11时03分，特拉维夫听到肖姆隆将军“第一架飞机已安全着陆”的简短报告，指挥所里鸦雀无声，拉宾不停地抽着烟。

旧候机大厅里的战斗十分顺利，45秒钟之内大厅里的4名恐怖分子全被撂倒了。二楼的战斗也没用多长时间，不少阿明士兵已醉得失去了战斗力，他们听说以色列人认输后猛灌了一顿。但扣押人质的三楼出了问题，一名察觉了动静的恐怖分子抢先开了火，蜂拥而入的突击队只有采取强攻了。突击队员们一边投出震荡手榴弹，一边用希伯来语高叫“卧倒！”明白过来的以色列人质立即伏倒在地，莫名其妙的恐怖分子则成了靶子。但终有一名恐怖分子从晕眩状态中恢复过来，他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咬着牙向冲上来的突击队员及身边的人质扫了一梭子……

第一架飞机着陆30分钟后重新起飞。机上载着被救出的人质、法国机组人员和战斗中死伤的人员。从第一架飞机降落到最后一架起飞，一共用了42分钟。四架大力神运输机依次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机场上加了油，几个重伤员被送到肯尼亚医院抢救。以方死了4人，3人是人质，还有一人是突击队指挥官内塔尼亚胡中校，他在混战中被一颗流弹击中。军士赫尔施背上中一枪，最后成了个偏瘫的残疾人。另外，人质中的多拉·布劳契也死了，但不是在机场上。战斗时他正因病住院，事后恼羞成怒的阿明叫人把他拖到花园里乱枪击毙。

阿明差一点儿气疯了，他真想用机枪把手下的饭桶全给嘟嘟了，他是4日凌晨才从国外广播中知道这回事的。什么叫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这件事情就是范例，以色列人天方夜谭式地楞把人质抢走了，打死了45名乌于达士兵，还把他仅有的几架米格飞机给炸光了。一直跟他联络的巴列夫，夜里1点打电话感谢他的“合作”时，他还高兴地一再叮嘱对方快把解决方案报来。现在可好，鸡飞蛋打，连老本都贴了进去。

当满载着胜利的大力神机群临近以色列之际，被激动的播音员鼓动起来的以色列人高兴地发了狂。全国各地响彻了犹太教士拉比在节日时才吹奏的羊角号，各种满载人群的车辆向本-古里安机场疾驶而去，人们要在那里热烈欢迎获释的人质及凯旋的突击队员。这时拉宾带着他的应急班子和总参首脑仁立在沙姆沙伊赫空军基地跑道旁，他要亲自向以色列的勇士们表示衷心谢意。几架护航的以色列鬼怪式呼啸着掠过机场上空，在滚雷般的马达声中4个小黑点出现在天际，拉宾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一层激动的泪水。

他掏出手绢拭去了眼角的泪花，他为自己如此激动而感到惊奇。在赶往沙姆沙伊赫机场的路途上，他看到人们像他一样含着热泪在大街上载歌载舞，一位满脸白胡子、头顶镶有银丝白纱巾的老拉比鼓着腮帮子使劲吹着装有簧片的羊角号。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欢乐，欣喜之中夹杂着骄傲，而这种万民欢庆的场面以色列已有9年没出现过了。自从赎罪日战争之后这个国家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地无精打采，人们久久不能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他们不再相信强大的以色列国防军和神秘的摩萨德可以保护自己，政客和将领之间的相互指责加重了他们心头的阴霾。现在，政府用铁拳回击了恐怖主义的恐吓，以军官兵重新抬起头来，奇迹般的胜利一扫人们的疑虑，这是一个良好的新开端！拉宾认为自己领导的这场斗争胜利的意义格外

重要，他向以色列这个丧失斗志的肌体注射了一针催人奋进的肾上腺素。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那些被营救出的人质还没回到家中。内阁中的窝里斗便掀开了新篇章，一支冷箭嗖嗖作响地向他的后心射来。《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特兰斯·史密斯打电话采访总理办公厅主任阿斯·艾兰，“你对国防部发言人纳夫塔里·拉维的评论有何评论？”艾兰感到莫名其妙，忙问拉维说了些什么。史密斯见他还蒙在鼓里便卖了个关子，“你看看今天的报纸就知道了。”说罢挂了电话。艾兰忙问手下人是怎么回事，知情者告诉他，拉维刚对新闻界发表了对营救行动的看法，谈话中有许多对拉宾总理颇为不恭的言词。拉维在记者招待会上断然否认拉宾领导了这场斗争，他极力强调是佩雷斯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拉维声称拉宾自始至终反对采取军事行动，坚持武力营救的人是佩雷斯，最后是佩雷斯迫使拉宾同意了长途奔袭方案。在他那绘声绘色的描述中，佩雷斯是个为人质安全忍辱负重的君子。而拉宾不过是个贪天之功为已有的小人。

拉宾闻讯很生气，他认为佩雷斯这样争功邀宠也太蠢了。

别的不说，只要他让人们了解佩雷斯曾提议叫达扬去乌干达与暴君阿明谈判一事，佩雷斯马上就会原形毕露。但拉宾没作到那一步，他不想让正沉浸在欢乐中的以色列公众太扫兴。但话说回来，佩雷斯在这件事上确实表现得很突出，部长们都记得他面红耳赤地坚持武力营救。当然，由于他不是总理，在全局问题上他不像拉宾那样考虑得周密。拉宾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况，委婉地提到自己的犹豫不决。他说：“6月27日至28日晚空中客车刚被劫到恩德培，我们就曾考虑组织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在对方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我们来不及这样做。”以色列诗人哈依姆·占里认为拉宾是个“最不像士兵的士兵”这话要看怎么说了。要说考虑周全一些就是优柔寡断，那么这顶帽子可以戴到拉宾头上。但拉宾的犹豫主要出于对伤亡过大的担忧，牺牲一个士兵对他来说就像死了儿子一样难受。

但他疏忽了。他仅把拉维的评论看作是政坛恶习的表现，没发现平静的水面下已经出现了湍急的暗流。他甚至没有多想想，为什么拉维这种中级官员敢于放肆地攻击总理，嚣张得像是不怕砸掉自己的饭碗似的。他只看到站在拉维身后的是佩雷斯，却没看清站在佩雷斯身后的是些什么人。这一疏忽使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76年是阿以和谈没有任何进展的一年。黎巴嫩内战打到当年秋季才告一段落，叙利亚趁机把腿伸进了那个国家，遭到夹击的巴解组织把主力撤到黎巴嫩南部地区。此况下阿以双方都没有心思谈和解问题。在美国，前乔治亚州州长、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选为新总统，但他得等到1977年初才能入主白宫，在那之前他仅仅是只无所作为的“跛脚鸭”。趁这个时机，拉宾大大充实了以色列的武库。

到1977年初他满意地看到，在他领导下以军的实力增强了一倍。飞机的数量增加了30%，坦克的数量增加了50%，自行火炮增加了100%以上，而装甲运兵车的数量增加了700%。但与此同时，以色列的经济形势却严重恶化了。政府预算赤字直线上升，通货膨胀率已上升到两位数，物价飞涨引起了公众强烈的不满。就在拉宾还沉浸在他与埃及达成了第二个脱离接触的协议以及救出人质的喜悦中时，各种倒阁力量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借机发难了。可怜的是，大难临头前他全然不晓，还沾沾自喜悠然自得。殊不知几架飞机

的到来就引发了一场风暴，使得形势急转直下。

## 第十一章 含辱下野

1976年12月一个星期五的黄昏，拉宾带着几位部长位立在一个空军基地的跑道旁。没多久空中传来震耳的轰鸣声，一个中队的F-15型战斗轰炸机排着整齐的队形掠过机场上空，接着来了一个陡直爬升和空中开花，然后这种双垂直尾舵的世界最先进的战机鱼贯着陆了。军乐队高奏欢迎曲，拉宾率领部长们向列队的飞行员走去，与他们一一握手。这是他从美国搞到的第一批F-15。这种飞机美国人连号称“石油龙头”的沙特阿拉伯都不肯给，却优先卖给了以色列，以色列军政首脑以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表示感激之情。

### 安息日犯禁遭弹劾 投票表决拉宾翻船

以前，当第一批空中之鹰和鬼怪式运抵以色列时，政府也搞过同样的欢迎式。这一次仪式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结束时太阳已经下山，拉宾等人天黑后驱车回家。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天已经黑了这一点，给他们造成了灭顶之灾。

第二天是星期六，也是犹太教徒的礼拜日——“安息日”。在中东三大宗教中，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礼拜日分别定在周末的三天：基督教的礼拜日是公历的星期日，以前不少人称之为“礼拜天”；穆斯林的礼拜日是星期五，又称“主麻”；犹太教徒的礼拜日是星期六。犹太教先知摩西训戒信徒说：“六天要工作，第七天是安息日，当有圣会。”但确切地讲，安息日并不是从星期六深夜零时开始，而是从星期五傍晚日落时算起，直到星期六晚天空出现第一颗星星为止。

犹太教法规定，人们在安息日不得进行非宗教活动及以车代步。以色列几乎所有的店铺和市场都在星期五午后不久关闭，除了少数多人共乘的出租车外连公共汽车也停止运营。但全国各地对这一规定执行的情况不同。在宗教势力不强的海法——特拉维夫地区，平时喧闹的景像消失了，大街小巷显得很安静，人们见面互致“安息日好”的问候。但公共汽车照常不误，也没谁对此大惊小怪；在宗教势力较强地区，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晨犹太教堂里挤满了作礼拜的信徒；在宗教势力特强地区，如耶路撒冷老城的米希姆里区，虔诚的教徒举行隆重的礼拜活动。他们穿着黑色的或灰白色的束腰长袍，头戴宽边的黑天鹅绒帽或白色小圆帽，跟随几十位拉比在社区狭窄的街道上呼号行进，其赞颂上帝声音在曲折的小巷里久久回荡为防止有人违反教规驾车行驶，米希姆里区的一些宗教狂干脆用铁链子把大街小巷锁起来，一群群好斗的信徒攥着石头聚集在路旁，见到过往的汽车就用石头猛砸。

建国初期情况没这么严重，至多是大家遵守安息日的规矩：不能生火也不能灭火；与火有关的电器、汽车甚至打火机都不能使用；想用电灯得从星期五下午一直开着。当然大多数人也遵守犹太人的基本习俗：不吃猪肉和带壳的虾、贝、蟹；牛奶不能与肉混着吃；刀叉要分开用和分开洗；等等。当时掌权的是宗教观念淡漠的工党领导人，他们虽把安息日定为国家公休日，却不允许拉比对公众进行宗教强制，但由于以色列实行的是纯比例选举制，工党始终不能实现一党统治，总要联合些小党组成内阁。愿意合作的往往是宗教党派，因此内阁中总有些宗教领袖。时间一长神权就开始敲榨政权了，

它往往以政治合作来换取宗教特权，于是宗教干预政治的状况日趋严重起来。有一年政府为节省开支准备实行夏时制，这激怒了宗教势力。它们声称这会破坏安息日的规矩，时间变更会导致太阳落后公共汽车仍在行驶。一位大拉比甚至振振有词地宣称：“在能源上节省几百万或几十亿谢克尔怎么能与我们灵魂上的巨大损害相比？”他们一闹，政府吓得退缩了，准备放弃夏时制。后来还是一位气不过的工程师把这事闹到最高法院，才“迫使”政府实行了夏时制。

在闹与不闹的问题上宗教势力很会审时度势。如果闹起来会激起民愤他们便不闹。比如拉宾要求内阁决定是否采取武力营救人质行动那天便是个安息日，按理说那天不能办公，但考虑到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盯着内阁的决断，宗教部长便早早地步行赶来了。如果断定能闹出名堂来，他们就会大闹特闹。在妇女堕胎和“谁是犹太人”等问题上他们都闹出了“辉煌”战果。现在他们认为机会又来了。

F-15 战机飞抵以色列的时间是美国人定的，他们要尽量方便自己的飞行员，由于两国有个时差问题并且飞机要在中途加油，到达以色列时天色已晚。再加上总参坚持搞个欢迎仪式，太阳便落山了，这就捅下了大漏子。议会中的极端宗教派“以色列正教党”，以这个欢迎仪式是拉宾政府故意违反安息日的教规为由，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拉宾在议会里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但他发现为政府辩护的人不多，议长最后决定就这一不信任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投票前，拉宾自信他的联合政府会挫败这个不信任案，因为工党联盟及内阁的小党有超过半数一票的优势。但他万万没想到，投票时内阁中两名宗教党的部长无视组阁协议投了弃权票。这样一来，支持政府的票就少了两票，而反对政府的票也就正好多出一票。于是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色列正教党的不信任案以超过半数的票通过了！当唱票结束后，议会出现了一两秒钟可怕的沉寂，接着反对党议员们跳起来欢呼伟大胜利，整个议院犹如开了锅似地沸腾起来。

被这意想不到的结果搞得目瞪口呆的拉宾涨红着脸坐在座位上。镁光灯冲他嚓嚓地闪个不停，伸到他鼻子底下的话筒足有十多个，记者们纷纷请求他谈谈此时此刻的感想。哈，这可真算得上是个特大新闻了！拉宾的脑袋里乱成一锅粥。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它确实是真的，自己下台了，就像闹着玩似地破人赶下台了！现在除了命令两个倒戈部长立即滚蛋以及向总统递辞呈外，自己一点辙儿都没有。他突然有种被人从高塔上推下来的感觉，尽管双手乱抓却什么也抓不到，地面向着自己冲来。他足有一分钟说不出话来，光见记者们七嘴八舌地似乎在说什么，但脑袋里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完蛋了吗？不！”他攸地站起来，厉声宣布立即解散议会在次年5月举行大选。此言一出议会里顿时乱作一团。刚刚还在欢呼胜利的反对党议员，立即擂着桌子咆哮起来，大骂他利用职权搞阴谋诡计，妄图用提前半年大选重新夺回政权。于是，新闻记者们又扑向那些气歪了脸的反对派议员，拉宾趁机离开了乱哄哄的议会大厦。从理论上讲，他现在已不是内阁总理了，仅仅是个看守政府的首脑。但他对重新上台充满信心，他认为这次下台完全是场对手侥幸得逞的闹剧，广大选民会给他一个公正评价的。因为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使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并向和平迈出了重要一步。

就在他组织力量准备重新上台之际，1977年初接到了美国新总统卡特发

出的访美邀请。手下人劝他谢绝这一邀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出国访问？要紧的是设法赢得大选。但他考虑不能扫卡特的面子，与民主党新政府搞好关系很重要，遂接受了这个邀请。拉宾知道卡特不像尼克松那样亲以，还听说卡特说过“我上台后马上辞退K博士”的话。卡特说的K博士指的是基辛格，他认为基辛格太亲以，损害了美国在中东的形象。说来很有意思，美国的总统们全对中东事物感兴趣，都认定能从这块海绵中挤出些水来，卡特也想在中东和谈上取得成就。因此他一上台就仿效前任大搞中东外交，这是往脸上贴金的一条捷径。拉宾准备满足他这一愿望，但他心里实在没底，就任大使时他有民主党要比共和党难处的印象。

果然，会谈一开始他就证实了自己的印象。除了那些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承担义务的话外、拉宾觉得卡特其它的话很刺耳。尼克松和福特后来已不提重开日内瓦会议的事了，但卡特在会谈中一再提出要重开此会。不仅如此，卡特还一再提出要邀请巴勒斯坦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听到这些话拉宾的怒火一阵阵上升，他不明白卡特是真傻还是装傻，因为有点儿经验的美国政治家都知道以色列拒绝与巴勒斯坦人会谈，但卡特偏要提出这个问题。轮到他发言时，他提醒卡特，所谓“和平”指的是终止以阿交战状态及进行正常往来。但卡特似乎没察觉到他的不快，进而直截了当地提出以色列是否愿意分阶段全面解决中东的问题。

拉宾听罢一惊，感到卡特是受了“布鲁金斯报告”的影响。他访美前夕，美国最有影响的外交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提出一个报告，认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撤到1967年6月4日的停火线。他本来不想得罪卡特，甚至抱有影响他的幻想，但见卡特步步进逼，遂认为有必要摆摆以色列的观点了。他告诉卡特，以色列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对边界及被占领土有不同立场，但也有共同的态度。不同点是：工党联盟愿意与约旦政府共同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约旦政府管理那里的民政事务，以色列负责它的安全和外交；利库德集团则根本拒绝以任何形式从西岸地区撤出，哪怕是一寸土地也不放弃。共同点是：工党联盟与利库德集团都反对与自称为巴勒斯坦人代表的巴解组织会谈，并且坚决反对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卡特没有退让。他提出：“但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美国联邦制的约旦—巴勒斯坦联邦。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非军事化的西岸地区享有半自治的地位。我并不是叫你们现在就这么办，我只是探讨有没有这样做的可能。”

拉宾立即封住他的嘴，“我们坚决反对在以色列与约旦之间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巴勒斯坦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要说的是我们绝不允许以约之间出现第三个国家。”

“你反对一个包括巴勒斯坦代表团在内的阿拉伯联合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吗？”

“我们不反对巴勒斯坦人参加约旦代表团，但我们只会与各主权国家进行谈判。只要我们能与毗邻的主权国家分别会谈，它们如何协商自己在会谈中的立场是它们自己的事。”

国务卿万斯插嘴问：“如果阿拉伯人坚持以一个统一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呢？”

“我们将坚决反对这种企图！”拉宾一口回绝。



拉宾与万斯共进午餐时，了解到卡特政府确实已接受了布鲁金斯报告的观点。掌握了这一动态后他决定不再客气，只要有人再压他与巴解组织谈判，他一定予以坚决反击，不管这个人是谁。

当晚卡特以工作晚餐的形式继续与拉宾会谈，出席晚餐会的约有 60 位美国最显要的政界人士。在卡特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双方进入了实质性讨论。以“炮筒子”闻名的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率先开了第一炮，他以尖锐的指责腔调质问拉宾：“我不明白你们究竟为什么不能同巴解组织谈判？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求你们像我们那样处理问题。我们不仅与北越人谈判，而且也与南越的越共谈判，我们跟他们没有外交关系。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你们就不可以呢？再说，法国可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并达成协议，英国可以同包括你们在内的全世界各种抵抗运动谈判，为什么偏偏你们不可以同巴解组织谈判呢？”

早有准备的拉宾立即一炮打了回去：“难道越共拒绝承认美国的存在并主张消灭美国了吗？难道越共打算通过谈判把美国变为一个越南人的国家了吗？难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提出消灭法国了吗？难道以色列地下抵抗运动与世界上其它抵抗运动打算消除英国的存在了吗？请问与巴解组织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是想消灭以色列并以一个巴勒斯坦国取而代之！”他说着激动地喘起粗气来，双手按在桌面上面红耳赤地逼视对方。

但卡特请来的人不是吃干饭的，拉宾刚说完对方就开始排炮齐射了，工作晚餐立刻变为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最后，卡特见手下人的炮弹放得差不多便出来打圆场，他笑容可掬地请以色列贵宾回去休息，把拉宾留下来单独谈。他以为这样一来拉宾就会让步，但余怒未消的拉宾拒绝作任何让步。见状，卡特不无用意地谈起自己的外交风格来。他强调美国人有民主的传统，他今后要搞公开外交，要把政府的打算向公众交待清楚，绝不搞尼克松—基辛格式的秘密外交。拉宾对他这一表白很反感，他认为这样做只会和谈前就给以色列造成压力，削弱以方的谈判地位。

在第三次会谈中卡特把话挑明了。他说：“关于巴解组织问题，昨晚奥尼尔议长的话表达了我们多数人的看法。我们毫无保留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必须看到在类似问题上世界许多国家已开创了与敌对组织谈判的先例。我看不到有证据表明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可以代替巴解组织。我们或许能找到某种妥善方式，使巴解领导人加入到某个阿拉伯代表团中。我希望你们在大选后能接受这一建议。”他接着警告说，如果巴解组织确实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以色列仍拒绝与它谈判的话，他很难抑制部分美国公众的激烈反应。

拉宾在这个问题上拒绝作出让步，而且态度越来越强硬。这是他对美国的国是访问中态度最强硬的一次，用句报上的外交辞令来说，双方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最后他与卡特达成谅解：由美国去张罗重开日内瓦会议的事，但在与以色列协商前美国不得用对某问题的公开表态来压以色列作出让步。在接下来提供援助问题上卡特还算慷慨。他答应了以色列在本国制造 F—16 型战斗机的要求，并许诺进一步提供经济援助等优惠待遇。

在几次会谈中，拉宾感到卡特政府在外交上与尼克松—福特政府的风格截然不同。共和党政府办事比较细腻。在方案没出台前，尼克松和福特总是先派得力助手基辛格等人作好大量准备工作，而总统是等一切都谈妥后才出场拍板。这样各方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也都能保住面子，事情容易产生结

果。而卡特政府不同。它没有基辛格那样的一流外交家不说，更糟糕的是它有位急于露脸的总统。这位总统习惯过早地表明美国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并且常常把秘密会谈的内容捅给新闻界，这使以色列感到很不舒服。

就像是要证实这一印象似的，他还没启程回国卡特就给了他一个难堪。离美前夕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学接受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他这一学位的是前副国务卿西斯科，他离开国务院后到这所大学当了校长。拉宾正与许多前来祝贺的美国朋友寒暄，手下人告诉他卡特已就中东和谈问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果然，卡特在记者面前公开表明美国政府赞同布鲁金斯报告的观点，明确提出以色列应当撤到 1967 年 6 月 4 日停火线上。这话尼克松和福特从不敢明说，他却毫无顾忌地倒了出来，把拉宾达成的谅解彻底地抛到脑后。这次拉宾真火了，他不再顾及卡特的脸面，反正得罪与不得罪他都一个样。在机场上，他怒气冲冲地质问送行的万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万斯推脱地耸耸肩说：“我无法解释此事。老实说我也是一无所知，我手头上甚至连份总统谈话的副本都没有。我知道他的谈话使我们都处于尴尬境地。不仅是你们，阿拉伯人也是如此。”

他回国后不几天，卡特存心激怒他似地公开宣称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自己的“家园”。随后，卡特又下令取消了以色列可以优先获得先进武器的特权。消息传来，拉宾既恼怒又无计可施。恼怒的是卡特准备彻底改变尼克松—福特政府制定的偏护以色列的立场，沮丧的是他已无力与卡特抗争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扯皮的议会和相互拆台的领导班子。

大选的日子一天天迫近了。拉宾忧虑地看到形势对工党政权极为不利，原因是工党政府被揭发出一连串的丑闻。

### 经济滑坡怨声载道 信任危机工党失势

到 1977 年 5 月，工党政府统治以色列已达 29 年之久，许多选民认为该换个政府了，应让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上来试试。公众不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菜篮子，他们认为自己没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而且他们认为工党政府内有批腐败官员，侵吞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拉宾内阁对此无所作为或予以包庇。

六天战争后这个国家大变了样。大量的外援使人们变得懒惰和虚荣了，在大手大脚花钱的风气下，以色列出现一批蛀虫，社会中形成了一个“黑色经济”。以色列第一批百万富翁是在承包“巴列夫防线”工程期间形成的，他们从承包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巨型防御工事中猛捞了一把。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相差无几的收入，现在突然看到一批偷奸耍滑的人大发横财愤愤不平。以色列国土很小，谁凭空暴富很快就能传遍街头巷尾，当人们看到个平庸的邻居突然添置了一辆进口车或大彩电时，就会心照不宣地得出结论：看，这个家伙准是在哪儿捞到一笔黑钱！

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名目繁多的税收更是火上加油。耶路撒冷大学高级讲师约瑟夫·内普里斯每月都从财务科收到一根“面条”。这根面条就是他的工资单，1 公分宽 60 公分长，就像一根意大利面条那样难以解开。在这根半米多长的工资单上排列的收入不下 15 项，但扣除的项目更多。在扣除了他从来搞不清的各种税收、保险和强制性储蓄之后，他只拿到了 51%—54% 的名

义工资。在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的情况下，内普里斯只能到商店的橱窗里看看汽车了。为给叫苦不迭的职工增加一些收入，许多企业搞了变相增加收入的福利措施。如电话公司给工程师们每月多发一些钱，名目是“租金”。原来是公司给他们安装了电话，占用了他们书本大的一块“地皮”，这部电话偶尔也用来谈谈公事，因此须付给房主租金。此外，以色列还有电力公司职工不掏电费、没汽车的职工照领汽油补贴和教授子女上学不缴学费等“惯例”。但拉宾上台后不认这个账，从1975年起取消了这些“福利待遇”，不取消的要照章纳税。而且，他还从人们收入中强扣“国家公债”和“国民保险费”。这些措施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国内不时发生大规模的罢工。

不满使得人们把眼睛盯在管钱的官员身上，人们认定这些人中肯定有贪官污吏，决心要挖出几只蛀虫出口怨气。

新闻界很快就帮他们揭出第一桩丑闻：政府存入不列颠——以色列银行中的一笔巨款不翼而飞了！此案的嫌疑犯是以方总裁米切尔·佐尔，他经手过这笔钱而且与政府及工党高级官员有着密切交往。这个案子还没完全查清，第二桩丑闻又被曝了光：以色列工总“患者基金会”的负责人阿谢尔·亚德林因涉嫌贪污被拘留。舆论一片哗然。

亚德林贪污案给拉宾政府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亚德林的身份与佐尔不同。佐尔不是政府官员，而且他只是作为嫌疑人受调查，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没查清。亚德林则不同，他东窗事发时是拉宾刚任命的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而且被拘留后他承认了非法挪用公款行为。经过新闻界的大力渲染，公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拉宾委任了一名窃贼去保管以色列老百姓的钱箱。他们没说出来的疑问是：拉宾为什么非要选个贼坯子去管理钱财？他本人与亚德林之间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在亚德林承认了犯罪事实后，拉宾立即解除了他的中央银行行长的职务，法院给亚德林判了5年刑。但没人为拉宾的决定喝彩，人们还认为判得太轻了呢！更糟糕的是，调查人员很快弄清，亚德林没把那笔巨款装进自己腰包，而是拿去资助工党了！这下子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大小小的反对党齐声指斥这是以色列的耻辱，表明工党联盟已经腐败到盗用公款去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的地步了。

在这种穷追猛打的声势下，第三桩丑闻又破揭了出来。1976年11月10日，一位周刊记者揭发说，现任住房部长阿夫拉罕·奥佛尔在任以色列工总“希昆奥伏丁”房产公司经理期间有数额惊人的贪污行为。这下子反对派和新闻界庆幸自己抓到了大鱼：这可是一位现任部长被揪了出来，而且又是与以色列工总有瓜葛，难道以色列人要永远忍受腐败透顶的以色列工总——工党联盟利益集团的摆布吗？于是乎，在由4位法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展开侦查期间，各大报纸每天用大量版面连篇累牍地详细报道调查进程，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

可惜的是，奥佛尔是个不经折腾的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厚脸皮的亚德林差多了。这个调查是由警方牵头的，又急又气的奥佛尔三番五次让警方说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但警方并不着急，每次都用“等查清后我们会告诉你的”这类话来搪塞他。报界给奥佛尔罗织的罪名越来越吓人，而线索又是由警方及时提供的。见闹得实在不像话拉宾去找总检察长，请求他在处理这个案子时对当事人的态度稍微宽容一些。总检察长很客气但官腔十足，他

声称自己在这件事上爱莫能助，必须秉公执法。

1977年1月2日，被报界和警方来回折腾了两个月的奥佛尔找拉宾倒苦水。一见面，拉宾被他那副模样吓了一跳。他的头发全白了，像突然老了10岁似地衰弱不堪，精神已完全崩溃。奥佛尔连哭带笑地诉说自己的冤枉：人们把一盆盆屎扣在他的脑袋上，却不许他冲洗掉，还命令他站在众人前出乖露丑，他觉得活下去真没意思。拉宾心头一惊，预感要坏事，忙用最诚恳的话来安慰他，开导他事情再过一两周就会搞清楚。但老人摇摇头转身离去，临走时甚至忘记与拉宾握手道别。

第二天一早，拉宾就接到奥佛尔自杀的消息。人们在特拉维夫以北的提尔贝鲁克海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奥佛尔倒在他的沃尔沃牌汽车旁，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手里握着把手枪，汽车挡风玻璃上别着一纸摧人泪下的遗言。电话筒从拉宾的手中掉了下来，他感到透不过气来，奥佛尔是被毫不负责的新闻界活活逼死的。那些家伙自认为有这种权力，在没弄清事实之前就先给他定个可怕罪名，并且不允许他进行申辩，最后把他逼上绝路。拉宾没吃早点就去看望奥佛尔的家人，目睹他们哭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他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当时的感觉是有人当着他的面杀了一名他的士兵。

人死了事情也查清了，奥佛尔根本没有贪污行为，那些指控完全是那位记者捕风捉影的捏造。但没人对奥佛尔的自杀感到内疚，更不要说表示歉意了，大家都像没这回事儿似的，新闻界又忙着寻找新的猎物了。拉宾明白，新闻界是在报1975年那一箭之仇。

1975年3月25日，以色列《国土报》首席外事记者、专栏作家马蒂·戈兰驱车来到特拉维夫新闻检查办公室，把有关基辛格在中东活动的书稿交出来进行例行检查。检查官伊扎克·沙里上校发现，在书稿中基辛格被描绘成一个两面三刀的坏蛋，是个处心积虑损害以色列利益的政治流氓。在耸人听闻的西方，这样写是可以的，当然要提防当事人控告。但考虑到基辛格还在台上，损害他的声誉对以色列不利，沙里上校和他的上司决定禁出这本书，并没收戈兰的全部书稿及有关资料。拉宾对此事很恼火，为此专门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除了不愿意往基辛格脸上抹黑外，他对书中大量引用机密文件极为震怒，据查这批绝密资料是从总理府办公室、外交部及国防部泄露出去的。

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政府威胁要对马蒂·戈兰采取法律行动以查清泄密的渠道，而整个新闻界则大叫大嚷地抗议政府粗暴地践踏了新闻自由。戈兰收拾好一个提包作出一副随时准备坐牢的样子，反对党议员则指责政府压制人权。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美国人出面让双方下了台。美国出版商对这部揭露内幕的书很感兴趣，最好能把白的说成黑的，有人甚至愿出25万美元“走私”戈兰的手稿。基辛格本人也表示不怕别人揭他的“老底”，只是希望作者在出书前先让他看看底稿，以便以后能够从容答辩。由于始终查不出到底是谁向戈兰提供了大量绝密文件，迫于国内外压力拉宾政府最后发还作者的手稿和资料，并允许该书公开出版。在这场较量中新闻界赢了，但它却记下挨过拉宾整的仇。

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工党联盟的处境很不妙，但佩雷斯却认为这是他夺取党内第一把交椅的好机会，没等中央委员会开会推举工党联盟的总理候选人，他就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个人竞选活动。佩雷斯手法是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跟拉宾对着干，并有意无意地把内阁中的不同意见捅出去，以一个反潮

流者的身份来博得广泛支持。佩雷斯与新闻界的关系很好，新闻界很高兴有他这样的核心人物提供高层信息，佩雷斯则对新闻界的吹捧深感满意。两头不是人的拉宾，他不断强调要加强保密使新闻界大为不满，他试图堵塞泄密渠道的措施招致了后者的怨恨。当拉宾要求佩雷斯把自己的嘴巴关严时，佩雷斯要么不予理睬，要么用“请不要忘记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予以回答。而后内阁的动态照样传出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才对以色列的“民主”喷有烦言。他声称自己像一个小地毯商人似地一寸一寸地与阿拉伯人侃价，而以色列人早就把自己的底价告诉了对方，使自己在阿拉伯领导人面前不断出丑。

佩雷斯攻击得最凶的是拉宾对犹太移民定居点的立场。工党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持温和立场，即除“安全定居点”外反对在人口稠密区建新的移民点。宗教势力和利库德集团则主张在被占领土上无限制地移民，他们干脆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称之为“朱迪亚和萨马利亚”，即占犹太人对该地区的称谓。拉宾在这个问题上硬不起来。从理智上说，他明白继续在巴勒斯坦人聚居区设立定居点是不明智的，不仅全世界反对而且堵死了与阿拉伯人和解的路。但他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占人口多数的东方犹太人“塞法尔迪”支持无限制定居政策，而工党联盟需要他们的选票。佩雷斯抓住拉宾这个“软处”猛攻，在支持定居的党员中很得了几分。

拉宾与佩雷斯第二次公开较量在1977年2月份进行，工党联盟举行了推选党主席——也就是总理候选人的选举。参加投票的有来自各地的约3000名代表，投票结果是拉宾1455票佩雷斯1404票，拉宾仅以41票的微弱多数再次取胜。他们俩都对选举结果深感失望：拉宾感到党对他的支持大大减弱了，按比例计算，这个“多数”比1974年那次竞选还微弱；佩雷斯对未获多数人的支持极为沮丧，这给了他一个教训，在党的山头上拉敌人的旗号是不得人心的。

这次选举后拉宾悟出个道理，那就是平民百姓对经济实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是从钱包的胀瘪来看待政府的好坏的。如果光是外交上取得辉煌成果而经济没抓上去，选民们是不会买帐的。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例外，如果政府领导人民打赢了战争，那么公众会暂时忘记政府的无能，让它再多干上几年。但拉宾沮丧地承认，他没有梅厄夫人那种“福气”，现在阿拉伯人不想打仗。

佩雷斯失望之余也看到了希望。因为41票不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只要拉宾再出一点儿纰漏，党的领袖就非他莫属了。到了3月份佩雷斯喜上眉梢，因为拉宾真的出了大纰漏。

### 存款丑闻拉宾辞职 法庭传讯莉赫现眼

1977年3月份拉宾访美归来不久，15日《国土报》记者丹·玛格丽特发表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以色列总理拉宾的夫人莉赫在美国一家银行中拥有外汇存款！

这则消息一公布，整个社会便轰地闹了个沸反盈天。人们第一个感觉是上当受骗了，被拉宾骗了，他要求以色列老百姓奉公守法，而他自己却干了让夫人在国外非法存款的可耻勾当！

在 70 年代以前，以色列任何公民在国外拥有存款都是非法的，这是财政部的《通货法》的一条规定。财政部制定这一法规基于三点考虑：第一，以色列外汇紧缺，公民们应把自己的外汇存在国内银行支援经济建设；第二，这是一种防止私营业主和腐败官员把非法收入转移到国外的措施；第三，一心为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在这三点中，第三点在以色列具有特殊意义，人们最气愤的正是这点。

以色列主要是由来自俄国和波兰的犹太移民创立的，在早期他们以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年青人爱唱的是苏俄歌曲。因此，强大的基布兹运动和以色列工总都有很浓厚的“公”字色彩，它们的成员们为此过了近 20 年的紧衣缩食生活。在艰难的创业岁月里，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凭着无私奉献的信念拼搏，人们很少考虑自己的私利，这种状况在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基布兹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基布兹规定，在外工作的成员应将所有收入如数上缴，同时从基布兹得到衣食住行的配给。时至今日，不少在外当议员、工程师和教授的基布兹成员仍遵守这个规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字色彩在以色列已经越来越淡薄了，许多前基布兹成员已不再上缴他们的收入，但克己奉公的道德观念仍在起作用。对老百姓来说，大人物搞女人酗酒都可以容忍，唯独不能容忍他们贪污盗窃。在这个小国里，人们很爱议论领导人的种种丑闻。作为一名前基布兹的成员，拉宾长期以来被工党吹得像块水晶那样纯洁，却干了让夫人把一笔外汇存到美国银行的事，人们感到梦幻破灭般的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慨。

《国土报》这次可算出了 1975 年那口恶气了，这简直是个以色列的“水门事件”，它要叫那个平日爱耍威风的总理大人付出足够的代价！于是它仿效民主党人对付尼克松的作法，调集了最能干的笔杆子慢慢地煎熬拉宾，不时丢出些“钢鞭材料”把声势推向新的高潮。在报道了莉赫在美国拥有存款的消息后，不久它又“发现”在那个存款户头上拉宾也签了名，于是报上醒目大标题变成了“拉宾—莉赫银行帐户”，矛头开始指向了拉宾。纰漏出在他们夫妇卸任回国时没取消这一帐户。

出于本能，拉宾最初对在国外存款一事的解释是含含糊糊的，他对记者说存款总额统共只有 2000 美元。听到这一消息许多支持者放了心，因为按有关规定，存款超过 5000 美元才会受到追究。但他没说实话。调查部门后来发现：他不是一个人头而是两个户头；存款不是 2000 美元而是 23000 美元。拉宾这才承认了事实，但申辩说，那些存款是他就任大使期间由妻子莉赫节省下来的钱。但这个解释没用，新闻界和反对党立即声称他在存款问题上对全国人民撒了谎，而且避重就轻。有的评论员尖刻地诘问他这个钱是怎么省下来的，并追根究底地盘问：“听说拉宾先生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养成了痛饮威士忌酒的嗜好，并在华盛顿外交界中久负盛名。他能否拨冗向公众耐心地解释一下，他整瓶整瓶喝的酒是谁的，是公家的还是他自己掏钱买的？”

在该报发表的大量尖酸刻薄的评论中，不厌其烦地引用拉宾在 1967 年说过的一段话，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六天战争结束后不到三个星期，拉宾代表全军将士接受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学位，这是该校全体师生时以军收复校园所在的斯科普斯山的感激表示。为烘托庄重的气氛，学校把授学位仪式安排在山顶的古罗马圆形大会堂举行。当拉宾的老上司，希伯来大学考古学教授伊加尔·雅丁把学位证书授予他后，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充满感激之情的演说。当时以色列公众很爱听战争英雄的讲话，所

以色列电台现场转播了他的演说。以色列老百姓听到他强调“以色列是一个在危难时刻不计较个人私利的民族”，还听到他赞扬人们所表现出的“道义和精神力量”。在奇迹般的胜利之后，这是最动听的语言，尤其是从军队总司令——总参谋长的口中说出的话，以色列人记得很清楚。《国土报》的评论指出，在以色列仍处于与邻国交战状态的危难时刻，拉宾先生注重的是谋取个人私利，他那些道义和精神价值的大话是专门讲给平民百姓听的，对他自己从来不起作用。

事情越闹越大了。拉宾很快明白，在存款一事上无论他说“是”还是“否”都无济于事，只会遭到愈演愈烈的抨击。反对派把美国民主党人在“水门事件”中那套伎俩学到了家，就像借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本人及共和党都搞臭那样，要紧紧揪住存款丑闻把他和工党联盟搞得丧尽人心。拉宾不愿像尼克松那样被人弹劾下台，况且他已经下台了，因此打算尽快辞去工党领袖职务。他找来密友、不管部长加利利商量此事，加利利劝他再等等看，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说也不迟。他接受了加利利的意见，他还有幻想。

但查处此事还有一些程序问题，原因是以色列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由哪个部门查处此事以及量罚的尺度。《国土报》揭发此事后，拉宾的律师迅速地与财政部外汇管理局督察讨论了有关情况，并向他提供了有关书面材料。拉宾自己也去找了总检察长阿哈隆·巴拉克，说明了自己的律师进行的工作。巴拉克最初听说只有2000美元存款认为问题不大，劝拉宾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还请拉宾让莉赫夫人放心。但后来巴拉克了解到存款有23000美元后，态度就大变了。

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财政部长耶霍舒阿·拉宾诺维奇决定指派一个本部门的调查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但这个调查委员会刚开始工作，总检察长巴拉克就提出了异议。他不徇私情他说，调查委员会不能由财政部长指定，而应由外汇管理局局长牵头组成。在这件事上巴拉克的权力很大，拉宾诺维奇只有顺从照办。但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清楚，领导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正是巴拉克本人，来自财政警察司法部门的调查委员都得经他认可。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拉宾明白大难临头了。

1977年4月5日调查委员会作出了审理结论。它确认拉宾与莉赫违反了政府有关规定，决定对他们两人进行罚款处分。但事情到此不算完，巴拉克在6日又作了一个新决定：如果财政部长同意这个审理结论的话，那么此事以后扯到法庭上时他不能出庭为拉宾夫妇进行辩护。司法部长立即表态同意总检察长的决定，拉宾诺维奇只好再次顺从。巴拉克以拉宾不知情为由对他进行一笔“象征性”罚款，而莉赫则必须在一家地方法院出庭受审。外人认为巴拉克这样做是给了拉宾面子；没让他出庭受审；而拉宾却认为巴拉克这是存心让他丢人，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妻子出庭接受讯问。

拉宾激怒地要对社会公开自己的收支账目，但被几位挚友劝住了。他们提醒拉宾，公布账目只会给政敌提供更多的攻击炮弹，而且这样做也减轻不了在外国存款的罪责。在当时，能来安慰他并为他出主意的朋友已经不多了，许多人已离开他这条注定要沉的船。在茕茕子立的情势下，他独自作出了三条决定：第一，立即撤回自己的总理候选人提名；第二，与莉赫共同承担外汇存款一事的责任；第三，立即辞去看守政府首脑的职务。

他本来准备在当天，也就是4月7日晚黄金时间，通过电视台向全国宣布这些决定。但朋友们劝他把时间往后推一下。他们劝告说，“伊扎克，你

知道今晚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要干什么吗？他们要实况转播以色列篮球队与意大利队争夺欧洲锦标赛冠军的比赛。你占用广大球迷的时间是不明智的，他们讨厌任何人的打搅！”他听从了这个劝告，等这场球赛打完后才向全国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以色列队打赢了那场比赛全国球迷欣喜若狂，当屏幕上突然出现拉宾的严肃表情时许多人感到很突然。拉宾宣布辞职决定后说，“我对我这样辞职深感遗憾。”许多人对此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少人在他说完后关了电视机。

但他想卸下担子一走了之并不容易。以色列有关法律规定他必须再留守一段时间，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前他作为看守政府首脑不得离职。但莉赫急需他的安慰和看护，在接到4月17日出庭受审的通知后她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他急于带她到外地去散散心。佩雷斯在4月10日被推选为看守内阁主席处理日常事务，但拉宾必须答应为外交和防务上的大事负责才能走。他同意了这一条件，看守内阁同意了他的“事假”。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带着莉赫驱车向西奈的沙姆沙伊赫进发。疾风穿过车窗扫在他的脸上，他既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又被极为委屈的心情折磨着。“我到底错在哪里？我为什么会栽这么大的跟头？”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在吞噬着他的心。莉赫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握着她的手，心头阵阵发酸。

回来不久，莉赫受审的日子到了。拉宾坚持要陪伴妻子出庭，起码给她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但朋友们苦口婆心地劝阻他，“别固执了，伊扎克，你千万不能出庭。你一出庭，那个审判就会变成一场尽力羞辱你们的大闹剧的！”拉宾气愤地一扭脖子，“不，我不能撒手不管她，我要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听我说，伊扎克，”莉赫从里屋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平静他说：“相信我，我受得了，你不要陪我进去。想想看，我们经历的风浪还少吗？”拉宾捧住她的手，含着眼泪点点头。

他们乘车来到当地法院外面，车还没停稳就被记者们围住了。在嚓嚓的闪光灯中有人高叫着：“谈谈吧，拉宾先生，您现在感想如何？您认为莉赫夫人有罪吗？”拉宾气愤地用手把那些伸到面前的话筒推开，打开车门把莉赫搀扶出来，然后当着众人用一个深深的吻把她送进法庭。巴拉克派了一位以严厉著称的法官来审判莉赫，那位法官很愿意在这种场合充分表现他的刚直不阿。最后，他宣布给莉赫一笔25万以色列镑的罚款，按当时汇率折合24000美元。拉宾夫妇决定不再上诉。4月21日佩雷斯被推举为工党领袖，拉宾成了一名“普通党员”。

使拉宾感到宽慰的是，许多以色列人没忘记他对国家的忠诚与贡献。莉赫被重罚的消息传出后，他们夫妇接到数以千计支持者的来信，不少人还寄来了支票要帮他们支付那笔罚款，甚至还有人愿意替莉赫坐牢来拒付那笔罚款。莉赫终日在书房里回信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支持者，说她把人们寄来的支票全退了回去。

最使拉宾感动的是阵亡家属的话。在一次纪念阵亡将士的仪式中，垂首默哀的他感到了烈士家属投来的同情目光。仪式结束后一位长者向他走来，伸出了自己粗糙有力的大手。老人看着他的眼睛说：“听着，孩子，把头抬起来。我的儿子就埋在这里，他比你小不了几岁。作为一位阵亡者的父亲，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说的是，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你是问心无愧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老人说完后又与他紧紧握手，然后转身坚定地离去。



这种感人场面在海法又重现了。人们要求他在纪念烈士的仪式上讲话，并对他的简短讲话报以长时间的掌声。一位烈士的母亲对他说：“伊扎克先生，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好好干吧，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当5月17日的第一批大选结果统计出来时，拉宾明白工党联盟这次在劫难逃了，热衷于窝里斗的工党领导人为他们不顾大局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以色列历史上，人们第一次用选票把工党政权赶下台，他们挑选的领导人是利库德集团领袖梅纳赫姆·贝京。6月21日拉宾与贝京在总理府会晤，在简短的仪式后他正式把权力移交给贝京，随后互致了敬意。从此，他的身份变成了一名在野的工党议员。

在他辞职6个月后，以色列的《通货法》作了重大修改，在国外存钱合法了。

在随后两年中，他除了为本党进行拉选票的讲演外，闲暇之余还为出版社撰写回忆录。卸下了总理和党的领袖重担后，他觉得自己的视野更宽广了，有些问题也看得更清楚了。冬天是以色列雨雪交加的季节。当风雨吹打着窗根之际，他常与莉赫坐在壁炉烤得暖洋洋的客厅里，轻声细语漫话人间炎凉。

他从来没想到脱离政治安度晚年，他确信自己东山再起只是个时间问题。

## 第十二章 鹰爪鸽派

长期以来拉宾在以色列是公认的“鹰派”。作为军人，他在战场上对阿军毫不留情；作为大使，他推动美国以各种手段迫使阿方就范；在首次出任总理及后来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主张无情地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对于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即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他的态度甚至不如达扬那么开明。

但 80 年代后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鹰派色彩逐渐减褪，主张和解的“鸽派”特征日趋明显。水滴石穿，他的这个转变是逐步形成的。

### 起惊雷萨达特访以 世道变引拉宾沉思

1977 年 11 月 19 日，黑压压的人群聚集在本-古里安机场上。人们等候着一位贵宾的光临，这位贵宾就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奇怪的是，没人能肯定他真会来，这种临时取消会晤的事已不是第一次了，萨达特在中东地区以说变就变而闻名。说来好笑，以军总参情报部竟断言萨达特来访是个大阴谋，认定他的专机后面跟着大群轰炸机。因此，当天以军奉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遭到突然袭击。

不久，一架标号 01 的埃及波音 707 客机平稳地降落了，它在跑道上滑行和减速后缓缓地向停机坪驶来。以色列新总理贝京，率领着他的部长们整齐地排列在飞机舷梯旁，期待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到来。所有摄影机都对准了机舱门，全世界亿万电视观众屏住呼吸凝视着这一场面。突然，萨达特从黑暗中出现了，他微笑着扬起手向人们致意。一时间，人们激动地认为自己在做梦：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亲身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亲手推倒了 30 年来隔在两国之间仇恨的大墙，阿以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蓄着犹太式连鬓胡子的以色列警察，竟然不能自持地念起了收获节时的祈祷词，不少以色列人泪流满面。随访的埃及《金字塔报》记者胡亚德感慨地说：“这比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还了不起！”美国人赶紧掏出 10 万法郎，买下了萨达特走出舱门时的照片。

在迎接萨达特的以方政治领袖行列中也有拉宾，他是 18 日从美国匆匆赶回国的。国务卿万斯告诉他萨达特即将访问以色列后，他缩短了访美行程提前回国。当贝京向萨达特介绍“这是前总理以色列总理拉宾”时，萨达特上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拉宾觉得萨达特与他握手时间要比别人长一些。

当以色列三军仪仗队精神抖擞地迈着英式鹅步接受检阅时，拉宾心中突然涌出一股酸溜溜的味道。他认为自己比贝京更有资格主持这个欢迎仪式，是自己最先采取与萨达特面谈的主动措施的，而且差一点儿成功，然而丰收的桃子却被贝京摘走了。“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举世瞩目的‘萨达特’呢？”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脸上热辣辣的。他的确醒得早，而且也采取了主动行动，但他的气魄没萨达特大。

1976 年 10 月 9 日，一支拉着窗帘的车队驶进了摩洛哥王宫，王宫卫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密保安措施。车门打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拉宾，他率领了一个以色列代表团进行秘密访问。为进行这次访问，拉宾乔装打扮，戴着假发和墨镜取道巴黎抵达拉已特。笑容可掬的国王哈桑二世在豪华的宫中

迎接拉宾一行，在互致问候及品尝了薄荷茶之后，双方进入了正题。会谈中，拉宾请求国王陛下说服萨达特同意与自己秘密会晤，他解释说这是符合以埃两国利益的。哈桑二世爽快地答应尽力帮忙。拉宾之所以请哈桑二世出面相助，是因为国王陛下和他的已故父王在以色列是极受尊敬的人物。自古以来摩洛哥就生活着大量的犹太人，他们的处境要比在其它阿拉伯国家好得多，历代王朝始终对他们相当宽厚。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政权也向他们伸出了魔爪，是哈桑二世的父王顶住了把他们送进虎口的压力。哈桑二世本人在执政后对犹太人和以色列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即使是在阿以关系极为恶化的岁月里，他还邀请许多以色列社会名流访问摩洛哥。哈桑二世并不惧怕别人说三道四，他与萨达特有着良好的关系。

哈桑二世没有食言。他确实向萨达特传达了拉宾的请求，但萨达特在犹豫片刻后回绝了这一建议。萨达特当时有顾虑。他认为拉宾缺乏驾驭自己政府的能力，而且有政权不稳的迹象。此外，他也不愿抛开“和平掮客”基辛格私下与以色列交易。就这样，拉宾失去了与萨达特当面议和的机会。

1977年5月底这样的机会又来了。当时摩萨德报告说，在距埃及边界35公里的一块利比亚绿洲里发现了一个训练敢死队的营地。据查，这个营地是卡扎菲在苏联克格勃帮助下设立的，目的是训练一支在7月23日埃及革命纪念节刺杀萨达特总统的敢死队。卡扎菲在埃以签订了两个脱离接触协议后把萨达特视为该死的叛徒，他曾向国际恐怖组织大头目卡洛斯支付了1000万英镑干掉萨达特。但卡洛斯的行动失败了，利比亚自己组织的行动也失败了，现在他求助于苏联克格勃。这次招募的敢死队员有利比亚、巴勒斯坦其它国籍的人，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萨达特这一次凶多吉少，应当尽快把这一情况通知他。拉宾确信，在收到这一情报后，萨达特会打消与自己会晤的顾虑的。

但他遗憾地看到自己的手已经伸不出去了，因为在5月17日大选后他只是个等候贝京来接收政权的保管，没资格出头露面。贝京闻讯后手疾眼快地接过这份厚礼，通过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渠道把这一情报交给埃及人。萨达特最初对此将信将疑，派飞机侦察后才知确有此事，盛怒之下他决定杀鸡给猴看。7月21日他下令对利比亚进行一场有限战争，25日一支搭乘直升机的埃及突击队包围并彻底摧毁了这个营地。无疑，萨达特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善意是心领神会，但功劳全记到了贝京头上，因为是他传了消息并保证埃及人动手时不加以干扰的。

不管拉宾如何感慨，他当时没达到破釜沉舟与阿媾和的思想境界。许多人不大清楚的是，最早在约旦河西岸建犹太定居点的事是工党政府干的，拉宾也有份儿。

1968年4月4日，犹太拉比莱温杰和沃尔德曼带着一伙人住进希伯伦市阿拉伯人一家小旅馆，声称是来此度逾越节的。但住了一个星期后他们露出真面目，宣布死也不离开这个葬有犹太鼻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城市。事情闹大后，工党政府没有派兵强行驱赶他们，而是让他们住进了当地的兵营，后来又在该市附近的阿尔巴镇为他们修建了定居点。这是西岸地区的第一个犹太定居点。

此事是拉宾挚友阿隆一手促成的。阿隆当时曾对这些宗教狂说：“你们若不造成既成事实，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你们不要等政府表态，要自己动手干，犹太人干事一定要干得漂亮。”事发后又是阿隆第一个跑来给他们打气：

“希伯伦一直都有犹太人，在他们被横蛮赶走之前，这里是犹太民族的摇篮。不让犹太人在祖先住过的古城定居，简直不可思议！”拉宾当时在向往“大以色列”方面不亚于阿隆，他在1973年盛赞梅厄夫人的扩张政策，说梅厄“时代的边界要比大卫王和所罗门时代更大”。1974年，20个犹太家庭占领了西岸的一个山头，当时他唯恐此事引起犹太人之间的流血冲突，便允许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军营中定居。

他不服气的是北京在中东和谈上的表现。他认为北京是个两面派，看起来强硬实际上稀软，真正硬的是自己和工党。北京上台后多次指责拉宾1977年初以极其粗暴的态度对待卡特总统，破坏了以美关系。北京在同年11月访美后，逢人便讲“我从拉宾几乎毁灭的以美关系中挽救了以色列”以及“现在以美没有对抗了”。但拉宾看到的是，卡特政府已公开要求北京撤训6月14日线上及接受建立巴勒斯坦实体的主张，而北京政府已接受阿拉伯国家组成统一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要求。1978年9月戴维营会谈前，拉宾在以色列一家晚报上严厉抨击北京政权。他在预测这次和谈的结局时说，在卡特和萨达特都能左右政局的情况下，说话不那么管用的北京势必要作更多的让步。后来他又撰文说，北京上台发誓要把以色列主权延伸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但在戴维营会谈中却同意以五年自治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他认为，在签订了戴维营协议后以色列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巴解提出来的，它要求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主权国家。这个方案以色列不能同意；第二种方案是利库德集团提出来的，它主张把西岸和加沙并入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人选择以色列或约旦的国籍，电可允许他们建立以色列所属的“自治区”；第三种方案是工党联盟提出来的，它主张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和约旦—巴勒斯坦两个国家。拉宾确信约旦国王侯赛因同意第三种方案，只是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使他不敢讲出来。拉宾坚决反对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他认为这种国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既不能安置周边国家中的15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而且它的政权必然落到巴解这样的组织手中。

他同意对埃及和约旦这样的温和国家作一些让步，但不愿对巴勒斯坦人作任何退让。他恨透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历来称之为“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他公开说过：“犹太民族曾不相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但我劝他们要相信《巴勒斯坦宪章》。”在1965年巴解修改过的《国民宪章》中，有句“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从巴勒斯坦领土上赶出去”的话，拉宾认为这就是巴解要以武力消灭以色列的铁证。他尤其憎恨巴解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深信此人是想毁灭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大头目，一直想亲手抓住并处决他，1974年他出任总理后，提出要启用一个最有争议的人来推行这个工作。但他的建议一提出就遭到国防部长佩雷斯和总参谋长古尔的坚决反对，理由为此公是个极为难处而且处处找麻烦的人。拉宾对此不以为然，坚持给他一个“国家安全顾问”的头衔。这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就是以色列家喻户晓的“战神”——阿里尔·沙龙。一些讨厌他的人给他起了个颇为不恭的外号——“牛头狗”。来形容他的桀骜不驯。

对阿强硬重用战神  
镇压反抗沙龙逞凶

沙龙 1928 年出生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卡法马拉“莫沙夫”中（莫沙夫是私有化色彩较浓的农业合作社）。他原来不叫沙龙，而叫施因纳尔曼，一个很有北欧色彩的名字。沙龙的母亲维拉来自白俄罗斯一个富商家庭，原先对犹太复国主义没什么兴趣。沙龙的父亲萨缪尔原是俄国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希伯来语教员，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他带着维拉移居巴勒斯坦。萨缪尔是这个家庭中的“凯撒”，习惯用拳头和皮带解决问题，他用老拳“说服”了妻子信奉犹太复国主义，并很快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沙龙 6 岁时就领到一根比自己还高的木棒，父亲命令他用它痛打那些偷水果的孩子。从此沙龙棒不离手，直到他长大后搞到一支枪为止。

在以色列，沙龙是公认的最仇恨巴勒斯坦人的人，这与母亲维拉从小灌输给他的情感有关。1922 年的一天，移居巴勒斯坦不久的维拉与萨缪尔乘一个阿拉伯人的渡船过河。船很小，船夫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彪形大汉。轮到维拉上船时，他伸出粗壮的胳膊把她拦腰抱起来，托起她的臀部把她举在空中，在她尖叫声中淫笑着把她的下体看了个够。这种屈辱和恐怖感她在 1928 年 8 月又经历过一次。当时她的住处遭到暴乱的阿拉伯人的袭击，丈夫恰巧有事在外，那天夜里她接着沙龙兄妹在昏晃里颤抖到天亮。这两个故事她对小沙龙讲了无数遍。在卡法马拉莫沙夫，沙龙父母常为鸡毛蒜皮小事跟邻里吵闹，沙龙就是在这种家教下长大的。父亲从小就用宽皮带督促他学习劳动，这使他变成一个粗壮、勇武的不合群的人。但同时也使他变成一个有主见和野心的人，因为从小村里的孩子全不搭理他，万事全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跟沙龙打过交道的人对他又恨又怕。恨他，是因为他既粗暴又自私，几乎没人能跟他相处。他对下属、同僚和上级都敢骂，天是老大他是老二，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怕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军事奇才，论身体素质、军事技能和组织领导能力。几乎没人比得过他。他治军有方，胆大心细，计划周密，屡建奇功，你不佩服都不行。军队下层官兵尤其崇拜他，赎罪日战争时坦克兵在战车上刷上了“阿里尔，犹太之王！”的标语。但由于他是个全军闻名的“刺儿头”，他的提升受了很大影响，差不多历届总参谋长都想把他从军队里赶走，其中甚至包括他原先的部下。

但上司中有两个人一直在庇护着他，一个是达扬，另一个是拉宾。

达扬之所以庇护他，一是与他经历相似，二是爱惜他这个将才。达扬与沙龙都是来自莫沙夫的农家子弟，都参加过哈加纳并都当过编外警察“拉菲尔”，而且都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念过书。这自然使达扬对他产生了亲近感。但更重要的是达扬很欣赏他的军事才干，认为他那股子敢打敢拼和热衷冒险的精神与自己很相像，因此在军队裁员、整编时把他留了下来。许多高级军官都劝达扬把这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家伙清除出军队，达扬拒绝了。他说：“我知道沙龙是匹会蹶子的劣马，但我爱用劣马。在节骨眼儿上你给它一鞭子，它能奋力把车拉上坡，这比那些温顺而无用的马要强多了。”因此达扬一手把他提到旅长。但这匹劣马最后还是给了主人达扬几蹄子。在赎罪日战争中沙龙头上受了点轻伤，他妻子莉丽打电话叫他小心点，打仗时要戴上钢盔。这时已成为战争大明星的沙龙在电话中傲然宣称：“我的钢盔还有别的用处。我要用它在特拉维夫打碎一些人的脑袋！”他要打的正是达扬的脑袋。在战后达扬备受指责之际，沙龙充当了反对他的主角，他当众大骂达扬是个“被宠坏了的明星”。

拉宾也挨过他的骂。沙龙由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出了大纰漏被冷落了

7年，1964年拉宾升为总参谋长后让他担任北方军区参谋长。拉宾重用他的主要原因也是惜才。他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听说过这个人，当时拉宾是“哈雷尔旅”的旅长，沙龙是“亚历山德罗尼旅”一名排长。沙龙也参加过强攻拉特隆警察据点的战斗，并在一场以惨败告终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更直接的了解是在后来的营长训练班上。拉宾是训练班负责人兼教官，沙龙是第一期学员，一个由达扬选送的耶路撒冷旅的营长。在教学过程中，拉宾对他精通突袭、包抄战术有很深的印象。在以色列，人们对军人的要求是会打仗，至于脾气坏不合群等毛病是次要的事。说来也怪，以色列名将几乎都有不合群的特点，达扬和沙龙如此，拉宾的朋友也不多。因此拉宾并不觉得沙龙毛病很突出，他甚至对那些讨厌沙龙的人说过“有沙龙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福气”的话。但沙龙上任后老毛病又犯了，在北方军区里专横跋扈，根本不把司令看在眼里。他甚至狂到当众辱骂拉宾的地步，在司令部里大声嘲笑拉宾在军事上不过是个连长水平。拉宾没跟他计较这些，后来又把他调到总参当训练部长，军衔也由准将升为少将。六天战争前夕，拉宾又任命他为南方军区一个师。

此外拉宾也考虑到他与政治领袖的特殊关系。沙龙当营长时就得到“老头子”本—古里安的器重。当本—古里安听说这位勇猛的军官出奇地仇恨阿拉伯人时便注意上了他，在了解到他是来自莫沙夫的农家子弟后兴趣更浓了，唯一不满意的是他那个德国式的名字。“你干嘛要叫施因纳尔曼呢？”本—古里安皱起了眉头，“就叫沙龙吧，阿里尔·沙龙。这才像个犹太人名字。”从此，他的名字就变成了沙龙。本—古里安更喜欢用“阿里克”称呼他，在沙龙受伤住院时还捧着鲜花探望他，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有了这个大靠山，沙龙更有恃无恐了。他部下动手打警察以及他驾车闯红灯之类的案件都成了小事一桩。由于他擅自决定强攻米特拉山口，给部队造成了惨重伤亡，军中要求查办他的呼声很高。但本—古里安又一次包庇了他，把他调去当军事学院的院长。除本—古里安之外，梅厄夫人也很喜爱这个以粗暴闻名的骁将。

沙龙在反对党中也有朋友，他与本—古里安的死对头贝京有着亲戚般的关系。早年贝京的父亲与沙龙的爷爷是莫逆之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去世后，是他俩领头冲突拉比们的阻力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更有意思的是，贝京本人是由沙龙的奶奶亲手接生的。出于这种因缘，贝京曾多次要求沙龙的上司巴列夫将军提拔他，拉宾当了总理后贝京也来走过这个“后门”。

拉宾启用沙龙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把他当枪使。六天战争前他把沙龙派到南线当师长，沙龙那股子闹劲儿又上来了。当时拉宾希望早打，但总理艾希科尔有些犹豫不决。拉宾便让沙龙向总理施加压力。沙龙连眼皮都没眨就照办了，腰里别着手枪就往总理办公室里闯。当办公室主任要求他取下武器时，他愤怒地抽出手枪“砰”地扔到桌子上，厉声怪叫道：“如果你认为我要用枪吓唬总理的话，那你就想错了。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干，我只要嚷嚷几句就会吓得他拔腿而逃！”果然，沙龙粗声大气地“反映”了一通军队的意见，加重了艾希科尔的思想负担。

1975年6月，拉宾不顾国防部长佩雷斯和总参谋长古尔的反反对，坚持任命了沙龙为“国家安全顾问”。事前拉宾与沙龙密谈过好几次，沙龙明确说自己想当总参谋长，为此需要重新成为现役军人。拉宾答应尽力帮他这个忙。

拉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佩雷斯身边安个钉子，让沙龙给他找点麻烦。此外，他也有利用沙龙与贝京的特殊关系软化利库德集团立场的用意。但佩雷斯并不傻，他马上与古尔联手抵制沙龙插手军务。在他俩的激烈反对下，拉宾不得不宣布沙龙不能参加总参会议，并把他的头衔从国家安全顾问改为“总理特别顾问”。这样一来，沙龙就不能参加军事会议了，拉宾的计划完全落空。沙龙看到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尤其看到拉宾在 1976 年初访美没带上自己后，便于 3 月向拉宾递交了辞呈。但总的来说沙龙对拉宾还算客气，小骂常有，但还没闹到撕破脸皮的地步。

沙龙之所以给拉宾留了点面子，主要是欣赏拉宾对巴解的誓不两立的态度。在对付巴解组织及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上，他们态度是相同的，都主张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

1953 年 6 月，在耶路撒冷附近阿布弗什地区突然建起一座戒备森严的兵营。随后，附近居民开始饱受兵营中的枪声和爆炸声的骚扰。居民代表们跑到驻军长官那里反映，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因为，连驻军长官也不了解这个兵营是干什么用的，他只知道那个部队的代号是“101 部队”，里面的家伙个个凶狠无比。

101 部队长官就是 25 岁的沙龙少校，他是达扬挑选出来进行“反恐怖斗争”的负责人。这支 8 月 5 日正式组建的部队之所以要叫 101，是仿效美军 101 骑兵师起的名字，美国这支部队是支战绩不凡的突击部队，尽管后来它的战马已换成了武装直升机。沙龙有套带兵的独特方法，那就是平时进行超强度的实战训练，一般人根本受不了。他用恶声喝斥、加倍惩罚和亲自带领的方法操练部卒，许多人一个星期后便垮了，然后他又换上一批人。沙龙坚持他的部队不受弹药量的限制，训练中要不停地对着官兵头顶和脚下放枪，射击装有鲜红色蕃茄酱的头靶时不准闭眼睛。就这样，他的 101 部队从来没有超过 50 人，但个个都是射击和肉搏的高手。

从一开始 101 部队就用来执行政治任务，它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从西奈迁到内格夫沙漠中的贝都因部落赶出去。于是，这群“凶神恶煞”在深夜中降临了，他们疯狂地开枪驱散哭爹叫娘的贝都因人，然后放火烧掉他们的帐篷。在随后的“反恐怖斗争”行动中，沙龙对阿拉伯人的仇恨得到了充分发泄。让他只杀 1 个人，他至少要杀 3 个，他不在乎倒地血泊中的多是妇女和孩子。到后来他干脆不等命令也出击了，越界炸平被怀疑为恐怖分子老窝的约旦村庄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部下往往在安好炸药后才随便喊一声：“里面有人没有？”然后就点燃炸药包。事情闹大上级责怪他为什么要滥杀妇孺时，他往往辩解道：“这不能怪我。我叫他们出来，但他们不吭气，我又没时间去查他们躲在哪里！”

1954 年初达扬把沙龙的 101 部队扩编为第 890 伞兵营。这是个政策性的转变，这表明以色列领导人相信 101 部队起到了“反恐怖斗争”作用，并决定用一支更大的精锐部队来执行这一使命。到 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前，沙龙部队又扩编为第 202 伞兵旅。

1970 年 8 月，埃以之间的“消耗战”终于停了下来，以色列进入了“整顿”被占领土秩序的时期。当月在加沙市发生了一起袭击犹太人的事件。驾车穿越该市的一家以色列人遭到枪击，两个孩子被打死，母亲受了重伤。这使以色列占领军得到再好不过的整肃借口。达扬与总参谋长巴列夫把在加沙地带“建立秩序”的任务交给了沙龙。沙龙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用不了一

年时间他就能使加沙平静得像个公园。达扬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跳上吉普车与巴列夫一块开走了。

他们走后沙龙把下属叫到跟前。他一边往嘴里扔着果仁，一边下着一道道命令，一个空前残暴的整肃行动在加沙全面展开了。沙龙要让当地的巴勒斯坦难民尝尝他的铁拳滋味，要让他们在几年后回想起还发抖！

荷枪实弹的以军士兵排成一线缓缓向前推进着，在他们后面约 100 米处还有一排人，这是“篦子战术”。就像用篦子把头发里的虱子梳出来一样，沙龙要用这种士兵、吉普车和警犬组成的“篦子”，把阿拉伯“恐怖分子”全梳出来。他的士兵动作很熟练，草丛树后一有动静马上就是一梭子、遇上洞穴立即往里面扔手榴弹。沙龙把整个加沙划分为若干个区，给每个区编上号，一个区一个区地来回搜索。在士兵后面是油锯手和推土机。油锯手奉命锯掉一切不高不矮的果树，以便于以军搜索和射击藏身的“恐怖分子”，推土机见洞和坑就填，难民营的通道全被拓宽了，以便以军巡逻车畅通无阻。沙龙在他的指挥所里呆了数月之久，通宵不眠是常事，他习惯一边吃着零食一边下命令，他的部下对他那超人的精力和无穷无尽的点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7 个月之后加沙地带的“秩序”建立起来了。搜出的武器弹药成堆，抓来的嫌疑分子多得没地方关，还有数百人倒在血泊里。沙龙上报的战绩是：打死和活捉了 742 名“恐怖分子”。达扬信服地给了他全军通报表扬。沙龙断然否认自己下过格杀勿论的命令，但士兵们多次听见他叫嚷：“你们都给我听着，只有那些被打死的恐怖分子才是‘好的’恐怖分子！”按照他的命令，以军对占领区居民实行精神和肉体折磨政策。他们见到成年男子就命令他站住然后是浑身上下的搜查，稍有不从便是一顿痛打外加一星期的苦役。越是收获季节戒严和宵禁来得越频繁，庄稼和水果烂在地里树上只能怪阿拉伯人自己不老实。沙龙认为这样一来阿拉伯人就会彻底丧失斗志，他父亲从小就是这么教他的。

但他想错了。有他这种想法的拉宾也错了。

### 铁拳政策狰狞毕露 石头革命威力无穷

1987 年 12 月 6 日，一名叫所罗莫·萨克莱的 45 岁以色列商人在加沙巴勒斯坦居民区被人宰了。凶手干得很利索，从后面扑上来一刀插进萨克莱的脖子，他在地上拼命挣扎时，巴勒斯坦商人漠然地纷纷放下卷帘门。这在当地算不上是个大新闻，已勒斯乾人与犹太定居者相互伤害事件时有发生，但有人发誓要进行报复。8 日下午，一名以色列人驾驶一辆重型拖车逆向行驶，全速冲向对面开来的巴勒斯坦人车队。在轰然巨响声中 4 名巴勒斯坦人被当场撞死，7 人受了重伤，死伤者都是反抗精神最强的贾已利雅难民营的居民。数十名已勒斯乾人目睹了这一惨案。当天下午 1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扛着死者棺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送葬游行，沿途的巴勒斯坦人不断加入这支队伍，使之汇成一个抗议的洪流。突然，人群中打出了绿、红、白、黑四色的巴勒斯坦国国旗，人们振臂高呼反以口号，悲痛的送葬变为一场愤怒的示威。这场示威一直持续到深夜为止，以色列占领当局根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喊喊号还能翻了天？



9日清晨，一支乘坐吉普车的以军巡逻队闯进贾巴利雅难民营进行例行巡查。反常的是，男人们没像往常那样吓得躲藏起来，而是立在路旁仇恨地注视着以色列人。蓦地，数百名巴勒斯坦小青年冲上来包围了车队，接着愤怒的石块雨点般地投向以色列人。“砰，砰，”带队的军官开了两枪，一个名叫哈梯姆，西塞的15岁的小青年捂着胸膛倒下了，成为这场抗暴斗争的第一位牺牲者。从9日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斗争迅速地蔓延到西岸、加沙区的各难民营中，人们冲上了街头，多年来郁积在心头的怒火总爆发了。10日斗争达到了高潮。在所有被占领土上，天空中弥漫着焚烧旧轮胎的黑烟，街道上垒起一道道阻挡以军车辆的路障，成群黑衣蒙面的巴勒斯坦青年冲出来向以军投掷石头或土造燃烧弹。一场名为“因提法达”的反抗运动开始了，沙龙费尽心机建立的“秩序”顷刻间土崩瓦解。

西方称这场抗争为“石头革命”，因为巴勒斯坦人主要的武器是百头，电视中也是一群群的巴勒斯坦人向以军扔石头。巴勒斯坦人则爱用“因提法达”称呼这场暴动，此同之意是“震动、发抖、颤抖”，他们要用石头使以色列人心惊胆战。最初没人相信他们有这么大的本事，但后来人们认识到，在被占领土上石头具有比枪大得多的威力。用枪意味着暴力斗争，以军便有充分的理由开枪镇压，用不了两天就能平定局面。而扔石头则被认为是弱者的抗争，以军反而不便开枪了，尽管他们没少开枪。关键是个国际影响问题，世人看到全付武装的以军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以色列政府再说什么也没用了。“石头”洗刷了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的恶名，以军的枪击和殴打比扔石头更恐怖，世人的同情心一下子移到巴勒斯坦人身事情刚发生时，贝京政府头面人物没把它放在心上。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闹几天后就完事了，大不了像1936年那次骚乱那样多闹几天，没什么可怕的。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这场斗争根本没有停息下来的迹象，以色列军政头目慌神了。不仅是他们，连驻扎在突尼斯的阿拉法特等人也感到意外。负责领导被占领土抵抗运动的阿布·杰哈德坦率地承认：“当暴动发生时我们曾为它担忧。它使我们回忆起1936年持续了6个月的起义。当时我们没想到这次暴动会持续6个月以还有个人也没想到这一点，他就是拉宾。他当时是利库德一工党轮流坐庄政府的国防部长，把这场“石头革命”镇压下去是他的职责。事件发生那天他正准备出国访美，临行前他自信地对记者说这场麻烦持续不了几天。随后，他打电话给正在巴西访问的外长佩雷斯：“别担心，西蒙。军队很快就会控制住局势的。”但等他从美国回来后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仍在进行，他沉不住气了，召集占领区长官研究对策。1988年1月19日，他悍然宣布要对巴勒斯坦造反者实行“铁拳政策”，他要求以军对他们进行“尽可能的狠狠打击”。这是一个公开允许以军向起义者开枪的命令，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甚至连最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也深感羞耻。《耶路撒冷邮报》形容拉宾对巴勒斯坦人使用了“刺耳的兽性语言”。

此令一下以军大开杀戒，他们对反抗者使用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和杀伤子弹。其实以军使用的新型的5.6毫米橡皮子弹也能打死人，尤其是照着脑袋和肚子上打时。美联社记者在医院里采访了一个被橡皮子弹打伤的巴勒斯坦少年。他掀开被子让美国人看他的肚子，那里有个缝了20多针的可怕创口。旁边的护士说：“这种橡皮子弹能把肚子打出一枚美国银币那样大的洞。”

在此起彼落的枪声中，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聚集到西岸和加沙地区。在冒死采访过程中，许多记者被以军的催泪弹熏得泪流满面，一些不听招呼

的记者还挨了枪托。这促使他们把那儿的真实情景呈现给世界亿万电视观众：一声呼哨，几个用围巾蒙住半拉脸的小青年从小巷里冲了出来，敏捷地踢倒滚到路中央的旧轮胎，然后变戏法似地使它们燃烧起来：随着烈焰和黑烟的腾起，人们高呼拥护巴解和反对以色列的口号，三五成群的小青年们跑动着向以军士兵投掷石头；头戴防暴盔、身穿防弹背心的以军士兵几人一组搜索前进，石头飞来时他们躲在墙角观望，随即举枪瞄准、射击……

在一排刺耳的枪声中，一个扔石头的小青年倒下了，人们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下来。遮住脸的围巾被扯开，电视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记者们认出了她，他们昨天采访过这位 14 岁的中学生，她的学校被以军无理关闭了。她当时愤怒地对记者说：“在我们这里，每 30 步就有一个检查证件的大兵，以色列人每天都要强迫我证明我就是我自己。在我们看来，以色列人就是敌人，仅只是敌人而已！”电视镜头久久地停留在她那被击中的胸膛上，涌出的鲜血染红了她的白衬衣。她吃力地想说句什么，但一开口血就涌了出来，她头一歪闭上了眼睛。人类的良知被触动了，全世界发出一片斥责以军暴行的怒吼。

但拉宾没有发抖，他把这些大孩子也说成是阿拉法特指挥的“恐怖分子”。按他的命令，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被抓起来进行审查；大量的嫌疑分子被驱赶到约旦或黎巴嫩；搜出土造武器的房屋立即被炸毁；被当场抓住的巴勒斯坦抗议者首先被迫面朝下趴在街上示众，然后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 1.5 米高的拘留室，让他们躬着腰站着“反省”；宵禁从大白天的下午 4 点钟开始，挂蓝牌照的巴勒斯坦汽车 4 点后不准行驶；各难民营的大门被装满沙子的大汽油桶和水泥预制板堵上。远在突尼斯巴解总部的阿拉法特评论说：“我没有在被占领土上搞恐怖主义。我们将继续开展反占领的斗争，这是一个合法的斗争方式。对于遭到侵略和占领的人民来说，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有权这样作！‘拉宾的回答是，“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正试图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伸出肮脏的手够到并伤害我们！”

这种恶狠狠的话他在 1982 年 6 月也说过。当时沙龙正指挥以色列大军围攻贝鲁特西区，准备把那儿的已解总部来个一锅端。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是以色列史上最肮脏、最声名狼藉的一场侵略战争，目的是清除巴解力量和建立一个亲以的黎巴嫩政权。孤立无援的阿拉法特率领着数千名巴解战士殊死抵抗，以军伤亡的人数上升了。这时拉宾跑来给沙龙出主意。他领着沙龙在贝鲁特郊外看地形，叫沙龙断绝对贝鲁特西区的水、电、食品和医药供应，这样一来阿拉法特就插翅难逃了。这个主意正中沙龙下怀。就这样，他们两人合力打开了阿拉丁的魔瓶，放出了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魔，一场对巴勒斯坦人的血腥大屠杀拉开了序幕。

一种不祥的感觉驱使《耶路撒冷邮报》记者古德曼去萨布拉及夏蒂拉难民营看看，因为在 36 小时的枪声后那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但刚迈进难民营他就被吓得倒退了一步，他发现自己贸然闯进了一个大屠场：到处都是被野蛮残杀的死尸；一个脑门上中了一枪的男人手脚摊开躺在地上，被割下来的生殖器塞在他嘴里；一个瓦砾堆上躺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手脚不自然地向后弯曲着，下身裸露，被掀起的裙子盖住了她的脸。古德曼在她的尸体旁发现了乱七八糟的军靴印和 20 多个烟头，他似乎听到了匪徒们轮奸她时发出的狞笑声和她那悲惨的呼救声；一颗大口径子弹把紧抱在一起的母女打了个对穿，蹲在她们旁边的汉子已哭不出声来，只会不时地用拳头狠打自己的头；

一位穿着破烂棕色外衣的老年妇女，在一具肿胀的尸体旁转悠，她一手拿着几封信一手挥舞着头巾，冲着尸体尖声叫道，“喂，是你吗，你是我丈夫吗？噢，主啊，你怎么不说话呀！”……

古德曼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接着呕吐起来，随后惊恐地叫着逃离了现场。在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发生了骇人听闻大屠杀的消息，立即像闪电一样传遍整个世界，以色列老百姓全被惊呆了。几十年来，政府一直让他们牢记犹太人曾遭大屠杀的历史，而现在他们在电视中看到了这种大屠杀场面，但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在以军占领的贝鲁特。他们勒紧裤带供养的士兵，竟然跑到黎巴嫩去杀人放火，而且杀的尽是妇女和孩子。

沙龙成了众矢之的。当报道的死难者数目超过 800 人时。以色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大示威，参加者多达 35 万人。相当于当时以色列总人口十分之一。人们高呼“耻辱”及“现在就要和平”的口号首先来到沙龙住宅前面，喝令他出来解释，随后他们又来到议会大厦前进行抗议。在与右翼分子和警察扭打过程中，一名沙龙的崇拜者向汹涌人群扔出一颗手榴弹，参加过六天战争和赎罪日战争的示威者格龙茨威格当场被炸死。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杀人的事虽不是以军士兵亲手干的，但他们接到沙龙等人命令帮助黎巴嫩基督教民兵进行屠杀。在那伙叫作“弗朗吉斯”的长枪党民兵进行“卡萨奇行动”时，以军一夜不停地打照明弹帮他们在难民营中搜索被屠宰的对象。“卡萨奇”在阿拉伯语中是劈砍的意思，那伙屠夫在难民营中熟练地使用了斧头和刀子。《纽约时报》驻贝鲁特站长弗里德曼，曾擂着桌子冲着以军战地司令德鲁里大叫：“你们怎么能这样干？你们怎么会看不见？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德鲁里少将低着头没回答。弗里德曼 9 月 26 日在该报以四版篇幅翔实地报道了这一惨案，当年他获得了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耶路撒冷邮报》评论说：“1982 年将作为耻辱的一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为我们已被全世界当作西贝鲁特那场可怕屠杀的帮凶。”

### 水滴石穿立场渐变 大势所趋转向和谈

有些事对拉宾触动很大。

1984 年大选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拉宾应邀出席以色列大慈善家吉塔女士的家宴，当时他是利库德—工党民族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席间女仆请他去接个电话，拉宾对女主人表示歉意后起身而去。但他很快就回来了，而且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人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不情愿地解释刚才是魏茨曼来的电话，请求他允许把卡瓦斯迈赫德的遗体运回希伯伦市安葬。在座的人都知道卡瓦斯迈赫德这个人。他原为希伯伦的市长，是个很受市民拥戴的阿拉伯学者，因为常替同胞讲话被当时的利库德政权国防部氏魏茨曼撤了职。后来卡瓦斯迈赫德在安曼遭到暗杀，原因是他当过以色列占领区的市长。魏茨曼后来对此事很内疚，想帮他的家属把遗体运回故乡安葬，遂打电话请求拉宾特批。人们以为拉宾不会拒绝这一要求，女主人亲切地给他布了匙菜，“您肯定同意了这个要求”。

“不，我没同意！”拉宾恼怒地提高了嗓音，“这不是件小事，他的葬礼会变成一场抬棺示威游行的。我不想发生这种事。”

闻言餐厅一下子寂静下来，人们都以毫不掩饰的鄙视眼光看着他，就像看一个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似的。

最后占塔女士开口打破了沉默，“你就让他埋在故乡有什么不行？他也是个人，而且是个死了的人。”

拉宾无言可答，宴会不欢而散。

从1987年底到1992年中，以军“铁拳”已杀死1775名扔石头的巴勒斯坦人，数千人被打伤或致残。没人认为以色列有必要这样作，不管是它的敌人还是它的朋友，就连美国人的抗议声也越来越刺耳，一直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组织已主动与巴解代表会晤了。在国际场合人们常常质问以色列代表道：你们希望我们主持正义，希望我们牢记希特勒对你们犹太人的大屠杀，可你们是怎样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你们霸占了他们的土地，毁坏了他们的家园，还不准人家扔几块石头表示抗议？”这一质问的确很难回答，许多人不懂哀兵必胜的道理。

拉宾印象最深的是乌尔将军讲的一件事，他是驻扎在加沙地区的师长。他说，一天他去难民营巡查，遇到一位一岁多的“造反者”。这个黑卷发大眼睛的小男孩，手里也拿着一块石头，而且是块小手几乎捏不住的“大”石头。这孩子直瞪瞪地看着他，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像是要把那块石头扔到他脑袋上似的。乌尔将军说到这里感慨不已，摇着头叹息说：“他才一岁，刚刚学会走路。”

这种敌对情绪甚至在美国爆发出来。1990年11月5日晚9时许，纽约曼哈顿东区马里奥特大酒店二楼召开的一个会已接近尾声。此会是由一个名叫“犹太人思想”的犹太极端组织召集的，主持人是臭名昭著的反阿分子梅厄·卡汉。卡汉臭骂了一通阿拉伯人后开始回答提问，这时一名笑容可掬的男子缓缓站起来向他走去，像是要上前提个问题似的。没想到此人走到卡汉面前突然拔出枪来，冲他“砰砰”两枪，前胸和头部中弹的卡汉不治而死。刺客赛义德不是个贫困潦倒的巴勒斯坦人，而是个日子过得挺滋润的美籍埃及人，他修空调机每年能收入3万多美元。他直言不讳地对警方说，他不能允许卡汉肆无忌惮地辱骂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是人。卡汉在以色列是个家喻户晓的反阿狂，他的“保卫犹太人联盟”简称“卡赫党”，他一惯用“狗”这个词称呼阿拉伯人，说要反对他们“跟犹太女人睡觉”。在以色列性问题兜售种族主义黑货方面，他毫不亚于要杀尽犹太人的希特勒。以色列议会1988年9月通过决议禁止他竞选议员，他回到老家美国后继续从事反阿活动，他认为没人敢碰他。

穷兵赎武政策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分裂。赎罪日战争后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最流行的歌曲是：“以被活活烧死的坦克驾驶员的名义，以在火焰中从空中摔下来的飞行员的名义，我答应，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战争。”民众轰达扬下台的口号是：“达扬要沙姆沙伊赫不要和平——我们宁要和平不要达扬！”在1982年侵入黎巴嫩的战争中，随着伤亡增多以色列的反战运动空前高涨，许多以军官兵也卷入这一运动，装甲兵指挥官埃里·吉瓦甚至抗命拒绝进攻。在特拉维夫，抗议屠杀巴勒斯坦难民的群众受到右翼分子的手榴弹袭击，当场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受伤者被送进医院抢救时，右翼分子竟围住医院高声叫骂，有人甚至歇斯底里地狂呼：“最好把他们全炸死！”拉宾目睹了这一悲惨事件的始末，他被战争政策导致了民族的分裂深深地震撼了。

他永远忘不了自己与美国大学生激烈对抗的场面。美国大学生强烈反对以色列欺压阿拉伯人的行径，他在大专院校的讲演常被嘘声和质问打断，学生们怒斥他是“杀人凶手”。他想硬顶下去，毫不退让的学生们就用冲会场、拉火警及设炸弹的威胁封他的嘴。当时他对此很想不通，企图把此解释为学生们受了阿拉伯人的煽动，但他无法解释判断力很强的名牌大学学生闹得更凶的原因。在上层他也遇到过这种场面，看来犹太人金钱也不是万能的，他曾遭到过美国议员和官员的围攻，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以色列不能与巴解组织谈？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从事了反以斗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美英法部能与这样的对手谈，为什么偏偏以色列不能与对手谈呢，以色列到底怕的是什么并且想得到什么呢？他虽用巴解要消灭以色列的辩解把质问顶了回去，但不能说这些责问对他毫无影响。

还有一件事情使他很感慨。想当初，基辛格博士以“穿梭外交”推动阿以和解时，他作为以色列安全的捍卫者寸利必争。对方的萨达特和阿萨德也不含糊，同样是寸土不让。害得基辛格日夜兼程，来往奔波，自嘲为“为每寸地毯激烈讨价还价的小商人”。有时他们的助手都累得睡着了，他和基辛格还在地图上为每平方米土地争执不休。这时他往往觉得自己有些过份。作为一名军人他知道，一公里距离不过是踩脚油门的事情，不值得斤斤计较。后来他让了步，对方也让了步，脱离接触的过渡性协议达成了，并导致了后来的埃以和解。这使他懂得了没有退让就不会有妥协的道理，硬撑下去对以色列没好处的道理他很清楚。据以色列商会统计，阿拉伯世界40年的抵制已使以色列至少损失了360亿美元。只是这本账不能宣扬，不能让阿拉伯人看到自己的软处。

最可怕的分裂来自领导阶层，他的老战友魏茨曼成了反战议和的旗手，并为此受辱丢官去职。魏茨曼原先是个著名的鹰派，对阿拉伯人的态度甚至比拉宾还强硬，六大战争的突袭方案就是他提出来的。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他的爱子于1970年的“消耗战”中受了重伤之后，他逐渐由一只凶狠的秃鹰变为一只温和的鸽子。他很早就反对向约旦河西岸扩张，坚决反对在希伯伦市设立犹太定居点。在1987年巴勒斯坦人发起抗暴的“石头革命”后，他针对拉宾的铁拳政策大声疾呼与巴解组织会谈，公开反对拉宾下令刺杀巴解领袖杰哈德的行径，他的资历和战功使沙米尔拿他没办法。后来沙米尔终于找到了他的“罪证”，借此把他赶出了统治集团。原来，魏茨曼不只是嘴上说说，他还采取了实际行动，通过以色列籍的阿拉伯医生艾哈迈德·提比与巴解取得联系，并与突尼斯的巴解总部通了电话。不料，摩萨德特工把他的电话录了音，沙米尔遂在1989年威胁要以叛国罪审判他。此时魏茨曼已对利库德政权深恶痛绝，索性退出利库德集团，并辞去利库德政府的国防部长职务。

此事使拉宾既反感又伤感。他很反感用法令限制重要政治家的活动，早年他就违令参加了帕尔马契的集会，为此让本一古里安好好收拾了一顿。魏茨曼是什么人，他是首届总统魏兹曼的侄子、以军前空军司令和作战部长，他对以色列的忠诚还会有问题？对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人，说声不用就一脚踢开，真令人齿寒。拉宾不信邪，魏茨曼没办到的事他要试试。

机会来了。1989年冬天，他在美国费城一家旅馆中会见了一位美国企业家，这位商人说萨达姆想跟他会晤。他是位美籍阿拉伯人，为一笔石油大买卖去了巴格达，见到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谈完生意后萨达姆让人

上了喷香的薄荷茶。

萨达姆呷了口茶后突然说：“我想跟拉宾谈谈。你知道，他是现在联合政府中最强有力的工党成员，我了解他。你能帮我安排一吗？当时这位商人惊呆了，不知道萨达姆玩的什么把戏，弄清是他的真意后才答应下来。随后才有了上述费城会见。拉宾闻言沉思了半晌，毅然说：“我可以见他，我要设法使阿以和平进程取得进展。”最后他们商定，在一个欧洲城市里安排这一秘密会晤。那商人胆子很小，事后忙向美国政府作了汇报，他不知美国政府鼓励这种事。遗憾的是，由于海湾战争和其它原因，两次安排好的会晤都被萨达姆取消了。

除了这些潜移默化外，当然还有世道巨变和美国压力方面的原因。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可以说，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和不能改变的事物。中东昔日的敌友界限完全被打乱了，一些阿拉伯人已经逐渐习惯与以色列人相处，埃及这只领头羊已恢复了影响。90年代初敏感的记者发现，在以色列的博展会上有大批阿拉伯商人，以色列官员有意透露他们与阿方的半公开贸易高达5亿美元。即使在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保守国家，也能看到大量贴着“塞浦路斯制造”商标的以色列灌溉设备。1993年6月初科威特带头解除了对以色列的贸易抵制，分析家们认为阿拉伯国家集体制裁以色列的政策已名存实亡。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伙伙以色列游客悠然自得地观赏埃及的金字塔；科威特人每天大吃以色列的西红柿；以色列记者和学者在突尼斯与阿拉法特长谈……埃以媾和后阿拉伯国家形成了个“对抗战线”，成员有叙利亚、巴解、利比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等国。而现在只有利比亚和伊拉克两国坚持反以立场，其它国家出于各种原因都不太吭气了。而且，1993年5月底有大批利比亚人去那路撒冷朝圣，北非反以斗士卡扎菲也邀请数百名以色列人访问利比亚。看来谁都不想再硬撑着斗下去，但又都希望对方能先走一步，当然他们身后都有人拽着不让走。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增加了，因为它急于在苏联退出后控制整个中东，挡路的正是自己的盟友以色列。拉宾很清楚沙米尔是因为什么下台的，他明白失去美国的支持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由于沙米尔在中东和谈问题上表现得非常顽固，而且沙龙等人还挑起事端对着干，美国政府非常恼火。1991年7月初布什总统决定敲打一下顽石沙米尔，压他放弃僵硬立场参加马德里和会。他在7月1日对记者说：“我想有许多人不知道中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到这里布什把话头打住了，他想给以色列政府留点面子。沙米尔很清楚布什这一含蓄威胁的份量。他明白如果以色列再不顺从，美国就会把老底揭出来，告诉全世界242号决议就是要求以色列撤出侵占的领土。以色列领导人知道不能把美国人惹火了。美国每年名义上给以色列30亿美元，实际上给50亿美元，以色列还能从捐助者手中再搞到5亿美元。美国在40多年中总共给了以色列810亿美元相当于给了每个以色列人2万多美元，到月球上也找不到这么慷慨的施主。在“铁拳”不灵和美国施压的情况下，顽石般的沙米尔终于软了下来，终于同意参加马德里和会。海湾战争后的事态发展，又给工党二号人物拉宾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课。

但他同样清楚自己不能作过多的让步，因为至少有40%的以色列人不同意那样作。他只能作多数选民可以接受的事情，而且还得不时表现出些强硬姿态减少阻力，橄榄枝和鹰爪得轮换着用才行。下野期间他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政治上要敢于决断出手快，二是经济和安全上要让民众得到实惠。

1992年是以色列的大选年，拉宾打算东山再起。这一来是因为他的自我感觉良好，二来是他看到了利库德集团明显失势的迹象。

但他还能东山再起吗？

“存款丑闻”的阴影仍在笼罩着他，一些人认为他的人品有问题。小报记者们仍在起劲地挖掘这个“金矿”，而且常能刨出些东西卖钱。但这已是个乏味的话题，说到底那是他的钱，除非证明他把国家的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他的优势是多数以色列人拥戴他，愿意跟他走，心甘情愿地要把他扶上台。这种拥戴很奇特，很有些盲从的味道，因为比他体面和能说会道的人很多。说句难听的话，他在欧美国家中恐怕连个市长都选不上，他不具备那里的候选人的起码“条件”。他的最大本钱是六天战争英雄，但这在欧美国家中只是个很有限的条件，人们不认战争英雄必能治国的理，选民们还要求候选人具有体面的仪表、风趣的谈吐、优雅的举止和出色的社交能力。正因为如此，尼克松一跟肯尼迪对阵必定败北，因为他没有肯尼迪那种大受女选民青睐的个人魅力。

可惜，这些“条件”拉宾都没有。他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总是一副悲伤模样。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评语中有“内向和爱操心”的描绘。他战功卓著，但跟其他高级将领的关系不是太融洽，他们在自传中很少提到他。在社交场合他是个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不会到处握手和拍肩膀那套，舞曲一起便离席而去。他不喜欢社交，不会吹拉弹唱，以至他当到总理都不会跳舞，还要福特夫人在白宫里把着手教他。他到了社交场合喜欢呆在角落，往往他那个角落很快变成这一场合新的“中心”。除了足球和网球外，他对其它运动不感兴趣。他很少跟别人交换看法，什么事都是自己拿主意，除埃坦·哈伯尔等几个人外他几乎没有朋友。他从不依赖别人，他甚至只看原始的情报资料，不看情报机构作出的分析和判断。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说话的神态，在党内他总是用一种不容置辩的口气讲话，这往往使高层领导人很不舒服。他讲话的声音低沉而又单调，容易给人留下一个缺乏个性的印象。即使在朋友间他也很少讲笑话，其实犹太人是擅长幽默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拥戴他呢？关键在于人们信赖他。信赖这个观念有时很难解释，就像活泼的姑娘往往会看上一个文静的小伙子一样，不一定讲得出道理来。以色列老百姓看拉宾搞什么都很踏实，而巨总能搞出名堂来，觉得他比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人可靠。人们觉得他比沙米尔温和务实，又比佩雷斯强硬果断，历来警惕着以色列的安全，因而尊称他为“安全先生”。此外他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虽颇具魅力但从不乱搞女人，老百姓觉得把自己交给这种人放心。他在群众中随和得很，走到街上常有人直呼其名上来拍他的肩膀，此时他往往会用两句粗俗的俚语逗得人们开怀大笑。到70岁时以色列已无人可与他匹敌，党政军三个方面他占全了，人们本能地相信姜还是老的辣。当然佩雷斯各方面也不错，但他缺少拉宾的威望和魄力，而且跟利库德集团斗输多赢少，因此广大党员强烈要求拉宾重新出山改朝换代。

利库德集团执政多年，经济和外交越搞越糟，到沙米尔时已走入死胡同。人们期望以色列的内外政策能有个较大的转变，让他们过上安全和富裕的日子。此况下，2月19日拉宾重新当选为工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这使他深感振奋，确信自己能够重展宏图。

## 第十三章 二度出山

1992年是以色列的大选年，到了6月初两党的竞选活动达到了高潮。随着投票日期的临近，双方支持者争奇斗胜的花招越来越多，摩拳擦掌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

### 击败对手重登宝座 采取主动推动和谈

6月9日大白天，利库德集团党徒赶着一头不知所措的毛驴在特拉维夫大街上游行，那头可怜的牲口背上驮着一个大招牌，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拉宾先生，以色列人不是蠢驴！”毛驴后面跟着一辆装着四只大喇叭的宣传车，沿途高声告诫选民，千万不能把那个遇到大事便犹豫不决、华盛顿外交界中的酒鬼以及在国外有存款的撒谎者选上台。工党支持者一看肺都气炸了，决定以牙还牙。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把一群毛驴赶到了利库德集团总部门前，那群牲口又叫又拉驴粪蛋，吸引了一大群市民围着看热闹。它们驮的招牌是：“只有蠢驴才不懂得该换个政府了！”利库德党徒一卷袖子冲上去就要打，要不是警察赶忙插到中间制止武斗，那天双方非打个头破血流不可。

拉宾担心的不是对手的挑衅，而是本党支持者的过份狂热，他们的馊点子引起风波往往使自己很难堪。在发生“毛驴战”的前几天，许多以色列人突然收到免费发放的避孕套，上面印着工党的竞选口号。这些口号多少有些揶揄沙米尔的意思，利库德集团立刻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扬言要上诉到最高法院，控告工党在竞选中的卑劣手段。它抨击工党是个堕落透顶的政党，居然把竞选活动开展到人们做爱的床上，构成了对本党候选人沙米尔的人身侮辱。见势不妙，6月2日拉宾赶紧跑到电台上谴责这种下流作法，警告“罪犯们将会受到严厉的纪律制裁”。这才算把事情压了下去。

投票前夕，以色列政治分析家纷纷撰文预测大选结果。他们预言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既不会有赢也不会输，最后的输赢将由几个席位来决定。他们继而指出，现在胜负的关键不在于两党谁的嗓门大，而在于谁能得到前苏联犹太移民的支持，他们手中的20多万张选票决定着8个议席的归属。其实根本不用他们指点，两党早已行动多时，一家一家地游说。工党用和平前景来打动这些犹太移民，告诉他们：正是由于利库德政权的顽固不化，美国才不给以色列100亿美元贷款，才使你们到今天生活还没着落；利库德集团则用“大以色列”梦来吸引这些人，对他们说：只有我们才能使你们到广阔的约旦河西岸定居，你们可以在那里迅速发家致富，美国佬那两个臭钱算什么？记者们恨不得挨着个儿地询问，但这批新移民的态度不明朗。

在捉摸不定的气氛中，6月23日以色列选民投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很快结果出来了：在120个议席中，工党获44席，比1988年大选增加了5席；利库德集团得32席，比上次减少了8席；双方的差距是12席。拉宾激动地看到，他把1977年令人耻辱的惨败记录正好翻了过来。那一年，利库德集团以43：32击败了工党，使工党饱尝了10多年在野拼搏的辛酸。

兴奋之余，拉宾不由得想起1984年那次大选的结局。那年工党本来已经以44席对41席领先于利库德集团，但由于只有微弱优势无法组阁，只有把



组阁权交给了利库德集团。最后得到一个令人作呕的结果：由于谁也无法取得明显优势，两党最后组成了一个轮流坐庄的“联合政府”，沙米尔和佩雷斯轮换着当总理。这在世界议会史上是空前的。400 万人的以色列竟产生了一个 25 位部长的庞大内阁，每个党的 12 名部长大天瞪着斗鸡眼找对方毛病。从成立那天起外电就评论这个“两头怪物”寿命不会长，因为两党主要精力全都用到了扯皮上，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拉宾认为那次大选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工党对选民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明确提出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及停止在西岸人口稠密区建定居点，从而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从那年选举结果来看，50%以上的以色列人是愿意这样做的，这就为工党今后大胆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7 月 10 日拉宾完成了组阁工作。这次组阁比较顺利，他任命了自己的老对手兼老伙伴佩雷斯为外长，自己兼任重要的国防部长一职。7 月 13 日，以色列第 13 届议会对他的“中间偏左”联合政府投了信任票，他成为以色列的第 11 届总理。他随即发表了精心准备的就职演说。

在充满了自信和激情的演说中，他要求以色列人摒弃 40 多年来的孤独感，抛弃“整个世界都反对我们”的陈腐观念，坦然和理智地处理各种棘手难题。他强调，他执政期间将把结束阿以冲突及致力中东和平的工作置于首位，采取务实、灵活和大胆的步骤来推动中东和谈。作为第一步，他提出以色列愿意讨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自治问题，并邀请约旦—巴勒斯坦代表到耶路撒冷正式会谈。

他还建议今后不要再用“和平进程”这个提法，因为这句话说了 10 年而和谈毫无进展，他提议今后使用更能表明以色列诚意的“实现和平”提法。他呼吁阿拉伯领导人以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为榜样大胆迈出和解的步伐。他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和黎巴嫩总统到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并声称自己随时可以去这些国家讨论任何问题。为了打动他们，他在讲演中引述了以色列最著名诗人肖尔·切来柯夫斯基的诗句：“尽管看来还遥远，但我确信，在将来国与国之间出现平静和相互祝福之际，和解的日子就来临了。”

接着他把手伸向巴勒斯坦人。他劝告他们别再受其领导人的“欺骗”了。他呼吁：“听我说，哪怕就这么一次。我们从目前的立场向你们提出最公正和最可行的建议——自治——一种有利和有限的自治。你们不会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们也不会。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可能一上而不复返的机会。”在挥舞了橄榄枝后他又扬起了鹰爪，扳下脸来警告巴勒斯坦好斗分子别在谈判期间轻举妄动，否则以色列政府将严厉打击他们的暴力活动。

在阐述了大力加强以美关系、加速国营企业私有化和妥善安置新移民等问题后，他动情他说：“各位议员先生，西奥多·赫茨尔曾经说过‘人们的成功源于他们的梦想’。尽管我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尽管人们对我们有种种非议，我们通过梦想和斗争已经建起了一个安全的犹太人天堂。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几代人的梦想已成为现实。”议员们掌声雷动。

他的和平倡议在中东地区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欢迎。阿拉伯人比以往成熟多了，他们没像以往那样对以色列的倡议不假思索地说“不”。相反，出席中东和谈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女发言人阿什拉维肯定他的倡议是“令人鼓舞”的，埃及外长穆萨也赞扬他的倡议引起了“某种乐观情绪”。随后不久，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邀请他进行正式访问。与此同时，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强调要对他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他的言行是否一致。阿拉伯报纸一致指出，对拉

宾来说“以土地换和平”的时候到了，这是对他声称的“诚意”的真正考验。

拉宾决心不给人们留下一个他只会卖狗皮膏药的坏印象。他上台伊始就宣布冻结 100 多个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包括为新移民建造的 6000 套住房工程。他还派军警阻止犹太移民“自发的”建房行动，驱逐沙米尔时期在东耶路撒冷强占阿拉伯人住房建立定居点的犹太人。他保证要在 1993 年允许巴勒斯坦人选出西岸和加沙地区的自治机构，5 年后就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为了表示诚意，他吸收了两名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头面人物担任内阁副部长，还允许巴勒斯坦著名领导人侯赛尼重开他的“阿拉伯研究中心”。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准备修改或废除不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令，并表示不再反对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中东和谈。9 月 10 日他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首次表示以色列从戈兰高地部分地撤出是可能的。他还拒绝保证不拆除以色列建在戈兰高地上的 32 个定居点，他要求人们“放弃以色列是宗教圣地的主张”。以色列《晚报》就此发表评论说：“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放弃了要献身于戈兰高地的誓言。”接着从耶路撒冷传出了以色列准备向叙利亚购买或租借一部分戈兰高地的流言。

布什政府对拉宾的和解姿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刚上台，美国国务卿贝克立即从九下中东的途中赶到耶路撒冷祝贺。他与拉宾热烈握手的场面，与对沙米尔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接着，布什热情邀请拉宾 8 月份访问美国。在 7 月 17 日拉宾和平解决了 3000 名巴勒斯坦学生与以军对峙 4 天的问题后，20 日美国政府决定向以色列提供 100 亿美元贷款的担保。美国报纸指出，布什与拉宾的会谈，标志着被沙米尔搞僵了的美以关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拉宾这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和平攻势，使中东各种政治力量感到兴奋、吃惊或不安。在以色列，前总理沙米尔愤怒谴责拉宾“廉价拍卖了”以军将士以鲜血换来的戈兰高地，数百名戈兰高地定居者 9 月 14 日在议会前举行示威，反对政府准备把他们的居住地还给叙利亚人；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示威者是工党的成员。在阿拉伯世界，他的攻势引起一场外交风暴，各国政府急忙协调它们的对以立场，但发觉要作到这一点很难。埃及和约旦认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阿以和解大有希望；叙利亚、黎巴嫩和巴解组织则认为，拉宾的让步还差得很远，真正的和解是以色列放弃所有被占领土。除埃及外这些国家都有顾虑，它们明白拉宾已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让步，不能粗暴地推开他伸出的手，否则很可能真像他所说那样以后没这种好事了。但握住他的手意味着自己也得进行让步，有得也有失，它们感到进退两难。此外，它们都害怕拉宾以各个击破手腕与各当事国分别成交，那样一来坚持到底的国家最后就会变得一钱不值。拉宾一眼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他在 12 月 6 日弦外有声地说：“我认为，我们在 1993 年是会达成一项协议的。即使不能与所有的阿拉伯代表团达成协议，也会与某些国家代表团达成协议的。”

对国内反对派的鼓噪拉宾并不过份担心，他早在大选前就摸清了对方的底细。大选前两天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8% 的以军后备役将领认为应把约旦河西岸还给约旦人或巴勒斯坦人；71% 的人同意把大部分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100% 的人同意从加沙地带撤军；76% 的现役将军认为以色列可以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对领土和安全最敏感的将军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渴望和平。而且据调查，40% 以上的前苏联移民支持工党和

解政策，而支持利库德集团的人不到 15%。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人移居以色列图的是安定和富裕的生活，他们不是来跟阿拉伯人打仗的。

此况下，拉宾在以土地换和平问题上的态度相当强硬。在发生了一些定居者反对归还戈兰高地的示威后，他在 9 月 17 日声色俱厉地说：“以色列是个民主、法制和主权的国家，有一个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政府。政府的决定必须得到每个公民的尊重，因为我们不能使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实现和平的机会，这样的机遇也许以后不会很快再出现。”

拉宾这一炮打响了，利库德集团和极端的宗教党派没能闹起轩然大波来，尽管严格地说拉宾要归还戈兰高地的举动是“违法”的，因为 1981 年议会通过了吞并戈兰高地的法律。反对派除了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外，也看到了拉宾强硬的一面他们明白拉宾的为人，知道他的让步是有限的，作为鹰爪鸽派他一旦发怒什么都干得出来。果然，拉宾不久便显示了一下鹰爪的锋利。

### 软中带硬重挥铁拳 硬中带软授意密谈

1992 年 12 月 17 日，6 辆隆隆作响的大客车鱼贯开到黎巴嫩政府军控制区前。车门一开，押车的以军如狼似虎地把 415 各巴勒斯坦人赶了下来，命令他们进入黎巴嫩政府军控制区原来，他们是一批被以色列当局驱逐出境的巴勒斯坦人，罪名是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制造骚乱”和“涉嫌绑架”。无奈，这些人手举古兰经高呼反以口号向黎军边防哨所走去，他们满以为黎巴嫩政府会像以前那样收留他们。但这一次不行了，黎军长官不准他们入境并命令他们返回原地，因为黎巴嫩不愿再充当以色列驱逐的巴勒斯坦人的收容所，否则只会鼓励以色列当局驱逐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在说不通的情况下，他们准备进入以色列设在嫩南部的“安全区”，但以色列走卒南黎巴嫩军早用两辆装甲车和一辆坦克堵住去路，黑洞洞的枪、炮口对准了他们。情急下这些人返身登上大客车，但立即被以军士兵连踢带打地推下来，随后朝他们头顶鸣枪逼他们往前走。就这样，这 415 名巴勒斯坦人在三面枪口威逼下被迫滞留在“文界处”的无人区中，成了谁也不接受的“难民中的难民”。中东是地中海型气候，冬季寒冷多雨，这些无处藏身的人在凛冽寒风和瓢泼大雨中冻得瑟瑟发抖，饥寒交加，处境极为悲惨。

这是拉宾对敢于闹事的巴勒斯坦人砸下的一记铁拳，他的火儿已经憋了很久了。6 月 23 日他刚取得大选胜利，25 日就有两名以色列卖菜小贩在加沙被人用刀捅死，在随后追捕凶手的枪战中又有一名以军士兵被击毙。当时拉宾发出要用铁拳回击的威胁，但没动真格的，因为他不想破坏自己刚树起来的鸽派形象。但到 10 月份之后这种袭击活动升级了，先后有 6 名以色列军警被打死，多人受伤。巴勒斯坦斗士已不再满足扔石头了，他们也用起了枪，枪手们往往是从飞驰的车辆中对以军巡逻吉普车射出雨点般的子弹。以军死伤人数直线上升，拉宾沉不住气了。

12 月 13 日发生了一起震惊以色列的劫持事件，以色列边防警官尼希姆·托勒丹诺少校在上班途中被人绑架。拉宾政府急忙表示愿与劫持者谈判，对方也说人还活着，但 15 日清晨人们在一条公路旁发现了这位警官的尸体。这下子反对派闹开了，纷纷指责他对巴勒斯坦人太软弱太仁慈，要求他对敢

于作乱的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措施。于是拉宾劈下了他的鹰爪，下令把整个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严严实实包围起来，挨家挨户地搜捕凶犯。以色列军警在大搜捕中一口气抓了 1600 多人。12 月 16 日以色列内阁决定对其中一些人实行为期两年的驱逐，17 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批准了这项驱逐令。这样便出现了上述的悲惨场面。

这是六天战争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最后一次驱逐。自 1987 年“石头革命”爆发以来，以色列当局总共驱逐了 70 多人，但这次一下子就把 400 多人赶出了家园。在 18 日以色列军警再次开枪打死 6 人打伤 30 多人后，国际社会震怒了。联合国安理会于 18 日一致通过了谴责以色列驱逐行动的 799 号决议，要求它取消驱逐令把被逐出的巴勒斯坦人接回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要求安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迫使以色列执行 799 号决议。换句话说，加利是要求对以色列采取制裁行动。欧共体、阿盟和非统组织也表示了相同的立场。就连美国国务卿伊格尔柏格也对这种行径表示了厌恶，他致信以色列政府强烈反对这种驱逐。一时间，以色列成了国际社会的千夫指，面临着受联合国制裁的威胁。

但拉宾脾气上来后什么人都不怕。他的发言人在 19 日称安理会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令人失望的”，他本人在 1993 年 1 月 26 日猛烈攻击加利，指责他要求制裁以色列的做法“在安理会几乎史无前例”。他一再发誓以色列绝不改变驱逐决定，有阵子他还不准国际红十字组织通过以色列为被逐者运送食物药品。但他的班子却没那么齐心。1 月 5 日副外长伊巴伊公开说这次驱逐是个非法行动，外长佩雷斯也在 9 日说此事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

拉宾之所以敢硬顶，主要是有刚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撑腰，美国公开表示不准安理会制裁以色列。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重施两面派故伎：一方面它对以色列驱逐难民表示反感，但这是作给阿拉伯人看的，因为阿拉伯人常痛斥美国对阿拉伯和以色列采取双重标准；另一方面它告诉拉宾美国将否决制裁决议，叫以色列赶紧作些让步争取主动。拉宾一点就通，立即作出和解姿态。他 1 月 23 日对英国的中东电台说：“我认为，过去作的错事太多了，想方设法解决这场危机的时刻已经到来”2 月 1 日他宣布让 100 名被逐者回家团聚，并说剩下的 300 多人可在一年后回来。美国立即对此大声叫好，并在 10 日告诫阿拉伯国家别再逼以色列了。就这样，在美国大力庇护下以色列没受到制裁，这个问题不了了之。

尽管美国庇护以色列过了关，此事还是给了拉宾一个深刻教训：今后以色列不能由着性子乱来了。要是在前十年，别说是驱逐几百名巴勒斯坦人，就是杀个千把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世道变厂，国际计会不再容忍以色列肆意欺压巴勒斯坦人。要是巴勒斯坦人用刀枪硬拼还好说，以色列可以辩解说自己是自卫，国际社会也不好说什么；而现在巴勒斯坦人是用嘴巴和石头抗争，反倒弄得以色列难以下手，左右为难。实际上以色列怕的不是阿拉法特的巴解，而是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温和派，尤其是侯赛尼、阿什拉维女士和沙菲博士三员大将。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者，在西方很有影响，对这种人既不能杀也不能关。沙米尔曾派出一流电视辩论高手内塔尼亚胡（现总理）对付他们，对方应战的是 40 多岁的阿什拉维女士，在激烈的辩论中内塔尼亚胡觉得很吃力。阿什拉维是西岸比尔宰特大学讲师，在美国受过教育，一口流利的英语，被你为“人民起义的发言人”。沙菲博士是个受人尊重的医生，没人相信他的手术刀会伤害以色列人。对侯赛尼就更不能抓

了，他是 1948 年战争阿方领袖卡德尔·侯赛因的儿子，深受巴勒斯坦人的尊崇。他已被以色列当局抓过 5 次了，每抓一次他的威信就高一层，到后来当局觉得还是不抓为好，不能为他树碑立传

当“和平”一词对自己变得有血有肉时，人们的感受就不同了。拉宾家中出现了这个词，而已频率越来越高，这个词是从他的外孙乔纳森口中发出的、他是在西岸和以黎边界服役的十兵。当他母亲达丽亚和外婆莉赫为他失眠和担心时，拉宾心疼地望着她们。死神在自己外孙附近转悠，真主党的喀秋莎炮弹已打死了他的战友，什么时候轮到乔纳森？拉宾变得怕瞧大女儿和老伴的眼神。他已是四代人当兵扛枪了，老拉宾、自己、儿子尤瓦乐和外孙乔纳森，还需要多少代才能赢得和平？

拉宾在两个问题上从不让步：一是坚持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个问题谈都不能谈；二是不同意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只同意有限的自治。勿庸忌言，他头脑中也有“大以色列”的残余，他在就职演说中仍称西岸为“朱迪亚和萨马利亚”，这跟利库德集团并无区别。梅厄夫人一再重复的“在地中海和沙漠之间只有以色列和约旦的位置”的话，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吉迪恩·列维在《国土报》上指出：“他嘴里没讲出所有隐藏在心中的东西，他心中隐藏的东西相当黑暗，这就是拉宾。”这家报纸还披露，他曾对亲友讲过“我希望加沙地区最好沉到水底下去”的话。阿什拉维闻言大怒，痛斥他这番话有鲜明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拉宾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在 1976 年下台后总结了经验教训，知道只要搞好经济和安全就没事，而只有坐稳总理宝座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二度出山后大抓经济问题，私有化搞得很红火，以各种增收节支措施扭转经济颓势。在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后，他从布什那里搞到了 100 亿美元贷款，解决了安置移民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问题。1992 年他使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6.5%，投资额增长了 8%，人均收入达到了 13000 美元。经济、外交局势一好转，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他使老百姓看到了自己当总理的好处。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反对派也没闲着，几次找机会想在小沟里掀翻他的大船，但他没费多大劲儿就瓦解了对方的攻势。此况下他的信心十足，他的经济顾问们甚至扬言以色列不一定需要美国每年给钱，当然他的橄榄枝和鹰爪也运用得更加自如了。

世人万万没想到，在他重挥铁拳的同时，他正于着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

1993 年 8 月 20 日深夜，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帕克路 45 号外交部大楼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一些人在低声交谈着，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而令人激动的气氛。在场的有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巴解代表阿布·阿拉和他们的几位助手，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草签以巴和平协议，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已艰苦地谈判了 8 个多月了，协议草签后人们自己动手打开了香槟酒，相互举杯庆贺起来，有的人眼角里甚至涌现出激动的泪花。人们的心情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脸上：这是真的吗？我们真的开始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了吗？他们情不自禁地用发出响声的碰杯告诉自己这是真的。巴解代表阿布·阿拉首先抱歉向众人告辞，他不得不先走一步，因为他不能让外人看到他与佩雷斯一起走出外交部大楼。他是用假护照到挪威的，即使是签定了协议也不能暴露身份。更不能过早地暴露巴以密谈。

事情还得从 1992 年 11 月份谈起。当时在华盛顿的巴以和谈陷入僵局，

阿拉法特很着急，请巴方谈判代表侯赛尼和阿什拉维想办法找其它突破口。也就是说，除华盛顿这个公开渠道外，还需另找一个秘密渠道跟以色列谈，中东的事情不密谈很难成交。此况下他们找到了以色列海法大学历史教授赫希菲尔德，请他帮助打开局面。赫希菲尔德是个敢说敢干的人，他不顾政府禁令 12 月会晤了巴解高级官员阿布·阿拉，双方敲定了私下密谈的问题。然而，双方虽坐下来谈了，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以方代表是热心的学者而不是负责的官员。看来还得另辟蹊径。于是，阿拉法特 1993 年 3 月又试图走美俄大国外交的老路。但这个弯子绕得太大了，而且犯了美国人的忌讳，这种事他们不想让俄国插手。俄国人表示愿意协助，但美国人不愿作以色列人的工作，而且话还说得挺难听：要走就从正门走，别老琢磨从窗子爬进屋的馊主意。因此这条路也堵死了。尽管如此，拉宾还是了解到对方的诚意，他不想把阿拉法特逼得走头无路。因此当巴解执委会成员阿布·马赞通过一位实业家进行试探时，拉宾点了头。

阿布·马赞 1935 年生于现为以色列的加利利的萨法德镇，真名为马哈茂德·阿巴斯，是法塔赫最早的成员。自 70 年代以来他一直是巴解领导人中不引人注目的鸽派，在华盛顿工作期间就开展了与以方的协调活动，与欧洲的同情者和以色列左翼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不顾巴解激进派的反对，坚持与以色列和解完全符合巴勒斯坦利益的观点，到 90 年代初他的主张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阿拉法特非常信任他，委托他全权负责与以方直接会谈的工作，而对包括政治部主任卡米在内的其他执委一直封锁着消息，到最后也只有极少数亲信知道内情。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哪儿谈。在美国谈看来是不行了，那里耳目太多根本无法保密，得另外找个地方。以色列副外长约西·贝林提议在挪威谈，因为那里僻静不引人注目，还因为挪威学者拉尔森擅长安排这类密谈。最初派去谈的是赫希菲尔德及让·庞达克教授，为的是去探探虚实，到 5 月份佩雷斯提高了会谈的档次，叫外交部精通谈判的尤里·萨维替换了打开局面的教授。谈判走上了正轨。

1993 年 1 月的寒冬，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在家中不安地踱来踱去，不时看看手腕上的表。他在等候以、巴和谈代表的光临，一切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他这个东道主绝不能出半点儿岔子。不多时有人先后打来两个电话，他放下话筒后轻松地舒了口气，随即出门驱车远去。他接电话之前，两架班机先后降落到挪威两个不同机场上，一切正常。在一个机场上，舱门一打开，挪威学者拉尔森立即从舷梯旁把巴解代表阿布·阿拉一行接走：在另一个机场上，他的妻子朱尔以同样的方式，把以方代表赫希菲尔德和让·庞达克接走。这两拨人分别乘车向奥斯陆东南方 80 公里处保尔高德庄园急驶，以巴之间面对面的直接和谈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但这场密谈最初拉宾没出面，而且对它有些三心二意，完全交给佩雷斯去处理。应当指出的是，佩雷斯在这次密谈中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积极主动地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和谈的进展。时间改变着人，不仅是拉宾，还有他自己，他希望早日实现和平。

还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拉宾与佩雷斯的关系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两人以前是种既离不开又合不拢的关系，你踹我一脚我蹬你一腿地闹别扭，但谈不上是为原则问题。在外人看来他俩是最佳搭档：拉宾魄力大控制局面能力强，佩雷斯涵养深善于处理内外关系。但两人一直不能精诚合作，终日

勾心斗角谁也没捞着便宜。1977年工党政权垮台后佩雷斯也进行了反思，结论是如果两人继续斗下去工党将难以翻身。怎么办，只有让着点儿拉宾，谁让自己比他小一岁呢？因此他后来对拉宾相当宽容，即使明显的是拉宾不对，他也不过份计较。

1979年中期拉宾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书中有不少对佩雷斯的贬损之词，一些话甚至成了利库德集团攻击工党的炮弹。这引起了许多工党上层人士的不满，他们为此在7月12日开会质问拉宾：既然你认为佩雷斯不是个东西，说他不适于当总理，那你为什么在下台时要提议他代行总理职务呢？为什么你后来又赞成他出任党的领袖呢？拉宾一时语塞。前司法部长哈伊姆·扎克多总结性地指出，拉宾的书没能损害佩雷斯，只损害了他自己及工党的声誉。本来这次会议可以通过谴责拉宾的决议，但佩雷斯无意如此，挥挥手了结了此事。

1980年拉宾想东山再起，10月份他写了个条子给佩雷斯，说自己想当工党主席。这是比以前文明一些的挑战，因为佩雷斯正当着主席。但他不知佩雷斯手中有个对自己极其不利的“钢鞭材料”，那是一个名声不佳的大商人为莉赫支付罚款的支票复印件，而拉宾曾信誓旦旦他说过别人没为他们支付过罚款。佩雷斯只要让人们看看这张复印件拉宾就完了，他不仅当不上主席而且将更加名誉扫地，因为他又一次撒了谎。但佩雷斯没那样作，他认为拉宾的积蓄凑不出那么多罚款，别人帮着垫付一下也无可非议。因此，他对报界否认自己手中有这个复印件，从而挽救了拉宾的政治生命。这一举动大得人心，那年他以压倒的多数连任党主席。同样，当拉宾在1984年提出他要当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时，佩雷斯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拉宾了解佩雷斯的良苦用心，对此也颇有同感。随着年龄增大他变得更加成熟了，逐渐懂得万事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只有胸怀坦荡才能成为大政治家。因此在1992年党内竞选时，他首先提议大家都投佩雷斯的票，在自己当选为主席后立即提名佩雷斯为二把手。从此，两位多年的老对手兼老伙伴靠得更紧了。

### 亲自督战加快进度 搭档配合不辞劳苦

至于拉宾为什么对奥斯陆密谈三心二意，一是因为他对阿拉法特仍有成见，二是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阿萨德。

他对阿拉法特的成见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挥之而去的。他在1992年11月24日说：“我认为阿拉法特是和平的一个障碍。”但他随即补充说：“我没说巴解组织。因为我认为那些在突尼斯(巴解总部)的人要比他更实际一些。”他的助手12月27日说：“拉宾总理正开始给予巴解组织合法性。他把矛头都对准了阿拉法特，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阿拉法特象征着恐怖主义洪水猛兽。不过他没攻击巴解组织。”听到这话阿拉法特很生气，反驳说：“我认为，我并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拉宾也是中东和平的一个障碍。如果我们两人都是和平障碍的话，我们就有责任进行会晤，共同来排除这些障碍！”他接着怒气冲冲地说：“拉宾是个聪明人，但他经常是用体力而不是用脑力考虑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拉宾多少有些意气用事。许多没见过阿拉法特的人，包括

戴着有色眼镜采访他的西方记者，最初都把他看成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但一经接触印象完全改变了。他们都盛赞阿拉法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是他受到的压力太大，许多事情他身不由己。阿拉法特此时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海湾战争后他断了财路，驱逐事件后他坚持和谈又失去了许多支持，这时他最需要取得和谈成果。此际拉宾如能与阿拉法特谈，肯定能取得突破性成果，但他犟着劲地一再说不。这实在没什么必要，因为他在1993年4月30日会见了巴解法塔赫创始人萨夫拉维，而法塔赫的领袖正是阿拉法特。

拉宾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更感兴趣，他很想跟对方达成一项贝京-萨达特式的大交易。拉宾历来只敬佩强人，阿萨德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公认的强人，他一点头嫩巴黎和约旦都会跟着走。那样一来，阿以冲突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阿拉法特只能乖乖就范，根本没有提条件的份儿。这就是他上台后归还戈兰高地的议论很热闹过一阵子的原因。

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权衡，他最终作出了选择巴解作为和谈对象的决定。这是因为：第一，叙利亚不愿作什么让步，始终坚持先还戈兰高地再谈别的。而以色列有一半人不接受这个条件，因为它涉及以色列的供水、安全和定居者等大问题，戈兰高地上有1.4万名住了20多年的以色列人；第二，巴解愿意做出诸如承认以色列及放弃恐怖活动的重大让步，而且加沙是个以色列人都主张快扔掉的大包袱，与最没本钱的巴解媾和代价最小；第三，与巴解议和有助于减轻哈马斯的威胁，近年来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巴解回来后肯定会压制不驯服的哈马斯。美国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很担忧，8月份来访的克里斯托弗特别叮嘱过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对局势的观察结论促使拉宾作出了这一选择。

1992年底以色列当局驱逐了415名巴勒斯坦人后，拉宾和阿法拉特的日子都不好过，都承受着沉重的内外压力。拉宾上台时曾发誓要全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解决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但言犹未了他便对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挥起了铁拳，国际信誉大受损害。在国内，反和谈的势力嘲笑他的善意可笑之极，认为那只会鼓励哈马斯等极端势力更猖獗的暴力活动。阿拉法特也是同样。他欢迎拉宾的和解姿态，但随即发生的驱逐事件使他相当被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哈马斯的影响急剧增长。相对来说拉宾的处境要好些，由于美国大力庇护总算渡过了安理会的制裁难关，夺回了一些外交主动权。而阿拉法特的地位则每况愈下，除了海湾战争引起的政治危机外又增添了财政危机，巴解组织已经窘困到了出售房产来维持日常开支的地步。这种严峻的形势，迫使他首先主动地采取与以方直接谈判的行动。

阿拉法特的手伸了出来，接不接这只手就要看拉宾了，衡量拉宾是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此一举。拉宾没让人们失望，他迟疑了一下也伸出了自己的手。他可以不这样作，因为经济好转政治稳定他的总理宝座没问题，况且他以前发誓不与阿拉法特打交道。但拉宾明白，在巴解之中找不到比阿拉法特更有威信、更现实和更有理智的人。巴解之外能找到理想的谈判者，但他们没有阿拉法特那样的根基和国际地位，谈到最后仍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时不待人，现在是成交的最有利时机，错过机会就只能与哈马斯打交道了。于是，他打开了与巴解直接谈判的绿灯。

因此，当8月12日阿拉法特任命巴勒斯坦和谈代表团7名成员为巴解执委会成员时，拉宾没表示反对。这是开绿灯的暗示。11月26日以色列电台播送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消息，说据调查有三分之二的工党议员同意与巴解直



接谈判。第二天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拉宾总理正开始给予巴解组织合法地位。”但开始时他自己不出面，完全交给佩雷斯和贝林去办，而且提出严格保密的条件。他最担心泄密，生怕吃不到羊肉反而惹一身骚。他对佩雷斯一再交待，此事绝不能声张出去，参与者越少越好，范围越小越好，否则宁可不谈。他担心利库德集团搞到密谈证据后在议会里发难，弄得事情没办成自己先翻了船。阿拉法特的顾虑更多，连他最亲密的战友卡杜米（巴解政治部主任）都批评他的退让，更不要说一直反对他的“解阵”、“人阵”和哈马斯组织了。在连部下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情况下，他再也经不起内部造反的大折腾。因此阿拉法特也有这一要求，双方一拍即合。他们约定：不但要对各自反对派保密，而且要对各自支持者保密，甚至要对各自核心——以色列内阁及巴解执委会多数成员保密。

拉宾同意谈，但并不想作过多的让步，他同意的是“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这个方案最先是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 1976 年提出的，当时西方国家很担心利库德集团次年大选上台，它们想通过此举给拉宾政府脸上贴金。但拉宾当时没接受这个方案，因为加沙和杰里科是他在六天战争中亲手夺来的，他舍不得还给巴勒斯坦人。他当时倾向于“沙龙计划”。沙龙既是个粗犷的武夫，也是个颇有心计的政客，别看他长得虎背熊腰的，脑袋瓜子相当好用。他在六天战争后提出个别出心裁的方案，俗称“沙龙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以色列帮助巴勒斯坦人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统治，使约旦王国变成巴勒斯坦共和国；把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全轰到那个国家去，使以色列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因此，当 1970 年梅厄夫人政府帮侯赛因解决“黑九月危机”时，沙龙气得跳着脚大骂，骂工党愚蠢地错过了颠覆约旦政府的大好历史机遇。拉宾明白，现在无论如何谈不上沙龙计划了，代价最小的是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

为此得摸摸阿拉法特的底，看他提出的是什么条件。于是佩雷斯 1993 年 3 月底飞往埃及的亚历山大，在那里登上一架埃及空军的波音 707，阿拉法特的左右手阿布·马赞和阿布·阿拉在里面等候多时。飞机在红海上空绕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向佩雷斯详细地介绍了巴解的“豹斑方案”，巴解想首先得到这些豹斑——约旦河西岸所有的大城市。佩雷斯不同意这个方案，但他没讲出来，他对阿拉法特这两个助手的印象极好。回去后他跟拉宾统一了意见，定下了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转告了中间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佩雷斯见到穆巴拉克时，后者只简单地问了一句：“没有更多的东西了？”佩雷斯沉默了片刻，回答说：“我想是这样。”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穆巴拉克知道一开始时巴解只能得到这点儿东西。

但阿拉法特不了解这些情况，他以为拉宾会作很多让步。当他把自己的要求告诉穆巴拉克时，没想到对方告诉他开始时只能收回加沙和杰里科。“仅仅是加沙和杰里科？”阿拉法特吃惊地张开了嘴，站起来手足无措地转了两圈，“等等，给我点儿时间，我们再研究一下。”说着，一头冲进隔壁屋子与政治顾问沙阿斯商量，这一商量就是两个多钟头。他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幅地图，上面的加沙与杰里科之间画了条粗大的红线。穆巴拉克一看就明白了，指着那条表示通道的红线说：“你这个方案不行，根本行不通。”

阿拉法特瞪圆了眼睛，“为什么行不通？我们不仅要求有这条通道，而且还要求让它享有‘治外法权’……”

穆巴拉克忍不住打断他，“听我说，好兄弟。我很了解拉宾，他是不会

接受你的方案的。”他摇摇头说：“眼下，你只能暂时先满足得到杰里科。只是在谈判中，你要坚持加沙和杰里科以后是不可分的。”

如巨雷轰顶，阿拉法特满脸痛苦表情说不出话来，最后低着头沉默地离开了总统府。一天后他来了电话，告诉穆巴拉克巴解接受了这一先行自治方案。

获悉这一信息后拉宾才动了起来，谈判开始出现突破性进展。从8月份起拉宾直接指挥谈判，协议草案中任何一个标点符号的变动都得经过他的认可。问题越接近最后解决，保密工作越显得重要。除了经常更换谈判地点外，在通讯中以色列领导人的名字全用上了代号。拉宾的代号是“爷爷”，佩雷斯的代号是“爸爸”，主谈的副外长贝林则成了“儿子”。有时，巴方代表打电话请示时往往会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比如“爷爷要求爸爸向儿子传达什么？”等等。窃听的摩萨德特工始终没弄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而上峰似乎也无意深究。

但真想捂住盖子也不容易，记者们那张刀子嘴有时也能撬出一些值得回味的信息。有一次拉宾自己就差点儿露了馅。他在一次讲话中居然忘情地称赞起阿布·马赞来，说他是个大无畏的现实主义者，是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好在当时记者们没反应过来，才没捅出大漏子。无独有偶，巴方高级官员也差点儿泄了密。阿拉法特的政治顾问纳比勒·沙特，在一次讲话中竟然犯忌地提到巴以会晤。这次记者们不麻木了，跟着就是一通刨根问底地穷追猛打，非要沙特说清楚双方在哪儿会晤和谈了些什么，把沙特弄出一头一脸大汗。见沙特抵挡不住阿拉法特赶紧出来掩盖，说巴以几次想在华盛顿单独会晤，但都没有成功。好不容易才搪塞了过去。

双方在奥斯陆一共谈了14轮。当然，谁也不肯轻易作出让步，激烈地讨价还价和唇枪舌剑是难免的，谈判中多次出现使人窒息的僵局。主要谈判会场设在保尔高德庄园，这是一座19世纪的农庄，室内装饰古朴典雅，屋内的壁炉里燃烧着劈啪作响的木柴，屋外白雪皑皑的园林中潜伏着双目圆睁的警卫。谈不下去休会时，以色列人常常是闷闷不乐地喝咖啡，巴勒斯坦人则神情凝重地猛抽烟，这不是个好兆头。但是，他们的脸色往往会突然由阴转晴，眼睛里放射出欢悦的光芒来，原来是东道主挪威外长那4岁的孩子爱德华欢蹦乱跑地走了过来，嘴里伊哩哇啦地叫着。于是，一时间双方代表年龄变小了，孩子似地爬在地毯上围着小爱德华玩耍，在欢声笑语中大家的心头不快消失了。重新再谈时人们似乎觉得刚才的分歧并不那么严重，许多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艰苦的谈判结束了，离别时大伙儿轮流抱着可爱的小爱德华一顿猛亲，那孩子一点都不怕胡了戳，乐得格格地直笑。代表们感慨万分他说，这孩子不知道自己在谈判中起子多么大的作用，真是出色的打破僵局的“外交好手”！

### 巨人握手以巴言和 举世注目白宫签约

1993年8月29日，耶路撒冷以色列内阁会议室里。主持会议的拉宾与外长佩雷斯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对他的部长们宣布：经过多轮秘密谈判，佩雷斯外长已于8月20日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同巴解组织代表草签了秘密和

解协议，在被占领土上的加沙和杰里科地区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

此言一出，在座的部长们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们万万没想到总理和外氏背着自己来了这么一手。随后，佩雷斯向不知所措的部长们汇报了整个谈判过程及协议的要点。接着，拉宾以他特有的直率谈了自己的感想。他没进行解释，而是直接了当地摊牌：“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不是在与朋友议和，而是非常不情愿地与敌人议和。我并不想把巴解组织说得有多好。它过去是个敌人，现在仍是个敌人，但我们必须与敌人进行谈判。”没人站起来跟他硬顶，除了72岁的佩雷斯和71岁的魏茨曼外，以色列已没人可与他相提并论，而佩雷斯和魏茨曼的威信都没他高。更关键的是他说在理上，无从反驳。这次内阁会议足足开了7个多小时，记者们看出了蹊跷围了上来。警察部长憋不住想一吐为快，休息时溜出来向他们吹风说：“有了突破！”话音未了几名记者立即冲向电话机。还没散会以巴秘密媾和的消息就像闪电似地传遍了全世界，成为轰动全球的特大新闻。

对于这一消息，欢呼的、沉默的、批评的和愤怒的皆而有之。然而，即使是那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钦佩拉宾超人的胆略，因为他敢干其他中东政治家不敢干的事，敢于出来解决中东最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他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心头滑过这样一种感受：干得真漂亮！又是一个萨达特式的惊人之举！其实他们心里全明白：要想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办成件事，最好是暗地交易先斩后奏，事情没办成之前千万别吭气，否则一露馅什么事也办不成。

奥斯陆协议一签定，随后的步伐就快得多了。8月3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奥斯陆协议草案。9月4日，巴解主流派法塔赫也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9日，以巴双方以互致信件的方式相互承认。

阿拉法特在信中说，总理阁下：

原则宣言的签定，标志着中东历史跨入了一个新纪元。由于深信这点，我要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的承诺：

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在和平与安全环境中生存的权力：

巴解组织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338号决议；

巴解组织保证参加中东和平进程，保证要和平地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并且宣布：有关永久地位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将通过谈判求得解决。为此，巴解组织宣布放弃恐怖活动和其它暴力行动，负起巴解组织一切分支组织和人员的责任，以确保他们遵守宣言，防止暴力行为和防止出现违反纪律的人。

鉴于新纪元带来的希望和原则宣言的签定，以及巴勒斯坦接受安理会第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基础，巴解组织郑重声明，巴勒斯坦宪章中否定以色列生存权的条款和巴勒斯坦宪章中不符合此承诺的规定，从现在起失效，而且以后也不再有效。为此，巴解组织承诺要将对巴勒斯坦宪章必要的修改提交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正式批准。

巴解组织主席  
亚西尔·阿拉法特  
1993年9月9日

拉宾在信中说，

主席先生：

为了回复您1993年9月9日来信我要向您声明 鉴于来信中包括的巴解

组织所作承诺，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并开始在中东和平进程的范围内同巴解组织进行谈判。

以色列总理  
伊扎克·拉宾  
1993年9月9日

这事搞得美国政府有些难堪。以巴双方直到8月25日才通知美国有这么一回事，这太扫美国的面子了，因为它一直以中东和平主持人自居，哪有主持人被撂到一旁的晚会呢？要说美国完全不知此事是假话，美国人多少知道一些内情，佩雷斯主动向白宫通报过情况。难堪的是巴以双方不让美国插手，宁肯自己到挪威找个地方谈，这多少有些不信任自己。但这种载入史册的大风头一定得出，要不忙活了一二十年图个什么？于是美国政府快步走到了台前，让世人看清楚谁是这场交易真正的经纪人。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傲然宣称：“要是没有我们，中东绝不会出现和平。”他强调，以巴双方都承认美国是这一进程的“教父”。他说的有道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积极的，因为消除阿以冲突对它大有好处，它长期一直压着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讲和。但美国人有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国内又有强大的亲以极端势力，因此以巴双方决定自己私下谈。

9月1日克林顿总统以和平主持人的身份致函9位阿拉伯国家元首，要求他们支持以巴和解协议。9月4日他又建议以巴双方13日到华盛顿签署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协议，地点是1978年埃以签定戴维营协议的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以巴双方迅速表示同意，这才使美国挽回了因被排除在外而丢失的面子。以巴乐于让美国大出风头有两层意思：一是借此镇住各自的反对派——美国都点头了，你们还叫什么，以后还想不想要美援？二是让美国风光之后慷慨解囊，掏个几十亿美元的赞助。但克林顿不想当冤大头，他忙在11日说美国的钱不多，好事大家一齐赞助才有意义。接着，他毫不客气地动员日本、欧盟和沙特等富国出血。

1993年9月13日，全球各大电视台都把镜头对准美国白宫的南草坪，一个轰动世界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当克林顿总统陪伴着拉宾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来到当年以埃签定戴维营协议那张长桌旁时，3000多位来宾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在贵宾当中，人们看到了关心中东问题的前总统卡特和布什等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佩雷斯与阿布·马赞庄严地代表双方在和平协议的正式文本上签了字，中东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他们放下笔后，人们再次热烈鼓掌表示祝贺，许多人甚至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70年代曾在中东刮起过穿梭外交旋风的基辛格博士。

阿拉法特首先向拉宾伸出了手，望着这只手拉宾显得多少有些迟疑，这时克林顿用双臂把他们两人往前送了一下，两位巨人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但拉宾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在，路透社形容说：“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被强拉去看晚间歌剧的体育迷，而不像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他仿佛不愿被人看见他也在鼓掌，因为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纷争了几十年的痛苦太深了。”

在阿拉法特发表了简短讲话之后，拉宾走近了麦克风。一时间他感情激荡，嘴唇都在颤抖。但他还是稳住了神，把心中的话一口气倾吐了出来：

“和平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来自血迹斑斑战场的士兵；我们，目睹了自己的亲友被杀的战士；我们，来自白发父母埋葬了黑发子女的国家；我们，是曾与你们巴勒斯坦人为敌的人。我们，今天用响亮而又清楚的声音对

你们说：血和泪已经流够了，够了。我们无意报仇，我们不记恨你们。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正常的人，是想要建筑房屋、种植树木、谈情说爱以及与你一起生活的人。今天，我们正在给和平一次机会，并且再次对你们说：够了！让我们祈祷吧，当我们可以说‘永别了，武器’那一天，和平的日子就来临了。”

他感到自己一直在微微喘气，是兴奋吗，可能。他知道，今天注视他的人远比六天战争那时多。那时，他是个战争英雄，对战争感兴趣的人仰慕他；而今天，他是个和平缔造者，全世界人民更渴望的是和平。他明白，尽管六天战争和巴以议和都是他最值得自豪的业绩，人们更看重的是后者——中东和平。

这一年他 71 岁，走过的路不短了，里程碑上分别写着：士兵，政治家，和平缔造者。27 年前，他在六天战争中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攻城掠地，27 年后，他又以同样令人吃惊的速度向着和平挺进。

## 第十四章 铸剑为犁

1994年9月以巴和平协议签定后，人们常见到拉宾与他的助手埃坦·哈伯尔兴致勃勃地交谈，表情非常轻松愉快。原来，他即将动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

### 飞往华夏实现夙愿 中以携手共展宏图

以色列等待握住中国的巨手的时间太长了。

国民党政府1947年支持了联大分治决议，并于1949年3月承认了以色列国，但没来得及与之建交就垮了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色列在3个月后的1950年1月9日宣布承认新中国，从而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回电表示感谢，以后两国沿着建交的方向前进。

那么，在以后的40多年中两国为什么没能建起外交关系来呢？这说来话长。

以色列人民有强烈的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这一来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犹太人很宽厚，从不歧视虐待流落到中国的犹太人，这在世界上是绝元仅有的。二来是因为以色列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老一辈人中有很深的根基，他们历来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许多人熟知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延安窑洞的故事。事情是明摆着的，与中国建交对以色列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好事，它有助于以色列打开在亚洲的局面。

但没想到以色列政府中途变了卦。50年代初以色列把目光转向美国，力图与美国结成紧密关系，这当然是它的内政问题。而此时朝鲜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美国竭力驱使仆从国一道封锁和孤立中国，因此不高兴以色列同中国发展关系。此况下，以色列领导人改变初衷，为取悦美国有意放慢了同中国建交的步伐。以色列统治阶层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很着急。许多以色列高级官员，是在中国的哈尔滨或上海市长大的，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很深。老资格外交家、以色列第一任驻缅甸公使科亨是这批人的代表，他力主不顾美国的压力迅速与中国建交。

中国是个重信义的国家，讲过的事一定照办，中国政府对此事相当认真。1954年6月29日，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途中在仰光特地会见了科亨，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希望他率团访华商谈贸易和建交之事。1954年9月23日，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同阿富汗和以色列的建立正常关系一事正在接触之中。”在以色列政界亲华派的大力推动下，当时的摩西·夏里特政府勉强同意派一个贸易代表团访华，但限定代表团只能谈经济不能谈政治。这样一来，1955年1月率团访华的科亨根本无法谈实质性问题，最后只与中国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以色列政府这种趋炎附势的作法，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中以关系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俗话说西方不亮东方亮，想跟中国交朋友的国家很多，中国的眼睛不一定非盯在以色列身上不可。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总理以杰出的外交才华在亚非拉国家中赢得大批朋友，以纳赛尔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领导

人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从而出现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广阔前景。这种苗头一出现以色列领导人慌了手脚，明白自己铸成了难以挽回的大错，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于是，在万隆会议刚落下帷幕的4月29日，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奉总理紧急命令匆忙与中国代表接触。他饥不择食地拉住一名中国驻苏联的外交官，向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希望在尽可能早和尽可能快的时间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为时晚矣，中国是个有尊严的国家，建交大事不是儿戏。历史的机遇失去了。

1956年中国与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标志着中国新的中东政策的开端。在同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中国坚定地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并中止了与以色列的直接贸易。在此后的近43年中，中国大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以正义斗争，无私地向他们提供各种援助。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撤出被占领土之前，中国不与以色列建立官方关系。不少以色列学者和官员对这一波折扼腕叹息，他们指出以色列在1950—1954年间“失去了历史的机遇”。

以色列政府一直给自己留着条后路，避免过深地刺伤中国人民的感情。它基本上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始终拒绝与台湾建交“外交关系”。但它与台湾当局也有不少来往，向台湾提供过包括“加布里埃尔”导弹在内的多种先进武器，还同南非白人政权一道同台湾当局研制过原子弹。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以色列多数情况投赞成票，有时也投弃权或反对票。40多年来，上至总理梅厄夫人下到一般外交官，只要有机会总想跟中国套近乎拉关系，打开紫禁城大门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的首要任务。在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几乎在所有的的问题上都有分歧，但它们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完全一致，那就是尽可能早和尽可能快地与中国建交。1971年10月25日，26届联大就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了历史性表决，以色列投了赞成票。10月29日，以色列外长埃班致电中国外长姬鹏飞，祝贺中国取得的伟大的外交胜利。出于历史原因，中国电信总局以两国无交往为由，将这封电报退回。

中国是具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色列长期以来把同中国建交视为外交上的一大突破，它有助于改变以色列在亚洲地区极端孤立的状态。中国是个讲原则的国家，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以斗争，但从未改变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立场。从80年代初起，中国代表一再表示，以色列与其它中东国家一样“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此后双方的非官方接触逐年增多，两国驻联合国代表也常就有关问题交换看法，两国外长多次公开在联合国总部会晤。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有少量的以色列官员、记者和学者，以参加在华举行的国际会议为由来到中国。同时，一些中国学者和记者也以个人身份赴以观光、考察和学术交流。

水滴石穿，1989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在特拉维夫设立了办事处，次年以色列科学和人文科学院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它们都有代理签证的职能。1991年11月以色列国防部阿伦斯访问了中国。

到1992年初两国加快了建交的步伐。1月21日以色列外长戴维·利维应邀访问中国。1月24日，中国外长钱其琛与以色列外长利维在北京签署了正式文件，宣布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利维，对他说：“中以建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国外评

论家普遍认为，此举对两国都大有斩获，而且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对中国，它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同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对以色列，它打破了以色列在亚洲没朋友的局面，有助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拉宾非常重视发展中以关系，很早就开始筹划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5月19日，外长佩雷斯对中国进行了6天访问，与中方签订了两国间文化协定。8月3日，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宣布了拉宾总理将于10月访华的消息。出访之前，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防部里接见了中国记者刘永明和魏恩祥，在毫不拘束的气氛中畅谈了自己对此行的看法。他强调，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理自己感到非常荣幸。他还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数千年之久的历史，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中以两国应该相互学习友好相处，在各个领域内加强协调与合作。他希望中国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这次访华，要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中东和平的最新进展状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与中方交换看法，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密切合作的途径。访华期间他还将签署一项两国政府间的航空协定，并主持签署一项在青海柴达木兴建一座钾肥厂的协议。他还要访问上海复旦大学，就中东和平进程及以巴关系对师生发表演说。外电评论，拉宾总理这次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是中国能与所有的中东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具体表现。

1994年10月10日晚，随着夜幕降临，拉宾的专机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陪同拉宾来访的有他的夫人莉赫，7位高级官员以及一批以色列经济界巨头，还有30名以色列和其它国家的记者，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代表团。在机场上，拉宾受到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农业部部长刘江和主管中东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的热情迎接。宾主稍做寒暄后，拉宾一行车队在军警摩托车队的护送下驰向钓鱼台国宾馆。

11日上午，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上为拉宾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解放军军乐队高奏以中两国国歌，拉宾在李鹏陪同下检阅了威武雄壮的三军仪仗队。然后两国总理回到了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首轮会谈。

李鹏总理首先以他个人和中国政府的名义，热烈欢迎拉宾总理访问中国。接着他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欢迎以色列工商界人士以及世界各地犹太人来华投资，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拉宾总理也介绍了以色列国内形势和中东和谈的最新进展，以及以色列对中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希望。这次会谈延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宾主都希望不断加深中以两国友好合作的关系。会谈前，中以双方签订了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以及以色列在上海设立领事馆及中国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馆的协定。

1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国防部长迟浩田分别会见了拉宾总理。拉宾对乔石表示，犹太民族一向十分钦佩中华民族，因为这两个古老民族全都成功地保持了各自的特点，而且能适应不同时期需要不断发展。他还向乔石转交了以色列议长谢瓦契·魏思的邀请信。会见后，拉宾主动向随行记者表示，他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分钟都很愉快。

但有人对拉宾访华不那么愉快。

拉宾启程访华的当天，以色列的《国土报》提醒他说美国人对此行不大高兴，说美国告诫以色列要“考虑”美中之间的不甚融洽的关系。这话很令人费解，人们不清楚美国要让以色列考虑什么，是要让它考虑随美国的风倒？



还是要让它考虑回到中以从前那种冰冷的状态？拉宾的专机还在飞行途中，美国人又发话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抢着发表了一份报告，声称以色列每年向中国出售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从美国得到的先进军事技术。12日美国国防部也出来证实，以色列一直向中国出售武器和先进技术。有两家提供证言，国务院发言人迈克尔·麦柯里便兴师问罪了。他让以色列一定要讲清楚：究竟把什么美国军事技术转让给了中国。在短短几天内，美国政府三大部门一起出来发难，看来他们是真的不高兴了。

评论家们指出，这是美国有意使以色列难堪，它不早不晚专拣拉宾访华时谈这个问题，是有意扫他的脸。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发生在海湾战争刚结束时。那时美国突然大呼小叫他说，以色列偷偷地把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及技术卖给了中国，而且说得活灵活现的。以色列人怎么解释都没用，一直到把美国人请来并让他们数清楚那些导弹还在以色列后，这段天方夜谭才算讲完。不久，美国人在“银河号”事件中又演了出丑剧，一直到开箱检查后才不吭气了。拉宾是个很要脸面的人，访华期间听美国人这样说很生气。他说：“我们还没蠢到这种地步，去冒每年失去从美国获得30亿美元援助的风险。”他火冒三丈地指责《纽约时报》，说该报引述的中以军火交易达“数十亿美元纯粹是胡说八道”。

但10月15日以色列《晚报》说美国的压力已经起了作用。本来，以色列准备向中国出售先进的“阿莫斯”卫星通讯系统，这项提议已包括在拉宾访华的议程之中。但美国18日要求以色列不要向中国提供用美国微机处理的光纤通讯系统，理由是聪明的中国人会偷技术建立新的军事通讯系统，到那时美国就难以窃听中国的军事机密了。同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说，在美国压力下以色列已同意暂停向中国出售这种通讯设备。不知它说的消息是否属实。

这些令人不快的小插曲按下不表。且说中以建交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需要有人从中穿针引线沟通感情，除了前面提到的科亨先生外还有其他人也作了努力。拉宾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答谢宴会上，恭敬地举杯向身旁一位言语不多的老者祝酒：“艾森伯格先生为以色列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让我们为他干杯！”在座的高级官员都明白这句话的含意，知道这位和蔼的老人为中以建交起了特殊作用。艾林伯格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得到政府领导人如此尊敬？他是国际知名的以色列企业家，一个美国亿万富翁哈默式的人物，一位从浪流者到大亨的传奇人物。

1938年希特勒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当时除中国所有的国家都关上了接纳犹太难民的大门，上海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避难港。这一年，除他以外他们全家从德国慕尼黑逃到上海，两年后19岁的他也来了。但可惜，他在上海找不到适合的事情干，便转道日本打算去美国发展。到日本后，他结识了一个有权势的生产钢铁的家族，随即以出色的空手道为他们供应矿石和废铜烂铁，白手起家很快在日本积聚起财富。他这一停留便走不成了，因为他在日本陷入了爱河，1941年娶了一位东京大学美术讲师的女儿作太太。但他的心仍向往着巴勒斯坦，1949年他取得以色列的国籍，1962年携带全家移居以色列。

他是个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式的经营奇才，擅长作别人认为没戏的生意。到1993年他的营业额高达25亿美元，个人资产13亿美元，产业分布在30多个国家中，在世界各地有40家办事处。他不爱出头露面，待人诚恳不尚空

谈，是个深受许多国家首脑欢迎的人物。他善于穿针引线促成交易，能向任何顾主提供其他人搞不到的东西，当然他收取的佣金不低。美国人对他很头痛，总怀疑他把美国给以色列的好玩艺儿全捣腾到中国去了，但又没有任何证据。他早在中以建交前就频繁地飞往中国，这种人到哪儿都受欢迎，他是个以自己的专机为家的人。

美国《时代》周刊断言先进的武器是维持中以关系的核心，言下之意没武器交易两国关系长不了。这话未免说得太武断。中国不拒绝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她绝不是一无所所有。《时代》周刊忘了中国早就研制出了以色列没有的核武器和导弹，能把美国军舰打出大窟窿的中国“蚕式”导弹肯定跟以色列没关系，而且中国还有许多这类抢手货。以色列人对这个问题比较客观，也看得长远。他们指出，以色列用不着靠卖武器生存，光是巨大的中国农业市场就够它赚的。他们说，以色列有最适合发展中国家应用的农业科技，而中国急需诸如滴灌等以色列的技术和装备，仅在这方面两国合作的潜力就极其巨大。中国人和犹太人以智商高在世界上闻名，中以两国发展关系自有不落俗套的方式方法，它们都不喜欢他人充当教师爷。

13日拉宾开始对上海进行的访问，黄菊市长因出访日本委托沙麟副市长接待总理一行。当天上午拉宾到复旦大学发表演说，他希望中以青年学生都应该着眼于未来。他特别追述了历史上犹太人与中国人的友好交往。他指出，早在唐宋年间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便开始涌向中国，在这些人中大量的犹太人。他们之中一些人定居在广州、扬州、宁波和泉州等沿海城市，另一些人则沿运河北上去开封等城市发展。他特别强调了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对犹太难民的无私帮助，并对当年上海人民接待犹太难民表示衷心感谢。随后，他在虹口区参观了一些犹太人生活过的地方，他一再强调犹太人非常珍视这种患难之情。

14日上午他专程参观了上海的摩西犹太会堂，这是俄罗斯犹太人于1927年建造的，是目前上海市保存完好的一幢犹太人旧址。下午，他在刘部长和沙副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浦东开发区。他与莉赫夫人兴致勃勃地登上宏伟的杨浦大桥，饱览了浦江两岸的秀丽风光。他详细地询问了上海全面对外开放的情况，对上海近几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赞不绝口。随后，他应邀到南汇县周浦乡农民家作客。

15日清晨拉宾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从上海乘专机回国。他这次访问在中以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被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倾倒的以色列部长们，回国后绘声绘色地向那些未能同去的同僚炫耀了一番。这下子可麻烦了。那些部长纷纷跑到外交部挂号，要求迅速安排他们访问中国，谁也拦不住。外长佩雷斯急了，部长们都去逛长城成何体统，只有把拉宾请出来镇他们。他要求拉宾“制止部长们去中国的旅游之风”，此事要排个先后顺序。那些部长们一听全气坏了，凑到一起要找佩雷斯“理论”一番。拉宾赶紧劝住了他们，说应该加强一下这方面的“秩序”，得分个轻重缓急。但一位高级官员沮丧地承认，拉宾这番话等于白说，部长们都能找出访华的充分“理由”。

暗中来往长期沟通  
水到渠成以约建交

1993年9月的巴以和解在中东引起了连锁性反应。9月初北非的摩洛哥和突尼斯先后与以色列建立了经济联系；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联酋和阿曼），也于9月30日宣布解除对以色列的经济制裁，阿尔及利亚、卡塔尔、阿曼和巴林也在讨论与以互派使团的事宜；据说，伊拉克也通过秘密渠道与以接触；以色列的工厂收到生产巴勒斯坦国旗的大批定单；……这股潮流，打破了阿拉伯国家非得作为一个整体跟以色列谈的局面，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形势使拉宾兴奋异常，他在1994年元旦踌躇满志地说：“我认为，1994年将是中东和平与稳定处在十字路口的一年。我今天确信，将会有一种国际、中东和以色列环境上的巧合，使得真正的和解步骤，如果不是一次性突破的话，也能朝着真正解决阿以冲突的方向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1993年9月1日，也就是巴以签署原则宣言的第二天，约以签订了两国谈判议程的协议。

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约旦跟以色列有来往在中东是尽人皆知的事。早在以色列国成立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与梅厄夫人和达扬多次密谈，只是当时的大气候使得他不可能与本-古里安媾和。侯赛因继位后情况有变，1957年美国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声称如需要将出兵对中东进行干预。善于审时度势的侯赛因，正想把约旦的靠山从英国转向美国，遂产生了通过以色列从中斡旋的念头，从1963年起约、以密使频频接触。但当时还谈不上与以色列全面和解的问题，坚决反以的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紧盯着约旦，侯赛因稍有不慎便会落得他祖父同样的下场。

六天战争后侯赛因的反以情绪增强，因为以色列夺去了他的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他忍不下这口气。直到1970年“黑九月事件”后情况才所有好转，他通过这场危机缓解了反以情绪，双方恢复了暗中接触。以色列前外长埃班说：“自1967年以来，侯赛因国王会晤了好几位以色列总理和其他负责人，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但侯赛因国王处事很谨慎，正是这种谨慎才使他成了中东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他不愿意当出头鸟，黑九月事件后他被斥为“安曼的刽子手”，他的首相在开罗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枪杀。这是一个清楚的警告：别跟以色列人勾搭，否则绝没好下场！一直走钢丝的国王感到进退两难：反以吧，嘴巴上喊喊可以，动真格的不行。以色列人已把丑话说到前头，约旦要是再动手恐怕江山难保；不反以吧，其它前线国家不答应，自己的巴勒斯坦臣民也不答应，算上西岸地区他们已占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赎罪日战争爆发时，他在不得不有所行动的情况下，宣言不讳地对不在跟前的以色列人说：“如果为了巴勒斯坦人打仗，那我第一个参加。早在1967年8月我就在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占领着我们的土地就不可能有和平，两者不能同时并存。我可以坦白地说，看来我们离和平还很远。但是，也许和平就在我们眼前，也许这次以色列能改变它的看法。如果是这样，以色列就应赶快行动，时间已经不多了。”以色列领导人了解国王的苦衷，并不在意他雷声大雨点小的反以“斗争”。

1977年以埃和解后，阿拉伯国家不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禁令名存实亡，侯赛因加大了与以方沟通的力度。他回忆说：“光是我就跟以色列官员们的会谈，就不下800个小时。”拉宾从1976年起，先后6次与侯赛因秘密会晤，答应把约旦河西岸还给他。但这些会晤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原因一是拉宾

要求继续在约旦河沿岸驻军，侯赛因不同意这个要求；二是拉宾要求两国公开和解并建立外交关系，国王觉得这一步迈得太大，还想等等看。拉宾明白，以约之间实际上已不存在什么障碍，只是国王仍不愿当带头羊而已。

以色列历届领导人都爱跟国王打交道，他们觉得跟侯赛因说话不累，即使没谈成心情也是愉快的。就连以强硬著称的利库德前总理沙米尔也跟侯赛因密谈过几次。拉宾成了中东风云人物后沙米尔很不服气，为证明自己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顽固，他也把自己当年跟侯赛因密谈之事抖落了出来。他对《新消息报》记者披露了1987年夏天的密谈情景。说当时他避开耳目悄悄飞往伦敦，陪他去的有总理办公厅主任阿哈龙和机要秘书鲁宾斯坦。他们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幢寓所里会见了侯赛因国王，陪国王前来的是约旦首相扎伊德·里法伊。但侯赛因跟顽石般的沙米尔谈不拢。侯赛因提议以联合国242号决议为基础达成全面和平，言下之意是以军应从约旦河西岸撤出来；沙米尔强调按1978年戴维营协议方针谈，意思是以方改善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处境就可以了。侯赛因微微一笑，不愿再往下谈了。但沙米尔不死心，在另一次会晤中赠给国王一部精装古兰经，侯赛因则回赠给他一支名贵的钢笔。众所周知，送笔的含义是请对方签和约的。想当初，敦促约翰逊总统签署禁止种族歧视法令的美国黑人，就不断地给他寄钢笔。

两国关系的质变发生在1988年，那年的7月31日，约旦宣布中断同西岸地区的法律和行政关系。这里面有个复杂的过程。想当初约旦兼并了东耶路撒冷和西岸，阿拉伯国家对此颇有责言，只是认为这总比让以色列占领好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事实。但当巴解组织影响扩大后，阿盟明确表示这些地区以后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并强调“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这就弄得侯赛因尴尬了：继续宣称西岸是自己的吧，只不过是白白替阿拉法特看家，而且那里的麻烦事总要扯到自己头上，影响约以关系；但把它拱手奉送给阿拉法特吧，又不甘心情愿，怪心痛的。但到1988年形势明朗了，巴勒斯坦国即将成立，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西岸是巴勒斯坦人的。此况下，他考虑再三毅然作出了上述表示。它的意义在于，一是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提供了国土，二是消除了同以色列和解的障碍。甩掉这个包袱后，他实际上跟以色列没什么纠纷了，只有一小块以色列愿意还的领土和水资源分配问题。于是，约以和谈的大门敞开了。

1994年5月19日夜晚，两辆不引人注目的汽车先后开到伦敦一处僻静的寓所前，中东舞台上的两位风云人物——以色列总理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准备在这个寓所中敲定两国和解协议。先到的拉宾在走廊里热情地迎接侯赛因，他们按中东的老规矩拥抱行贴面礼，拍着对方的脊背互道“沙洛姆”（希伯来语“您好！”）和“赛俩姆”（阿语“您好！”）。

陪同国王前来的是一位举止稳健的中年人，他以不易觉察的眼神向拉宾致意。他是侯赛因国王最亲信的助手，约以密谈的牵线人，他安排了今夜的密谈。但人们万万想不到，他的真实身份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副局长。侯赛因知道他的身份，是他主动告诉国王的。25年前，当他亲口告诉国王自己是什么人时，侯赛因送到嘴边的咖啡杯抖动了一下。然后两人对视了片刻，但什么话都没说，此况下语言是多余的。他不像伪满州国皇帝溥仪的日本顾问那样行事，他从不干涉约旦内政，哪怕是政府的反以决策。他的任务是保护国王安全，维持他的统治，这最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从此，任何一位约旦将军的异常举动，侯赛因马上能了解得清清楚楚，刺杀国王成了一个历史名

同。他成了国王最亲宠信的人。

1993年侯赛因国王的处境恶化了，那时他刚在美国动了癌症手术。由于他在海湾战争中站错了队，约旦各方面的情况骤然变化，富有的海湾国家断绝了援助并驱赶大批约旦侨民，约旦外债跃增到84亿美元。对伊拉克的禁运又使约旦损失了90亿美元，国内的失业率高达33%，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5亿美元，约旦已濒临破产。国王统治的根基动摇了，尽管动完手术回国的侯赛因受到上百万臣民的欢迎。此况下这位助手立即启动，几次飞往美国沟通关系，美国那边很快就有了反应。7月4日克林顿致函侯赛因说：“在你与以色列讲和的过程中，你不会是孤军奋战的。”随后，克林顿要求国会恢复对约旦的军事援助，国会以罕见的痛快赞同这一要求。接着，其它经济优惠也接踵而来，国王重新站稳了脚跟。

1993年8月的奥斯陆协议使侯赛因大吃一惊。他原以为拉宾跟阿拉法特谈不成，没想到他俩真得成交了，自己这个老客户反而被甩到了一边。他更担忧的是自己的地位，因为巴以和解便意味着阿拉法特将回到约旦河西岸，而约旦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要是拥立阿拉法特的话约旦王国就完了。于是，他忙通过这位助手紧急约见拉宾，两人在两国间的亚喀巴港会晤。拉宾了解了他的焦虑后，向他保证以巴之间绝不会结盟，而且以色列只是部分地撤出西岸。但这没打消侯赛因的顾虑，他还担心拉宾趁势与阿萨德媾和，到那时约旦就更加一文不值了。他决心采取主动摆脱困境。约旦经济学家法赫德·法内克评论说：“和平列车已经开动，约旦要么在前面阻拦而被飞驰的列车碾个粉碎，要么盲目地跳上列车往前走。”

他说干就干。11月3日，他又通过这位助手请佩雷斯到约旦王宫密谈。那天，佩雷斯白天参加了以色列的市政选举，晚上趁着夜色悄悄驱车来边界的阿伦比桥边。那里早有一辆王宫专车等候多时，载上佩雷斯后便直奔王宫。在那里，佩雷斯与侯赛因整整谈了一夜，起草了4页纸的文件，为两国今后正式签约打下了基础。

但佩雷斯犯了个不该犯的错误。他太兴奋了，口一松，把这个消息捅了出去。他对以色列一个电视记者说：“请记住这个日子，1993年11月3日！”这下糟了。以色列电视台一披露这个消息，阿拉伯国家马上议论纷纷，说什么话的都有。侯赛因对此大为恼火，因为约旦正处在议会选举前的敏感时期，此事有使激进势力占上风的可能，于是有意放慢了关系正常化的步伐。直到巴以1994年5月4日签订了开罗协议，侯赛因才重新恢复了约以谈判。这才有了上面所说的伦敦密谈，跟拉宾谈妥了以后，剩下的事情是扫清国内的障碍。

7月9日，侯赛因用国家的困境镇住了下院的反对派。他警告他们，约旦现在面临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只有与拉宾公开会晤才能得到美国的慷慨援助。那些议员让他给镇住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以色列只占领着约旦的300多平方公里领土，而且一再说愿意悉数归还，在阿拉法特都急欲与拉宾成交的情况下，约旦还有什么理由硬绷着呢？本来侯赛因想在边界上与拉宾公开会晤，但克林顿不干，美国想把所有的中东和解仪式全集中在白宫的南草坪上举行，再说也没有让美国掏钱却不让它露脸的道理。于是，在征得双方同意后，7月15日克林顿宣布侯赛因和拉宾将于25日在白宫会晤。拉宾的动作更快。他8月4日开始向约旦河放水，7日接通了直通电话，8日开放了边界通道。他要让约旦人从一开始就体会到与以色列和解的好处。

1994年7月25日，侯赛因与拉宾在华盛顿首次公开会晤并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宣布结束两国敌对状态。美国同意在3年内免除约旦的近10亿美元外债，并答应帮助约旦改善与海湾国家关系。随后，拉宾和侯赛因在10月16、17两天内解决了最后的具体难题，17日拉宾在约旦王宫中签署了和平条约草案。

1994年10月26日下午1时，在21响礼炮和高奏的国歌声中，侯赛因和拉宾肩并肩站在一起，在两国边界的阿拉瓦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结束长达46年的敌对状态。约旦成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人们注意到，尽管约以和解没有巴以和解那样的轰动性效果，但拉宾这天显得比与阿拉法特握手那天更加愉快，他对侯赛因更比对阿拉法特亲热得多。他像找不到词儿似地说：“这是以色列历史的新篇章，是对我们来说极其美好的事物。”

约以争端涉及边界处两块共约340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对约旦河和耶尔穆克河水的分配问题。拉宾一迭声地说这些事好解决，以色列绝不要约旦一寸领土，个别地段两国可作领土交换。1995年2月10日，以军终于完全从约旦领土上撤走。

根据两国协议，以色列每年向约旦提供5000万立方米的水。

双方将在约旦河上游建坝蓄水，共享这一水源。评论家们指出，约以和解有推动叙以和嫩以的直接谈判的积极意义，中东和谈的全胜取决于1995年的叙以和谈。

但中东和平进程到了1995年明显地减慢了速度。

### 归还戈兰节外生枝 和平列车逐渐减速

首先是叙以和谈陷入了僵局。

在埃及退出和伊拉克被打趴下之后，阿拉伯世界中能够而且敢于跟以色列斗的国家只剩叙利亚了。阿萨德总统始终坚持强硬的反以立场，原因是以色列一直占据着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而且不想归还。戈兰高地面积1860平方公里，位于叙、以、黎、约四国交界处。它俯瞰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扼守通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通道，控制着一部分约旦河的水源，上面的赫尔蒙山具有预警的战略价值。以色列通过六天战争夺占了这块高地，迫使15万叙利亚居民逃离家园。后在基辛格的劝说下，以色列在1974年把库奈特城等部分高地还给了叙方，但仍占据着1200平方公里，并于1981年通过法律予以兼并。随后，美国操纵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靠叙方一侧划出一块非军事区。现在戈兰高地上有32个犹太定居点，1.4万名定居者。

今年67岁的阿萨德是中东最强硬、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东有“不先生”的声誉。从1970年11月16日夺权以来，他一直在中东和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前他坚定地与苏联结盟，没像萨达特那样跟苏联翻过脸，使得苏联最先进武器流水般地充满了他的军火库。他依靠苏联大力支持，与以色列展开了长期顽强的斗争，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敬重；在纳赛尔之后他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反以大旗，他的坚决态度迫使那些温和派国家掏出大把钱来资助叙利亚；他使10个好斗的巴勒斯坦组织投靠自己，他以一连串自杀性攻击迫使美国丢脸地撤出黎巴嫩；他在黎巴嫩内战中纵横捭

阖，在以色列眼皮底下扶植了一个亲叙政府，并使黎南部成为袭扰以色列的基地。以色列领导人对他很头痛，视其为高深莫测的斯芬克斯，军事打击与利益诱惑对他都不起作用。一位西方外交官感慨地说：“过去三年中每人都企图对叙利亚施加压力，但阿萨德不屈服任何压力。他有不同于别人的战略、观点和日程安排，他除了要讨还戈兰高地外，还要保证叙利亚在中东实现和平后仍占有一席之地。”

阿萨德的高明在于他的灵活，他虽强硬却并不死板，他打出的牌常使对手瞠目结舌。他随时准备修改既定方针，等待着最有利自己的时机到来。海湾战争时期，他出人意外地向沙特派遣了2万军队助战，从而大大改善了与西方的关系，一下子摆脱了苏联崩溃后极端孤立的困境。他是个城府根深的人，一贯不卑不亢，他希望和平收复失土，但总是一副爱谈不谈的姿态，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他常说的话是：“我们赞成和平进程，但我们不会容忍被轻视。”他不是虚张声势地强硬，他的强硬是由于自己有底牌，任何人很难给他套上笼头。他的治理能力极强，无论是对政党、军队还是经济，叙利亚让他治理得井井有序。叙利亚的经济状况不坏，粮食基本可以自给，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也活得下去。海湾战争后西方给了它10亿美元酬劳，沙特等国又给了15亿，现在它只有35亿美元的外债。西方国家知道，仅凭这些外债是难以对叙利亚施加压力的。

苏联解体和反以阵线解体后阿萨德改变了策略，在美国撮合下1992年10月起叙以开始密谈，但他与僵硬的沙米尔谈不出个名堂来。拉宾上台后决定打破这一僵局。1993年他开导以色列人说：“伊朗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从长期来看要比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以色列愿意在领土问题上作出痛苦妥协。”1994年7月他授意佩雷斯公开声明“戈兰高地的主权属于叙利亚”，表明了自己的和解诚意。阿萨德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宣布“和平也是叙利亚一项战略选择和客观需要”，随之大马士革街头出现了“和平英雄阿萨德正像他进行战争那样谋求和平”的标语。1994年10月，叙外长沙雷破天荒地在华盛顿会见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叙利亚报纸从此用“以色列”代替叫了40多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拉宾11月初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已经发现，以色列同它的伙伴在努力实现全面和平的过程中，进行对话和悄悄的接触是消除成见的最好办法。”11月12日，他要求克林顿再帮他安排叙以和谈。

但双方一谈到具体问题就卡了壳。以方主张：用6—8年时间分阶段从戈兰高地撤军，换取同叙方的全面关系正常化；叙方坚持：只有以军完全撤走后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两国要按1967年6月4日前的停火线划界。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以色列不愿痛痛快快归还戈兰高地的原因之一是水资源问题，上面有巴尼亚斯河、达恩河和约100个泉眼。以色列警察准将阿卜杜拉·巴佐说：“以色列之所以紧紧抓住这个地区不放，原因就是它需要水。对以色列来说，它就是水库。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是个战略问题。”克林顿于1994年10月28日飞到大马士革，与阿萨德会谈。在美国斡旋下，叙以就戈兰高地的立场有所接近。1995年5月24日，叙以就以撤出戈兰高地后的安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但阿萨德在6月1日强调，叙利亚在以军全部撤走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

僵持的部分原因是拉宾遇到了世界顶尖级谈判高手，阿萨德是个连基辛格都敬畏三分的谈判对手。大马士革乌迈耶德宫的阿萨德巨幅画像下红白相

间的大标语是：“阿萨德既是战争英雄，也是和平英雄”。这是事实，他既会打仗也会谈判，人们用“老谋深算”、“天才”、“高深莫测”和“极其强硬”等形容词描绘他的谈判风格。尼克松称他为一个“天才”；基辛格被他的冷静、对问题的深刻了解和谈判才能所折服，不无敬意地称他为“阿拉伯的俾斯麦”；以色列的叙利亚问题权威马奥茨对他的全面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中东有个夸张的笑话，说阿萨德能用舌头使强盗乖乖奉还抢来的东西。1994年美叙会谈后以色列媒介刻薄地评论说，“老奸巨滑”的阿萨德轻而易举地制服了“缺乏外交经验”的克林顿，后者在大马士革只有眨着眼睛点头听的份儿。有人说，阿萨德一看以色列真想议和便在和解的条件上加了码，他提出按六天战争前的停火线划分的边界比叙利亚的国际边界还要大。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拉宾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他在1994年1月18日说：“我相信，如果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草案，那要付出可能超出预料痛苦的代价。那时，如果我们希望对我们自己诚实的话，我们必须征求公众的意见。”从逻辑上这种说法没道理，因为以色列已公开声明戈兰高地是叙利亚的，归还它国领土是不需要搞全民公决的。早在70年代他第一次出任总理时，就师从梅厄夫人说了要以全民公决来决定归还领土的话。其实这种过时的诺言完全可以抛弃，人们对此也不会有太多的责怪，归还西奈、加沙和部分西岸地区哪里是由全民公决来决定的呢？

### 履行协议一波三折 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按照以巴1993年9月签订的原则宣言，以方应在当年12月31日从加沙和杰里科撤军，1994年4月13日前全部完成。但由于双方在安全问题上谈不拢，以军并没按时撤出一兵一卒。此后，阿拉法特与佩雷斯2月9日在开罗达成了新协议，对扯皮的安全问题重新作出安排。但2月26日希伯伦惨案打断了这一进程，巴方曾一度退出谈判，直至5月4日双方才在开罗签订了最后协议。

开罗协议是个实质性协议，它涉及以方移交权力、撤军和巴方开始行使权力等具体问题，双方争得很厉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埃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要不是穆巴拉克总统和穆萨外长极力撮合，以巴双方早就闹翻了。2月份穆萨半真半假地对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说：“如果你们不能取得一致，今天就别想离开开罗！”在开罗协议签定的头天晚上，穆巴拉克把拉宾和阿拉法特请进总统府，谈了6个小时，敲定了20多个问题，最终达成了协议。即使如此，到第二大签字时还是出了问题，已达成的协议差点儿泡了汤。

5月4日11点签订仪式开始，2500个座位的国际会议中心座无虚席，这个会议中心是由中国无偿援建的。主席台上，一并列地站着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挪威外交大臣戈达尔和埃以巴三方代表共8人。按字母顺序阿拉法特先签协议，他面前是三黑三蓝200页的两摞文件，黑的是正文，蓝的是附件。阿拉法特签完黑皮文件后开始签蓝皮文件，但打开后他皱起了眉头，随即沉下脸合上了文件夹退席。他怒气冲冲地对惊异的穆巴拉克说：“这几幅地图我没见过，我不能签。”拉宾签完了黑的后，发现蓝的上面阿拉法特没签字火了，起身质问了阿拉法特几句回到自己的位置。会场气氛立时紧张起来，主席台上的人赶紧围住阿拉法特和拉宾紧急磋



商。拉宾相当生气，他认为阿拉法特这是节外生枝，故意当众羞辱他，遂脸红脖子粗地质问阿拉法特；穆巴拉克表情严肃地劝告双方冷静处理此事，不要使国际社会太失望；阿拉法特则愤然一挥手，表示这种文件他拒绝签署。但他们也不能老在台上纠缠，于是签字仪式被迫中断，8人退至幕后紧急磋商。全场哗然。

最后，在人们苦口婆心地劝解和开导之下，12点20分拉宾和阿拉法特又从幕后重新走出，签字仪式继续进行。阿拉法特在蓝文件上做了注解后签了字，签字仪式在掌声中结束。这场风波的原因，是阿拉法特在地图上没见到克里斯托弗的担保函。此函代表美国保证：地图上的杰里科面积不是最终的自治面积，巴以双方以后还将就此举行谈判。仪式中断后阿拉法特找到了那个担保函，才同意继续签字，同时又亲笔把担保内容写到了地图上。

1994年5月13日上午，以色列正式从加沙和杰里科撤走了全部军队，向巴方移交了权力。飘扬了27年之久的以色列国旗终于被醒目的巴勒斯坦四色旗所代替。7月1日，阿拉法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重返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成立了以阿拉法特为首的自治政权，开始实施自治。

我们在开头说过，巴勒斯坦地区不是个容易治理的地区，问题复杂而且积重难返。阿拉法特虽然开始实施自治权，但加沙和西岸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夜消失，而且往往因为人们的期望值太高矛盾容易激化。自治区和被占领土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既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有缺乏资金的问题，当初承诺的外国施主们并没按期如数掏钱。再加上一有风吹草动以色列就封闭边界，巴勒斯坦人无法过境打工，许多人的生活反而比以前更加艰难。此况下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活跃起来，不断进行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活动，阿拉法特无力控制这些活动。

拉宾极为恼怒，他不能允许出现归还土地反遭杀伤的事，他要杀一儆百。

1995年10月26日上午10点刚过，一名中年人在马耳他的闹中区光天化日下被人枪杀。凶手是个身穿牛仔裤、黑上衣的年轻人，一副东方人的长相，迈着镇静的步伐走向受害者，突然掏出无声手枪向那人的脑袋上连扣五下扳机。然后他镇静地捡起地上的弹壳，从容地跨上同伙驾驶的摩托车，绝尘而去。后来结果是人们熟知的：警察什么证据也找不到，地上没弹壳，被遗弃的摩托车是偷来的，上面的指纹已经消除干净。死者持的是利比亚护照，名叫易卜拉辛·沙维什。

但两天后他的真正身份查明了，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领袖法特希·沙卡基，以色列称他是继卡洛斯之后的头号恐怖大头目。阿拉伯人发出一片怒吼，谴责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暗杀行为，以色列政府坚决予以否认。

此事在被占领土上引起一场反以风暴。巴勒斯坦人举行了罢工罢市，示威者与以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誓要进行报复。它在发给新闻界的声明中说：我们向所有的犹太人和他们的领导人拉宾总理保证，这次卑鄙的暗杀将导致所有的犹太人成为我们的自杀炸弹的攻击目标。

拉宾说他不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又接着补充说，如果死的真是沙卡基他不感到遗憾，因为此人是专事杀害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组织首领。

但此事的确是摩萨德干的，而且是拉宾亲自下的命令，他在1988年4月下令杀害了巴解领袖阿布·杰哈德。早在1995年2月他就做出干掉沙卡基的决定。这事他没告诉其他阁员，只有几个情报机构的大头目知情。摩萨德

使用的方法，跟 1983 年在瑞典街头除掉巴解领导人一模一样，讲究个干净利索。它为这次行动租了条货船在马耳他岛附近游荡，船上的集装箱里有一架“贝尔”直升机随时待命，必要时杀手将会从天而降猎取人头。但后来它没使用“空中杀手”，还是收拾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的老办法：一名车手加一名枪手。沙卡基离开利比亚前三天，隐藏在该国的摩萨特特工就报告他将去马耳他，再从那里飞往叙利亚。摩萨德头头建议在公海上活捉沙卡基，拉宾摇摇头，那样作太张扬了，现在正在谈和平。

血，仍然在流。

## 第十五章 拉宾之死

鉴于 1993 年的巴以和平协议推动了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大大地缓解了阿以冲突，总部设在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准备向巴以双方领导人颁发 1994 年和平奖。

### 获和平奖拉宾欣喜 三人分佩雷斯有份

最初这个奖是准备授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 1994 年 1 月 13 日英年早逝。此况下，评委们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这种奖最初是授予一个人，后来出现了同授两人的情况，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南非的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等人都是这种情况。这次肯定也要同授两人，因为以巴议和缺一不可，1979 年就是萨达特和贝京两人共享这一殊荣的。但到确定名单时，人们才发现事情不大好办。问题是：巴方人选好确定，理所应当是阿拉法特，没人跟他争；而以方的人选难定，因为拉宾与佩雷斯的表演都很突出，不知该定谁为好。

拉宾当仁不让，他在这种问题上从不含糊，在争当总参谋长、大使到党主席时他从没谦让过。他的助手哈伯尔强调，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地拍的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

佩雷斯也不想谦让，因为这不是可以推让的党内竞选。诺贝尔和平奖是载入人类史册的荣誉，是西方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目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的门徒贝林和萨维声称，佩雷斯在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你用谁也否定不了。他们指出，在拉宾三心二意时是佩雷斯坚持谈下去，并且是他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

他俩一争，新闻界觉得有戏。以色列《晚报》以《诺贝尔和平奖大战》为题开始了渲染。它援引一个内阁部长的话说：“两人正紧锣密鼓地力争获得和平奖，其它一切事情都被推到一边……他们都已经 70 多岁的人了，政治生涯已近黄昏，两个人最感兴趣的是赢得荣誉，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俩一争，其他阁员觉得很为难，不便表态。支持佩雷斯吧，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谁都知道拉宾是和平航程的舵手，他为此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下了注；支持拉宾吧，佩雷斯往哪儿摆？佩雷斯为和谈付出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怎么办才好呢？

最后有人提议以方出两个候选人，“最好是两人同时得奖，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话，那将是个悲剧。”

聪明的挪威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既然能够精心组织奥斯陆密谈，当然也会妥善解决这一难题。果然，1994 年 10 月 14 日，设在奥斯陆的评选委员会宣布：阿拉法特、拉宾和佩雷斯三人共享这一荣誉。为不引起三人对排名前后的争议，评委会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了他们的位序：阿拉法特的名字以 A 打头排在第一位，佩雷斯以 P 打头排在第二位，拉宾以 R 打头排在第三位。既然挪威人把话都讲明了，三人对名字排在前后没表示异议。

1994 年 12 月 10 日晚，挪威首都奥斯陆市政府大厅里灯火通明，聚集了身穿庄重和艳丽服装的绅男淑女。颁奖仪式开始后，阿拉法特、佩雷斯和拉

宾，在礼宾官的指引下走到台上并排站在一起。在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致词后，悠扬的乐曲奏起，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把奖章和证书送到三人手中，大厅内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阿拉法特和佩雷斯发表了讲话之后，拉宾戴上眼镜走到了麦克风前。

女士们，先生们：

我度过了青春年华，如今年事已高。在我生活了 72 年的记忆中，此刻我能想到的就是我的希望。

我们的人民选择我们来掌握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命就掌握在我们手中，虽然这话说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今晚，他们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他们暗自思忖：这些人是怎么行使授予他们的权力的？他们将作出什么样的决策？我们明早起床后会是什么样子？是和平还是战争的一天？是笑还是哭？

在我的国家以色列国，在我有幸服役过的以色列国防军，我们历来视生命为最珍贵的东西。我们从未发动过战争，除非战争落到我们头上。

我们正在缔造和平。承担这项工程的设计师们和工程师们，即使在今晚也在一砖一瓦地营造着这座和平大厦。这项工程难度极大，复杂而又艰巨，错误的决策和施工会使整个建筑坍塌，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把这座和平大厦视为对我们，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赐福。我们把它视为对我们周边邻国、对和我们共同从事这项事业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挪威）的赐福。这些国家，为了在此处，后来在华盛顿，尔后在开罗签署的这个协议作了大量工作，该协议标志着解决阿以冲突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棘手的巴以冲突的开端。我们还要向为此作出贡献的其他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已感觉不到与以往有所不同。和平已成为可能。我们在孩子们的目光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在士兵的脸上，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中，在田野上，看到了光明。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一定不让他们失望。

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是 500 万以色列公民——犹太人、阿拉伯人、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和切尔卡西亚人，500 万颗心为和平而跳动，500 万双眼睛满怀希望对和平的希望注视着我们。

最后请允许我与你们重温一句犹太人传统的祈祷词，我们的人民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吟诵它，以表达他们最深沉的企盼：“上帝将赋予其人民以力量，上帝将赐予他的人民——我们所有的人——和平”。

### 晴空雷希伯伦惨案 姑息下宗教狂猖獗

1993 年 12 月 25 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把拉宾、阿拉法特评为 1993 年的“新闻人物”。这个杂志说：“如果没有拉宾和阿拉法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就会继续沿着他们自 1948 年以来一直走着的凄惨的、充满暴力的道路走下去。”“他们都抓住了眼前的机会。”

但是，中东和平列车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顺利前行。

从和解的方面来说，阿以之间和谈的势头加强了，和解迹象日益增多。

1993 年 9 月 14 日，以色列与约旦在华盛顿签署了和平框架协议。摩洛哥 1993 年年底经过选举产生了新政府，里面引人注目的是有位犹太人大臣。

1994年5月4日，以巴在开罗签订了实施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的协议，5月11日至13日以方把上述地区权力移交给巴方。1995年9月28日以巴签订了塔巴协议，以方同意把巴方自治范围扩大到西岸27%的地区，同意以军10天后开始撤出西岸阿拉伯区。

从反和解方面来说，巴以双方的反对派的活动日益猖獗，这些事件给和平前景罩上了阴影。

几乎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发生：以军伏击哈马斯分子，抓捕其中的极端分子，惩戒性地炸毁他们的房屋；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警察的出现暴跳如雷，不断寻衅滋事，设法给拉宾政府制造难题；巴勒斯坦好斗分子用匕首刺杀以军，用斧头袭击定居者，极端分子不断在以色列大城市制造自杀性爆炸惨案。

这样一来，双方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上当受骗，认为和解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拉宾和阿拉法特的支持率都下降了。

1993年11月，以色列反和谈势力的活动达到了猖狂地步。以色列在西岸建立了145个定居点，他们之中闹得最凶的人，发誓要用鲜血保卫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有些人扬言以后见到执勤的巴勒斯坦警察就用枪打。领头闹事的是“保卫犹太人联盟”，是在纽约被杀的卡汉创建的极端组织，它的主席费德曼在希伯伦恶狠狠地说：“双方都将血流成河，这里将会变成另一个黎巴嫩。”12月3日，他们在其领导人汽车挨砸后大白天向希伯伦市中心疯狂扫射，而“维持秩序”的以色列军警则袖手旁观。12月7日，数百名极端分子在拉宾住宅前焚烧他的画像，抗议他不保护犹太定居者的“安全”。一位示威者煽动众人说：“政府不保护我们，我们就得自卫！”19年前拉宾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妥协。1974年20家犹太人占领了西岸一个山头后，当时任总理的拉宾怕此事引起犹太人之间的流血冲突，便允许他们到附近的兵营中定居，从而为后来在被占的西岸再建几十个定居点开创了先例。但这次他不想再妥协了，他警告那些闹事的人不得违法及破坏以巴和平协议，并命令保安部队对那些不听招呼的人绳之以法。他命令军队逮捕那些袭击阿拉伯人的定居者，把他们送交警方进行惩处。

但他的警告余音未了，犹太极端分子的枪就响了。

1994年2月25日清晨5点45分，在被占领土上的希伯伦市，800多名巴勒斯坦穆斯林正跪拜在易卜拉欣清真寺中作晨礼。突然，一个身着以军预备役少校军服的中年人闯了进来，二话不说端起冲锋枪来便向人群猛扫。“哗哗”扫了一梭子后，他又换上了一梭子继续扫，统共打了3梭子弹。在狂扫中他还不住地高喊：“阿拉伯——狗！阿拉伯人——猪！统统给我下地狱吧！”中途，他还向夺路外逃的人群扔出3颗手榴弹。枪声，爆炸声，惊叫声，喷溅的鲜血……枪声停息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血流得太多了，人们在抢运伤员的过程中，不断在淤积的血渍中仆仆滑倒。凶手也死了。他倒在血迹斑斑的地毯上，一脸脏兮兮的胡子，被砸得青肿的脸上凝结着满足的微笑。

以色列军警封锁了现场，凶手的身份很快查清。他叫巴鲁赫·戈尔茨但，38岁，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犹太人，1983年移居希伯伦郊区阿尔巴定居点。警察在他脑袋上找到了枪眼，说他是自杀而死；但在场的巴勒斯坦人说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人们在他打完子弹后冲了上去，用鞋底、桌子腿和灭火器把他的脑袋砸扁了。初步清点的伤亡人数：死29人，伤近200人。出事后，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涌向医院，要探望伤员和为他们献血，但遭到封锁医院的

以色列军人的阻拦。在随后的冲突中，又有两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消息传开后，整个占领区到处发生了巴勒斯坦人与以军的激烈冲突，结果是 18 名巴勒斯坦人和 1 名犹太人被打死。

希伯伦是个古老的三教圣城。旧约圣经说，犹太人鼻祖亚伯拉罕 4000 年前花了 400 谢克尔银市在这里买了墓穴，后来他、以撒和雅各及他们的妻子都埋在这里。圣经还说，大卫王 3000 年前定都此地达 7 年之久。但它也是伊斯兰教圣地，这里有约旦河西岸最大的清真寺。1929 年希伯伦有 700 名犹太人，8 月份的骚乱中 67 名犹太人被杀，伤 200 多人。1936 年英委任当局撤走了该市全部犹太人，随后犹太圣迹遭到严重破坏。犹太人，尤其是他们之中的极端分子，牢记着这个仇。1968 年，犹太拉比摩西·莱温杰率一批人以度假为名来此租了个小旅店住下，后来便宣布要在此地重新定居。三周后以占领当局把他们安排到军事总部居住，1971 年在附近的阿尔巴镇为他们建立了定居点。1979 年又有一批妇女和儿童悄悄进入市内的拜特哈达萨，贝京政府保护她们定居了下来。

全世界被希伯伦惨案惊得目瞪口呆，各国尤其是中东领导人发出一派怒斥声。阿拉法特强烈谴责这一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屠杀，指出犹太定居点已经成了破坏巴以和解的定时炸弹：极端反以的真主党和哈马斯组织发誓要报复，让以色列人等着瞧；黎巴嫩说此事使人想起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伊朗说这一屠杀是在以色列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叙利亚说以色列领导人要为此事负责；美国总统克林顿谴责这一“凶狠的屠杀行径”；联合国、俄罗斯和欧洲诸国也齐声怒斥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国际舆论指出，希伯伦惨案表明中东冲突的形式变了：它不再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国的冲突，而是温和派与极端派的冲突，这是一场真正的中东战争。它将使巴以和平进程大大减速，并严重损害了拉宾与阿拉法特的威信。

刚访欧归来的拉宾立即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他和佩雷斯都严厉谴责这起凶杀。拉宾痛心地说：“希伯伦惨案是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的耻辱。这一悲剧只能促使以色列下更大的决心与巴勒斯坦人进行和谈。”他和佩雷斯要求各方保持克制，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拉宾打电话给阿拉法特说：“作为一个以色列人，这一事件使我感到尴尬。”27 日以色列政府宣布，它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全国调查这一事件；解除那些闹事的犹太定居者的武装并限制他们活动；释放 800 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但阿拉法特对这些举措反应冷淡，认为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同一天，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和谈代表团宣布中断与以色列的分别会谈，从华盛顿返回本国。

这事多少跟拉宾有些关系，他对犹太极端分子态度不坚决。他是准备以土地换和平的，但他不愿多还，一有风吹草动就更不愿意还了。他一动摇，底下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更不干了，不执行决议的借口很容易找。他没有改变在巴勒斯坦人建国和那路撒冷归属问题上的立场。直到 1995 年 10 月 1 日他还对法新社记者说：“以色列将同一个不受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实体生活在一起，但这个实体不是一个国家。”在那路撒冷问题上他的态度异常固执，始终坚称它是以色列统一的首都，根本不能谈这个问题。他在长达 20 个月的巴以和谈中，一直回避东那路撒冷未来地位问题，同时有条不紊地建造占据大片西岸土地的“大耶路撒冷”。他在 1993 年 7 月份说：“政府关于耶路撒冷不容谈判的决心是坚定的，今后几年的重点是加紧建设大耶路撒冷。”

他对耶路撒冷的感情极深。1987 年的一大晚上，他在特拉维夫国防部的

办公室里对《纽约时报》记者马里兰·贝格一诉衷肠。他说：“你问我为什么如此迷恋耶路撒冷。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的父母是在耶路撒冷相识的，并且在那里结了婚。我是1922年在耶路撒冷出生的。1948年，我为打通耶路撒冷补给线血战过。1967年，我作为以军总参谋长亲眼目睹了耶路撒冷的统一，看到西墙恢复了原貌，一个犹太孩子或犹太成年人盼的是什么？盼的是能生于耶路撒冷并参加过两次决定它命运的重要战争。”正因为如此，1992年后他在耶市附近新建了3942幢住所，使犹太定居者增加了39%，达到了14.5万人。

但犹太极端分子不买拉宾的账，他们与巴方极端分子一道诅咒他，多次威胁要杀死他。1995年9月的塔巴协议对他们是个大刺激，捅了他们的“大以色列”梦的马蜂窝。因为以前只是说说或文字协议，现在却要变成实际行动了，这一次是撤出27%，以后是多少？他们狗急跳墙了。他们到处搞抗议示威活动，大骂拉宾是“叛徒”，“卖国贼”，8月份掀翻一位部长的小汽车，9月份围攻推搡耶路撒冷警察局长。在一次集会上，他们甚至猖狂到不准总统魏茨曼讲话的地步。9月份希伯伦街头出现了一个巨型标语牌，上面的阿拉法特用枪瞄准犹太人，旁边戴着阿拉伯头巾的拉宾袖手旁观。下面写着：一对儿冷血的难兄难弟。

10月份对拉宾个人生命的威胁升级了。3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乌兹·兰道破口大骂拉宾是个“不学无术的蠢材，对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无所知。”分析家们指出，这是利库德集团赤裸裸鼓动暴民“干掉”拉宾的号召。随之，拉宾在极端分子眼中成了犹太人的死敌，跟搞大屠杀的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10月5日，在反阿的“卡赫运动”组织的集会上，极端分子高举着侮辱拉宾的招牌，上面的拉宾穿着一身纳粹党卫队制服。与此同时，威胁政府部长的事件不断接连发生，住房部长埃利泽在汽车里遭到右翼示威者的袭击；教育部长阿洛尼遭到殴打；环境部长萨利德的轿车几乎被推下高速公路。

鉴于暴力事件急增，拉宾为内阁部长们增派了保镖和配备了防弹车，但他自己却拒绝穿防弹衣。1993年10月14日，他针对有人要对他下手的威胁说：“我并不害怕这种威胁。我是不会吓得扭头跑掉的，他们不能使我沉默。利库德集团鼓动了那些极端分子，它在此事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类似的话我在议会中听得够多了。我是从整体上看待这一问题的，而不是关心我自己的安全。我在军队中有比这更艰难的经历，我经历过无数次致命的炮击和扫射。暴力针对的不是我个人，它要摧毁的是公众的思考能力。”

除此之外，有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呢？想象力丰富的人认为有。他们发现，以色列最猖狂的犹太极端分子几乎全来自美国的布鲁克林区，如像以“狗”称呼阿拉伯人的卡汉和在希伯伦大开杀戒的戈尔茨坦。1995年6月份，布鲁克林的拉比亚伯拉罕·赫克特公开号召人们刺杀拉宾。美国记者阿莱维指出：“卡汉把美国式的激进主义和用强大传媒灌输的反阿意识带进了以色列。”阿莱维本人是美国犹太人，他原为卡汉的忠实信徒，后转变成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1993年9月13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谈巴以和解对美以关系和美国政治的影响。它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是欢迎巴以和解的，但也有一些人对此惴惴不安。他们担忧的是：如果真的实现了阿以和解，美国就没必要每年给以色列18亿美元军援了，以色列的生存能力就会下降；同时，美国不得不从中东地区撤走一部分军力，海湾石油国的君主

们将会感到威胁；而且，美国犹太人对政府的要求减少了，他们的政治捐款也将大大减少；最糟糕的是，美国对中东的武器出口也会大幅度下降，美国的失业率将随之升高。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用数字证明了这点。它在 1993 年 11 月 1 日的刊物上说：由于中东还存在着紧张关系，1985 年 - 1988 年，美国卖给中东的武器是 135 亿美元，1989 - 1992 年猛增到 356 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两倍；1993 年继续增高，仅美国与沙特签订的销售 F - 15 战斗机及与科威特签的 M1A2 坦克的合同就高达 140 亿美元。不言而喻，要是中东地区消除了紧张关系，谁还买这些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玩艺儿呢？

再联想到，1995 年 10 月 24 日，即拉宾遇刺的 10 天前，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要求美国把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人们不禁要问这是要干什么，是要推进和平进程还是制造新的紧张局势？谁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地位是阿以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为此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敢在耶城设立大使馆。至此，人们逐渐品出一些味道来，尽管白宫的确是急欲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

### 和平集会刺客枪响 一代风流猝然千古

1995 年 11 月 4 日晚 8 时，星期六的特拉维夫。夜幕降临后市中心的以色列众王广场灯火通明，万头攒动，约有 20 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支持和平进程的集会，许多孩子的文化衫上写着“跟拉宾一起走向和平”。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在不远的地方举行反和谈的集会。俯瞰广场的市政厅二楼阳台上，并排站立着拉宾、佩雷斯和其他阁员，埃及和约旦驻以大使也应邀出席了集会。这是特拉维夫市 10 多年来规模最大的集会，会议主题是：“要和平，不要暴力”。表示支持并前来助兴的有大名鼎鼎的吉迪·果夫，以色列家喻户晓的大红大紫的三栖巨星。为确保政府领导人和贵宾的安全，防止右翼分子寻衅冲击会场，以色列保安部门在广场上及周围布置了 700 多名警察和便衣。

在佩雷斯发表了简短讲话后，晚 8 点半，在群众有节奏的“拉宾，拉宾”声浪中，拉宾发表了和平演说。面对欢声雷动的人海，波翻浪涌的彩球和横幅，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用充满信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以人们熟悉的低沉和沙哑声调说：

“请允许我这样说，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每一个人，因为你们都是为了反对暴力拥护和平而来的。这给了我和我的朋友西蒙·佩雷斯领导的政府一个机会，给了和平一个机会，这个和平将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大部分问题。

我当了 27 年的军人，只要和平的机会还没到来我就会继续斗争下去。我相信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一个争取和平的伟大机会，为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人，为了更好的不在这里的人，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始终认为，大多数人希望和平，并且随时准备给和平一次机会。而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个集会的人，和没来参加这个集会的人，表明人们真正渴望和平反对暴力。暴力腐蚀了以色列民主政体的基础。我们应当谴责、明智地消除以及孤立暴力行为，暴力不是以色列政府选择的道路。我们有民主体制。在民主政体中，人们对事物有不同的争论，但最终结果将由民主选



举决定。就像 1992 年选举那样。那次选举授权我们干我们现在正在干着的事，而且我们将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我想说，我感到骄傲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的，和我们一样渴望和平的国家的代表将继续留在这里，埃及、约旦和摩洛哥已为我们开辟了和平之路。我要感谢埃及总统、约旦国王和摩洛哥国王，感谢今天到会的这些国家的代表，因为他们是和我们共同迈向和平的伙伴。

我还是要说的是，在这个政府存在的 3 年多时间里，以色列人民已经证明争取和平是可能的，和平为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社会敞开了大门。和平不仅仅是一种祈祷——在我们的祈祷中和平是最重要的，它也是全体犹太人的渴望，一种对和平的真正渴望。

总会有和平的敌人的，他们正千方百计地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中东和平进程。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在巴勒斯坦人中找到了和平伙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我们的宿敌，但现在它已停止了恐怖主义活动。没有和平伙伴也就不会有和平。同样，我们也有机会同叙利亚人达成和解。为了和平，我们将作出最大努力，巴解组织也要尽到最大的努力，目的是解决以色列——阿拉伯之间最复杂的、最持久及最伤情感的指责和矛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和平的，愿意为和平冒任何风险。

这是一个充满困难和痛苦的过程，对以色列来说，没有毫无痛苦的道路可走。但是，和平的道路要比战争的道路好得多。我这些话，是以一个老军人和今天的国防部长的身份说的，因为我看够了以色列国防军军人遗属们的痛苦。对他们，对我们的孩子们，对我来说是我的孙子们，我的政府将用一切公开的、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推动和取得一个全面的和平。

这一集会一定要向以色列公众、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整个世界转播，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要和平，而且支持和平！

谢谢你们。”

听惯了他那低沉沙哑的声音的群众，发现拉宾今天激昂慷慨地简直像变了个人。

讲完后，他掏出歌词紧紧挨着佩雷斯，在著名歌星米里·阿隆尼的领唱下，同全场群众一起高唱《和平之歌》：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不会使我们重新拥有。

他的蜡烛已经熄灭，他已埋入土中。

痛苦已不能将他唤醒，更不能使他死而复生。

没人能把他还给我们，从那漆黑的墓穴中。

胜利的欢呼和赞美的歌声，也无法使他起死回生。

唱一首和平之歌吧，别再低声祈祷。

不如高声呐喊，欢唱幸福的和平。

让阳光沐浴似锦的花朵。

别再回首后看，让逝者得到安宁。

抬起你希望的双眼，别再用枪口瞄准。

唱一首爱的赞歌，不要再颂扬战争。

别说那天会到来，要它到来因为并非梦境。

在城市每个广场上，只为和平而欢呼。

人们放声高唱着这支歌，广场上的激昂情绪达到了鼎沸状态。

这时拉宾突然转过身来，张开双臂，同佩雷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台下台下立时发出一片喝彩。几位工党阁员对拉宾的举动颇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佩雷斯这样做过。他再度出山并任命佩雷斯为外长后，内阁部长们都捏着一把汗，生怕他俩又像以前那样勾心斗角。一年后他们才放了心，因为两人合作得很好，而且不是装出来的。见状，一位以色列记者挤过来问拉宾：“总理先生，你们两人是不是头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拉宾答道，“事情在变，不仅仅是世界和中东在变，我们也在变。”佩雷斯笑着点点头。

集会结束后，拉宾在众人簇拥下走下阳台，准备乘车离开。他边走边与身边的热情支持者握手。在人群中他忽然对佩雷斯说：“西蒙，好像你提醒过我，说可能有人要在今天这个集会上行刺。不知谁会向我开枪。”佩雷斯笑了笑，没说什么。

拉宾万万没想到，要向他开枪的人正向他逼近。

人们仍陶醉在集会的欢乐气氛中，没注意到此人正从阳台后的通道走出。贵宾停车场在市政大厅的下面，是个半地下的建筑，乘车的人要下几级台阶。那天停车场里有20多名保安人员，但没人上前盘查此人，以为他是某位要人的司机。

佩雷斯有事先走一步。他走下阳台时碰上拉宾的司机达姆提。达姆提问他拉宾什么时候走，佩雷斯说还有几分钟。说完，佩雷斯下到停车场乘车先走了。

拉宾同外国使节和各界名人——握手道别后，同莉赫夫人一起走下台阶，向新配备的凯迪拉克防弹车走去。在这之前，他的贴身保镖请求他穿上防弹背心，尽快离开会场。拉宾拒绝了。他对保镖说：“此刻我觉得像呆在家里一样安全。”

听到这话，一位记者问莉赫：“难道您不怕一个疯子会突然窜出来，向总理先生开枪吗？”

莉赫惊奇地瞪大眼睛，“你怎么会提出这种问题？你疯了吗？我们是在哪里，难道我们是在非洲吗？我真不明白、你们记者怎么会有这么多怪问题。”

拉宾和莉赫这样说有些道理。以色列是个很特殊的国家，一是持枪者众多，二是显得很民主。由于地处敌对环境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件，政府允许大量后备役人员把枪支保存在家中，而且满街净是些大背着枪的现役军人。但很怪，这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犯罪率却很低，持枪行凶的案件极为罕见，仅为美国同类犯罪率的1/10，西方国家都认为这是个奇迹，以色列人的尊卑观念很淡漠，总统夫妇跟老百姓在街头一起喝咖啡是很平常的事，谁愿意凑过去跟他们聊几句都行。西方记者吃惊地发现：一位以色列前总统访美归来，竟然跟普通旅客一样排队取行李，没人优待他请他排到前面。拉宾夫妇已习惯于这种社会环境，而且沉浸在当晚激奋的情绪中，根本没想到有人要向他们开枪。

就在拉宾正要跨进座车之际，那人从黑暗中窜出几步来到他的跟前，抬手就是“砰砰”两枪。他边开枪还边喊道：“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真枪！”时间是9点50分。

拉宾猛地感到腹部和胸部被人重击了两拳，一阵钻心的疼痛，不由自主弯下了腰。保镖们立即冲上去把他往车里塞。不料这一过程中他的背部露了

出来，凶手趁机又向他开了两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背部，另一颗子弹打中一名保镖的肩膀。拉宾缓缓倒了下去。

在人们一片惊呼中，保镖们扑上去掐小鸡似地制服了凶手，几个人把他死死按在水泥墙上，枪口抵着他的下巴。司机达姆提忙帮保镖把拉宾抬进汽车。另一些保镖拉着惊呆了的莉赫往前走，不住对她说，那是一枝玩具枪，不是真的。

达姆提猛按喇叭，狠踩油门，载着重伤的拉宾急速向附近的伊契洛夫医院冲去。途中他听见保镖轻声问拉宾：“总理先生，您伤着了吗？”

“是的，是的，”拉宾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伤在哪儿了？”

“背上，背上。”

随后，拉宾低沉地说出了最后两句话：“我没事，没事。”说完，头一歪，失去了知觉。

一分钟后汽车冲到医院门口。一位满头大汗的保镖挥舞着乌兹式冲进急救室，厉声喊道：“快，快把这间屋子腾空了，拉宾被人开枪打了！”接着几名保镖用担架把拉宾抬了进来。只见他紧闭双眼，胸部和腹部咕嘟咕嘟往外冒血。伊契洛夫医院是以色列的一流医院，主治医师们都有妙手回春的本事，主刀的院长加比·巴拉巴什教授医术享誉全球，但抬到手术台上的拉宾已量不出血压和脉搏了。医生们开刀找到了两颗子弹，一颗打在脾脏上，另一颗击中了脊椎骨，第三颗没找着。这些子弹都是致命的达姆达姆弹，俗称炸子儿。这种子弹的弹头上铸有沟槽，进肉见血就炸，能把人打出个碗大的窟窿来，是一战后国际上严禁使用的子弹。果然，这些一流医生止不住拉宾的大出血，不多时手术台就被鲜血染红了，他一直没有恢复知觉。

11点06分，以色列电台中断正常节目向全国宣布，拉宾总理遇刺受伤，伤势严重。在刚才集会的以色列众王广场，人们点燃蜡烛，唱起了悲歌。上千人涌向伊契洛夫医院，围在门口守候拉宾的消息。

11点10分，医生们相视片刻后放下了手术刀。院长摘下口罩走出手术室，告诉内阁部长们，拉宾因大出血和心力衰竭不治身亡。

11点15分，拉宾的助手埃坦·哈伯尔走出医院，悲痛地向守候的人群说：“以色列政府以震惊和悲痛的心情宣布，总理兼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今晚在特拉维夫被一名凶手刺杀身亡。”

人们闻言悲愤地连声高喊：“不！不！”许多人失声痛哭，以色列国发出了哀泣。

### 宗教干政杀机丛生 防卫疏漏凶手得逞

凶手的身份很快查明。其实根本用不着严厉审讯，他在警车上把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干全说了，痛快得就像竹筒倒豆一般。

这个上穿蓝色T恤衫、下穿黑色牛仔裤的刺客名叫伊加尔·阿米尔，25岁，特拉维夫郊区巴尔伊兰大学犹太法学的学生，家住特拉维夫市的赫兹利亚地区。他父母是来自也门的东方犹太人“塞法尔迪”，东方犹太人的宗教观念强，政治上比较保守，他们多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他母亲戈尤拉是家庭自办幼儿园的老师，父亲沙罗莫是个大胡子黑衣帽的职业抄经人。阿

米尔高中毕业后在以军精锐的戈兰尼旅服过役，退伍后进大学攻读犹太教法，作为后备役军人他有合法的持枪资格。这个身材瘦小、肤色较深的青年，平时没什么劣迹，警察局里也没他的犯罪记录。邻居们对他的印象不错，说他平时文静有礼，还常做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但他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性格孤僻沉默寡言，观点偏激好认死理。一些犯罪学家认为，这种性格的人容易出问题，而且容易出大问题。他生长在一个以多子女为特征的宗教家庭，是八兄妹中的老二，家中宗教气氛非常浓厚，住棚节时全家搬进院子里搭的棚子里住。这种家庭是以色列极端主义势力的温床。据阿米尔的战友反映，他在军队中平时还规矩，只是每天的宗教礼拜一道不能少。但在加沙执勤期间他变了个人，对巴勒斯坦人极其野蛮凶残，动辄朝他们的致命处狠踢。

以色列是由世俗化的东欧青年创建的国家，最艰苦时宗教人士躲在国外挑毛病，诅咒这批青年违反神的意志重建家园。建国后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地来了，然后借助比例选举制逐渐爬上政坛，开始了宗教干预政治的历程。在这个科技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黑衣帽拉比的影响大得惊人，成了社会中一批专横跋扈的特权人物。多年来不断有人抨击这一丑恶现象，但由于执政党必须依靠宗教党，这种现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色列激烈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它自己也有犹太教原教旨主义问题，自称信教的妇女甚至可以不服兵役。战神沙龙本人对宗教不感兴趣，但他手下的年青军官有40%的人信教，并由此极其仇恨阿拉伯人。毫不夸张地说，不管叫得是否合适，以色列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宗教政治。

阿米尔便是这种宗教政治的产物。随着巴以双方极端分子的暴力活动升级，他变得狂躁不安了。每当他听到哈马斯分子袭击以色列平民的事，总是情绪激愤地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要把这一切都算到拉宾和他的政府的帐上。”他从不隐瞒自己想杀拉宾的观点，他把以土地换和平的拉宾斥为“叛徒”和“刽子手”，声称要从拉宾手中拯救以色列人，因而在极端分子中有个“救世主”的绰号。

同学们曾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极端组织“埃亚尔”的反政府传单。他还自豪地夸耀，他在约旦河西岸参加过反政府示威并被警察拘留过。人们还见他最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详细描述政治谋杀手法的《杰卡尔的一天》，另一本是吹捧在希伯伦杀死29名巴勒斯坦人的戈尔茨坦的书。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信号了，但在宗教色彩甚浓的巴尔依兰大学中没人管这种事，这所大学是个反对和谈的政治堡垒。

阿米尔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刺杀行动，一些极端的拉比对他进行了露骨的鼓动。他在1995年一年中三次企图刺杀拉宾，都因故未能得逞。第一次是在1月22日，那天拉宾要出席“亚德瓦谢姆”大屠杀博物馆的纪念活动，有下手的机会但由于哈马斯在贝特利德汽车站制造了炸死29名以军士兵的惨案，拉宾临时取消了这次活动。第二次是在7月24日，也是个炸死7名以色列人的爆炸现场，拉宾视察时维持秩序的警察没让阿米尔挤到最前头。9月11日又有一次机会，拉宾出席特拉维夫市以北的卡发·沙马雅胡高速公路立交桥的开通仪式，他第三次前去行刺。在后来重播的录像中，阿米尔喊着“14万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被你们抛弃了”往前挤，但又被保安人员推到了一边。

这次是他第四次行刺。这次他得逞了，因为根本没人拦他。

预审中阿米尔对所干之事供认不讳，但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个人干的，没有同谋。他对记者们叫道：“没人跟我一起干，不要指控别人，都冲着我来好了！”

但他在撒谎。他不一个人干的，有人全力协助他行刺，他哥哈盖就是其中之一。阿米尔曾问过哈盖，怎样才能阻止中东和平进程，哈盖冷笑着告诉他，向拉宾开枪是最有效的途径。27岁的哈盖是极端组织“犹太之剑”的骨干分子，他不但完全知情，而且还积极参与了这次刺杀行动。前面所说的炸子儿，就是他在8个月前亲手制作出来的。他把阿米尔的0.22口径“贝雷塔牌”手枪和子弹研究了一番，挑出20颗看来不会臭火的新子弹。然后小心翼翼地弹头上钻洞，再往洞里填上钢珠，这种子弹打得更准而且入体就炸，形成无法止血的大面积创口。11月4日晚上，他们哥俩儿坐着一起看电视，当看到拉宾讲话时阿米尔的呼吸声粗重了。他起身从枕头底下拿出枪塞在腰里，那把枪里装了两颗达姆达姆弹，什么也没说地悄然离去。哈盖被捕后供认：“我知道他要去哪里和干什么，但我没拦他。”哈盖还供认他自己也很想杀拉宾。他打算用支带瞄准镜的AK-47型自动步枪干这件事，一是这种枪杀伤力极强，一枪便可致拉宾于死命；二是用瞄准镜可在远处开枪，打完后便于逃脱。警察在他们家的后院中，搜查出手榴弹、雷管和可塑炸药等许多凶器。

在初审中，阿米尔尽力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刮得光溜溜的脸上挂着强装的微笑。但他不想为这一可怕罪行上断头台，一涉及到刑事责任他就往宗教上推，他知道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小命的稻草。因此他不承认自己有罪，口口声声说这是上帝让他干的，并煞有其事地说曾接到过上帝的启示。说着说着他竟嚣张起来，冲着旁听的记者们大叫：“我们需要具有付冷酷的心肠。犹太法典允许人们杀死一个把土地和人民交给敌人的犹太人。假如你们看到有人威胁要杀死你的朋友，你必须去拯救他们。这是一种高尚的表现。如果总理说他只管98%的以色列人，而不管（被占）领土上2%的人，我就有责任去管他们……”他还供认那天晚上本想连着佩雷斯一块杀，只是佩雷斯跟拉宾老没站在一条线上，不便下手才饶他一死。

据查他行刺时不是极端主义组织成员，只是一个右翼势力的支持者。认识他的戈德史密斯对警方说：“我见过这个人，他是个很特别的人。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我们在‘马拉赫·伊斯雷尔’里一起共过事，我真不敢相信他作了这件事，我简直都被搞懵了。”这个马拉赫·伊斯雷尔，是个被取缔的极端的定居者组织。

当更多的案情披露后，人们觉得某些情况简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不是刺杀领导人这种事。这种事在世界上几乎年年都有，国家领导人和著名政治家历来是谋杀对象，总有些人以为杀了他们便可改变一切。据粗略统计，从1946年到1994年，全世界共发生过61起这类事件，有68位国家元首和著名政治家遇刺身亡。客观地说，保卫国家领导人有一定的难度。他们在明处，而且必须在人群中活动，不可能用防弹罩把他们严严实实罩起来；而凶手在暗处，可以主动寻找最佳下手时机，什么时候窜出来开一两枪很难防。据说美国总统的保镖队伍常换人，原因是这种工作使人高度紧张，时间一长铁人也受不了。

不可思议的是以色列出了这种事，而且是保安机构预先得到警报后出的事。以色列保安机构效率之高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聘请以色列专家调教本国

保安人员在国际上是种时髦，连美国人都常向他们虚心求教。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世界超一流的精兵强将，竟能允许一个陌生人走近总理从容开枪？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更令人不解的是：事前有人已向警方举报此事，他除了没透露刺客姓名外什么都说了，甚至提供了刺客的年龄、个头、肤色和学校。但警方没有认真对待，仅作了一般性的归档处理。

再查下去，情报部门和保安部门工作都有漏洞，而且是不小的漏洞。

以色列情报机构以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著称于世。它能很快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搞到手，能把埃及总统纳赛尔夜间尿样凌晨送到摩萨德头头的桌子上，对敌对组织搞窃听和安插耳目更不在话下。但为什么这次就什么都知道了呢？这真不知，还是知情不报？况且近来这类暴力事件相当引人注目，上级也下达了加强监控的指示。种种迹象表明，这架效能极高的国家机器某些零件出了问题，政治倾向影响了它的正常运转。贝京就曾下令禁止情报机构侦察右翼势力的反政府活动，说它会妨碍公民的言论自由。一些情报人员，甚至他们的首脑，本身就有强烈的仇阿情绪，认定只有阿拉伯人才会干凶杀的事，因而对来自犹太人的危险信号视而不见。

保安工作不该出的纰漏就更多了。不能让外人了解被保护对象的行动路线和活动规律，是干这一行的最起码常识。但这次，国家领导人的座车停在哪里，他们从哪个出口顺台阶下来，乘坐哪辆车，凶手阿米尔了解得一清二楚。拉宾的停车处本应是重点防卫地点，保安人员应有固定的站位和明确的任務，但那天这些规定形如空文。再联想到，犹太极端分子猖狂向希伯伦市中心射击时以军官兵站着旁观，人们不能不从政治倾向的角度看待这些所谓的“漏洞”了。另外，拉宾的贴身保镖也大意得使人吃惊。从后来的实况录象来看，当时有许多陌生人挤上前与拉宾握手和交谈，而贴身保镖们没有什么反应。出事前几分钟只有两名保镖跟随拉宾，而且拉开了距离，这给了凶手走近他的可乘之机。保镖们这种麻痹和迟钝，使凶手能从容地向拉宾连发数枪。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拉宾被刺实况竟被一位业余摄影师全部录了下来。他原先是录着玩的，现在打算用这一珍贵资料赚笔大钱。人们在这盘录像里可以看到：贵宾停车场谁都可以自由出入，就像没人管的菜市场那样方便；凶手阿米尔到了现场后，没事人似地与一位警察聊天；他先是紧盯着佩雷斯伺机下手，看没机会下手才转向拉宾；他先是背着手隐于一棵大树后面，然后毫不费力地走近拉宾开枪。当然，拉宾自己的防护意识差也是凶手得逞的原因之一，他不听保镖一再劝告拒不穿防弹衣。这一是因为他太相信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了，不相信本国同胞会向他开枪；二是他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不愿给人一个贪生怕死的印象，哪有战争英雄怕枪口的？

再往下查，情况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了。原来，阿米尔不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而是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招募的保安人员。也就是说，作为国家总理的拉宾是让一名国家保安人员打死的。辛贝特的全称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是以色列五大情报机构之一，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破案率极高，备受国外同行尊崇。辛贝特建立的时间（1948年6月30日）比摩萨德（1951年4月1日）更早。辛贝特是对内的，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摩萨德是对外的，相当于中央情报局。辛贝特究竟是看上了阿米尔哪一点人们不清楚，但秘密招募他为保安人员却是事实。辛贝特准备把阿米尔派到拉脱维亚共和国去，名义上是当个希伯来语的教员，暗地里从事保护该国犹太

人的工作。拉脱维亚二战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重灾区，二战中该国参加屠杀犹太人的人不少，战后仍时有反犹太活动的报导。有了辛贝特雇员这一身份，阿米尔几乎是公开进行刺杀拉宾的准备，他在辛贝特的靶场上提高了射击水平，而且接受了不引人注目地靠近目标的特殊训练。怪不得那天晚上他能悄悄地接近拉宾，怪不得他枪打得那么准而且那样镇静。

更难以置信的是，那位举报者“K先生”也是辛贝特的雇员。他名叫阿维沙伊·拉维夫，是辛贝特派到右翼极端组织中卧底的，他在厕所里听到了阿米尔冷酷的议论，向警方举报了刺客的详细特征和具体作法。但辛贝特不愿意相信犹太人会干这种事，它实际上是个专门用来对付巴勒斯坦人的机构，在被占领土上它的侦破效率高得惊人，对巴勒斯坦人毫不客气。1984年4月13日，当时的辛贝特局长沙洛姆带人营救了一辆公共汽车上的人质。在4名劫持汽车的巴勒斯坦人中，2名被打死2名被俘获。但身为局长的沙洛姆忘记了法纪，命令部下用拳头、枪托和石块把两名俘虏活活打死，然后宣布他们“死于送往医院的途中”。对这起谋杀的处理也带有严重政治倾向，总统赫尔佐格很快就赦免了沙洛姆等人。

具体负责保卫拉宾的是辛贝特的“重要人物保卫处”，它是专门保卫党政要员和外国贵宾安全的部门。我们前面提到，以色列的军警宪特既分家也不分家，各部门互相支援的情况很普遍。这个处的情况正是这样，它的成员都是从以军的精锐部队中抽调来的，个个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反应机敏才能出众。他们人人都会驾车驶船，个个都能熟练使用通讯设备，精通格斗擒拿等十八般武艺。他们出枪快准头好，第一颗子弹击中目标是起码要求，一有险情首先要将保护对象按倒，以自己身体抵挡刺客的子弹。这一切都要在真枪实弹下反复演练，直至形成他们的条件反射为止。他们跟美国白宫的同行一样，没人能够干满7年，反应一慢就得走人。

既然如此，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首先是对拉宾的三层保护圈出了问题。第一层是“外围圈”，即把现场与外围隔开的圈子，它负责警戒会场、封锁通道和监视群众等任务；第二层是“近卫圈”，它负责把群众与保护对象隔开；第三层是“无菌圈”，由身材较高的贴身保镖组成的密封圈，外人绝对不能进入，他们时时应处于刺客不便瞄准射击的位置。从事后电视台和那位业余摄影师的录像来看，这三层保护圈都有明显破绽，该防的没防住，该堵的没堵严。其次是辛贝特直到最后也没勾勒出刺客的轮廓来。事先它接到过警告，也研究过告密信，但得不出结论来。总局局长会前曾召集过各大报主编、评论员和名记者，要求他们给激烈的群众情绪降降温，并提醒他们：“极端分子现在已不仅是在言论上藐视总理，而是想动手要他的命！”警卫工作的漏洞及对刺客不摸底，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

顺便说一句，那位业余摄影师因此发了笔横财，以色列电视台二频道与发行量最大的《新消息报》买下了这盘录像带，

## 第十六章 无尽哀思

当埃坦·哈伯尔宣布了拉宾死讯后，守候在伊契洛夫医院门外的群众不禁失声痛哭。人们纷纷点燃了手头的蜡烛，没蜡烛的人则打着火机，用摇曳的人光悼念逝去的拉宾。《和平之歌》响彻以色列的夜空。

### 拉宾遇刺举世震惊 万民垂首哀悼英灵

拉宾遇刺身亡的噩耗震动了整个以色列，也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当晚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上，拉宾生前的座椅挂上了悼念的黑纱，当代总理佩雷斯悲痛地向亡者致意时，部长们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佩雷斯哽咽着说：“他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位罕见的领导人。在他最后的三年中，他以积极的态度在中东发起了一场革命。”

拉宾是在中东和平进程发展到关键时刻遇害的，人们对此深感悲痛和震惊。

人们感到悲痛的是，拉宾终于变成了中东的第二个“萨达特”，成了又一位为和平献身的著名政治家。人们发现他们两人的生命历程惊人地相似：都在青少年时代参加过抵抗运动；都出身军旅并都是著名战争英雄；都大胆地打破禁忌与宿敌议和；都义无反顾地在中东刮起和平旋风；都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都在本国盛大集会上被宗教狂当众枪杀。这一惊人的相似使人不由地问道：难道推动中东和平的政治家必须付出生命代价？难道努力结束阿以仇恨的人只配得到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以色列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刺杀国家领导人的事件，社会中形成了以暴力改变国家政策的趋势。许多以色列人对本国出了这种事深感耻辱。因为过去他们最爱炫耀的是以色列的民主制度，西方也吹捧以色列是“中东专制海洋中的民主孤岛”，现在凶手阿米尔使这一神话变成笑柄。试想，一个连总理都敢杀的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人们对以色列向何处去忧心忡忡。

他们不禁回忆起拉宾遇刺两周前讲过的话。当时拉宾在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纽约应邀出席了《时代》周刊举行的午餐会，并接受了该杂志编辑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人们发现他愁眉不展一直处于深思状态中，语调低沉言语缓慢。他们看得出，他是对近来不断出现的暴力活动深感忧虑。他对编辑说：“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实施和平计划的障碍，我要说那就是恐怖主义活动。”当时人们以为他指的是

不断制造爆炸惨案的哈马斯分子，现在他们明白了，拉宾也指出了以色列极端分子的危害性。

西方评论家指出，拉宾遇刺无疑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悲剧和一大倒退。它表明一些以色列人已不相信民主选举制的有效性，转而相信残暴的凶杀能起到改变政治航向的作用。他们进而指出，如果以色列人继续以这种野蛮的中世纪方式行事的话，日益加剧的暴力活动将毁掉这个国家。以色列著名作家约尼姆·卡尼乌克悲观地说，他曾希望以色列成为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现在这一梦想已彻底破灭，因为宗教已与民族主义搅合到了一起。这种结合极具破坏力，它使神权更容易敲榨政权，使得广大群众分不清是非。此况下，



教士拉比说准该死谁就得死，圣经取代了法律的地位。他继而不客气地指出，即使那些想和谈的以色列人的感情也是扭曲的，他们想要和平却不愿归还土地。他承认以色列是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是犹太人把巴勒斯坦人从故土上无情地赶了出去。他说：“这是以不公正对不公正。在我们眼里，我们比他们受到更不公正的待遇（注：指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他们眼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认识到这点的。”

国际组织和各国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或谈话，对这起卑劣的谋杀表示强烈愤慨，对拉宾遇害深表震惊和悲哀，并希望这一事件不要影响中东和平进程。但关注中东事务的各国评论家一致认为：拉宾之死将严重影响中东和平进程。拉宾遇刺前是用自己的老本钱，他的无人可比的资历、功勋、忠诚和威信，连推带拉着以色列人往前走。现在他一死，工党一时找不出跟他一样强的人，和平进程势必会出现一段停滞不前的局面。因为中东的事情，从古至今从来离不开杰出人物的作用。

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电以色列总统魏茨曼说：“沉痛获悉以色列国总理伊扎克·拉宾阁下不幸遇害，深感惋惜。拉宾总理是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以色列人民杰出的领导人。我与拉宾总理先后在北京和纽约的两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以色列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向拉宾总理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时，衷心希望拉宾总理为之努力的中东和平事业排除干扰继续前进。”同一天，李鹏总理也向以色列代总理佩雷斯发了唁电。6日，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率外交部高级官员前去以驻华大使馆吊唁拉宾总理。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严厉谴责这起谋杀，认为拉宾遇害对以色列和全世界都是个巨大损失。他认为纪念拉宾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坚持在中东地区创建和平。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声明中说：“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他是为其国家的自由而斗争的勇士，现在成了为其国家的和平而献身的烈士。拉宾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我十分钦佩他，我非常热爱他。由于语言无法表达我的真情，我只能用希伯来语说：‘沙洛姆，恰瓦尔！’（别了，朋友！）”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谴责暗杀的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贡献。白宫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亲率代表团到特拉维夫参加拉宾的葬礼。

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发表声明说：“这种对以色列勇敢的领导人和和平缔造者犯下的可怕和恐怖的罪行，使我感到非常悲痛和震惊。我希望我们大家——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有能力战胜这场矛头指向和平进程、指向整个中东局势的悲剧。”

约旦国王侯赛因表示，拉宾遇刺身亡消息对他个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但这一事件不会使中东和平进程脱离正常轨道，也不会助长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他表示将出席定于6日举行的拉宾葬礼。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对拉宾遇刺身亡表示哀悼，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拉宾为中东和平作出了许多努力。全面的和平是一项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肩负的使命。”他称赞拉宾是一位勇敢和讲原则的人。穆巴拉克以前因为中东没实现和平拒绝访问耶路撒冷，但这次他为拉宾破例去那里参加葬礼。

在短短两天时间里，有上百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发表讲话或发出唁电，对拉宾的遇害表示震惊和惋惜，并强烈谴责了杀害拉宾的罪行。

11月5日以色列政府为拉宾举行了国葬。当日，运送他的遗体的车队从

特拉维夫启程驶往耶路撒冷。这可以说是拉宾前往耶路撒冷的最后旅程。他的遗体安放在以军的指挥车上，身上覆盖着蓝白两色的大卫星国旗，各军兵种的6位将军和2位高级警官守卫在他的灵柩旁。数以千计的以色列人驾车尾随灵车而行，他们将参加吊唁活动并亲手把拉宾葬于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沿途的商业广告已连夜拆除，换上了沉痛哀悼总理的标语。最引人注目的标语，是以色列最走红的歌星所罗莫·阿尔茨一句歌词：“人们喜爱的人在哪儿？”

当车队经过拉特隆地区时许多人稀嘘不已，不少人泣不成声。他们都是原拉宾的“哈雷尔旅”的官兵，1948年拉宾率领他们为打通耶路撒冷补给线在这里血战过，当年旅长拉宾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们回想起：拉宾满头大汗地领着他们焊制土造装甲汽车；拉宾一次次地坐在头一辆车上打头阵；拉宾多次带领他们杀出重围；……当年的崎岖山路，早已修成宽敞的高速公路，你付出了多少心血！

当灵车抵达耶路撒冷后在街上徐徐行进时，人们悲痛地肃立在街道两旁默哀。连住院的病人都出来了，他们的病号服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拉宾的遗体停放在议会广场前供人们瞻仰。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排着长队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所有的人都说出了同一句话：“别了，朋友！”为方便人们参加悼唁活动，耶路撒冷的公共汽车司机们免费载客前往议会广场。从5日下午2时到6日上午11时，有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通宵达旦地排队向他告别，数十人在吊唁时悲痛地晕倒。对于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他在公众中的崇高威望。

拉宾之死也引起了许多反和谈人士的沉思。一位以强烈反和谈著称的卡尔梅楚定居者以前把拉宾视为该死的叛徒，他认为拉宾同巴解组织讲和只会毁灭以色列国。但今天他也来给拉宾送葬，尽管出发点不同。他坦率地对记者说：“我是来为暴力哭泣的，我是来为国民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哭泣的。我希望，我的到来有助于以色列人的团结。我的世界观，既要忠实于必须为之奉献一切的土地，也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之间仇恨的滋生。”另一位反对者名叫米夏埃尔·保罗斯，他是埃夫拉特的犹太定居者，在参加拉宾葬礼之前进行了反省。他并不隐瞒自己将继续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观点，但同时承认反对派过去太看重土地而忽视了其它价值。他引述旧约圣经说：“上帝下达的第一个戒令就是‘不可杀人’。因此有一个需要整个民族来承担责任的问题。我们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分裂状态，拉宾被刺也许有助于弥合这一可怕的裂痕。”

总而言之，他们并未放弃反对和谈的立场，但坚决谴责政治对手的卑鄙谋杀，而且认为此事丢了犹太民族的脸。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以色列人的同一性危机问题。电视台工作者米夏埃尔说：“我们谈论同一性的危机，是因为所谓犹太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神话破灭了。我们成了跟其他民族没什么两样的民族，这是一个优秀民族的悲惨结局。”多数人接受了犹太拉比耶胡达·阿米塔勒的观点，他领导着一个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他在报纸上撰文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真正战斗，是维护以色列国犹太人形象的战斗。”

但拉宾之死并未驱散政治谋杀的幽灵。他被刺之后，又有好几名部长接到匿名电话的死亡威胁，在耶路撒冷和一些犹太定居点中甚至出现了赞扬这次谋杀的标语。拉宾死后佩雷斯成了杀手们的头号目标，耶路撒冷大街上挂出一幅几米长的大标语，上面用大号黑字写道：“拉宾是和平的牺牲者，佩

雷斯是名单上的下一个，佩雷斯是希特勒的继承者！”标语上画着一只举向天空的愤怒拳头，这是被拉宾取缔的“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标志。还有人公开说他们以后还要这样做。塔普瓦什地区一位犹太定居者在电视上说，杀死拉宾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想把我们的房屋拱手奉送给阿拉伯人，他现在受到了应有惩罚。佩雷斯，你要当心点儿，如果你要坚持犯同样的错误的话，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看到这种事，听到这些话，许多欧美国家前来参加葬礼的“马哈尔”都不认识这个国家了。当初他们志愿驾机参加以色列的独立战争，看到以色列人是饿着肚子打仗，但那时他们很团结；现在以色列富强了，人均收入达到了1.4万美元，却闹得没法儿在一起过了。6日下午1时10分，用以色列国旗覆盖着的拉宾的灵柩由8名以军陆、海、空、警将领抬上黑色的灵车，车队由摩托车开道来到赫尔茨山的国家陵墓。这个50年代建造的陵墓位于大屠杀博物馆“亚德瓦谢姆”旁，用来安葬国家领导人和阵亡将士，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赫茨尔便葬于山顶，遍山的苍松翠柏给陵园增添不少肃穆气氛。拉宾的葬礼安排在黑色大理石筑就的赫茨尔墓前举行。赫茨尔墓左侧树立着以色列国的象征——七枝形烛台，右侧是一把象征着军队的三米高的利剑。墓前广场中搭建了一个黑色的大木台，用以停放拉宾的灵柩，周围是接待外宾的U型看台。

### 隆重葬礼贵宾赞颂 少女诺娅纯情动人

下午2点整葬礼仪式正式开始。葬礼完全按军队的礼仪进行，由军队的大拉比主持。全国各地汽笛长鸣2分钟，车辆停驶，行人驻足，停止一切活动，向拉宾致哀。墓地上的5000多位来宾肃然而立。

在拉宾之子尤瓦尔首先致悼词后，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称颂拉宾是一名杰出的、广受尊敬的领导人，他说，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代总理佩雷斯在悼词中说，拉宾的身躯可以被杀死，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之中，以色列人将沿着他开辟的和平道路继续走下去，直到与毗邻的巴勒斯坦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

克林顿总统在讲话中首先称赞了拉宾的人品，“他是个毫不做作的人，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我读过他的自传，他说1949年被派到罗得岛参加停火谈判。由于他过去从来没戴过领带，因此不知道怎么打领带。一位朋友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出门前先帮他打好领带，并教给他扯松领带的简易方法，他在罗得岛就是这样做的。不到两周前我们两人又重温了这一幕。”当时，拉宾接到加利秘书长出席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晚宴的邀请，按规矩男宾应该穿晚礼服出席。但拉宾没带那么多衣服，他也不在乎穿什么衣服上阵，便准备穿他那身公务西服出席宴会。克林顿觉得不妥，让助手借给拉宾一个蝴蝶结。但那个蝴蝶结太长，系上像挂在脖子上一样，需要弄短一些。见状克林顿过来亲自解决这个难题。他找了把剪刀把蝴蝶结剪短，然后缝合、熨平后帮拉宾系上。“这一情景，我将终身难忘。”在回顾了美国的政治谋杀史后，克林顿要求以色列人摒弃政治上的仇恨。他动情地说：“今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请求你们仔细观看这一悲惨的画面。你们可以看到今天为拉宾与和平而来的阿拉伯及全世界领导人。虽然，我们不能再听到他那

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但他的和平言行使我们再次来到耶路撒冷。”

最感人的讲话出自约旦国王侯赛因。1967年拉宾指挥的六天战争夺占耶路撒冷东区和西岸时，年青的国王穿着一身红白色的非穆斯林服装悄然离去，此后再也没有公开返回过耶路撒冷。今天，他百感交集地硬咽着说：“你作为一名战士而活着，你作为一名争取和平的战士而死去。我从未想到我会此时来到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在此悲痛地悼念自己失去了一位兄长、一位同事和一位朋友，人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和一名勇敢的士兵，一个即使在战场上也受到对方尊敬的士兵。”1951年侯赛因的祖父阿卜杜拉国王在耶路撒冷遇刺身亡，他本人也为保卫这个伊斯兰圣地战斗过。他动情地说：“我们对此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感到畏惧。我们不害怕任何事情，但害怕承认自己的朋友已经倒下，就像看到我的祖父倒下那样。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城市里，当时我就在他的身边，还是个刚懂事的少年。”无数次凶险和谋杀已使侯赛因国王看淡了死亡的威胁，他伤感地说：“当刺客最终得手的那天，我希望，我也能像我祖父和拉宾那样悲壮的死去。”

人们悲痛的高峰，出现在拉宾密友哈伯尔展示“和平之歌”的歌词时，人们看到那页歌词沾满了拉宾的鲜血。哈伯尔说：“我要朗诵的这页被鲜血染红的歌词，就像是你那天晚上唱完后才谱写出来的，就像你与和平遭到枪击之后谱写出来的。”他在众人悲泣中泪流满面地朗诵了歌词。许多外宾不了解，这首1969年创作的歌原先是首禁歌，曾被军方斥为失败主义歌曲，严禁在军队电台上播放。原因是歌词中流露出对当时消耗战中重大伤亡的悲哀和困惑，部分军队首脑对此极为不满，要求政府公开下令禁唱。但能表达人们情感的歌曲是禁不住的，犹如二战期间风靡欧洲的《莉莉玛莲》一样，戈培尔越骂它是失败主义歌曲，战壕里敌对双方官兵越起劲地唱它。后来以色列报纸就此展开了一场辩论，军方明显没道理，这首歌才开了禁。1993年9月以巴签署和平协议后，此歌成了一首万人齐唱的颂歌。拉宾遇刺后，以色列电台和电视台不断播放这首歌曲，在广场上和医院前守候他的消息的年轻人也低声吟唱此歌。这首歌的词作者雅各布·罗特希利特说：“我想，这首歌抓住了事情的实质。”

这是二战后世界各国政要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葬礼，这天共有44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对拉宾的送别。中国出席葬礼的特使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他访以期间发生了这起凶杀。阿曼和卡塔尔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但它们的大臣也参加了葬礼。

最后一位发言的人是拉宾19岁的外孙女诺娅·本阿兹。与其他人不同，她在发言中一句不提政治，通篇是一位纯洁的少女对慈祥外公的动人追忆，其情感之真切震撼了所有的人。

她说：“请原谅我今天不谈和平，我只想谈我的外公。外公，您总是从恶梦中惊醒，但我是昨天才进入恶梦，一个生活中没有您的可怕恶梦，一个深不可测的漫长恶梦。外公，您是野营中熊熊燃烧的篝火。现在我们孤独地身处荒野之中，感到阵阵寒冷和悲切。”

诺娅与拉宾的感情极深，从小她心目中只有外公没有父亲，她一直把拉宾称为“阿爸勒”（希伯来语，爸爸）。她母亲是拉宾的大女儿达丽亚，特拉维夫的一位开业律师。拉宾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因为儿子尤瓦尔是个勇武的军人，他自然更偏爱需关心的女儿一些。达丽亚跟父母生活的时间很短。1968年拉宾赴美任大使时，达丽亚没跟父亲同去，她即将高中毕业而且

还得服两年兵役。更使拉宾伤心的是她的经历颇为坎坷。她的前夫是位军官，1979年翻车受伤后与她离婚，留给她一对儿女。在这之后的几年中，诺娅和她哥哥乔纳森一直住在外公拉宾家，直到母亲与继父再婚后才搬走。出于这种原委，拉宾特别疼爱天真活泼的小诺亚，小丫头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他在小诺娅3岁时就教她下棋，后来又教她打网球，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陪她到花园里荡秋千。人们常说人老了往往变得跟孩子似的，老小老小大概就是如此吧。

小诺娅一直叫拉宾“阿爸勒”，久而久之，莉赫夫人也跟着这么叫上了。拉宾更神，他也跟着小诺娅叫起莉赫“萨普塔”来（希伯来语，外婆），而且执意要把正确读音“萨弗塔”发为“萨普塔”，老少隔代没大没小的倒也愉快。继父阿维对诺娅很好，用慈爱抚平了她心头的创伤，使她长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姑娘。她性格活泼开朗，在迪斯科舞厅度过不少时光。

出事那天晚上，诺娅与哥哥分别驾车去了广场。那里人山人海彩旗飘扬，人们用有节奏的“拉宾，拉宾”的齐声呼喊催促他讲话，诺娅心里暖洋洋的，充满了幸福和自豪感。但遗憾的是她看不见外公，人群、彩旗和标语像大墙似地挡着她，她跳了几次还是没看见外公。见状，哥哥用粗壮的双手把她托了起来，这才使她看到了外公。在聚光灯下，外公的脸还是那样红通通的，目光仍是那么慈祥，外公讲了些什么她没全记住，只有“和平”两字印入到她的脑海中。

外公讲完后，她和哥哥各自驱车回家。途中她没打开收音机，而是欣赏一盘最流行的滚石乐，身子随着拍子有节奏地晃动着。她全然不知以色列电台正在播送一条可怕的消息，一条有关她外公的可怕消息。

到家门口，她看见哥哥那辆本田车停在门前。“他倒跑得挺快”，她心里想着，关上车门向家里走去。突然房门大开，哥哥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灯光下他脸色苍白，嘴唇在哆嗦。继父在哥哥身后，浑身颤抖地嗷嗷道：“知道吗，他们冲你外公开枪了，他已被送进医院……”她脑袋嗡地一声叫起来，一把推开他们的手，冲进房间穿了件毛衣，转身跑下楼冲进汽车。她觉得心里堵得慌，“不，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他们……顶多打着他的腿，”却哭不出声音来，夺眶而出的泪水蒙住双眼，手抖得对不准车钥匙孔。继父忙把她扶下车，拉开自己的车门让全家人坐进去，猛踩油门车子窜上公路。哥哥打开了收音机，播音员不停报道这次刺杀和拉宾的伤势，车里的人全哭出声来。车子发狂般地飞奔，继父生平第一次连闯红灯，后面警笛声响成一片，他今天豁出去了。

医院门前围着大群人，见她们来自动闪开一条路，有人把她们领进地下室，一道长长的走廊通向手术室。诺娅一眼看见外婆，只见她孤零零地站在手术室前，挥着手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诺娅跑上去与外婆抱头大哭，一家人围作一团悲泣不已，一位医生忙把她们请进一间屋子。不久，内阁部长和拉宾的密友也被请了进来，屋里的空气变得愈发沉闷和潮湿。外婆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她一刻不停地哭泣，泪水在化妆过的面颊上留下斑斑黑点。她大声问想象中的丈夫：“他们为什么要用枪打你，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打我？”没人敢劝她，平时能说会道的部长们此时找不出话来安慰她。

诺娅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跑到过道里透透气。她抱着头小猫儿似地缩在墙根，脑袋里乱糟糟的，说不清想了些什么。耳朵里回响着外公常说的那句话：“诺娅，我向你保证，我是不会发生意外的。”后来，过道里平静

了下来，拉宾的密友西蒙·谢维思轻轻走过来，小声地对她说：“诺娅，他已经去世。”她吃惊地抬起头，接着放声大哭起来。外婆仍呆在那间屋子里，蜷缩着身子坐在病床上，口中喃喃地说道：“可怜阿爸勒，我难以相信能把您留在这里自己一人回去。”她不断重复这句话。

外公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停尸房里一张桌子上，身上盖着条白床单，像睡熟了似地安详。他的脸仍是红朴朴的，只有残留在嘴角的僵硬笑意表明他已故去。在回家的路上，诺娅看到医院外面的人群点燃了手中的蜡烛，一些年轻人打着火机，整个特拉维夫市到处是星星点点的哀悼火光。外婆莉赫仍不停地喃喃说：“为什么你先走了，而不是我？为什么他们要对你下毒手？可怜阿爸勒。”她很难想象自己怎么能离开丈夫一个人活着。她想起几周前的情景。那天住宅门外聚集了一些反和平的示威者，他们冲着拉宾夫妇呼喊：“拉宾是个刽子手，拉宾是个叛徒。”她开门先进去了，站在楼梯上面，仿效示威者笑着对刚进门的拉宾喊：“拉宾是个叛徒，拉宾是个叛徒”。拉宾笑着抢上去，“得了，宝贝儿，我在门外听够了！”说罢，一个吻。

许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在政治家们谴责这一卑劣谋杀时没多少反应，但当小诺娅动情地追忆外公拉宾时，他们不禁泪流满面，她的纯情流露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不约而同地问自己：“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我们带给这位姑娘的是些什么？”

下午3时，在拉比的祈祷声中，人们抬起拉宾的灵柩走了180多米，缓缓来到他那隐没在松林中的墓穴。达丽亚和尤瓦尔搀扶着自己的母亲、莉赫夫人戴着墨镜为亡夫送终，她不愿让拉宾看到自己哭肿了的眼睛。红色贝雷帽的仪仗队朝天排枪齐射为他送行，人们依次上前洒下一把把黄土，黄土和鲜花渐渐覆盖了他的灵柩。仍未从震惊和悲伤中完全恢复过来的人们，最后告别了这位为和平献身的领袖。

当达丽亚和尤瓦尔扶母亲离开墓地时，莉赫夫人喃喃说道：“阿爸勒，你躺在里面有什么感觉？”闻言40岁的尤瓦尔

大声痛哭起来。父亲虽疼爱姐姐，但对他也没少花心血。他小时爱哭，常厌食不吃东西，有时闹得妈妈都烦了。这时爸爸放下文件走过来，“怎么啦，小伙子，唔，这可不行。”他拿起汤匙。“知道这是什么吗？不，这是‘百人首领’式坦克的炮筒，冲撞对方坦克时可得把炮塔转过来。”他舀起一勺汤，喂进睁大眼睛的尤瓦尔的嘴里。“接着呢，还得炮塔转过来，”又是一勺喂了进去。“这样才能看清前面的敌人。于是，炮手探出身来，哒哒哒地开枪扫射，敌人一排排地倒下去，……”10分钟后，一盘汤全喂了进去。

### 阿拉法特夜访致哀 言犹在耳睹物思人

9日晚，位于特拉维夫市北郊拉马特·阿维夫的拉宾家中，仍笼罩着肃穆和悲痛的气氛。莉赫夫人斜靠在客厅里的高背沙发上，全身黑色的孝服，悲哀的眼神中显出几分呆滞，泪水不断地涌出。她身后是个长条桌，墙上悬挂着拉宾的遗照，全家人围在四周服侍着。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圆脸中年人在场，他名叫约西·金诺萨，是拉宾一家多年的私交。她们在等候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贵客，巴解主席阿拉法特。

惊悉拉宾遇害身亡消息后，阿拉法特要求到耶路撒冷参加他的葬礼。但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以色列政府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但同意他派巴勒斯坦自治体 6 位部长出席葬礼。事后，阿拉法特再次提出秘访以色列吊唁拉宾和慰问莉赫夫人的请求。代总理佩雷斯同意了这一合乎情理的要求，以色列安全部门周密地安排了这次夜间密访，只允许几名可靠的记者进行现场报道。

晚 10 点 15 分，随着一阵脚步声，阿拉法特在阿布·阿拉和阿布·马赞陪同下步入客厅。这两人是阿拉法特最亲密的助手，他们在与以方两年半的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阿拉法特今天大变了样子：头上是顶帽子，戴着宽边墨镜，一条长长的黑围巾，一件长袍，完全使人认不出来他是电视上的阿拉法特。阿维与安全机构共同安排了这件事，阿拉法特一行抵达特拉维夫一个偏僻机场后，阿维驾车把他们接来。进大门后阿拉法特脱掉衣帽，露出了人们熟悉的装束。

在客厅门口，阿拉法特默默地摘下了他的阿拉伯头巾“卡菲耶”，以此对逝者表示真挚的敬意和哀悼。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从不取下这条黑格白底的头巾，不管是在哪里也不论是在谁的面前，这条人们熟识的阿拉伯头巾已成了他的象征。但对拉宾，他打破了惯例。默哀毕，他疾步上前握住莉赫夫人的手，含着热泪对她说：“我的好妹妹，拉宾是一位和平英雄，他的不幸遇害使我失去了一位朋友。我和整个和平进程都将深深地怀念他！”接着，阿拉法特分别在莉赫、达丽亚尤瓦尔、乔纳森和诺娅头顶上吻了三遍，又吻了尤瓦尔面颊左右各一次，阿布·阿拉和阿布·马赞也分别向莉赫夫人表示了同样的悼念。

莉赫请阿拉法特一行就座，感谢他们深夜前来特拉维夫吊唁拉宾。尽管她以前从没见过阿拉法特，但对他并不陌生，拉宾生前曾多次谈起过这位以前的死敌现在的朋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缓缓地说：“拉宾生前说过，您是位值得信赖的和平伙伴。我预祝您在促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取得成功！”在谈话中，她一再称赞阿拉法特是拉宾的“和平伙伴”。拉宾多次对家人说过，“他确实相当不错”。

阿拉法特仍穿着人们熟悉的军服，摘去头巾后惊骇和悲痛使他显得有几分苍老。谈话间他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拉宾的遗照，一时走了神，似乎听到拉宾沉稳地说：“当我们决定与阿拉法特共同寻求和平时，他的处境非常糟糕。由于海湾危机，他丧失了 400—500 万美元的收入，在阿拉伯世界中空前孤立。”听到这里，阿拉法特不由地对着亡友点点头。“阿拉法特停止了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拉宾继续说，“从 1992 年以来他们没有杀死过一名以色列人，恐怖活动现在主要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搞的，其目的显然是要破坏和平进程。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恐怖主义，即自杀性的恐怖主义活动。我们根本无法阻止那些在汽车上或在包裹中携带烈性炸药并准备同归于尽的人。我们发现的只是些血肉模糊的遗骸，有时根本无法辨认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中东和平进程会不会逆转？也许会的，但恐怖主义绝不会成功。”

“目前，希伯伦市有 450 名犹太人和 12 万巴勒斯坦人。我们不得不留下三营军队来保护这些犹太人。我相信生命价值——犹太人的和全体居民的生命价值——决定着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能称希伯伦市为犹太城市，但那里有 450 名犹太人也是事实。为此需要实行军事统治，但绝不是针对 12 万巴勒斯坦人的。如果你问以色列人，是否相信居住在这一人口稠密地区会有安全价值，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阿拉法特很清楚，拉宾没下达过杀死他的命令，否则他活不到今天，在突尼斯家中被杀的杰哈德就说明这点。以巴签定原则宣言前拉宾收到了阿拉法特的保证信，他颇为感慨地说：“现在阿拉法特遇到了与我同样的问题。”他指的是自己人中有人对和解不以为然，甚至激烈反对。他准备向那些人：“阿拉法特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敌人，但我必须与他缔结和约来拯救以色列。”1982年8月21日，贝鲁特的巴解战士抗击以军的战斗接近尾声，阿拉法特率部登船撤往突尼斯。当他走上甲板时，他的脑袋出现在以军最优秀射手的瞄准镜中，距离只有100多米。阻击手的手指已搭在扳机上，他等待着射击命令，但这一命令始终没有下达。多年后人们听到佩雷斯说：“我不希望有人谋杀阿拉法特。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甚至我们都从未向他开过枪，我们本来是可以杀死他的。”1994年3月2日，外长佩雷斯又为他与右翼议员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时，他在议会赞扬阿拉法特是位遭到不公正诽谤的和平伙伴，正冒着被哈马斯分子杀死的危险与以方谈判。利库德议员耶霍舒亚一听腾地蹦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叫：“你应感到羞耻并该受到谴责！你为他的死感到遗憾吗？”佩雷斯也火了，气愤地喊道：“你们爱怎么攻击阿拉法特就怎么攻击吧，我曾日日夜夜地坐在他的对面。你们通过传媒看到的他，与实际看到的他，完全是两个人。他有生命危险。”他激动地重复道：“他有生命危险，因为他决定结束屠杀！”

在以色列，想“干掉”阿拉法特的人，不是一两个利库德议员，也不都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名叫利维·科恩的《耶路撒冷邮报》记者，1994年6月24日在报上发表了《刺杀阿拉法特》文章，公然鼓动人们刺杀阿拉法特。他以玩世不恭的语气凶险地说：“现在是圣城的狩猎季节，是周末猎手捕获一名出头露面的恐怖主义者从而实现一生雄心壮志的大好机会。”在文章中，他还附上一张出现在瞄准器十字线中央的阿拉法特头像。他接着说：“荣耀正在等待着你。这是用你的名字命名全国每个城市中一条街道的好机会，甚至可能用你的名字命名朱迪亚和萨马利亚某地一个城镇。”这篇文章受到国内外读者的严厉抨击。

阿拉法特夜访拉宾家的时间不长。他们返回加沙后，以色列政府发言人乌里·德罗米向新闻界披露了这一消息。

8日上午，在极其严密的保安措施下，佩雷斯主持了拉宾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听取了对刺杀拉宾事件的调查汇报。主管此事的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激烈指责它玩忽职守和严重失职。辛贝特的首脑不打算推卸自己的责任，出事后局长卡尔米·吉隆8日引咎辞职。但下面的人多少有些委屈情绪，一位高级官员沮丧地说：“要保护的领导人已被杀死了，再说什么也是白搭！”

拉宾遇刺后以色列情治机构进行了严密调查，拘捕了一些嫌疑犯进行审查，一些严重失职的高级官员也被撤职。但相对来说这是次要的事，最主要的是人们对犹太人的民族性发生了怀疑。正如评论家丹克指出的那样，拉宾被刺一事粉碎了一个神话：甭管有多大分歧，犹太人不会自相残杀。现在这种事情发生了，而且杀到总理头上，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神话其实早就破灭了，只是人们不愿承认而已。

最典型的是建国前的阿尔罗索洛夫被刺案。1933年6月16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哈依姆·阿尔罗索洛夫被人刺杀。犹太代办处是国联认可的伊休夫行政机构，是未来犹太国的“影子政府”。犹太代办处



的政治部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因而，可以说阿尔罗索洛夫是这个皱型犹太国的“外交部长”。他是个天生的外交部长，30 出头，风度翩翩，才华横溢，能干得都使本·古里安感到不自在。那天晚上，他和妻子在特拉维夫海滩上散步，有人上来用电筒照他的脸，并用希伯来语问他几点钟，随即便给了他一枪。本·古里安听到这一消息后悲痛地晕了过去。最后，大体搞清了刺杀他的原因：阿尔罗索洛夫少时有个叫玛格达·弗里德兰德的女友，此时已成为希特勒手下红得发紫的戈培尔的夫人。阿尔罗索洛夫想通过她走上层路线，尽量多从德国纳粹魔爪中救出一些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来，当时他们已面临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威胁。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人骂他与纳粹头目勾搭，骂得最凶的是修正派头目雅博廷斯基。他的报纸恶狠狠地说：“犹太人民不会忘记你去纳粹德国的访问，人民将对你的这一罪行作出回答。”果然，他们用子弹作了这一“回答”。

企图用暴力改变国家政策的举动也并非首次。

据以色列《国土报》说，1949 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年，有位 23 岁的犹太男青年闯入权作议会的特拉维夫电影院，用汤姆式冲锋枪对准当时的总理本·古里安和其他阁员。多亏保安人员反应快冲上去制服了他，否则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以色列现在是个什么样都很难说。这个刺客也是个宗教狂，他后来供认想杀死世俗的本·古里安和他的部长，然后再开枪自杀。他认为，能杀死他们拉比的话就会得到尊重，就可重建耶路撒冷一座犹太会堂。但人们有意淡化此事，竭力维持着这个国家团结的形象。后来此人仅被判了 2 年监禁。更可笑的是还有人从反宗教的角度行刺。同期一个名叫沙蒂尔·本·耶尔的人要杀死工党政权交通部长平哈斯·本·蔡恩，原因是他向宗教势力屈服，在安息日实行交通管制。

再往后的 1957 年，一个右翼分子摩西·德韦克向耶路撒冷议会大楼的部长席扔了一枚手榴弹，总理本·古里安、外交部长梅厄夫人、交通和运输部长摩西·卡麦尔受了轻伤，内政部长摩西·夏皮拉则受了重伤。这种在其它国家早该枪毙的凶犯，只在以色列坐了 15 年的牢。建国后，以色列的宗教狂和政治极端分子不断生事，他们差点儿就把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彻底炸毁。

散会后部长们没有马上离去，他们仍凝神注视着桌子上那个烟灰缸。那是拉宾的烟灰缸，有人特地把它摆出来，部长们睹物思人伤感不已。

1994 年 10 月 23 日早晨，拉宾在这间会议室里召开内阁例会，他宣布开会后便信手点燃了一根烟。但他发现部长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盯着自己，再一看，桌子上的烟灰缸全不翼而飞了。他这才意识到，今后不能在这里抽烟了，以色列的禁烟令今天生效。怪不得，刚才在走廊里卫生部长埃弗赖姆·斯内赫往他手里塞了一份禁烟令，欲言又止，原来是提醒他今天开会时不准再抽烟了。

但不抽烟怎么过，他这辈子就没离过烟，一天至少四包，离了烟浑身不自在。佩雷斯原先也抽得厉害，一根接着一根抽，后来听人劝戒了烟，老字辈中只有拉宾一个人继续抽。其实禁烟令早在 1993 年就制定出来了，但拉宾拒绝签署这一法令，在他看来它简直就是冲自己来的。无奈这个法令后来终于通过了，他当总理的总不能带头违法吧，他只好掐了烟宣布开会。

但那天他的思想集中不了，老开小差，部长们说些什么他一句没听进去。于是，习惯地一伸手，一根香烟飞到了嘴角上，“嚓”的一声点着了。“总

理先生，我必须提醒您，”他看见卫生部长扳下脸来对自己说，“这里不准抽烟，这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法令。再说，我们也不愿在这里被动吸烟。”这番话把他弄了个大红脸。再看其他部长，有的低头抿着嘴窃笑，有的干脆扭头装没看见，谁也不出来“声援”他。没办法，他只好再次熄灭了烟。

这事也不能怪阁员们不讲义气，他前不久刚把大伙儿的“饭碗”砸了，取消了“内阁餐厅”，人们能没意见吗？源来，以色列部长们个个能侃，开起会来一个赛着一个发言，每周内阁例会开个一整天是常事。于是，管事的便在每人面前摆上糕点和矿泉水，让大家侃饿了时吃点东西垫补一下，吃饱了有精神再往下侃。部长中胃口好的人多的是，一开会他们便大吃大喝起来，什么样的咀嚼动作和声音都有，就像那天早上他们是空着肚子来的。按照惯例，开会前有个让记者拍照的时间，记者们对这番西洋景很感兴趣，于是一些部长不大文雅的动作便频频见诸报端。这种镜头一多，旅游部长按捺不住了，跑到电台上责难记者说：“有些人总以为，以色列的部长们整天干的事就是大吃馅饼。”拉宾也恼了，因为这样下去影响很坏，老百姓会把自己的部长全看成酒囊饭袋。于是下令把这些点心撤到另一间房子里。这样一来，等于不让大伙吃东西了，因为谁也不好意思开会时跑到隔壁去吃点心。

但不管部长们怎么不满，他今天没烟就无法工作，当总理的总该有点儿“特权”吧？于是十多分钟后，一根烟又飞到了他的嘴角上，他第三次点着了烟。这次卫生部长斯内赫没再说什么，看他那个难受样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望着会议室里的“禁止吸烟”告示叹口气。于是拉宾成了总理府唯一违禁烟令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照样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新闻界也拿他没办法。

在国内抽抽也就算了，在国际场合他也照抽不误，他不善于也不愿意伪装自己。1994年10月26日，他与侯赛因国王主持了两国和约的签署仪式。仪式进行中当然不能抽烟，可把他给憋坏了。仪式结束时他烟瘾大发，顾不上与人交谈，急忙到休息室过瘾。到那儿一看，侯赛因国王也在里面，此时再扭头出去很不礼貌，况且也不能跑到克林顿面前抽吧。于是他灵机一动，忙掏出烟来递给国王一根，这是请求对方允许自己抽烟的委婉表达方式。聪明的侯赛因当然懂他的意思，马上掏出自己的“万宝路”回敬给他一根，并递上了火，于是他俩在吞云吐雾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萨缪尔·刘易斯说，拉宾极其厌恶虚伪作风，有时感情直露得像个孩子，并不看重自己的总理身份。以约签署和约那天，参加仪式的各国领导人个个穿得笔挺，唯有他穿着便服戴着白色棒球帽就上场了，在人群中活像个美国西部牛仔。直到最后到签字时，手下人才给他套上件西服。他还有他的道理：天气这么热，楞绷着面子穿那么多干嘛！由于刘易斯大使夫妇的网球水平与拉宾夫妇相当，所以每周都被请去与后者双打，打球中拉宾的直率性格表露无遗。每当莉赫夫人打了个臭球时，他总要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埋怨，还比比划划地说这个球该怎么打。而莉赫夫人也不示弱，他一抱怨立刻跳起来反唇相讥，拉宾打了臭球后她更是幸灾乐祸地大笑。输了球后拉宾会像个孩子那样赌气，绷着个脸不吭气。这时莉赫便会逗他：“你们瞧，今天有人因比赛而生气了。”拉宾一扭脖子：“是的，我的搭档让我输了。”说完他也不禁笑了。刘易斯感叹地说：“看来他们两人非常平等。莉赫夫人坐下休息时，拉宾忙给她披上毛巾；拉宾一放下拍子，莉赫就把矿泉水递过去，真是一对儿恩爱夫妻。”

在舆论压力下以色列情治部门动了起来，拘捕了“埃亚勒”和“卡赫”

等犹太极端组织的领导人。以方情治机构还在边界的埃雷兹与巴方同行会晤，敦促后者加强对阿拉法特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保护。他们还劝告阿拉法特等领导人不要老在一个地方集体露面，以免一旦遭到袭击被人一锅端。同时，以色列政府紧急从美国空运回数百件防弹背心，发给高级官员和他们的保镖穿用。但这多少有些亡羊补牢的味道。被抓的极端分子关不了几天，以色列不以言论定罪，哪怕是有人公开说他明天就要去杀佩雷斯。拉宾对此太大意了。一位与他有 30 多年交往的中东专家约翰·瓦拉契说：“他大意得使人吃惊。每当有人造访他，他常亲自为来访者开门。而且，他的家门经常是不锁的。”情势越危险，他越是经常深入到人群中活动。

1996 年 3 月 27 日以色列法庭对凶手阿米尔作出了无期徒刑的终审判决。他将在内格夫沙漠中一所死牢中度过终生。代总理佩雷斯说：“与阿米尔所犯下的可怕罪行相比，这种判决是相形见绌的。但我看不出有其它办法。”他确实没办法，因为以色列没死刑，终生监禁就是“断头台”。以色列迄今为止只判处过一例死刑，而且是个破例，被绞死的是纳粹屠犹太元凶阿道夫·艾希曼。

有人给阿米尔撑腰，以色列和美国都有人这样做，布鲁克林区的犹太人极端分子还募捐给他请最好的律师。因此他妹妹根本无所谓，在法庭上嚼着口香糖谈笑风生，好像她哥哥明天就会被保释出来似的。阿米尔毫无悔罪表现，宣判后他有恃无恐地说：“我知道，我给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民、以色列法律和以色列国家。要是没有我所采取的行动，以色列将由于拉宾所奉行的政策而遭到无法改变的破坏。这次审判自始至终都是做给人看的。这不是简单的谋杀问题，实质上关系到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命运。”

拉宾的外孙女诺娅在法庭外见到了这个残暴地夺去她外公的人，凶手阿米尔家在赫兹利亚区，与她的家相距不远。她说：“有两分钟我僵在那里，全身一阵阵战栗。”她将用《以悲痛和希望的名义》一书纪念拉宾。她说：“我从未想过报仇雪恨，因为复仇不会使我的外公复生，也许这是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已经不在人间。”

她常去墓地看望外公。拉宾的坟墓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碑前仅有几盆鲜花和瞻仰者放下的几张拉宾遗照。最奇特的是他的墓碑，由黑白各半的两块碑石构成。黑碑上仅镌刻着他的名字“伊扎克·拉宾”，连生卒年月和简短的碑文都没有。白碑更奇怪，上面连一个字都没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表明他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还是说他的一生功过参半？留待后人评说吧。

## 拉宾简历

(1922年3月—1995年11月)

1922年3月1日生于耶路撒冷。毕业于北加利利地区卡多里农校。

1941年5月参加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武装精锐部队“帕尔马契”，6月潜入黎巴嫩执行破袭任务。

1943年提为排长。

1945年升为营训导主任，10月作为副总指挥率部营救出200名关在阿色里特集中营里的约200名犹太非法移民。

1946年6月底被英军拘捕，在拘留营里关押了半年后获释。

1947年10月升为帕尔马契副司令兼作战部长。

1948年4月任新建的“哈雷尔旅”上校旅长。参加过“纳赫松行动”，为打通至耶路撒冷的通道血战拉特隆。参加过争夺卢德和拉马拉的战斗，以及占领内格夫和埃拉特的“霍雷夫行动”。同年9月与莉赫结婚。

1949年1月参加罗德岛的以埃停火谈判。

1953年在英国坎特伯雷皇家参谋学院进修一年。

1954—1956年任总谋训练部长，升为准将。

1956—1959年任北方军区司令。升为少将。

1959—1960年任总参作战部长。

1961年任副总参谋长。

1964年1月1日任以军第七届总参谋长，升为中将。

1965年与达扬共同指挥了“六天战争”，名声大振。同年，他被希伯来大学、德罗普西学院和布兰代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68年1月1日退出现役。

1968年1月—1973年3月任驻美大使。任职期间被《新闻周刊》评选为五个最优秀的驻美大使之一。

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中任“战争筹款委员会”主席。

1973年12月成为以色列国会议员。

1974年3月任梅厄夫人政府的劳工部长。

1974年6月3日出任以色列第5届第6任总理。同年与埃、叙两国分别签定军队脱离接触协定。

1975年9月与埃及签订了第二个军队脱离接触的过渡性和平协议。同时与美国签订补偿性的担保协议。

1976年间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多次秘密会晤。

1976年6月底领导了成功解救人质的“恩德培行动”。

1976年12月因违反了安息日教规被弹劾下台。

1977年3月被揭出存款丑闻。4月辞去工党主席职务。

1977—1984年间为国会中的外交及防务委员会成员。

1979年出版自传《拉宾回忆录》。

1984—1990年间任工党——利库德民族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

1985年提出从黎巴嫩撤军、在黎南部建立“安全区”等主张。

1992年2月重新当选工党主席，同年6月出任以色列第9届总理兼国防部长。

1993年经密谈8月与巴解草签和解协议，9月13日与巴解主席阿拉法特

在美国白宫签订巴以原则宣言。10月成为首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理。

1994年10月26日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签署了和平条约。同年12月，他与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同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1995年9月28日与阿拉法特达成塔巴临时协议。11月4日参加特拉维夫的和平集会后被刺身亡，享年73岁。

